厉以宁经济史文集

第1卷

# 希腊古代经济史

下册

厉以宁 著



厉以宁经济史文集


ISBN 978-7-100-10761-7
9 787100 107617 >
定价：180.00元（上下册）

# 下　册

# 希腊化国家篇



# 第九章　马其顿的崛起和逐步希腊化

本书上册的最后一章(第八章)已经分析了希腊城邦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交织的困境,指出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城邦在危机重重的时刻根本找不到出路,希腊城邦制度已趋于崩溃而没有任何方案可以拯救它。人们等待的是给予这一制度以最后一击,最后一击来自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国王菲利普二世。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征服希腊本土后,希腊城邦时期结束了,从此历史开始转向希腊化时期。稍后,菲利普二世之子亚历山大继位,除了继续巩固自己在希腊本土的统治以外,还率领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大军东征,先后占领了小亚细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阿富汗、中亚细亚一部分地区、印度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世界由此形成。

亚历山大不久去世。为了争夺帝国所留下的大片领土,于是亚历山大的部将们开始了激烈的继位战争,最终出现了三个王国相峙的格局,这三个王国就是:以马其顿和希腊本土为基地的安提柯王国,以西亚、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为基地的塞琉古王

国，以及以北非为基地的托勒密王国。此外还有一些独立或半独立的小王国。这些国家被称为希腊化王国。它们一直延续到陆续被后来兴起的罗马共和国所吞并。等到罗马共和国灭掉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王国——之后不久，罗马共和国也被罗马帝国所替代。

希腊化时期结束了，希腊化世界不再存在了，希腊化王国一一消失了。从时间上说，从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大继位到公元前 30 年托勒密王国灭亡为止，一共是 306 年。这段时间就是本书下册所要考察的时间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亚历山大帝国是如何形成和解体的，安提柯王国、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国是如何建立和如何灭亡的。本书将论述这段时间内希腊半岛、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迁，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动乱的交替。本书将尽可能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说明：希腊化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①

希腊化时期结束了，但希腊化文化却继续存在，即希腊化文化不仅存在于希腊化时期和希腊化王国，而且还存在于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和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在长达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希腊化文化自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以及不断同其他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这同样是本书下编所要探讨的问题。②

---

① 在国内出版物中，值得一读的是陈恒所著《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它在吸收了当代西方研究者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② 详见本书最后一章（第十四章）：“从希腊化文化到拜占庭文化”。

# 第一节　马其顿的崛起

## 一、希腊化的含义

"'希腊化'一词是19世纪内才创造出来的,用以说明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3年去世,到公元前30年最后一位马其顿籍埃及统治者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这段时间内希腊和近东的历史时期。"①在希腊化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王权形式,即由马其顿传统和近东传统综合而成的王权形式,它成为亚历山大死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结构。②

陈恒在《希腊化研究》一书中,对希腊化与亚历山大时代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的阐释。他写道:"亚历山大时代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亚历山大时代就是指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0年),汤因比就采用这种说法;狭义的亚历山大时代就是指亚历山大大帝在位统治的年代(公元前336年——公元前323年)。"③陈恒指出,他的这本《希腊化研究》中关于亚历山大时代是狭义的,即仅指亚历山大继位到去世这段时间。④

本书同意陈恒采取的狭义的亚历山大时代的表述。本书不

---

① T.R.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页注①。

④ 参看同上。

同意汤因比有关广义的亚历山大时代等同于希腊化时代的意见。这是因为，自从亚历山大去世到安提柯、塞琉古、托勒密三个王国的建立，继位战争不停，形势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已有较大的差异。后来，安提柯、塞琉古、托勒密三个王朝各自传承了若干代，到它们先后被罗马灭掉之前，同亚历山大大帝当初统治时建立的体制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用亚历山大时代来表示希腊化时代，是不准确的。

本书有关希腊化的时间范围，在前面已经说明，是从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位算起，而不是一般所说的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时算起，结束之时则没有差别，都以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国被灭为终点。为什么本书以亚历山大继位算起，主要考虑的是：既然是讨论希腊化时期的开始，那就应当把马其顿王国的希腊化也包括在内，因为如果没有马其顿王国的希腊化，那就谈不到亚历山大从进入小亚细亚以后就一直不懈地推进希腊化的政策，也更谈不到把希腊化在西亚和北非的不断推进的事实。所以把亚历山大去世作为希腊化时期开始的说法，在本书看来是有缺陷的。

既然强调马其顿王国本身先希腊化，然后才有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西亚、北非地区的希腊化，那么为什么希腊化时期的起点不从菲利普二世继位开始而从亚历山大继位开始呢？本书主要考虑的是：一方面，远征西亚、北非的作战部署是亚历山大继位后制定的，也是由亚历山大率领大军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亚历山大继位后，希腊本土才由马其顿人牢牢地控制，而没有再发生像菲利普二世死亡后希腊城邦又纷纷宣告独立，试图恢复马其顿人南下前的政治格局，特别是，亚历山大采取了把希腊人组织

到远征西亚、北非的军队中去，从这时起，亚历山大军队才成为一支由马其顿人—希腊人组成的军队，亚历山大依靠这些军队建立了他的帝国。也就是说，希腊化事业的创造，开始于亚历山大继位之时（公元前 336 年），而不是开始于亚历山大去世之日（公元前 323 年）。

本书的上述看法，只是一家之言，谨供研究者们参考。

希腊化一词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它理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本书在讨论希腊化各王国时，都以它们各自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变迁为主要内容，其中包括了这些体制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它们在哪些方面受到希腊城邦体制的影响，哪些方面受到东方国家原有的体制的影响，这些影响反映于哪些方面，最终又演变成什么样的混合体制，即希腊化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希腊化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毫无疑问，希腊化一词还包括了文化上的意义，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的社会文化生活传统同本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传统融合在一起了。这一地区的各个希腊化王国，尤其是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那里的国王们都是原籍马其顿人，他们把希腊人大量引进到自己所统治的地区，依靠希腊人，利用希腊人，并且按照希腊方式新建了城市，希腊文化逐渐对本地的城市居民发生影响。[①] 直到两百多年后，当罗马人吞并了这些地区时，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②] 至于安提柯王国，由于它原来就是在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建立的希腊化国家，它自然会保留更多

---

① 参看 T. R. 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98—199 页。

② 参看同上。

的希腊文化，但同时也吸收了东方文化的因素，因为随亚历山大出征西亚、北非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后来回到了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把东方文化的影响带回到安提柯王国。因此，在考察希腊化时，文化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领域。

下面，让我们从马其顿的历史谈起。

## 二、早期的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不在希腊本土境内，而是位于希腊以北的地区。希腊人很早就知道这块地方，尤其是他们很早就同马其顿沿海岸的一些城镇有过贸易往来，通过商人同当地居民的交往而对马其顿有所了解。① 但当时的马其顿，除了宫廷中使用希腊语以外，民间是不使用希腊语的，希腊文化也没有渗入这块荒野的土地上。② 在希腊人的眼里，马其顿大部分地区还是一块蛮荒之地，野兽出没无常，没有什么文化，土著居民也没有什么教养。希腊人感到，马其顿人是粗鲁的、强悍的，山地居民住在树林里和峡谷中，喜欢在密林间追捕熊和狼，或者搏杀野猪。③ 总之，希腊人从不把马其顿人看成是希腊人。

的确，马其顿人是另一个民族，但又同希腊人有一定的血缘联系。尽管马其顿一直“被希腊人视为蛮荒之地，从而被排除在希腊世界之外，实际上，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近亲，应该属于多

---

①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32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35页。

利亚人”[1]。马其顿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也同希腊语有某种相近之处。[2] 有趣的是，马其顿却从不小看自己，“他们称自己的祖先是希腊人”[3]。

但不管怎么说，在马其顿王国崛起以前的很长时间内，它是孤立于希腊世界之外的。这可能也同马其顿地位偏僻有关，希腊人无论当初是南下还是东进，都把马其顿撇在一边了。在希腊城邦建立以后的大移民过程中，包括雅典在内的一些希腊城邦的移民，曾经向北移民，但主要是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沿岸地区，建立移民城邦或移民区，而没有在马其顿停留。

公元前 7— 前 6 世纪，当希腊城邦经济有较大发展时，马其顿由于多山与丘陵，所以仍是以牧业为主，兼事农业，经济落后。马其顿王国大约是在公元前 6 世纪中叶以后建立的。国王由各个部落共同推举出一位军事统帅而产生。这里也不曾像希腊本土那样建立城邦和形成城邦制度。马其顿国王采取世袭制。国王在形式上是由贵族们协商推举出来的，实际上，由国王和一些强大的贵族家族一起组成了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的成员同国王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之间的依附与忠诚关系”[4]。大臣、幕僚和军事指挥官由国王任命，他们统称为“同僚”，“而且不同的国王会选择不同的‘同僚’”[5]。相应地，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

---

① 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年，第 300 页。

② 参看 T. R. 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88 页。

③ 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年，第 300 页。

④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83 页。

⑤ 同上。

集团成员们也获得国王的丰厚赏赐,包括土地等。[①] 如果说国王的权力多少也受到贵族家族的限制的话,那么受限制的程度将因国王本人的威信、权力和士兵对国王的忠诚程度而定。[②]

即使马其顿王国建立了,但它依然不是希腊人的国家,“马其顿从来就没有被当做是希腊的一部分”[③]。而从生活上看,这时的马其顿仍同过去一样,未摆脱未开化状态,或者至多只能说处于半开化状态。比如说,马其顿人和色雷斯人一样,都还保留了蛮荒人的祭礼,他们的“酒神的女祭司吃的是生山羊肉”[④]。在这种祭礼后的生山羊肉的盛宴上,崇拜者在吃了生山羊肉后,就以为“可以分享神的生命”[⑤]。所以当时的人认为把生山羊肉吃掉“是一种令神高兴的献祭活动”[⑥]。

又据亚里士多德记述:“在马其顿,曾经设置过一条专律,凡尚未杀过一个敌人的男子,腰间只可束络〔不得佩带〕。”[⑦]这就是未开化部落的风俗习惯。亚里士多德同马其顿人有过较多的接触,他又做过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所以他对于马其顿人风俗习惯的记述应是可信的。

那么,马其顿文化中为什么会有希腊文化的成分?一种可能是:马其顿王国与希腊本土相距不远,希腊文化毕竟是当时的

---

① 参看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83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84 页。

③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48 页。

④ 赫丽生:《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谢世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4 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346 页。

先进文化，马其顿王国的宫廷人士和贵族阶层喜欢希腊的文化和时尚，因此多多少少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①]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在马其顿人口中并不占多数。"马其顿的平原是国王的统治最牢固的地方，居住在此的人说希腊语。"[②]他们之中就包括了宫廷人士和贵族家庭。但马其顿的山地居民则不然。"上马其顿则是山峦起伏的地区，它是操各种语言〔都不是希腊语〕的各个武士部落的家乡"[③]，他们很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些人根本没有受到这种影响。

马其顿王国产生后，由于位置偏远，又不在希腊本土通往黑海沿岸地区和小亚细亚的陆地通道上，所以不被当时西亚强国波斯帝国所注意。大约在公元前 510 年，波斯帝国的军队从小亚细亚北上，占领了爱琴海北部沿海岸线一带，距离马其顿已经很近了。马其顿国王阿梅恩塔斯一世向波斯帝国投降，波斯接受了。[④] 但马其顿王国臣服于波斯帝国的时间不长，公元前 492 年左右，马其顿人乘着小亚细亚希腊人反抗波斯统治之际，摆脱了波斯的统治。[⑤] 紧接着爆发了希波战争，波斯军队侵入希腊境内。由于波斯军力强大，这时马其顿王国又向波斯人屈服了，但它只是"表面上投降波斯人，暗中支持希腊人"[⑥]。

希波战争初期，波斯军队攻势凌厉，他们越过博斯普鲁斯海

---

① 参看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10 页。

② 阿克罗伊德：《古代希腊》，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07 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扎尔恩特："马其顿背景"，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8 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 年，第 71 页。

峡进入色雷斯，也可能经过马其顿境内一路南下，不过没有在马其顿停留。到希波战争第一阶段末期，希腊军队反攻时，希腊军队陆续收复了色雷斯和黑海沿岸地区，但也没有进入马其顿境内。这段时间，对马其顿来说，正是发展经济的好时机。也正是"从公元前5世纪起，它已经加入了希腊诸国的贸易圈，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①。当然，这段时间更利于马其顿积蓄力量，伺机南下，因为南下是马其顿王国从国王、贵族、将军到士兵的多年夙愿。

马其顿的一部分贵族对南下最为积极。他们"渴望更完全地成为希腊世界的一部分"②。在这以前，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接受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相当程度的希腊影响，他们的儿女常常拥有希腊家庭教师并且在雅典和其他希腊城市生活度日"③。但希波战争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不是马其顿南下的最佳时机。何况，这时海军力量还相当强大的雅典仍拥有爱琴海上的霸权，如果马其顿陆军(当时马其顿还只有陆军)能胜利攻入希腊本土，而雅典的舰队却北上在马其顿附近登陆，马其顿岂不是老巢尽失，背腹受敌？所以马其顿这时只好静观形势变化。

马其顿在这种形势下，继续抓住商机，同雅典扩大贸易往来。公元前5世纪，雅典为了增加自己的海军作战能力，需要建造大批舰船，于是从马其顿购买造船所用的优质木材。这项交

①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年，第73页。

② 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③ 同上。

易,“既要求硬通货,也要求善用外交手段”①。木材生意对马其顿和雅典双方都是有利的。于是雅典从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开始,同马其顿之间建立了较好的政治关系,马其顿成了雅典的优质木材的供应商。②

马其顿对外扩张的机会终于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进行,几乎把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卷进去了:不是站在雅典一边,就是站在斯巴达一边。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内的各个希腊城市,凡是卷入战争的,都是在自毁。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马其顿因为过去一直担心雅典强大,所以一度帮助过斯巴达。③ 但稍后看到战争形势对雅典越来越不利,马其顿反而又趋于中立,为的是准备南下。以前马其顿对于扩张的路线有所考虑:先南下,还是先东进或西进?西进,强敌不少,困难重重,而且会得不偿失。④ 东进,比如说,夺取黑海沿岸地区,那就会同雅典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这里是雅典粮食供应的生命线,雅典是不甘心丢掉粮食的。⑤ 现在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不仅陆军遭到严重损失,而且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无论南下或东进的障碍都消失了。于是马其顿决定采取先南下、再东进的战略。

公元前413年,马其顿国王阿奇拉当政(公元前413—前

---

① 加布里埃尔森:“希腊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④ 参看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4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年,第220页。

⑤ 参看同上。

399年)。他在希腊战乱时期加紧扩充实力,并将都城从内地迁到靠近海岸的培拉。由于战乱中希腊文化界人士难以在希腊本土有所作为,所以阿奇拉国王尽量吸引他们前来培拉城,以便加速对希腊文化的吸收。到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已经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军队的王国了。总之,"马其顿乃后起之邦,它没有希腊各邦所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也不像希腊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内战、外战,它是以一种新的力量态势走上巴尔干的历史舞台的"①。

## 三、菲利普二世

阿奇拉被认为是一个注重文治的马其顿国王。② 但阿奇拉国王始终没有放弃南下的意图。阿奇拉在位时,由于贵族势力很大,对国王有牵制作用,所以马其顿内部王权与贵族世家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这也影响了马其顿军队南下计划的推行。情况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发生变化,强人菲利普二世于公元前359年登上了国王宝座。他就是后来称霸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被称为"亚历山大之前勇者之中的最勇者"③。他勇于作战,以致在战场上被打瞎一只眼睛,折了一条肩膀,一条腿也瘫痪了。

菲利普二世在继位前,曾在底比斯生活过,对希腊文化比较了解,他本人也勤于学习希腊文化。他作为马其顿国王,决心一

---

① 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27—128页。

②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③ 同上。

手加强集权制，并大力扩充军备，一手加快引进希腊文化，促进马其顿早日摆脱“半开化”状态。

在政治方面，为了加强国王的实权，他大大抑制贵族世家的势力，打击那些不顺从国王意志的大族大家，笼络一批拥戴他的贵族，建立了把军队大权集中于国王手中的专制体制，从此结束了马其顿王国建立后数百年存在的实际上由国王与贵族世家共治的氏族社会传统。

在文化方面，菲利普二世以身作则，自己努力学习希腊文化，而且号召贵族要起表率作用，要改掉不文明的陋习。在菲利普二世的努力下，马其顿同希腊城邦之间的文化差距缩小了。这个成绩是不容忽视的。

菲利普二世对马其顿王国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军队的整顿和重组。要知道，希腊各个城邦在陆地作战时一向依靠步兵，而波斯帝国则拥有一支强悍的骑兵，所以在希波战争第一阶段，希腊步兵同波斯骑兵在雅典周围交战时，波斯军队始终占据优势。菲利普二世汲取了希波战争的经验教训，决心建立一支马其顿骑兵。菲利普二世很可能着眼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希腊周边的新形势，他认为，今后马其顿王国最大的对手已经不是包括雅典、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城邦了，因为这些城邦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兵力都已削弱；最大的对手也不是波斯帝国，因为波斯帝国兵力虽然强大，但已不如希波战争以前，何况，目前波斯帝国主要想称霸于希腊本土，它唯恐希腊各个城邦联合起来，所以一心挑拨离间，对希腊城邦实施半拉拢、半恐吓的做法，“国王的和约”就是这样通过威吓和欺骗而强加给希腊各个城邦的。马其顿王国地处偏远，此时尚不在波斯国王的视界之内。那么，马

其顿王国此时的最大对手是谁,谁对马其顿王国的威胁最大?这就是出没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蛮族人,他们一直想从巴尔干半岛南下,马其顿首当其冲。所以菲利普二世重组军队和建立骑兵的首要目标还是为了消除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威胁。① 当然,这并不排除另一个目标,即同波斯人对抗。马其顿的骑兵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农民中招募来的,另一部分则是雇佣兵。

对于步兵,菲利普二世在他所熟悉的底比斯军队作战方式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步兵采取密集型的阵式,称作"马其顿方阵",即"士兵排成 16 列,将矛头举过前列兵的头部或是放在前列兵的肩上,使每一方阵形成铁墙"②。同时,步兵都配备了长矛、铜盔和甲胄,并握有盾牌。作战时,步兵和骑兵互相配合,骑兵充当步兵方阵的前锋并在两翼掩护,步兵列成方阵前进,步兵方阵的后面是弓箭手,箭从前列兵的头顶上掠过,射向前面的敌人。这样一支步骑配合的马其顿军队,其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希腊城邦的军队。③

菲利普二世麾下的马其顿军队,人数并不多。"公元前 358 年,菲利普二世约拥有 10,000 名步兵和 600 名骑兵"。④ 公元前 358 年,是菲利普二世继位后的第二年。后来,菲利普二世不

---

① 参看 T. R. 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74 页。

②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48 页。

③ "马其顿长矛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兵器,其长度是希腊长矛的二倍。"(阿克罗伊德:《古代希腊》,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08 页)

④ 塞孔达:"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陆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25 页。

断扩充兵力，主要依靠雇佣兵的招募。在当时的希腊一些地方，许多年轻人苦于没有出路，充当雇佣兵被看成是一种很好的职业。[①] 虽然充当雇佣兵的薪酬不多，但有另外的酬报，如分享战利品，或从新城市得到所授予的一块土地。[②] 这对希腊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而菲利普二世对待加入马其顿军队的雇佣兵采取高薪的做法，即从菲利普二世控制的菲利比附近的金矿得到的黄金作为犒赏分给他手下的雇佣兵。[③] 这对希腊年轻人就更有吸引力了。这些雇佣兵悍勇善战，愿意效忠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为了得到更多的兵力，除了使用雇佣兵外，还在“马其顿方阵”中补充了加盟国家的分遣队。[④] 例如，其中有来自巴尔干半岛上一些国家的投掷手，还有来自克里特岛的弓箭手。[⑤]

菲利普二世还利用重组军队的机会来削弱马其顿王国内部贵族的权力。多年以来，马其顿国内的贵族世家一直不受国王控制，历届国王对他们无可奈何。菲利普二世在仿照底比斯方式在步兵中建立“马其顿方阵”和另建骑兵的同时，“把素来骄横难制的贵族编入受国王统率的骑兵”[⑥]。另外，马其顿境内还有一些不服从国王的部落，菲利普二世亲率军队予以平定，从而

①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 年，第 80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塞孔达：“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陆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29 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 年，第 73—74 页。

扩大了王权直接控制的范围。①

至此，菲利普二世认为南下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实现自己的南下计划。从战略上考虑，"他懂得，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有一个希腊同盟者是至关重要的。他唯一的策略就是首先征服希腊以建立他的可靠后方"②。下一步目标，就是以希腊为基地，挥兵东进，先把波斯军队赶出小亚细亚，解放被波斯帝国统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移民城市，然后征服西亚大片地区。"他断言，对亚洲的征服是完全可行的，亚洲的富庶像神话一样诱人，征服者的荣耀、数不清的财宝在等着他们。"③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马其顿境内有优质的木材资源，包括雅典在内的一些希腊城邦都向马其顿购买优质木材，建造舰船，但菲利普二世不重视海军，也没有建立舰队的打算。④ 这是为什么？这可能是因为，菲利普二世认为要南下征服希腊，有一支精锐的陆军作战部队已足敷应用，用不着花费大笔资源去建造舰队。如果征服希腊本土之后再跨海东征波斯帝国，那时就可以利用希腊的舰队而不必自己再来建立海军。⑤

## 四、希腊境内的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

马其顿王国崛起之时，希腊境内正处于城邦制度危机和社

① 参看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年，第74页。

②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舒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海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⑤ 参看同上。

会危机交织的困难境地。正如本书上册最后一章(第八章)中已经概括的,当时希腊各个城邦经济衰败,社会动荡,思想混乱,人心不稳,茫茫然不知出路何在。希腊各个城邦自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日起,就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一个城邦有力量能把其他城邦(哪怕只是一部分城邦)再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较强大的力量,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雅典来说,经济虽然有所回升,但实力已大不如前,手工业和商业都难以恢复到过去极盛时期的状况,更不必说农业生产了。银矿恢复开采,产量却再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① 雅典的财政支出浩大,财政收入却剧减,日子很不好过。

应当指出,在马其顿军队南下之前的几十年间(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一些城邦仍在筹建各种各样的同盟,只是这些同盟都不巩固,时常发生变动。② 甚至以雅典为首的同盟也是如此,根本无法与过去的提洛同盟相比。谁来牵头统一希腊世界呢?马其顿在争夺希腊世界霸主地位的竞争中,显然是一匹"黑马"。③ 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因为当时谁也不曾料到正是马其顿把希腊世界统一起来并成为希腊世界的真正的霸主。

菲利普二世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并准备南下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希腊各个城邦。有人高兴,认为希腊世界从此可以摆脱困境了;有人发愁,不知所措,惊呼希腊城邦的末日来临了。在雅

---

① 参看T.R.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哈里斯:"马其顿早期帝国史导论,公元前360年—前300年",载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历史论文集(公元前360—前146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典，这两种情绪并存，因为雅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马其顿大军南下的首要目标，有人认为是福，有人认为是祸，于是很快在雅典形成了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1] 两派的领袖人物都是雅典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就是前面提及的：亲马其顿派的领袖人物是伊索克拉底，反马其顿派的领袖人物是狄摩西尼。[2]

关于伊索克拉底和狄摩西尼的言行，前面已经提及，这里根据他们对当时希腊形势的评论，再做一些补充。

伊索克拉底的看法是：在希腊各个城邦已经危机四起而又没有一个城邦能够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南下不正是一件好事么？否则希腊人怎能摆脱被波斯帝国所控制的命运呢？这就是泛希腊主义的论点。伊索克拉底认为，马其顿是全体希腊人的希望所在，它会“把雅典从‘流浪分子’的骚动中拯救出来”[3]。伊索克拉底甚至指望菲利普二世能够领导全希腊去攻打波斯，用掠夺东方的财富来解救希腊各个城邦。[4] 这种扩张主义的言论岂不是有悖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普遍谴责扩张主义的言论么？对这个问题应做如下的分析：要知道，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希腊各个城邦都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深受其害，所以希腊人都斥责城邦的对外扩张，但这种批评是针对那种以损害其他希腊城邦的利益和以牺牲其他城邦

---

① 孙道天在所著《古希腊历史遗产》一书中，认为亲马其顿派姑且可以称为“连横派”，反马其顿派姑且可以称为“合纵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② 参看本书，第八章第三节。

③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年，第74页。

④ 参看同上。

的希腊人为代价的对外扩张。[①] 至于把“蛮族”统治之下的地区纳入希腊世界，尤其是对波斯帝国及其统治下的地区进行攻击，那就不在受谴责之列，因为这是完全正当的行动。[②] 这样，亲马其顿派很自然地把欢迎菲利普二世率军南下并带领希腊人向亚洲扩张视为使希腊摆脱自身社会危机的手段。[③] 也就是伊索克拉底在演说中所说，要“把菲利普二世的领导当作对波斯长期存在的威胁的一种平衡力量来加以欢迎”[④]。

狄摩西尼作为反马其顿派领袖人物，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这一派看来，马其顿本是蛮荒之地的一个蛮族国家，在那里，一方面没有经历过希腊所经历过的城邦政治阶段，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央集权、国王独揽大政的独裁国家；另一方面，马其顿人没有受过希腊文化的熏陶，没有教养，粗野成性，只知道打打杀杀，而且菲利普二世本人就是一个在习惯上和气质上同希腊传统格格不入的野蛮人。[⑤] 如果让这样的人带领军队来统治希腊，那绝对不是拯救希腊，而是把希腊推到了绝地，希腊文化也就从此消失了。因此，狄摩西尼在演说中，要“向众人警告有领土野土的马其顿国

---

① 参看奥斯汀和维达尔-纳奎：《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导论》，英译本，奥斯汀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 年，第 152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⑤ 参看哈里斯：“马其顿早期帝国史导论，公元前 360 年—前 300 年”，载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历史论文集（公元前 360—前 146 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 页。

王对希腊世界的威胁”①。可以这样概括:反马其顿派同亲马其顿派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对马其顿的绝不信任。②

以上是从知识界精英的观点所做的分析。社会上各个阶层和职业的人士对马其顿南下这件事的看法,要比知识界精英分子的观点复杂得多、现实得多。这是因为,无论是欢迎马其顿南下还是反对马其顿南下,都涉及各自的利益问题,即利益是减少了,受损害了,被剥夺了,还是利益不变,甚至利益还有所增长。这里排除个别人的利益,只谈集团或阶层利益,如贵族利益、平民利益、农民利益、商人利益等。

贵族关心的问题:对希腊各个城邦的贵族阶层来说,欢迎还是反对马其顿南下,主要取决于马其顿控制希腊各个城邦以后对待当地贵族的政策。如果马其顿依靠当地的贵族进行统治,任用当地贵族为各级官员,并让贵族继续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和财产,那么贵族不反对马其顿南下,否则他们就对马其顿南下持反对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平民关心的问题:希腊各个城邦的平民对马其顿南下的心情相当矛盾,平民们最大的愿望,一是能够安居乐业,虽然不一定能变得很富裕,但至少也应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同时致富的途径不应被封死,只要个人努力,致富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二是公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力不应被取消,特别是在雅典这样的通过历次制度调整公民已取得不少政治权利的城邦,平民更加关心这些政治权利在马其顿南下后还能否保留下来(如参与

---

① 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② 参看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选举城邦领导人的权利、监督和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利等)。结果，平民们心情是矛盾的，因为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其顿南下后定会恢复城乡秩序，公众的生活有可能安定下来，治安也会改善，而另一方面，马其顿王国如果按照既定的中央集权体制来统治希腊城邦，平民已经争取得到的政治权利即使未被完全取消，但无疑会大大削减，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可见，希腊城邦的平民们普遍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来看待马其顿的南下。他们拿不准究竟是欢迎马其顿南下还是反对马其顿南下。一切根据马其顿来到以后实行的具体政策而定。

农民关心的问题：希腊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各城邦的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连斯巴达这样历来以公平为准则的城邦，也因小农纷纷失去土地而陷入社会危机之中，其他城邦土地集中现象的加剧更不必说了。所以希腊本土上，农民对马其顿南下的土地政策最为关心。他们在思考，如果马其顿王国一旦控制了希腊各个城邦，它会不会重新分配土地，照顾无地、失地的农民？会不会让希腊的农民重新成为小土地所有者？或者，马其顿王国会不会采取相反的做法，放任马其顿贵族夺取希腊农民的土地，建立大种植园、大牧场？如果马其顿采取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农民将拥护马其顿入主希腊本土；如果马其顿贵族夺取希腊农民的土地，农民会奋起反抗，不会退缩不问。所以这一切都将由马其顿南下后的政策措施决定。

商人关心的问题：商人们考虑得较多的是，马其顿王国统一希腊本土之后，商路是不是更加通畅了？经营自由的局面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商人的发财致富的门径会不会被马其顿的贵

族和商人所垄断而不让希腊本土的商人得到好处？还有，如果马其顿王国在控制之后又收回了被波斯帝国强占的小亚细亚希腊移民城市，或者进而击败波斯帝国，攻占了西亚、北非，那么对希腊商人来说，岂不是扩大了市场，这能不能让希腊商人受惠？因此，希腊商人同样处于观望的状态。商人们是讲实际的，他们不像希腊的知识界精英那样从政治制度上或从文化上考察，而更加关心的是本身的利益变化。

最后，马其顿王国控制希腊本土后会怎样对待蓄养和使用奴隶的希腊家庭和希腊的工商业企业，似乎并未引起当时希腊人的关注。这可能由于他们知道，马其顿王国也是一个使用奴隶劳动的国家，奴隶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成分也在马其顿境内流行，所以不担心马其顿控制希腊本土之后会下令禁止买卖奴隶和役使奴隶。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在希腊社会危机加剧以前，不少生活较为安定的一般希腊居民家庭也都使用少数奴隶从事家务活动，一般小手工作坊因为生意还不错，也使用了少数奴隶作为劳动力；①后来，希腊社会危机加深了，为了减轻负担，原来使用奴隶的家庭和小手工作坊释放了一些奴隶；②甚至有些男子因生活状况不佳，找不到妻子，便同女奴结婚，同时释放了她们。③ 这样，一般居民家庭和小手工作坊因为已经不

---

① 当时，“谁要是不得不在生活中不用任何奴隶，那么无论如何是一个无产者（在古代的意义上）。”（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690 页）

② 也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先允许奴隶到外面去自己经营手工业或商业，等他们积累了一些钱财后再回来赎身。（参看同上书下册，第 707 页）

③ 在古代，“释放自由可能大多数服务于有效的缔结婚姻，即通过赎买婚姻的候补者促成的”。（参看同上书下册，第 706 页）

役使奴隶了，他们也就不关注马其顿南下后有关使用奴隶的政策了。

## 第二节　马其顿对希腊的征服

### 一、菲利普二世南下

菲利普二世的南下，对希腊人有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自从马其顿人进入历史舞台，巴尔干半岛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才真正开始"①。这是因为，在菲利普二世南下之前，尽管马其顿王国已存在两三百年了，但希腊人仅以马其顿和色雷斯以南的地区为活动范围，更确切地说，他们"基本是以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为主要活动区域，其文化影响尚未深入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区，或者说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区的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达吉亚人还没有全面卷入古希腊人的活动"②。这一格局是菲利普二世打破的：一方面，他"从军事战略安全的角度，将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纳入关注的视线"③，即要南下应先关注北部，抗御"蛮族"从北方威胁马其顿本身；另一方面，他南下后，以强大的兵力把希腊全境变成了自己管辖的范围，把希腊文化带进了马其顿，并由此扩大到巴尔干半岛北部。

在率军南下之前，菲利普二世对希腊各个城邦及其居民的心态是很了解的，不断有人向他汇报希腊各个城邦的举措和动

---

①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 年，第 72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向。他知道有人赞成马其顿南下,有人反对马其顿南下,但还有不少人处于观望之中。菲利普二世南下决心已定,不管反马其顿的力量会有多大,他不打算更改南下的意愿。由于希腊各个城邦难以聚合在一起,所以菲利普二世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

公元前357年,菲利普二世突破了马其顿和希腊的边界线,占领了安菲波利斯,第二年又攻占了佩德纳和波提达亚,又隔了一年,他攻占了梅索奈。连续三年的进攻,菲利普二世终于把希腊最北部和爱琴海西北岸纳入马其顿的版图。尽管他本人在作战时负了伤,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取得的胜利使他受到鼓舞。色雷斯既已归他占领,当地的金矿收入就足以保证今后的军费开支。

在这段时间内,雅典屡次提出抗议,谴责菲利普二世入侵希腊,但仅仅是抗议而已。雅典的那些反马其顿派人士忙于同希腊城邦中的反马其顿派串联,商讨应付马其顿王国进一步扩张的对策,包括联合出兵阻击等,但没有什么效果。雅典政府这时顾不上出兵抗拒马其顿的原因可能是战场距离雅典还远,雅典不愿意由自己牵头来反对马其顿入侵者。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雅典城邦这时遇到了两个麻烦。一个麻烦是:雅典国内贵族派和平民派的斗争已十分尖锐,国内政局不稳,雅典认为派不出军队进行北征。另一个麻烦是:雅典同希腊其他城邦之间的关系正因达尔菲财宝被劫事件而相当紧张。达尔菲财宝是希腊人认为应当属于全体希腊人的圣物,任何人都不应当心存贪欲,把财宝攫为己有,但福息斯城邦却不顾这些,公然劫掠了财物,引起希腊其他城邦的愤怒,于是发生了长达10年(公元前

356—前 346 年）的城邦间的战争。[①] 雅典不顾其他城邦的反对，支持福息斯。[②] 这就把雅典推向了希腊一些城邦的对立面。斯巴达这时也同雅典一起，支持福息斯。[③] 所以雅典已没有把希腊城邦聚集在一起对抗菲利普二世南下的号召力。

菲利普二世看到这是有利于马其顿南下并控制希腊中部和南部的绝佳时机。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帮助下，福息斯转危为安。而联合攻打福息斯的那些希腊城邦则转而投靠菲利普二世，希望后者率军继续南下，愿做内应。菲利普二世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穿过希腊中部，于公元前 346 年击溃了福息斯人。雅典和斯巴达都退缩了。这样一来，马其顿在某些希腊城邦的心目中成为解放者、拯救者，即把它们从雅典和斯巴达的威胁下解放出来了。菲利普二世"被拥为达尔菲之太阳神圣坛的保护者，并在特尔斐竞技大会担任主持人"[④]。

至此，菲利普二世的南下目标已完成了一半。

## 二、雅典的屈服

菲利普二世击败了福息斯，成为某些希腊城邦共同推崇的解放者，但这还不等于真正成为希腊本土的主人。摆在马其顿面前的还有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对手。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49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09—210 页。

④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49 页。

在菲利普二世看来，尽管斯巴达有过昔日的辉煌，但在经过底比斯的攻击以后，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何况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也已四分五裂，不可能再聚集在斯巴达的旗帜下对抗马其顿了。马其顿要征服希腊全境，剩下的唯一主要对手只是雅典。

菲利普二世认为，雅典的实力虽然大不如前，但经过近些年的经营，它的海军仍有较大的作战能力，而且雅典的商人集团既拥有财富，又有很大的海外影响，加之，雅典城邦经过多次改革，平民派的基础仍是比较巩固的，他们崇尚民主和宪制，不会轻易丢掉已获得的政治权利而听任马其顿的专制政体对自己进行统治。反复思考的结果，菲利普二世决定采取拉拢、安抚的策略来对付雅典。因此，蒙森在评论这一段历史时写道："菲利普不把希腊各共和国并入他的帝国，实有其正当理由。"①也就是说，菲利普二世准备在满足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某些要求的前提下，不仅利用军队，而且还利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来安抚归顺者，菲利普二世本人被认为是精于此道的。② 在安抚雅典之前，他已经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把希腊北部、中部的一些城邦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对雅典也准备采取军事、政治并用的手段。③

然而，雅典究竟是战斗还是归顺，仍在犹豫之中。雅典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认为，希腊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城

① 蒙森：《罗马史》第 2 卷，李稼年译，李澍泖校，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33 页。

② 参看考克维尔："希腊自由的终结"，载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历史论文集（公元前 360—前 146 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05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06—107 页。

邦分治的格局，城邦自主独立已成惯例，不必勉强统一，更不应统一于中央集权的马其顿王国之下，如果那样的话，城邦制度从此不再存在了，所以雅典要顶住菲利普二世的压力。主和派则认为，希腊最可怕的敌人是波斯帝国而不是马其顿，一旦希腊城邦同马其顿相互杀戮，得益者只能是波斯帝国，希腊人的命运就会同波斯其他殖民地人民的命运一样，受奴役和压榨；而菲利普二世毕竟接受了希腊文化，马其顿人也开始希腊化了，所以雅典应转到马其顿一边，谋取包括马其顿人在内的所有希腊人的共同利益。当然，无论是雅典的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不能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其顿军事力量强大，决不是任何一个希腊城邦所能抵抗得住的。①

雅典的主战派和主和派相持不下，相互指责。主和派指责主战派接受了波斯帝国的贿赂；主战派指责主和派接受了马其顿王国的贿赂。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雅典决心同菲利普二世一战。雅典组成了反马其顿联军，斯巴达拒绝出兵，底比斯感到马其顿即将进入底比斯境内，派出军队协同雅典作战。但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雅典军队和底比斯军队都挡不住马其顿骑兵的冲锋和“马其顿方阵”的挺进，全军溃败，主战派人物随即逃亡。后来一些历史研究者都承认喀罗尼亚战役是决定性的，独立希腊城邦的丧钟敲响了。② 从这以后，希腊城邦作

---

①　参看考克维尔：“希腊自由的终结”，载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历史论文集（公元前360—前146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

②　参看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为国际政治活动独立主体的时期已经结束；在对外政策上，希腊城邦必须考虑马其顿的意愿。① 希腊城邦今后只能作为希腊世界的基本经济和社会单位而保留自己的重要性。②

菲利普二世作为胜利者，对待底比斯和雅典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对待底比斯，菲利普二世采取高压政策，处决了一批反马其顿派的领袖，扶植亲马其顿的人士上台，建立完全由马其顿当局控制的贵族寡头政府。

对待雅典，菲利普二世采取安抚政策，释放了2,000名雅典俘虏，并派出使者同雅典城邦政府会谈，条件是：只要雅典承认菲利普二世是全希腊的统帅，雅典同意在他的领导下一起抗击波斯帝国和其他敌人，其余一切照旧。这一条件大大出乎雅典意料之外，雅典同意了，归顺了。

如果说底比斯城邦制度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已寿终正寝，那么雅典城邦制度即使还保留着，但也步入最后阶段，离最终的灭亡已不很远。这是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始终是以雅典这样一个独立的城邦为载体的。喀罗尼亚战役之后，雅典作为独立城邦已经不再存在，所保留的是公民选举领导人的程序或形式，城邦自治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大约又经过将近一百年，到亚历山大去世后很久，在安提柯王朝成为希腊世界的统治者之时，不仅雅典，而且希腊世界其他城邦，一概屈从于君主制之下，于

---

① 参看T.R.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② 参看同上。

是城邦自治体制最终结束。[1]

希腊各个城邦是怎样丧失独立的？雅典是怎样衰败和最终屈从于马其顿统治者的？这是一个值得总结的问题。本书第八章在讨论希腊城邦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交织时，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城邦没落的主要原因，即贵族和平民两派的长期斗争，以及平民中的极端派利用直接民主形式，使政治冲突变得越来越血腥，统治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恐怖，以致国力耗尽，人心丧尽，终于马其顿人乘虚而入，逐个击破。那种认为雅典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2]的观点，并不能反映有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到喀罗尼亚战役之间六七十年的实际情况；而那种认为导致雅典灭亡的"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3]的说法，并没有抓住雅典社会危机的实质。正如本书上册所一再强调的，贵族和民主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城邦社会的全过程，这就是希腊城邦社会的主要矛盾。城邦制度的历次制度调整，旨在缓解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它们曾经有效过，所以随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矛盾的几度缓解，城邦经济得以发展，社会安定得以实现。但这一矛盾的根源未消除，当矛盾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爆发时，矛盾反而越来越尖锐了。

---

① 参看魏凤莲：《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近现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 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15 页。

③ 同上。

到平民极端派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执政力量后，这一矛盾达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终于断送了希腊城邦制度。

## 三、科林斯会议

喀罗尼亚战役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37年，菲利普二世在科林斯召开了希腊城邦会议，除了斯巴达以外，其他城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此后希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都十分重要。

科林斯会议的结果，被认为从此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科林斯同盟”。实际上，这是后来的希腊史研究者所使用的名称，当时并没有这种说法，“同时代人所知道的是‘菲利普和希腊人’”①。这只是因为他们一起在科林斯开了会。当然，如果要说“科林斯同盟”形成了，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菲利普二世（后来还有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成为霸主，领导参加会议的各国，这同以前希腊境内有过的城邦同盟并没有什么不同。② 重要的不在于有没有组织形式，而在于科林斯会议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政治方面：科林斯会议做出以下重要决定，一是希腊各个城邦承认马其顿的领导地位，承认菲利普二世为希腊的军事统帅；二是希腊各个城邦保持自治地位，各个城邦之间不得进行战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不得控制另一个城邦；三是各个城邦原来的体制不变，仍按过去已有的程序和规则实施行政管理。

---

① 哈尔：“希腊时代的国际关系”，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② 参看同上。

社会方面：科林斯会议做出以下重要决定，一是希腊各个城邦都应在科林斯会议决定的基础上保证社会秩序的恢复，维护社会的安定，不得实行报复，不得清算历史旧账；二是取缔任何极端的社会改革活动，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废除债务、强行释放奴隶等。

经济方面：根据科林斯会议的精神，决定在经济上保留原来的既成事实，尊重私有财产权。手工业、商业和农业都按现状继续生产和经营。

科林斯会议使得菲利普二世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样一来，“以菲利普二世为首的军事王国的统治，正式取代过时的各自独立的城邦”①。不仅如此，“有了科林斯同盟，菲利普为他在希腊的领导权创造了一个合法的根据，从而使马其顿的称霸得以在国际法之下实现”②。

科林斯会议也使得希腊各方面人士都感到满意。希腊城邦中原来的亲马其顿派，即主和派，显然十分满意，他们鼓吹多年的以马其顿为首的“大希腊”设想得以实现。至于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中原来的反马其顿派，即主战派，也对科林斯会议的决定感到可以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菲利普二世承认希腊城邦的自治地位和自治权，而且科林斯会议禁止清算历史旧账，不准报复，这表明他是一个“讲理的征服者”③，由他来统治希腊

---

①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年，第74页。

② 扎尔恩特：“马其顿背景”，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第25页。

③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51页。

"是幸运"。[1] 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科林斯会议的决定竟被大家看成是一个"和平条约",保证了希腊境内的和平,这是对科林斯会议评价的基本出发点。[2]

希腊城邦中的公众,除了平民中的极端派而外,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在内,公民和自由人都认为可以接受菲利普二世的统治。这样,菲利普二世"以不过分施加政治压力的形式,既可缓和希腊人的反抗情绪,又无可争议地成了希腊的实际统治者,这是继军事之后的外交上的重大胜利"[3]。

但是,希腊(尤其是雅典)知识者的精英分子同一般公众的看法不同,甚至同政界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人士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有较深刻的思考。他们之中,无论是原来亲马其顿的泛希腊主义者,还是原来反马其顿的、持孤立主义观点的人士,全都认为科林斯会议葬送了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从而牺牲了希腊城邦的自由、民主和人文主义传统。当初积极倡导泛希腊主义的伊索克拉底的理想落空了。他曾经欢迎菲利普二世南下,认为无论菲利普"过去曾对希腊城邦做过什么,但也许不会剥夺雅典的自由"[4]。结果,雅典失去了民主政治,也就失去了自由。而当初竭力反对马其顿南下的狄摩西尼,更加感到失望。他抱怨雅典那些只顾个人眼前利益而宁肯屈从于菲利普二世的政界人士,认为正是这些人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51 页。

② 参看扎尔恩特:"马其顿背景",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一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25 页。

③ 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132 页。

④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56 页。

断送了雅典的政治生命。他不甘心失败，仍想寻找合适的机会赶走马其顿人。尽管狄摩西尼再次失败（第一次是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失败并逃走），但逃不过马其顿军队的缉捕，"雅典最终被迫把狄摩西尼交给了马其顿人"①。他为了不愿屈辱求生而自杀。智者毕竟是智者，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雅典的民主政体和宪制。

斯巴达是不愿意同马其顿合作的，它拒绝参加科林斯会议。菲利普二世暂时不理睬斯巴达，因为他认为斯巴达已经衰落，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希腊城邦已经不再听命于斯巴达了。而且从内政的角度来看，斯巴达这时政局动荡不定，财政力量空虚，国库已无力支付军费支出。这时的斯巴达国王是阿基达马斯三世（公元前 360—前 338 年），他是阿吉西劳斯二世（公元前 399—前 360 年）之子，登基后一直忙于保住斯巴达在海外殖民地的战争，率军赴斯巴达在意大利半岛的移民城邦塔兰托参战，并在当地阵亡。② 他的儿子阿吉斯三世（公元前 338—前 331 年）继位。正是他，拒绝向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妥协，使斯巴达成为唯一没有参加科林斯会议的重要城邦。③ 不仅如此，他还用"各种方式不断反抗着马其顿人，给亚历山大的后方制造麻烦。公元前 331 年，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军队发生了分裂，并被敌军打败，阿吉斯（三世）阵亡"④。

---

①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87 页。

②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91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同上书，第 292 页。

关于马其顿征服希腊本土的这一段历史，可以总结为希腊民主、自由、宪制陆续丧失的历史。其中，希腊自由的丧失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希腊城邦，不管形式上或名义上还保留了多少所谓的自治权，但实质上都已经丧失了自由。归根到底，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其顿军力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希腊的分裂，各个城邦各行其是，只考虑本身的利益。①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希腊城邦制度的结束是不可避免的。②

对希腊各个城邦而言，“雅典式的自治城邦与民族统一的大帝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城邦的根本原则是自治、自给，主权在民。每个城邦都拥有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③。这正是马其顿王国的统治和希腊城邦政治从本质上无可相容之处。④ 菲利普二世通过科林斯会议赢得了希腊各个城邦(除斯巴达以外)对马其顿的臣服，这是事实，但这种情况究竟能维持多久呢？如何巩固这种格局？如何让希腊人更加自觉地站在马其顿一边，真的把马其顿看成是希腊人自己的国家呢？菲利普二世认识到，唯一能拢住希腊人的办法，就是带领希腊人去同希腊人的宿敌波斯帝国开战，这样，马其顿人在希腊人心目中的信任度就大大提高了。一旦击败了波斯，科林斯会议所希望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成为事实，希腊人也就会认同

---

① 参看考克维尔：“希腊自由的终结”，载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论文集(公元前360—前146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④ 参看同上。

马其顿了。[①]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菲利普决心出征波斯，并让希腊人一起参加这场“神圣的战争”。

## 四、亚历山大继位

当初，希腊城邦中那些欢迎菲利普二世南下的人，就把在马其顿领头的条件下聚集希腊城邦一起抗击波斯帝国的侵犯作为目标。现在，科林斯会议开过了，再不动手进攻波斯，岂不是会引起希腊人对菲利普二世的失望甚至不信任？因此菲利普二世必须下此决心。但对付一个庞大的波斯帝国，却比马其顿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击败雅典—底比斯联军要艰难得多。菲利普二世还不敢贸然出兵，而只是试探性地发动小的攻击。“10,000名马其顿人在一支舰队的支持下出现在（小）亚细亚，并且宣布他们受命‘解放’波斯人统治之下的所有希腊城市。”[②]这是公元前336年初的事情。

也正在这个时候，即公元前336年，菲利普二世在他女儿的婚礼宴会上被暗杀身亡。关于事件的真相，始终不明。有一种说法是：菲利普二世的王后奥林匹亚斯为了使她的儿子亚历山大能够继位而筹划了这场暗杀。[③] 尤其是菲利普二世的最后一

---

① 参看哈尔：“希腊时代的国际关系”，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②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591页。

③ 参看阿克罗伊德：《古代希腊》，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109页。

个妻子和她所生的婴儿一起被害,似乎奥林匹亚斯就是谋杀的指使人。[①] 然而也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任何史料、任何推断能够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特别是无法看出亚历山大从刺杀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因为菲利普不一直是将亚历山大作为其继承人的吗?”[②]亚历山大则将暗杀菲利普二世一事归咎于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代理人,据说有截获的许多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③]不管是不是夸大了被截获的这些信件的作用,也不管这些信件里的说法是真是假,马其顿国内的阴谋者“的确寻求过波斯的庇护”[④]。对亚历山大来说,有了被截获的信件,使他增添了一个可以动员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进军西亚的理由。历史旧账和新账一起算,马其顿—希腊大军东征不应再拖延了。

菲利普二世对马其顿王国的功绩是显著的。“功绩在于他巩固了马其顿王朝,并使希腊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这就为亚历山大的远征奠定了稳定的基础。”[⑤]即使从亚历山大远征本身来看,菲利普二世可称得上是未来这支远征军的真正奠基者,因为参与亚历山大远征的一批能干的将领们都是菲利普二世培育和提擢的。[⑥] 亚历山大是这次远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但如果没有菲利普二世的奠基作用,远征不能进行得这样顺利和取得这

---

① 参看卡奈:“亚历山大和他的‘可怕的母亲’”,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198 页。

② 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6 页。

③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592 页。

④ 同上。

⑤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63 页。

⑥ 参看同上。

样大的成绩。

菲利普二世被暗杀身亡后，亚历山大很快被军队拥戴为新的马其顿国王和军队统帅，称亚历山大三世。[①] 这是因为，在他即位国王之前，马其顿王国曾有过两位名为亚历山大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公元前 498—前 454 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公元前 369 年登位，不到一年，于公元前 369—前 368 年冬季在内乱中被杀）。[②] 那两位名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国王都没有什么名气，因为马其顿王国获得盛名，实际上始于菲利普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后来也不常被人们提出，而被尊称为亚历山大大帝，那是由于他远征的功勋卓著的缘故。

亚历山大在马其顿宫廷中曾受业于亚里士多德。据记载，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担任过菲利普二世的父亲阿明塔斯二世的御医，所以菲利普二世在即位前可能在宫廷中就认识了亚里士多德。这显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把亚里士多德送到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学习之前的事情。[③] 公元前 343 年，这时菲利普二世担任马其顿国王已经 16 年了，他的儿子也已 13 岁了。为了教育好这个儿子，菲利普二世特地聘请亚里士多德来到宫中，请他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这时是公元前 343 年，是柏拉图去世（公元前 347 年）后的第 4 年。[④] 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达 4 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亚历山大被认为从一个“13 岁的野

---

① 参看扎尔恩特：“马其顿背景”，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年表和第 11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83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384 页。

孩子”，成长为一个有教养的少年。[1] 亚历山大的人品、知识甚至政治见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不能过分夸大。应当注意到，“现代学者往往过高地估价了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影响，实际上要想确定这种影响是十分困难的”[2]。虽然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使亚历山大直接接触了希腊文化，然而使马其顿接触希腊文化是马其顿多年以来的传统做法，而并非开始于亚历山大。[3]

亚历山大作为军事指挥官，已有好几年经历。公元前338年，亚历山大18岁，在马其顿军队南下同雅典—底比斯联军于喀罗尼亚作战时，任马其顿骑兵指挥官，击溃了雅典—底比斯联军，深受马其顿军队爱戴。因此，公元前336年菲利普二世被暗杀身亡后由亚历山大继任，在大部分军官和士兵心目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后来的功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没有菲利普二世对亚历山大的培养和大胆任用，亚历山大的军事才能就不会这么早显现出来；没有菲利普二世生前的一系列成就，也就不可能有亚历山大后来的胜利。[4] 具体地说，正是菲利普二世扩大了马其顿王国的疆土，北面抵御了蛮族对马其顿的攻击，南面又控制了希腊本土，此外还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亚里士多德担任亚历山大的教师之后，菲利普二世又任命亚里士多德担任马其顿境内一些城市重建指导工作和法律制定工作。公元前334年，即菲利普二世去世（公元前336年）之后两年，亚里士多德才重返雅典。

② 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5页。

④ 参看扎尔恩特：“马其顿背景”，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第7页。

建立了一支准备进攻的军队和一支能干、忠诚的官员团体，[①]这都是亚历山大日后远征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亚历山大被以后有些历史著作称作半马其顿人、半希腊人，从血缘关系上看是有根据的。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是地道的马其顿人，是马其顿部落贵族世家的后裔。他的母亲奥林匹亚斯自称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英雄人物阿喀琉斯的后裔，来自希腊西北部一个小王国，所以也被人们称作希腊的公主，亚历山大因此而自豪。尽管有人把奥林匹亚斯称作“可怕的母亲”，认为亚历山大得不到母爱，[②]但这种说法也遭到另一些历史研究者的质疑，理由是：由于马其顿宫廷历来内讧不已，常有谋杀事件，镇压叛乱的手段十分残酷，所以，如果要说谁“可怕”的话，那么菲利普二世、他的皇后奥林匹亚斯以及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全都是“可怕的”。况且，即使奥林匹亚斯对她的儿子亚历山大非常严厉，这也符合当时马其顿和希腊社会的传统，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③] 当然，历史研究者也承认奥林匹亚斯个人有政治野心，对马其顿政府心怀不满，这可能因菲利普二世在同她结婚以后又娶了两位妻子而产生了怨恨，此外，她还同自己娘家的兄弟有密切接触，特别是在亚历山大死后，她亲自参与了部将们夺取继位权的战争，这些都是以后的历史学家对她产生怀疑的

---

① 参看扎尔恩特：“马其顿背景”，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7 页。

② 参看卡奈：“亚历山大和他的‘可怕的母亲’”，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189 页。

③ 参看同上。

由来。①

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毕竟有浓厚的希腊情结。稍后，当亚历山大率军东征，跨过达达尼尔海峡时，他随身携带了史诗《伊利亚特》，自称是在完成祖先留下的未完成的事业——征服小亚细亚，重建特洛伊城。

但亚历山大继位后，还不可能立即率军东征，因为菲利普二世被暗杀身亡后，曾被马其顿征服的一些希腊城邦的反叛不断发生。有的地方干脆把马其顿驻守在当地的军队赶走。当菲利普二世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已经屈服于马其顿的雅典城区内的主战派欣喜欲狂，举行宴席庆祝。马其顿北部边境线的一些游牧部落和蛮族人，本来就伺机待动，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乘机南下，以为亚历山大已难立足，不如乘此良机夺取马其顿的领土。马其顿境内也有一些密谋夺取王位的贵族准备暗杀亚历山大，推翻现在的马其顿政府。

亚历山大在这一艰难时刻，决心荡平叛乱。他率军逮捕了马其顿内部企图暗杀自己和夺取王位的主谋，斩首示众，同时平定了希腊境内掀起暴乱的地区，镇压了为首者。接着，他带兵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因为菲利普二世在世时，当地的希腊人曾答应菲利普二世，表示顺从，如果将来出征波斯时，当地的希腊人将帮助马其顿军队。现在，既然菲利普二世已死，当地的希腊人便起来反抗马其顿，过去的承诺也就不算数了。亚历山大为此出征伯罗奔尼撒半岛。“亚历山大大军一到，他们就都垮台了，

---

① 参看卡奈：“亚历山大和他的‘可怕的母亲’”，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第190—191页。

还答应给他比原先给予菲利普二世更加崇高的地位。"[1]解除了希腊人的叛乱威胁之后，亚历山大转而北上。

亚历山大率军北上，是为了解除来自北方蛮族部落的威胁。他渡过多瑙河，在多瑙河北岸攻击这些游牧部落的老巢，以免他们日后威胁亚历山大的后方——马其顿境内。这些蛮族中，主要是凯尔特人，他们成为亚历山大的主要追击对象。战争虽然激烈，马其顿军队终于取得胜利。"凯尔特人傲慢自大，但都表示了要和亚历山大修好的愿望。"[2]亚历山大一心想早日结束北方之战，便"宣布他们是他的朋友，跟他们结了盟"[3]。至此，亚历山大认为可以启动对波斯帝国的战争了。

不想正在这时，一个谣言突然传到底比斯，说亚历山大在讨伐北方蛮族时已经阵亡。[4] 底比斯派出使者，联合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再次宣布起义，底比斯城内许多人都信以为真，附和者很多。[5] 本来，亚历山大在率军北上攻打蛮族部落时就担心希腊城邦会乘机反叛，特地"在底比斯卫城中驻扎了一支军队，因为底比斯叛离的倾向最明显"[6]。现在，底比斯果然首先发难了，而且兵力不弱。[7] 亚历山大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用几乎

---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2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7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8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22 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67 页。

⑦ 据说，底比斯组织了一支有 7,000 名装甲步兵防守城外的工事，有 12,000 名被释奴隶、难民和外邦人组成的警卫部队防守城区，此外还有一些骑兵作为前哨。(参看阿希莱:《马其顿帝国: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年代，公元前 359—前 323 年》，麦克法兰出版公司，伦敦，1998 年，第 177 页)

难以置信的秘密和灵巧赶到底比斯，攻陷城池，将其居民卖为奴隶，并将城市夷为平地”[①]。亚历山大的镇压手段是残酷的，显然是为了在远征波斯时消除后顾之忧。这一事实使希腊人大为惊恐：一方面，“底比斯的被毁预示着在马其顿世界的新秩序中，城邦的独立是有限的”[②]；另一方面，凡是同底比斯站在一起参与起义的其他希腊城邦纷纷屈服，并承认自己是听信了“亚历山大已经阵亡”的谣言才参与底比斯的反叛活动的。[③]

亚历山大在毁灭底比斯的同时，赦免了那些参与底比斯反叛的其他希腊城邦，以表明他“对希腊文明的尊重”[④]。这一招果然有效，希腊各地为了向亚历山大表明忠诚，纷纷采取行动：有的地方，“那些离开家乡去支援底比斯的人就把原先教唆他们干这件事的人都判了死刑”[⑤]；有的地方，“接回了他们的逃亡者，这些人原先是因为和亚历山大要好才逃亡的”[⑥]。雅典人听到底比斯被彻底摧毁的消息，惊慌失措。他们“在底比斯出事的时候正在举行大规模宗教庆祝仪式，突然有难民从底比斯战地飞驰而回。他们在惊惶中急忙中止了庆祝活动”[⑦]，并立即召开大会，“在全体市民中选派了十个著名的、跟亚历山大关系最好的人当使者见他，庆贺他从（北方）……安全归来和对底比斯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67 页。

② 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年，第 29 页。

③ 参看阿希莱：《马其顿帝国：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年代，公元前 359—前 323 年》，麦克法兰出版公司，伦敦，1998 年，第 180 页。

④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67 页。

⑤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7 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

叛乱镇压的成功”[①]。这表明雅典的屈从，亚历山大因此也不再计较了。希腊境内大体上平静下来后，亚历山大便准备进行东征。

雅典的脸面丢尽了，雅典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了亚历山大允许保留的有限的自治权。而雅典财政的困境使得这种恩赐的有限自治权不断受到限制。“公元前338年以后，财政独立的追求开始丧失了它的正当理由。”[②]科林斯会议以后雅典已失去独立地位，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摧毁吓得雅典不敢再幻想独立自主。这时的雅典已经不像自城邦建立以来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雅典。“雅典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地位随着喀罗尼亚战役而几乎消失了。海上力量稍稍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它也在公元前323—前322年迅速凋零。”[③]

## 五、马其顿的希腊化

前面已经提到，马其顿原是希腊本土以北的一个王国。尽管它距离希腊本土很近，但历来被希腊人看成是蛮荒之地，马其顿人则被希腊人看成是化外之人、野蛮人，至多是半开化的族群。

马其顿经历了希腊化过程，这一过程开始得较早，可能从希腊和波斯之间发生战争时就开始了。到了菲利普二世时期，希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页。

② 加布里埃尔森:“希腊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2页。

③ 同上。

腊化过程加快了。亚历山大继位后，马其顿的希腊化过程大体上已经完成。

马其顿的希腊化有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马其顿王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前是不被看成是希腊的一部分的，也是被希腊各个城邦排斥在希腊世界以外的。在菲利普二世的策划和军事、外交的努力下，先把希腊最北部的色雷斯纳入了马其顿王国版图，接着又陆续吞并了由马其顿通向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道路上的一些城邦。等到喀罗尼亚战役和科林斯会议之后，马其顿终于被承认为希腊世界的一员，菲利普二世作为马其顿国王被推举为希腊各个城邦的最高统帅。菲利普二世去世后，亚历山大用武力摧毁了进行反抗的底比斯，从而使雅典等希腊城邦彻底服输，亚历山大对希腊的统治巩固下来了。

第二，马其顿的土地制度同希腊本土各城邦的土地制度逐渐趋于一致。从历史上看，希腊各个城邦在建立初期，仍然保留了部落时期的土地公有制，即土地归于部落，部落成员分到份地，定期重分。久而久之，这些份地演变为私有财产，可以继承、买卖，或被兼并，土地公有制不再存在。马其顿也是这样，只不过演变较晚，过程同希腊城邦的土地制度演变过程一样，即“土地由个人占有，同时个人享有买卖或转让土地的权利”①。区别在于：由于马其顿实行的是国王统治，而不像希腊各个城邦实行城邦制度，所以马其顿经过演变而最终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可以说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国王，而

①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89 页。

这正是它的独特性"①。

第三，马其顿逐渐接受了希腊文化。在菲利普二世以前，接受希腊文化的仅限于马其顿宫廷和贵族世家。菲利普二世由于率军南下，征服了希腊本土各个城邦，所以随军南下的不少马其顿人也逐渐接受了希腊文化，至少是由于直接接触希腊的社会各界人士，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亚历山大继位后，希腊文化对马其顿人的影响大为增加。特别是，在亚历山大的资助下，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开办了一个教学设备齐全的讲授修辞学与哲学的学校，校内不仅有宽敞的教学楼，还设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足见亚历山大对希腊式教育的重视。据说，亚历山大既擅长领兵作战，也擅长诗歌、写作、音乐。他在行军途中还同希腊的学者通信，交流学习心得。亚历山大从一个血缘关系方面的半希腊人，在雅典工作期间变成了一个文化修养方面的真正希腊人了。

第四，在亚历山大亲自带动下，马其顿人，特别是跟随马其顿军队南下的那些马其顿人，不仅学习希腊文化，而且连言谈、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也逐渐同希腊人相近了。据说，亚历山大在同马其顿官员谈话时，时常插上几句希腊的神话、故事或希腊名人的名句，使得那些不学习希腊文化的人感到难堪。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在西亚如果建立了帝国，就应当把希腊文化输入到那里去，那里应当有希腊的移民、希腊式的城镇，包括希腊式的公共建筑、希腊式的学校，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应当是希腊式的。在不知不觉间，马其顿人的思考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就和希

---

①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腊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半开化的马其顿人也就成了接受希腊文化的马其顿—希腊人。

希腊人（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希腊人）接受亚历山大也是渐进的。首先是国王的身份和头衔问题。这是因为，在希腊人心目中，只有像波斯那样的蛮族王国才有国王，而在希腊各个城邦，也许是在很古老的传说时期才有国王，所以希腊人对国王是陌生的、不愿接受的。① 在希腊人这里，出现过僭主，但僭主被看作异类，僭主不是希腊人愿意看到的统治者。虽然斯巴达保留了国王，并且国王家族实行世袭制，然而希腊人认为斯巴达的实权并非掌握在国王手中，而是掌握在监察官手中。② 尽管如此，希腊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亚历山大。为什么会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亚历山大接受了希腊文化，并且使马其顿希腊化了，另一方面是由于亚历山大把传播希腊文化作为东征的使命之一，东征过程实际上就是希腊文化的传播过程，不仅马其顿希腊化了，亚历山大所征服的西亚、北非地区也希腊化了。此后二三百年内，希腊人越来越认同亚历山大，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变：希腊城邦制度虽然消失，但希腊文化继续存在并推广了。

最后，在本章结束之时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亚历山大本人的希腊化和亚历山大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

要知道，亚里士多德担任过亚历山大的教师，前后达 4 年之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20 页。

② 参看同上。

久(从亚历山大 13 岁到 17 岁)。亚历山大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和学到科学文化知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亚历山大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则很难说。这是因为,亚历山大是菲利普二世的儿子、继承人,后来又继任马其顿国王。马其顿王室传统对亚历山大政治主张的影响肯定会大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对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理论大师,“他主张让多数人轮流执政,每个公民都担任统治者又当被统治者”[1],也就是说,“他是明显倾向民主制的,他认为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和平等,平等就是轮流担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每个公民都有这种权利,是人人平等的”[2]。这显然和亚历山大的治国方针和所遵循的政治理念不一致。因此,在亚历山大担任了马其顿国王和残酷镇压底比斯起义之后,亚里士多德无疑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对上述事件不表态呢?为什么他对马其顿称霸于希腊本土的政策沉默不语呢?这件事不是没有人注意的。[3] 也许,在当时某些希腊人看来,希腊的那种城邦分立的制度既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各个城邦由马其顿王国来统一、联合、牵头,不失为一种出路。这就是泛希腊主义的观点、亲马其顿派的主张。但亚里士多德对此持什么看法呢?他却始终一言

---

① 参看汪子嵩、范明生、陈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 3 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151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151—1152 页。

不发，似乎他仍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学说。[①] 当然，也可能作出另一种解释，即“由于他和马其顿王国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的特殊关系……(所以)对当时最大的政治——马其顿征服全希腊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避而不谈”[②]。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不应该忽略的是：沉默也是一种武器、一种手段、一种在特殊环境中可以使用的策略。沉默，意味着反对或拒绝。作为一个智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做法。亚里士多德选择的是沉默。沉默可能引起某些人的指斥、误解，甚至中伤。怎么办？不一定要辩解，可以继续一言不发。

亚里士多德的晚年是很不幸的。“他在雅典早已不受欢迎”[③]，人们嘲笑他，讽刺他，厌恶他。反马其顿派把他视为亲马其顿派的首领，[④]而亲马其顿派则认为他是对手，说他根本不是什么亲马其顿分子，而是令人讨厌的批评家。[⑤]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于战功辉煌之际突然病逝于巴比伦。雅典随即发生政局变化，亲马其顿派下台，反马其顿派执掌政权，他们掀起了“绝大的反动，凡是沾到马其顿的东西，都被激烈排斥”[⑥]。他们把亚里士多德告上法庭，罪名是不敬神，散布异端邪说，无非是因他们仇视马其顿而拿亚里士多德出气。亚里士多德这时已经

---

① 参看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 3 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152 页。

② 同上。

③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04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斯塔斯：《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庆泽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96 页。

62 岁了，他匆匆逃出雅典，回到他母亲的老家优卑亚岛上的卡尔塞斯，几个月之后，即公元前 322 年，病死于卡尔塞斯。有人说是胃病恶化，也有人说是服毒自尽。[1]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04 页。

# 第十章　马其顿帝国的急剧扩张和迅速崩溃

马其顿帝国是学术界对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后所建立的庞大国家的习惯称法。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当时人并没有马其顿帝国这种说法。“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希腊人确实没有帝国的概念。现代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所谓雅典帝国，意思不过是雅典的统治、霸权。后来的斯巴达帝国和马其顿帝国，也更多的是霸权。”①

因此，本章所谈到的马其顿帝国的急剧扩张和迅速崩溃，也是承袭了学术界有关马其顿的统治、霸权的说法，而并非表示马其顿王国在政体上已经演变为帝国。

## 第一节　亚历山大——征服者

马其顿的兴起以及对希腊本土的控制、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对西亚、北非广大地区的征服，开辟了古代地中海东部历史的新时期，罗素曾这样概述了这一通行古希腊语的世界历史的三个

---

①　晏绍祥：弗格森著《希腊帝国主义》译后记，载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39 页。

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由城邦时期，它因亚历山大的统治而告终。“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自由与混乱。”①

第二个时期，希腊化国家时期，它以罗马吞并埃及而告终。“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屈服与混乱。”②

第三个时期：罗马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屈服与秩序。”③

上述第一个时期，本书的上册和下册第九章已做了阐述。上述第二个时期，本书第九章和以下各章将予以讨论。罗素提到的第三个时期不在本书考察范围内，读者可参看本书作者所著《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一书。④

为了便于分析上述第二个时期，让我们从波斯的灭亡开始。

## 一、波斯的灭亡

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始于他平定希腊境内的叛乱，严惩了起兵反抗马其顿的底比斯，并再一次宽恕了协助底比斯起兵的雅典之后。当亚历山大率军来到雅典时，希腊各个城邦又信誓旦旦地向他效忠，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支持对波斯帝国的讨伐。

亚历山大由雅典返回马其顿后，决定立即出兵东征。他率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7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参看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

领的马其顿军队人数不多，据说，“他带去的步兵有轻装部队和弓箭手，总共30,000多，还有骑兵5,000多”①。另据现代研究著作所载，亚历山大东征时的兵力是32,000人，其中包括马其顿方阵兵12,000人，骑兵5,000人。② 这些部队渡过海峡时，用了160艘战船和一大批货船。③ 马其顿自己的海军力量较小，其中大部分舰船要留守爱琴海西岸，以控制希腊本土，只有少量船只驶往拜占庭，参加亚历山大东征。④ 亚历山大东征所使用的舰船主要来自希腊各个城邦，它们帮助亚历山大大军渡过海峡，在小亚细亚登陆。幸好波斯的舰队没有及时赶到，所以亚历山大大军渡海是顺利的。⑤

亚历山大本来可以带更多的马其顿军队前去小亚细亚，但由于他不放心希腊本土的反马其顿势力会不会乘亚历山大东征之际再掀起叛乱，所以给留守马其顿和负责监视希腊各个城邦的部将安提帕特留下12,00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⑥ 除了亚历山大留下的舰船以外，安提帕特还新建了一支舰队。在公元前323—前322年间，他拥有110艘三层桨座战船，稍后又增

---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9页。

② 参看塞孔达:“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陆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5页。

③ 参看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9页。

④ 参看阿希莱:《马其顿帝国: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年代，公元前359—前323年》，麦克法兰出版公司，伦敦，1998年，第91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塞孔达:“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陆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5页。

加到130艘。[①] 这支陆军和海军可起到控制希腊本土的作用。

亚历山大在远征波斯之前,从色诺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本书第七章曾提到,公元前401年,当波斯发生内乱时,有一支希腊人的雇佣军(色诺芬就在这支军队中)在小亚细亚帮助夺取波斯王位的王弟小居鲁士,小居鲁士身亡后,这一万多人的希腊雇佣军击败了波斯国王军队的重重阻截,终于回到黑海南岸的希腊移民地区。“万人大军的长征向希腊人显示了波斯的软弱”[②],也鼓舞了后来亚历山大对波斯的征伐。[③] 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一书中记述道:在同波斯大军作战前,亚历山大把军官召集起来,“间接地提到色诺芬和他那一万人,数量比他们现在少得多,威望比他们低得多,也没有骑兵……远远不如他们现在强;而且色诺芬既无弓箭手又无使用投石器的人”[④],结果,却一路打败波斯军队。据说,亚历山大讲完后,“将领们把他围起来,紧紧地握住国王的手,向他高声欢呼,要他率领他们前进”[⑤]。亚历山大军队士气之高昂,由此可见。

公元前334年春季,亚历山大率军登陆小亚细亚后,在希腊人的圣地特洛伊停留。“他向众神献上祭品以表达对这一圣地的敬意,还全身涂油,绕着据称是阿喀琉斯的坟墓裸奔——涂油

---

① 参看舒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海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② 布朗森:色诺芬著《长征记》一书英译本序言,载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5页。

⑤ 同上书,第66页。

裸奔是在希腊显贵的葬礼上所举行的运动会中的一个通常的项目。”①这意味着亚历山大要表明自己不仅是以马其顿国王的身份东征的：他代表的是全体希腊人。

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登陆后迅速击溃波斯驻军。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军队是由多个不同民族所组成的，其中包括一支强悍的希腊雇佣军。② 他们人数约在20,000人左右。③ 大流士三世偏爱这支雇佣军，他认为这支希腊雇佣军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会背叛自己的雇主。④ 在公元前333年11月的伊苏斯战役中，这支希腊雇佣军得不到他们两翼的波斯军队的支持，因此被亚历山大击败；⑤其中大部分人被马其顿人俘虏。⑥ 据说，亚历山大对待所俘虏的希腊雇佣兵的手段是残酷的。亚历山大及其麾下的官兵都认为，“他们是希腊化事业的叛徒，因为他们违背了希腊人反对蛮族的共同愿望，帮助蛮族与希腊人作战”⑦。被俘的希腊雇佣兵乞求宽恕无效，“十分之九的人被杀死了。剩下的2,000人在马其顿的地产上作为奴隶来赎罪”⑧。这被认为

---

① 布朗主编：《失落的文明：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李旭影译，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②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年，第81页。

③ 参看阿希莱：《马其顿帝国：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年代，公元前359—前323年》，麦克法兰出版公司，伦敦，1998年，第61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

⑦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599页。

⑧ 同上。

是对那些受雇于外国的希腊雇佣兵的警告。①

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市已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生活多年，那里的希腊人盼望马其顿军队前来解救他们，所以有些希腊移民城市自动打开城门，欢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授予它们自治权，建立城市自治政府。至于那些站在波斯帝国一边抗拒亚历山大的希腊移民城市，亚历山大则予以严惩："在征服小亚细亚期间，亚历山大对希腊各城邦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城邦对他的态度所决定的。"②

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是黑海南岸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移民城邦赫拉克利亚。从公元前 6 世纪中叶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城邦、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在波斯帝国强盛时，它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主地位，不得不归顺波斯帝国，缴纳较轻的贡赋，并获得波斯帝国的恩准，得以保留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防卫力量，免于受到波斯帝国官员的干预。③ 后来，雅典强盛时，赫拉克利亚不愿改变原先亲波斯的传统政策，拒绝向雅典缴纳贡赋。④到了亚历山大东征并于公元前 334 年春天侵入小亚细亚安那托利亚时，赫拉克利亚作为一个希腊移民城邦，仍然维持同波斯王室的传统效忠关系。⑤甚至在亚历山大击溃波斯军队，波斯军队退至小亚细亚腹地并且实力大为削弱之后，赫拉克利亚仍不

---

①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599 页。

② 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53 页。

③ 参看伯尔斯坦：《希腊文化的前哨：黑海岸边赫拉克利亚的兴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 年，第 27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33 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 72 页。

改变一贯政策，依旧倾向于波斯。马其顿军队这时已经顾不上赫拉克利亚了。亚历山大继续南下，以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为进攻目标。小亚细亚西部的其他希腊移民城市纷纷投向马其顿一方。①

到了公元前331年，即亚历山大对波斯的战争明显地将要获得最终胜利之际，赫拉克利亚国内一些反对亲波斯政权的被放逐人士决心投靠亚历山大，希望借助马其顿的势力返回赫拉克利亚，推翻赫拉克利亚的当权派。亚历山大这时也认为，黑海南岸地区如果继续被亲波斯的势力所控制，对自己是不利的，于是表态支持赫拉克利亚的被放逐人士，但亚历山大并未出兵攻打赫拉克利亚。② 赫拉克利亚亲波斯的政府在这种形势下，见势不妙，决心转而投靠被亚历山大留在马其顿负责留守和监视希腊本土的亚历山大部将安提帕特以及亚历山大的姐姐克娄巴特拉，赫拉克利亚的政局才稳定下来。③

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从印度返回巴比伦。这时，赫拉克利亚被放逐人士再次请求亚历山大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们回到赫拉克利亚执掌政权。然而亚历山大治理亚洲的思路已经不同于当初刚战胜波斯帝国的时候了。亚历山大很可能已经把自己当作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继承者，决定以稳定西亚的政局为重。亚历山大的姐姐克娄巴特拉在这里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她替已经投靠安提帕特的赫拉克利亚当权派说情，劝亚历

① 参看伯尔斯坦：《希腊文化的前哨：黑海岸边赫拉克利亚的兴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73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73—74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74页。

山大不要采取措施让赫拉克利亚被放逐人士立即返回赫拉克利亚。到了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就去世了，对赫拉克利亚原来亲波斯、后来才投靠安提帕特的政府的威胁也就解除了。①

赫拉克利亚事件的始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公元前 324 年到公元前 323 年这段时间内亚历山大对待波斯帝国及其管辖地区的态度的明显变化。

让我们再回到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获胜后南下攻击波斯军队的公元前 333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继位于公元前 336 年，这时刚任国王不久。“在打仗上，大流士基本上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②当然，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暴君，因为“在其他方面，还未发现他有什么暴虐行为，也许他还没有机会干这样的事”③。公元前 333 年，当亚历山大率军一路受到希腊移民欢迎进入叙利亚时，大流士三世也亲自领兵迎战。马其顿依旧以骑兵冲锋在前，步兵方阵在后，一举击败了大流士三世率领的波斯大军。波斯军队大败，可能与大流士三世轻敌有关，因为他认为用不着调集伊朗高原北部各省的军队就足以赢得胜利。④ 结果，大流士三世只身逃走。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女儿等家人均被俘虏，财物也大量落入马其顿人手中。⑤

在击溃波斯大军之后，亚历山大为了进一步笼络希腊人，

---

① 参看伯尔斯坦：《希腊文化的前哨：黑海岸边赫拉克利亚的兴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 年，第 74—75 页。

②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21 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赫克尔：“亚历山大对亚洲的征服”，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33 页。

⑤ 参看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71 页。

“他送回去一部分战利品，特别把 300 面盾牌赠予雅典人，在所有的战利品上面都刻上铭文：‘菲利普之子亚历山大和全体希腊人，取自居于亚洲的蛮族’”①。

亚历山大获胜后，“他在蛮族的面前表现出傲慢的姿态，好像他确信自己具有天神后裔的身份，然而他在希腊人中间就比较谦虚，很少摆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②。亚历山大了解到，如果没有希腊人的支持，他是难以征服波斯帝国和今后治理好这块广阔的土地的。但亚历山大在颁赐战利品给希腊人的文告中，郑重地写上“斯巴达人除外”③。这“显然是对斯巴达人的一种处心积虑的侮辱。亚历山大用这种公开羞辱的方式提醒斯巴达人，他们并不是他所领导的反击波斯的希腊东征军的一员”④。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亚历山大会如此羞辱斯巴达？主要是因为斯巴达拒绝顺从亚历山大。在科林斯会议上，斯巴达是唯一缺席的主要希腊城邦。在亚历山大摧毁底比斯后，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都认错并向亚历山大表示忠诚，斯巴达又是唯一不肯向亚历山大妥协的城邦。当时的斯巴达国王阿吉斯三世（公元前 338—前 331 年）用各种方式不停地反抗马其顿，给亚历山大东征时的后方一再制造麻烦。⑤

波斯军队溃败后，亚历山大乘势进驻大马士革，接着又开进

①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2 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 1211 页。

② 同上书，第 1223 页。

③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10 页。

④ 同上书，第 210—211 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 291—292 页。

古代腓尼基人的城市西顿。这两座城市由于未进行抵抗，所以亚历山大善待了他们，以此作为榜样，告知其他城市。在亚历山大继续南下过程中，地中海东岸港口城市提尔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亚历山大破城后，"连提尔人带外籍人，被俘后卖出去当奴隶的共约有 30,000 人"①。随后，亚历山大进攻加沙城，这是由叙利亚从陆路进入埃及的最后一站。加沙城抵抗甚烈，亚历山大军队攻入城内后，"加沙市民还是抱成一团顽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到底，结果全部被歼。亚历山大把他们的妇孺都贩卖为奴，把附近部族招来在城内定居，利用这个城市作为战争中的要塞"②。

埃及的大门敞开了。这时的埃及仍处于波斯帝国统治之下。波斯占领埃及的历史很久。自从公元前 525 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后，埃及人一直抵抗波斯占领当局，暴动不绝。公元前 410 年，埃及人的起义进入高潮，经过 6 年的战争，埃及全境终于在公元前 404 年解放。起义领袖阿门赫尔成为埃及第 28 王朝的国王。但第 28 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 5 年。接下来，可能发生了两次政变，政权仍在埃及人手中。③ 这就是埃及第 29 王朝（公元前 398—前 378 年）和第 30 王朝（公元前 378—前 341 年）。到了公元前 343 年，波斯国王又率军进攻埃及。虽经埃及军队（由埃及人、利比亚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军队）奋力抗击，但因与进攻者相比实力相差甚大，埃及第 30 王朝被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89 页。
② 同上书，第 92 页。
③ 参看费克里：《埃及古代史》，高望之等译，科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09 页。

灭。[1] 这是波斯帝国第二次对埃及的征服。

波斯对埃及的第二次统治时间不到9年。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率军由西亚进入埃及，波斯军队溃败、投降。[2] 亚历山大在埃及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埃及人视其为解放者，把他们从可恨的波斯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了"[3]。亚历山大为了博得埃及人的信任，以便在埃及长期统治，便笼络埃及的祭司，设法把自己装扮为埃及主神阿蒙的儿子，亲自到神庙去祭祀，声称自己是受了神的嘱托，到埃及来解救埃及人的，亚历山大还被授予法老的称号。[4] 亚历山大的这一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他的东方化政策的一个明显的信号。[5] 从此埃及较为平稳地转归马其顿统治。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决定向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带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发起攻击。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为扭转战局，把他统治区域内各个不同种族、部落的壮丁全都征集到一起，人数众多，准备同亚历山大决一死战。双方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摆开阵势。亚历山大兵员虽少，但精悍善战，波斯军队一遇到马其顿骑兵冲锋和步兵方阵挺进，不知所措，惊慌逃散，结果大流士三世弃部队而去，他在逃亡途中被部下认定为懦夫而遭杀害，死时约50岁。[6] "亚历山大命令把大流士的尸体送

---

① 参看费克里：《埃及古代史》，高望之等译，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11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同上书，第111—112页。

④ 参看赫克尔："亚历山大对亚洲的征服"，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第36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44页。

⑥ 参看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2页。

到波斯波利斯，埋葬在皇陵里，跟大流士以前的帝王埋在一起。”①

亚历山大追击波斯败军，直逼巴比伦城下，巴比伦城投降。据说有星相师告诫亚历山大不要进入巴比伦城，否则会死亡。亚历山大信了星相师的话，就扎营于巴比伦城外。后来，有哲学家对亚历山大说，不要相信星相师，亚历山大这才进入巴比伦城内。② 巴比伦城把大流士三世储藏在该城的巨额财富奉献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用这一大笔财富的一部分来犒赏马其顿官兵，一部分用于慰问曾经抗击过波斯侵略而后来被波斯征服的各国居民，并宣布他们从此摆脱了波斯的奴役。亚历山大看中了巴比伦城，准备在这里建立都城，修建港口，还打算改善幼发拉底河的灌溉系统，甚至想打通里海和地中海。③ 由于亚历山大很快去世，这些宏愿都未实现。

亚历山大继续追击波斯残存部队，攻下了波斯帝国的首都苏撒。立国三百多年、一度十分强大的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亡。对于亡国之君大流士三世本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评价不一。一种评价是：大流士被描述为软弱和缺乏进取心的国王，无法应对马其顿军队的进攻；④另一种评价则是：大流士三世“作为一

---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1页。

② 参看D.B.马丁：“希腊人的迷信”，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③ 参看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黄民兴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2页。

④ 参看布里昂：“大流士三世帝国的透视”，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第142页。

个国王，因其美德和各种很好的品质而受到赞扬，但却遇到一个如此强大的敌人，他没有机会战胜对手”①。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不管大流士三世个人品质如何，阿黑门尼德王朝这时已经衰败，地方势力膨胀，不受中央节制，军纪松弛，没有战斗力，因此在同马其顿军队作战时一败而无法收拾，换言之，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气数已尽了。

亚历山大在进军苏撒途中，看到一大批沦为俘虏和奴隶的希腊人，他们被截去手脚或挖去眼珠，心中大怒，决心报复。他攻下苏撒后，把波斯王宫洗劫一空，苏撒城被焚为废墟。他还放纵士兵奸淫妇女，杀戮男丁，抢劫民宅，以便彻底摧毁波斯帝国。那么，战后怎样治理这一大片土地呢？亚历山大着手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他认为有必要更换过去波斯帝国的行政官员。新授予军事职衔并统领驻军的都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②至于地方的行政官员，则是新任命的希腊人，他们常常是希腊平民而不是马其顿官员。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亚历山大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地方行政长官的专横跋扈，所以有意削减官员的权力，并设法制约高级官员的行为。④ 至于低层官员，则通常任命西亚本地人担任。

---

① 布里昂："大流士三世帝国的透视"，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142 页。

② 参看赫克尔："不信任的政治：亚历山大和他的后继者们"，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85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 二、印度河战役

亚历山大灭了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后，决心扫平波斯帝国在东部的残余势力。

他已在巴比伦城住下。在这里，亚历山大受到了更多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对波斯的征服，“是亚历山大在希腊文化的名义下完成的”①，他一直认为自己既然成了希腊世界的领袖，就必然是希腊文化的传播者。他还懂得希腊式的领袖的含义：领袖无非是公民集体中的一员，尽管他并没有按照这个教导去做。但当他越来越深入东方国家之后，他却感到东方文化中的许多内容似乎更适合于他的统治。例如，在埃及，他被授予法老的称号，自称为神的儿子；在攻下波斯首都苏撒时，他滥杀平民作为波斯人对待希腊俘虏的残酷行为的报复，等等。这样，“每一次离希腊更远一步，亚历山大就越来越不像是个希腊人，倒是越来越像是个野蛮民族的国王了”②。

亚历山大在征讨波斯东部地区时，报复之心有增无减。途中，有一个波斯人村庄的村民曾经参加过对小亚细亚希腊移民城邦米利都的神庙的洗劫，把掠夺到的财宝献给当时的波斯国王。那已经是150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的村民已经是当初劫掠神庙的人的第五代后裔。亚历山大下令把全村村民统统杀死。③

① 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②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③ 参看同上。

又如，亚历山大军队进入波斯东部今阿富汗境内的布哈拉时，抓到了杀死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波斯官员比苏斯。亚历山大认为，臣下杀死国王是大逆不道的，于是他自称要替已故波斯国王复仇，以酷刑折磨比苏斯，再以分尸的方式处死这个背叛国王的人。① 这一切都表明亚历山大越来越像一个东方的专制君主。

亚历山大进入中亚细亚，遇到的全是游牧部落。这些游牧民到处流动，随时随地攻击马其顿军队。虽然马其顿军队占领了巴克特利亚等地，但始终免不了受到游牧民的攻击，所以在亚历山大看来，占领这些地方没有多大用处。于是亚历山大的"征服中亚的政策有了转变。其主要点在从单纯的镇压变为拉拢利用当地的贵族上层，并采用当地的制度和风俗习惯，以争取当地民族的归附"②。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决定进攻印度。首当其冲的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当时已经有一些城市，居民来自世界各地，有若干年前从欧洲迁来的，还有自蒙古迁来的。③ 后来主要是雅利安人在这里居住。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多半来自伊朗。④ 这些城市一个个都是独立的，可能分别由不同的部落居住，并同当地的土著融合。⑤ 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在公元前321年才建立的。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②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③ 参看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陶笑虹、庄万友、周柏青等译，涂厚善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27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34—35页。

亚历山大命令部队“带着3,5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留守巴克特利亚，他自己率部向印度进军”①。但亚历山大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印度人的抵抗十分激烈，例如在阿瑞伽亚斯，印度人即使战败了，也放火烧毁城市后逃跑，“亚历山大进去之后才发现是一座空城”②。亚历山大再向前挺进，发现印度军队“营地的烟火比马其顿营地的烟火多得多”③。这不是虚张声势，确实是印度军队人数众多。马其顿军队虽然仍在前进，但“战利品在减少，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正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按照亚历山大的地理概念，进入印度，跨过印度河已经离世界的尽头不远了”④。

这时，马其顿军官和士兵都已厌烦长途行军作战，而且他们还认为远征印度师出无名。在他们看来，波斯是希腊的宿敌，灭掉波斯是有理由的；叙利亚和埃及都是被波斯征服和奴役的国家，把它们从波斯统治下解救出来，也有理由；而印度则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同希腊距离很远，同希腊人交往也少，有什么必要兴师动众去攻打印度呢？军官们劝亚历山大放弃这一计划，兵士们则拖延行军时间，东行进展缓慢：“他们告诉亚历山大，他们不想再这样无休止地征战了，他们要回家。”⑤亚历山大无法说服官兵，就采取身先士卒的方式，以激励全军。作战时，他冲锋在前；攻城时，他最先攀上城墙，以致中箭受伤，军中还一度盛传

---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5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③ 同上书，第169页。
④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⑤ 同上。

亚历山大因伤重不治而去世。[①] “消息传开后,全军先是一阵恸哭。哀伤过后,随即想到全军统帅今后谁属的问题,就又陷入悲观失望之中。”[②]军心日益不稳,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当大家想到怎样才能安全回到自己家乡的问题时,也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全军正处在众多好战的部族重重的包围之中。”[③]直到军队得到了亚历山大只是受伤而并未去世,并且伤势正在好转的消息之后,士气才振作起来,继续东进。

总的说来,亚历山大的印度河战役是不成功的。印度军队抵抗激烈,马其顿军队伤亡很多,加上他们不服水土,染上疾病,而所占领的土地仍遭袭击,未必能守住。所以马其顿军队渡过印度河,进入河东地区后,就奉命停止前进了。跨过印度河可算是亚历山大东征事业的顶峰。亚历山大从印度河流域折返,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

## 三、马其顿帝国极盛时期的消逝

亚历山大率军东征之初,他“坚定地相信希腊文化的绝对优越性,而且终生坚守这种信仰。他认为,他征服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整个亚洲树立希腊文化”[④]。一路上,亚历山大委派希腊人担任所征服地区的地方官员,建立希腊式的城市,鼓励希腊人移民西亚,这些都是他推行希腊化的有力措施。尤其是他建立希腊式城市这件事,更具有深远意义。这是因为,大批希腊式

① 参看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30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231 页。
④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72 页。

城市的建立(包括希腊式的学校、神庙、公共性建筑和希腊式民居的建设),在传播希腊文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除此以外,建立希腊式城市还具有另一个目的,即"通过建立城市,亚历山大减轻了进行军事和行政管理的困难,因为每个城市都为他承担了城市领土上部分维持秩序、征收赋税、管理司法的任务"①。

亚历山大率军由印度河流域返回巴比伦城时,已是公元前325年。此时距他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登陆小亚细亚(公元前334年),整整9年。不停的战争、拼杀,使亚历山大从身体到心理都已疲惫不堪。他打算安顿下来,决定让希腊—马其顿人娶波斯女子为妻。他本人在征服波斯后就娶了两位波斯公主为妃:一是巴克特利亚公主罗克姗娜,另一是大流士三世之女斯塔提拉。为了鼓励军官和士兵娶当地女子为妻,亚历山大给每个娶当地女子为妻的军官一笔厚重的聘礼,还给每个准备结婚的士兵一笔结婚费用。据说他还为娶波斯女子为妻的马其顿军官们举办了集体婚宴。"不过没有一名马其顿或希腊女子嫁给波斯人。"②至少当时如此。

希腊文化,包括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推广了。不仅叙利亚、埃及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甚至远到波斯帝国东部地区也一样。③ 考古学为此不断提供新的证据。"考古学家们甚至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交界的一个叫阿伊卡努姆的地方发掘出了一座体育馆,它距离希腊大约有4800公里之遥。这里最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72页。

②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1页。

③ 参看阿克罗伊德:《古代希腊》,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129页。

初是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名叫亚历山大里亚奥克西亚纳，是希腊文明最偏远的前哨站之一。”①

然而，从实质上说，亚历山大自己却越来越东方化了。“亚历山大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用以更好地传播希腊生活和思想的外国制度，恰好对它们希望保护的精神具有毁灭性。”②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亚历山大不相信他的人数不多的军队能够长久统治东方的被征服地区，同时他还认为，“东方除了君主神圣的政府形式而外，是不习惯于任何别的政府形式的”③。加之，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他的军队中不少马其顿士兵即将退役，人数大约 10,000 名步兵，另有 1,500 名骑兵。④ 这样一来，在他的军队中，本地士兵要占到一半以上。⑤ 为此，亚历山大决心给自己披上东方君主的外衣，以东方式的统治来管理这一块被征服的土地，让本地老百姓顺从，让本地籍士兵忠诚于亚历山大本人。“亚历山大觉得他自己很适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⑥于是在亚历山大所造就的希腊化世界中，很明显地形成了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是沿着希腊人与波斯人范围之间的断裂带延伸的”⑦。大体上说，从小亚细亚北部（黑海南岸希腊移民地区）

---

① 阿克罗伊德：《古代希腊》，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29 页。

②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73 页。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280 页。

④ 参看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61 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280 页。

⑦ 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年，第 33 页。

往南，把小亚细亚西海岸、叙利亚西海岸都包括在内，构成了这条中轴线的西部，这是希腊文明为主的区域，这条中轴线以东，希腊文明的影响越往东越小，而东方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就越大。

亚历山大越来越喜欢臣民把他视为神或神的化身。他于公元前324年向希腊各个城邦郑重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亚历山大希望希腊各城邦认同这一点。这是因为，“从亚历山大的立场看，当他被列入得到各个城市承认的众神之中时，他的统治就合法了”①，所以他执意要这样做。果然，“亚历山大是神”的说法，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同意了，连斯巴达也同意了，因为在希腊的宗教观念中，神和人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即使亚历山大自命为神、神的化身、神的儿子，也没有什么与常人不同之处。比如说，神是不需要睡觉的，人是要睡觉的，难道亚历山大从不睡觉？神是不会出血的，人受伤后要流血，难道亚历山大受伤后不流血？其实亚历山大自己心里也很明白。据说，“有一次他为箭矢所伤，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候，曾对身旁的人说道：‘我的朋友，这里流出真正的鲜血。’”②意思是告诉朋友，“他是人而不是神”③。

因此，希腊人并不把神化亚历山大这件事当真，他愿意当神就当吧，认为这只不过是亚历山大便于统治东方的一种策略而已。希腊人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不了解神化统治者所造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79页。

②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223页。

③ 同上。

成的恶果："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城市的屈服。"[①]希腊世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屈从于神化的国王统治之下了。

实际上，亚历山大神化前也好，神化后也好，他"并没有什么前后一致的政治观念体系"[②]。尽管他早年受到希腊式的教育，对希腊文化有所了解，后来在东征途中又采纳了东方文化中的许多成分，但人们还是不知道"他想赋予他的帝国什么样的形态"[③]。似乎他的目的就是征服，征服压倒一切，"因为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军事征服仍在继续进展，这种军事征服的目的越来越不明确"[④]。

马其顿军官们对亚历山大的看法不同于希腊对他的看法。希腊人远在希腊本土，根本见不到亚历山大本人。希腊人即使来到东方，也无法见到亚历山大。而马其顿军官们，过去在军营中，在战场上，在胜利后的行军途中，同亚历山大一起打仗，一起行军，经常接触，觉得彼此相距很近；而现在，亚历山大住在巴比伦城的宫殿中，"他穿上了华丽的波斯长袍——年轻而帅气——仿效波斯君主的奢华"[⑤]，被一群贴身侍从护卫着，俨然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或神的化身。特别是他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军官们再也不那么容易见到他了。希腊士兵是不喜欢亚历山大采用的东方国家仪式的，他们也不习惯对国家领袖的膜拜。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应当是产生于民间的杰出人才。这是因为，"在士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79页。

②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兵们看来，希腊的习俗是再好不过的"[①]。于是亚历山大同希腊士兵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很多。

不仅如此，自从亚历山大从印度河岸回来以后，他的心情一直很坏，时常发脾气，动不动就训斥部属，甚至无缘无故地杀死自己的部属，军中的人都怕他，不敢惹他生气，担心发生不测。而当亚历山大称神的消息传到希腊本土以后，较多的人不予理睬，不予评论，只是内心产生反感。据说，"只有斯巴达人说：'既然亚历山大想成为神，那就让他成为神吧。'"[②]。

当然，在马其顿军官中并不都是亚历山大的忠实追随者，正如菲利普二世达到顶峰时部下仍然有企图暗杀他的军官一样。不忠实于亚历山大的军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当初迫于大势而顺从亚历山大的贵族家族出身的军官，也包括亚历山大东方化政策的反对者，他们不愿意像崇拜东方专制君主那样来崇拜亚历山大，甚至"他们觉得必须依他现在要求的方式来接近国王是一件可耻的事"[③]。亚历山大似乎过于自信，不相信手下的军官会不忠实于他。

亚历山大在开始进攻波斯帝国时，对自己的生活是有节制的，但当他从印度河岸回到巴比伦城定居下来后，越来越沉溺于酒宴。他认为自己的功绩大大超过了父亲菲利普二世，希腊历史上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无法同自己相比，他还有什么理由不

---

①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02 页。

② D. B. 马丁："希腊人的迷信"，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23 页。

③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02 页。

过一过欢乐的生活呢？据说他饮酒无度，身体大受影响。他已经患病了，但他自己不认为如此。有人预测，在亚历山大回到巴比伦城之后，各种征兆都预示着他将死亡。事实真的如此，亚历山大不久就去世了。[①] 这未必仅仅是星相师的凭空猜测，也许从亚历山大的身体、举止、气色来看确有一种他已患有重病的征兆。

这时的亚历山大还很年轻。他继位时才20岁，征战9年，回到巴比伦城不足3年，公元前323年他去世了，这一年他将近33岁。“据阿瑞斯托布拉斯记载，亚历山大一共活了32年又8个月，在位12年零8个月。”[②]

亚历山大怎么死的？一种说法来自罗马人，说他“是由于本国人的谋害而丧生于异域”[③]。这种说法似乎有根有据。[④] 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亚历山大是病死的。得的什么病？可能同酗酒过度有关，更可能是由于长期酗酒过度，身体虚弱，再染上感冒，高烧不退，一病不起。他死时还很年轻，所以根本没有考虑接班人问题。他留下一个庞大的国家，但它已经度过了极盛时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亚历山大留下了一大堆待处理的难题，包括马其顿同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马其顿如何治理被征服的西亚和北非地区、留在波斯本土和巴比伦区域的马其顿军队

① 参看D.B.马丁：“希腊人的迷信”，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②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90页。

③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3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123页注②。

的去向等等。马其顿帝国的极盛期消逝得过快，留下这一堆难题如何处理？可惜从这时起，再也没有一个马其顿将领能够担此重任。

又比如说，亚历山大在所征服的波斯帝国东部、中亚细亚游牧部落地区、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些希腊式城市，那里“最初也被赋予了希腊式建制并且有希腊移民定居。希腊生活方式与其神殿、图书馆、剧院、室内体育场在远离希腊的地方得以延续”[①]，然而，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与希腊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②]。随着马其顿军队的先后分批撤离，这些希腊式城市就再也不被人们提起，并最后被遗忘了。但不能忘记，当年“无论其规模多小，也无论其位置多偏，它们都以细小的方式为人性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并为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了前提”[③]。

亚历山大去世了。他是带着未实现的理想或规划而离开人世的。除了没有留下他心目中的或指定的接班人而外，还留下了有待于实现的理想或规划，这不能不被看成是亚历山大的两大遗憾。

亚历山大还打算征服何处？一种说法是：他打算攻占阿拉伯半岛。[④] 据说，他计划在征服阿拉伯半岛之后，在半岛沿岸建立希腊移民区，然后开辟一条商路，东通印度，西达埃及。[⑤] 亚

① 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6页。

④ 参看阿希莱：《马其顿帝国：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年代，公元前359—前323年》，麦克法兰出版公司，伦敦，1998年，第357页。

⑤ 参看同上。

历山大为此还专门派人进行调查，他从调查结果了解到阿拉伯半岛的富庶，懂得占领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意义，以及懂得商路开通之后可以使他的帝国更加富裕。①

亚历山大生前在征服西亚、北非之后曾经计划由他自己亲率大军和舰队攻下意大利半岛。一种说法是："这是因为罗马的声名远扬，使他难于忍受。"②另一种说法是：亚历山大决定西征，一是为了保护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移民城邦塔兰托，以免遭受罗马人侵犯，二是为了肃清地中海西部的海盗，保证希腊商船在地中海西部海域安全航行。③ 此外，希腊人一直把迦太基视为竞争对手，亚历山大攻占西亚腓尼基人的城市后，很可能这时就有了攻占迦太基的想法。④ 而意大利境内的各种反罗马的势力也都欢迎亚历山大率军在意大利半岛登陆，它们派遣使者到巴比伦城，向亚历山大提供当地的情况。⑤

总之，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城以后，的确有过远征的想法。据说，亚历山大在从印度河流域班师回到巴比伦后，他最后一次重要活动就是巡视底格里斯河下游和海岸线。⑥ 在这之前，他在印度河战役后，也曾在那里考察海岸线，眺望大海。⑦ 亚历山

---

① 参看阿希莱：《马其顿帝国：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年代，公元前359—前323年》，麦克法兰出版公司，伦敦，1998年，第357页。

②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55页。

③ 参看蒙森：《罗马史》第2卷，李稼年译，李澍泖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1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131—132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131页。

⑥ 参看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⑦ 参看同上。

大究竟下一步想征服何处，只能凭后人的猜测。同时，亚历山大在印度河一带发现当地盛产松木、枞木、杉木，于是他开始建造船只，所建造的虽然是一些用于运输的船只，[①]但未必没有造舰船的打算。亚历山大回到巴比伦之后，曾计划建造战舰，以便用于远征，然而他本人不久即去世。[②]

对于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之后的意图，阿里安评论道："究竟亚历山大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猜不准，因为我没有根据，而且我也不想猜。但有一点我是可以断言的：亚历山大雄心勃勃，决不会满足于已占有的一切。"[③]由此看来，征服阿拉伯半岛，征服罗马，征服迦太基，可能都被亚历山大考虑过。阿里安甚至说："即便是在亚洲之外再加上欧洲，把不列颠诸岛也并入欧洲，他还是不会满足。"[④]阿里安认为这一切都同亚历山大个人性格有关："他永远要胜过对手。实在没有对手时，他还要胜过他自己。"[⑤]

最后还要提到，亚历山大在进军波斯途中和征服波斯全境后，夺取了波斯帝国的巨额金银财宝，他是怎样处置这一大笔财富的？大体上有以下用途。一是，他"分配了很大的数目给他军队中老兵，他们是要回马其顿的老家去的。他的将士在远征途中所借的债，他也代为偿还了"[⑥]。二是，花钱用于公共工程建

① 参看舒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海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55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8页。

设,如在征服地区建立新的城市,修筑水渠,还帮许多城市修复破坏了的庙宇。[①] 亚历山大肯定还保留了不少财富,但具体数字不得而知,否则他死后不会发生多起为争夺波斯财宝而引发的战争。应该说,亚历山大用于分配和建设的资金总额是巨大的,这对于马其顿、希腊和亚洲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有重要影响,因为在波斯帝国时期,这些财富是深藏于宫中的,亚历山大把其中一部分投入了流通领域。[②] 流通领域中货币流通量的增多究竟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留待本书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章中再讨论。

## 第二节　马其顿帝国的迅速崩溃

### 一、动乱

亚历山大患病期间,仍亲自过问军队的大事。他绝对没有想到还不到 33 岁就会病故。但病情发展很快。到了病危阶段,马其顿的将军问他把帝国交给谁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交给最强的人”[③]。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可能是他死得太快了,太突然了,所以对身后的事没有安排。[④] 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种说法是:由于“没有直接的继承人,从一开始,驻于巴比伦

①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88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03 页。

④ 参看 T. R. 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97 页。

的将军们就没有打算把权力授予一位真正的国王”[①]。还有一种说法是：亚历山大去世时，他新娶的王后、波斯公主罗克姗娜已经怀孕了，所以巴比伦城的将军们都正等待这个孩子的出生，再做决定。[②] 但谁又能保证这个待出生的孩子一定是个男孩呢？也只有等待，到时候再定。即使罗克姗娜生下的是个男孩，那么谁来摄政呢？于是又回到谁是“最强的人”这个难题上来。[③]

究竟谁是“最强的人”？在马其顿军中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将军们都跟随亚历山大走出马其顿，进入希腊本土，又渡海来到小亚细亚，然后分别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阿富汗、中亚细亚和印度河岸立过战功。他们或者在亚历山大身边，或者奉命率军驻守一地。亚历山大在世时，他们全都恭敬从命，显得十分忠诚。士兵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在世时，最忠于他个人的是色雷斯士兵，其忠诚程度甚至超过马其顿士兵。[④] 亚历山大去世后，这些将领、军官和士兵是否依然忠于亚历山大的接班人，是否依然忠于马其顿王国，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形势在迅速变化。对将军们来说，没有亚历山大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谁都不会承认另一个资历同自己相似，战功同自己不相上下，拥有的实力同自己相差无几的同僚是“最强的人”，是众望所归的最合适的接班人。军官听将领的，士兵听军官的，基

---

① 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4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174—175页。

④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年，第49页。

本上谁也改变不了这样的格局。

要知道，亚历山大本人是信任自己的“征服中的伙伴”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同国王之间的关系，在亚历山大征服东方的一些著名事件中提供了引人入胜的内幕情节，[①]但这些往往易于被人们所忽略。这里主要有两个同马其顿政治—军事体制有关的、便于我们了解亚历山大与将领们以及将领们相互关系的问题。一是，这些将领和他手下的军队来自哪些地区；[②]二是自从菲利普二世以后的马其顿国王都采用如下的办法来笼络不同地区的将领，即把他们的儿子提拔到宫中服务，使他们忠诚而又有竞争性、有领导才能而又听话顺从。[③] 亚历山大正是这样使他的将领们对自己忠贞不贰，以保证在亚历山大死后政局不乱。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亚历山大的“征服中的伙伴”不止一人，成为亚历山大亲信的将领有若干人之多。谁能说得上谁是最受宠信的？这个问题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伤势严重时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军中已经传出亚历山大即将去世的消息了，“在全军心目中，很多将领的威望都不相上下”[④]，谁最有希望接班，没有人知道。在亚历山大举丧时，谁也不敢先表露出准备接班的架势，因为这无异最先把自己摆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上。于是将领们都僵持着，都在静观待变。

---

① 参看赫克尔：“国王和他的军队”，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70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71 页。

④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31 页。

此外，还有一支难以捉摸的力量，就是亚历山大军队中的雇佣兵。他们加在一起大约有60,000人之多，其中包括希腊人、小亚细亚安那托利亚人、亚洲人。他们主要担任守备任务，只对给他们发薪酬的军官忠诚。[①] 另一支难以捉摸的力量是伊朗人充任的兵士，他们同样人数众多，大多数驻防于巴比伦和原波斯帝国各省。他们可能忠于亚洲的君王。在亚历山大死后的权力斗争中，他们处于观望状态。[②]

帝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首先是军心不稳，来自马其顿的军官和士兵都想回家，不愿再留在东方打仗了。无论巴比伦城或新建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多么繁荣、壮观和重要，马其顿毕竟是他们的真正故乡。[③] 即使是那些有可能成为亚历山大事业继承者的将领们，也都留恋自己的老家，[④]更不必说普通的军官和士兵了。但更为严重的则是希腊本土的形势的剧变。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希腊各个城邦的时候，有人欢呼，有人则为希腊的前景担忧。

欢呼者认为，希腊城邦从此可以摆脱马其顿的控制了。他们把马其顿驻军看成是外来的侵略者，是硬加在希腊城邦之上、剥夺了希腊城邦独立地位的势力。[⑤] 与此同时，驻防于巴克特

---

①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年，第51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41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惠特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第53页。

利亚的希腊雇佣军也试图开拔,返回欧洲。①

尽管从菲利普二世到亚历山大都以希腊城邦效忠为条件而给予这些城邦以自治权,但希腊人心有不甘,他们始终把这看成是一种恩赐、一种羞辱。从生活上看,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希腊各个城邦远离战火,生活上比较安定,一部分希腊人跟着东征的大军前去西亚、北非了。而且亚历山大俘获波斯帝国财宝后,还恩赐给雅典等希腊城邦不少财物,这是东征期间希腊人得到的礼物。② 同时,希腊的粮食供应问题也缓解了。黑海北岸的粮食不断输入雅典等地。北非的昔兰尼也在向希腊城邦源源供应粮食。③ 但这些并不等于希腊人放弃了原来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理想。现在,亚历山大去世了,欢呼的希腊人认为这意味着希腊自由时代的来临。表现最积极的城邦是底比斯,因为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在平定底比斯和雅典反马其顿的军事行动时,两度宽恕了雅典,却两度严惩了底比斯。于是逃亡到雅典的底比斯人立即组成了志愿军,围攻马其顿的驻军。雅典人则纷纷走上街头,兴高采烈,欢呼庆贺,说什么"亚历山大早就该死了",这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发泄,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为希腊城邦会因此回到马其顿南下之前的时代。

因亚历山大之死而担忧的其他希腊人(也包括一些雅典人)则认为,尽管马其顿南下后希腊各个城邦头顶上多了一个发号

---

① 参看惠特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53 页。

② 参看哈丁编译:《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伊普索战役》,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47—148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43—144 页。

施令的国王,但不管怎么说,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渐渐淡化了,希腊城邦内的平民极端派不可能再强行推行那种"均贫富"、"驱逐、殴打、屠杀贵族和富人"的政策了,希腊人毕竟赢得了 10 年左右的恢复经济和稳定社会的时间。尤其是,这 10 年间,希腊商人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得到了不少商机,他们在扩大了的西亚、北非市场上赚了钱,或者返回希腊置业,或者携带家人移居新建的希腊移民城市。希腊本土的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和善于经营的农场主们,也向往着西亚、北非的新生活。现在,亚历山大死了,西亚、北非也许不再是希腊移民的乐土了,甚至在希腊本土,过去 10 年的好日子还会维持多久,会不会再度陷入社会无序的境地呢?这些在亚历山大刚去世的日子时已经出现了征兆,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呢?

希腊人高兴也罢,担心也罢,但他们全都看清了这样一点:一个时代——亚历山大时代——已经结束。

亚历山大死后留下的是一种最高权力真空的状态。将领们争夺地盘的斗争开始了,形势变化在加速,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事实。①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希腊人也许可以欣慰的是,亚里士多德那种把希腊城邦政治和希腊文化推广于希腊世界以外的夙愿也许可以实现了。② 这是因为,无论在亚历山大生前还是死后,希腊人毕竟成了西亚、北非新征服的土地上的新主人,希腊式的城市毕竟在这些新征服的土地上纷纷建立了,而大多

---

① 参看惠特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59 页。

② 参看奥斯汀和维达尔-纳奎:《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导论》,英译本,奥斯汀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 年,第 152 页。

数劳动力则由东方被奴役的土著居民经常提供。[1] 可以预料，将来无论是谁执掌政权，也无论是哪些将领分割了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他们全都会依靠希腊人，任用希腊人。希腊文化在西亚、北非的传播会比亚历山大在世时更快，范围更广。

与此同时，在希腊世界的周围也出现了对亚历山大死后的马其顿政权的威胁。多瑙河以北的游牧部落，主要是早期的斯拉夫人部落和日耳曼人部落，渐渐由分散到聚合，由弱势转向强势，他们时刻伺机南下，马其顿正处于他们南下希腊本土必经的道路上。亚历山大去世后，将领们忙于争夺继承权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无暇关注北方边境的危险。西方，在意大利半岛中部，正值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人已经开始强盛了，他们击退了高卢人的南侵，并把意大利半岛中部一些地方纳入版图，正准备把半岛南部也纳入。这就威胁到那里的希腊移民城邦的安全。这些希腊移民城邦原本想求助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移民城邦叙拉古，但这时的叙拉古发生内乱，它没有力量来支援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人了。[2] 他们求助于科林斯和斯巴达，因为这是他们的母邦，但都无济于事。[3] 无奈之下，这里的希腊人只好向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叔叔摩洛西亚的亚历山大求救。后者认为这是一个向西扩张的机会。这时亚历山大大帝仍在东方，无暇西顾。于是摩洛西亚的亚历山大便乘此机会，亲率一支军队渡海

---

① 参看奥斯汀和维达尔-纳奎:《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导论》，英译本，奥斯汀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 年，第 152 页。

② 参看伯里和梅吉斯:《希腊史(到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第 4 版(修订版)，圣马丁出版社，纽约，1975 年，第 413 页。

③ 参看同上。

进入意大利半岛南部作战，并取得胜利，罗马被迫议和。[1] 这很可能是罗马慑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权势和声望所致。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移民城邦从此同马其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现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了，谁还有力量来挡住罗马人向希腊移民城邦的进犯呢？

西西里岛的情况也不妙。摩洛西亚的亚历山大渡海进入意大利半岛南部同罗马人作战时，他可能也把计划中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西西里岛。[2] 现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了，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的命运也岌岌可危，一方面，迦太基始终没有放弃统一西西里岛和消灭当地希腊城邦的打算，另一方面，罗马人同样垂涎于西西里。谁来保护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呢？

再看东方。小亚细亚不平静，因为那里的希腊移民城市虽然被亚历山大从波斯帝国手中解放出来了，并且还保留自治地位，但只要亚历山大还在世，这里的希腊人还有所顾忌，不敢树起独立的旗帜。现在，亚历山大已死，他们想摆脱马其顿的控制，恢复到波斯帝国占领前的独立自主状态。至于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直到中亚细亚和印度河流域，那里就更不平静。当地的居民，包括一部分移民到这里的希腊人，总想自主为王，割据一方。

动荡最严重的仍然是希腊本土。就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最初两三年内，在马其顿帝国没有人接替亚历山大而出现的“权力真空”状态的条件下，雅典认为自己独立的时间到了，于是联

---

① 参看伯里和梅吉斯：《希腊史(到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第 4 版(修订版)，圣马丁出版社，纽约，1975 年，第 413 页。

② 参看同上。

合了一些城邦,驱逐马其顿驻军。这就是公元前323—前322年的反马其顿战争,又称“希腊战争”。[①] 战争初期,希腊城邦联军获胜,马其顿军队向北撤退,小亚细亚的马其顿军队起来支援。在公元前322年的拉米亚城的会战中,希腊城邦联军被击败,所以这场战争又称“拉米亚战争”[②]。“希腊人失败的关键是:每个希腊国家现在只顾自己的安全”[③],于是军事力量分散了。

马其顿军队的统帅是安提帕特,他是亚历山大东征时奉命留守马其顿并负责监视希腊本土的将领。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叛乱,“安提帕特下令叫最没有生活保障的雅典公民迁至色雷斯,分给他们土地。拥有2,000德克拉姆以上的雅典人才能享受政治权利”[④]。然而只过了3年,安提帕特于公元前319年去世,争夺安提帕特权位之争立即开始。争夺安提帕特权位的马其顿将军为了得到希腊人的支持,又允许希腊各个城邦恢复民主制度,当初反对马其顿的被放逐的希腊人也可以回到故土。[⑤] 但由于希腊本土以北地区的战乱未停,黑海沿岸港口向希腊运送粮食的船路受阻,希腊的粮食供应又紧张起来,社会因此动荡不安。希腊不得不从北非的昔兰尼进口大量粮食,以安定人心。[⑥]

---

① 参看哈丁编译:《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伊普索战役》,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2—153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303页。

④ 同上。

⑤ 参看同上书,第303—304页。

⑥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2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年,第3页。

## 二、分治的必然性

分治是分裂的结果，分裂之后才能分治。分治是一种妥协，妥协的最佳方式就是分治。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的解体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亚历山大生前就对一些拥有重兵而又担任某一地区行政长官的将领心有戒惧，唯恐他们拥兵自重，割地称雄。[①] 一个例子是亚历山大对待前面提到的安提帕特的态度。安提帕特追随菲利普二世多年，是一位老将。亚历山大东征时，任命安提帕特为驻守马其顿的军事统帅兼地方行政长官。但亚历山大对他不放心，又任命梅姆农为色雷斯的主管军政的大员，以制约安提帕特。[②] 安提帕特受到牵制后，便对梅姆农不满，两人关系恶化，以至于公元前 331 年，即亚历山大东征后的第三年，梅姆农不听安提帕特的调遣，而且还向亚历山大报告安提帕特的行径。这件事可以表明亚历山大并未对梅姆农不服从安提帕特调遣的做法有反感。[③]

既然马其顿帝国的解体已成定局，大一统局面的恢复无望，而社会秩序需要恢复，战乱需要平息，政府的权威需要重新确立，分治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这么大的马其顿帝国会分裂为多少块？由几家来分治？难道会像一只瓷盘被摔碎之后分裂

---

① 参看赫克尔："不信任的政治：亚历山大和他的后继者们"，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84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为无数碎片那样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掌权、势力相当而又能维持一方安宁的马其顿将领人数并不多。

由于亚历山大东征时，在原波斯帝国领土上进展很快，所以在所占领地区“首先保留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大部分管理机构，尤其是各省份的边界，除了个别例外，几乎未作什么改变”①。只是考虑到有的省面积过大，就把省份划小，例如叙利亚省可能就是在公元前329年从腓尼基省划出来的。② 军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马其顿将领手中。东部有的省的省长是本地人，军事统帅则是马其顿人，省长的任务主要是征税。③

亚历山大死后的分治，起初是按照马其顿军队驻防的地区划分的，面积比省大得多。分治初期，马其顿军队的一些将领各自把防区变为实际管辖的区域，管辖区域内各省的省长当然听命于驻军的将领，有些被认为不顺从的被撤换了。但将领们谁都没有建立国家，名义上仍是以马其顿的名义来治理的。建国，或建立王朝，是以后的事情。

分治之初，较大的军事冲突不多见，较小的军事冲突则不断。军事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力强大的将领，把实力较小的将领打败了或逼走了，把后者的地盘吞并了，这样，保留下来的是少数几个实力强大的将领，由于实力不相上下，暂时相安无事，各方都把精力主要用于稳定现有地盘上的秩序。二是为了不至于兵力过于分散，所以分治一方的将领有必要对防区和管辖范围进行一些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冲突，

---

① 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6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67页。

但冲突一般不至于激化。

## 三、分治区的形成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去世，亚历山大的将领们稍后在亚历山大宫殿所在地巴比伦城开会，决定先由亚历山大的异母弟阿里狄俄继承马其顿王位，称菲利普三世；同时考虑到罗克姗娜所怀的亚历山大遗腹子大约在两个月后出生，决定称之为亚历山大四世，马其顿实行菲利普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共治。又过了一段时间，菲利普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都由巴比伦城迁回到马其顿境内居住。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战由此拉开序幕。这是马其顿将领之间一场互不相让的战争。安提帕特这时（公元前 323 年）被将领们推举为摄政或监国，以辅佐两位幼主。[①]

将领们争夺继承权的战争，简称继承战争。由于不同的记载有些出入，它的年代（发生的年份和结束的年份）也有差异，[②]所以只能大体上加以叙述。继承战争共有三次，其上限（发生年份）分别是：

第一次继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321 年或公元前 320 年；

第二次继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317—前 316 年冬季，或公元前 316—前 315 年冬季；

第三次继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312 年春季和夏季，或公元

---

①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6 页；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272 页。

② 参看惠特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54、66 页。

前 312 年秋季，或公元前 311 年春季。①

第三次继承战争的下限（结束年份）至少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第三次继承战争结束于公元前 312 年秋季（加扎战役结束）；

第二种说法：第三次继承战争结束于公元前 311 年春季（塞琉古返回巴比伦城）；

第三种说法：第三次继承战争结束于公元前 311 年 2 月 22 日（托勒密控制腓尼基和巴勒斯坦之时）。②

无论采取哪一种有关继承战争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看法，可以认为继承战争大约持续了 10—11 年之久。③

继承战争结束后，基本上形成了五个分治区或总督区的格局。这五个分治区或总督区是：

1. 安提帕特管辖的地区

前面已经提到，安提帕特是菲利普二世的宿将，亚历山大东征时留守马其顿并负责监视希腊本土。亚历山大去世后，他平息了雅典和其他一些希腊城邦联合举兵反马其顿的战争，并在两位幼主（菲利普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共治期间担任摄政或监国之职。由于他年事已高，而且忠于菲利普二世，④所以亚历山大东征后曾想换掉他。亚历山大命令另一个将领克拉特罗斯率

---

① 参看惠特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66—67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67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6 页。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40 页。

领退伍还乡的10,000名马其顿士兵去替代安提帕特，但克拉特罗斯心存疑虑，不敢贸然行事，恰好在行军途中亚历山大去世了，安提帕特乘机拉拢他，给克拉特罗斯一个虚衔："护国者"，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这样，马其顿和希腊本土依旧由安提帕特统治。①

2. 安提柯管辖的地区

亚历山大在世时，安提柯是小亚细亚驻军的指挥官，主要驻守小亚细亚中部地区。他是公元前334年被亚历山大安排在这里的，并被任命为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地区的总督。② 军政大权集于他一身，可见亚历山大对他是信任的。亚历山大去世后，巴比伦城的官员们尽管对安提柯不放心，但没有正当的理由把他调往别处，只得让他留任。③ 于是安提柯有实力成为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之一。

3. 塞琉古管辖的地区

塞琉古也是深受亚历山大信任的将领。亚历山大在世时，他驻防于两河流域、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地区以及叙利亚，但长期驻于巴比伦城，担任马其顿中央政府的骑兵司令官。这个职务在亚历山大临朝时期十分重要，因为相当于国王的代表，但亚历山大去世后，可能只有纯军事性质了。④ 不管怎样，塞琉古担任的职务重要，又握有兵权，使他有条件分治一方。

---

①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323—前30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年，第14—15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4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13—14页。

4. 托勒密管辖的地区

托勒密在亚历山大临朝时期奉命率军驻防于埃及和巴勒斯坦。亚历山大认为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是今后向西扩张的基地，又是粮仓，所以同时任命克列奥梅纳为主管地方行政的总督，作为自己的正式代表。① 尽管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军权和地方行政管理权是分开的，但军权更为重要，而在亚历山大去世后，当地的实权就落到了托勒密一人手中。②

5. 莱西马库斯管辖的地区

在分治的各个将领中，莱西马库斯是实力最弱的一个。他驻防于色雷斯。这里需要指出，色雷斯未被列入希腊世界，那里居住的是色雷斯人，后者被希腊人视为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部落，较早就被菲利普二世占领。亚历山大死后，莱西马库斯就把色雷斯及其附近海峡地区作为自己的管理范围，独立行事。但由于他的实力较差，所以总是同这个或另一个分治一方的将领合作，避免被兼并。③

以上就是五个分治区的基本情况。关于莱西马库斯，还有三个由他分治的地方需要提到。一是赫拉克利亚，二是帕加马，三是本都。

赫拉克利亚原是一个独立的希腊移民城邦，位于黑海南岸，亚历山大东征时予以特殊照顾，让它保留自治权。关于这一点，

---

①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13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29、39 页。

本章第一节已经有所阐述。[1] 从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 305 年这 18 年间，赫拉克利亚一直保持安定和繁荣的局面，它同爱琴海沿岸城市之间的商业往来持续进行。[2] 公元前 305 年，赫拉克利亚掌权者狄奥尼修斯国王（公元前 337—前 305 年）去世了。而这时，亚历山大死后的分治格局已经形成。莱西马库斯看中了赫拉克利亚，他乘狄奥尼修斯去世和国内形势混乱之机，进兵安那托利亚西北部，直逼赫拉克利亚边境。在这种形势下，狄奥尼修斯的遗孀阿玛斯特里斯王后同莱西马库斯结婚并结成同盟，莱西马库斯认为这将有利于自己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于是派兵进驻赫拉克利亚。[3] 赫拉克利亚因此也避免了战乱，继续保持境内安定。公元前 300 年，阿玛斯特里斯与狄奥尼修斯所生的长子克利尔库斯已成年，掌握了赫拉克利亚大权，但在其母的影响下，此后 17 年内赫拉克利亚依旧经济繁荣。[4] 公元前 284 年，阿玛斯特里斯去世，谣传她被儿子谋杀，赫拉克利亚内部不稳。尽管在这以前莱西马库斯已同阿玛斯特里斯离异，但他不愿放弃这个吞并赫拉克利亚的机会。于是他以帮助克利尔库斯镇压反对派为名，率领军队开进赫拉克利亚。然后，莱西马库斯再以谋杀罪把克利尔库斯及其亲信逮捕，审判后定罪处死。至此，赫拉克利亚并入莱西马库斯的领地。

---

①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929—932 页。

② 参看伯尔斯坦:《希腊文化的前哨:黑海岸边赫拉克利亚的兴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 年，第 78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81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84 页。

莱西马库斯长期以来同塞琉古保持良好的关系，双方相互支持，以色雷斯为基地的莱西马库斯才能在小亚细亚西部站稳脚跟。但不久他同塞琉古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这主要由于莱西马库斯竭力在小亚细亚扩张，并掠夺到较多的财富、宝藏，[1]塞琉古认为这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于是双方发生战争，公元前 281 年，莱西马库斯在赫尔斯滂战争中丧命。[2] 他死后，其侄子欧迈尼斯在小亚细亚西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希腊人国家，这就是帕加马王国。关于帕加马，本书第十二章另有阐述。[3]

在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大约于公元前 301 年前后，在分治争夺地盘的战争中，崛起了一个小国，这就是本都。公元前 281 年，米特里达特一世在本都称王。它最强的时候，征服了小亚细亚西部和中部的大片地区，还占领了黑海的北岸。这些地方过去是受莱西马库斯影响的，莱西马库斯兵败身亡后，他的侄子欧迈尼斯只继承了一小块领土，建立了帕加马王国，而小亚细亚大部分领土则陆续成了本都的管辖地区。本都的强盛成为正在扩张中的罗马的威胁。在罗马的进攻下，本都被灭，其领土并入罗马的加拉太—卡帕多西亚行省。

现在，可以对亚历山大死后陆续形成了五个分治区做一小结。五个分治区中，莱西马库斯所管辖的地区的演变，已如上述。接下来，让我们对另外四个分治区的变化做一说明。

---

①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持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68 页。

②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36—37 页。

③ 参看本书，第 827 页。

## 四、安提柯、塞琉古、托勒密三个王朝的建立

首先要从安提帕特谈起。安提帕特于公元前319年去世。他所管辖的分治区由其子卡桑德同安提帕特的部属争夺统治权。据说，卡桑德在这以前从未显示过他有统治整个帝国的野心，在他父亲去世前他已取得了马其顿驻希腊的卫戍部队的指挥权，从而在其父死后坚持自己有继承其父地位的权利。[①] 毕竟安提帕特担任实际上马其顿领导人一职已有15年之久(从公元前334—前319年)，所以卡桑德受到一部分马其顿军官的拥护。加之，卡桑德又同安提柯、托勒密等将领往来密切，他还娶了托勒密的姐妹为妻，他在马其顿的地位似乎更巩固了。这时，由于安提柯一心想同塞琉古争夺小亚细亚和西亚的霸权，而托勒密的心思全放在埃及，无暇北顾，于是卡桑德就能够专门对付同他争夺安提帕特权位的各个部属。[②]

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同父异母弟这时已被捧上国王位置，称菲利普三世。卡桑德立即移师北上马其顿，受到马其顿人欢迎，并控制了菲利普三世。而安提帕特的部将波利帕奇翁则把马其顿另一位国王即亚历山大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及其母罗克姗娜带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另立王旗。亚历山大之母奥林匹亚斯站在其孙子亚历山大四世一边。于是交战双方阵线分明：一方是亚历山大四世，背后是波利帕奇翁；另一方是菲利普三世，背

---

① 参看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年，第103—104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04—105页。

后是卡桑德。[①] 年老的奥林匹亚斯本来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但她已身不由己，卷入战争之中。战争的结果是：菲利普三世于公元前 317 年被杀害，亚历山大四世于公元前 310 年被杀害(时年 13 岁)，亚历山大之母奥林匹亚斯被卡桑德处死，波斯公主罗克姗娜(亚历山大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之母)也被杀害了。"亚历山大的亲戚中没有一个人有机会掌握统治大权"[②]，亚历山大的母亲、妻子、儿子和同父异母弟弟相继被害身亡。卡桑德登上了马其顿国王的宝座。

卡桑德及其家族的命运又如何呢？同样是不幸的。

安提柯作为分治者之一，领兵驻守于小亚细亚。他的野心很大，一方面想西进，攻占马其顿，再控制希腊本土，另一方面又想夺取两河流域，同塞琉古共享两河流域的利益。结果，塞琉古和托勒密联合起来，在公元前 301 年的伊普索战役中将安提柯击败，安提柯被杀，年已 81 岁(公元前 382—前 301 年)。[③] 塞琉古从安提柯手中夺取了后者所占据的小亚细亚地区。[④] 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自知不敌塞琉古的军队，乘着伊普索战役后塞琉古同托勒密为瓜分战果而争吵不休的机会，率领余部西进，也算是继承了其父安提柯的遗愿。[⑤] 卡桑德受到进攻，赶快向莱西

---

① 参看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 年，第 106—107 页。

② 阿克罗伊德：《古代希腊》，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23 页。

③ 参看哈丁编译：《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伊普索战役》，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76 页。

④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41 页。

⑤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76 页。

马库斯和塞琉古求助，三方联手终于逼使德米特里暂时无法直接进攻马其顿。但德米特里仍然在希腊境内扩大自己的势力。①

公元前 297 年，卡桑德突然病故，其长子菲利普继位，四个月后也死去。马其顿留下“权力真空”。卡桑德还有两个儿子，但都无法填补空缺的王位，因为卡桑德的遗孀偏向于幼子亚历山德罗斯，中子安提帕特罗斯谋杀了其母，弟兄之间发生了内战。这两人年轻，毫无政治经验，德米特里便利用这一混乱状态，以“恢复民主”和“解放希腊人”为号召，进攻马其顿，一年后马其顿落入德米特里手中。② 安提帕特和其子卡桑德统治马其顿的时代结束了。

这样，争雄的分治区还剩下三个，即托勒密的分治区、塞琉古的分治区以及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的分治区。这三个分治区中，最早建立国家和独立称王并建立王朝的是托勒密和塞琉古。他们分别于公元前 4 世纪末建立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托勒密是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者，自称托勒密一世。塞琉古王朝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他自称塞琉古一世。

那么，安提柯王朝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前面已经指出，公元前 302—前 301 年，塞琉古和托勒密联合起来同安提柯作战，在伊普索战役中将安提柯击败，安提柯身亡，其子德米特里西进

① 参看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 年，第 132—133 页。

②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53—54 页。

马其顿和希腊本土。[①] 因此，伊普索战役被看成是亚历山大继承者争夺权位的战争中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决定了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三个王朝并立格局的形成。[②] 但争夺马其顿的战争仍在继续，托勒密和塞琉古不甘心马其顿落到德米特里手中。公元前288年，德米特里被迫撤出马其顿。

德米特里自知实力不如托勒密和塞琉古，决心利用希腊本土重整军备，于是大规模地建造舰船，以加强海上力量。[③] 他还在雅典、科林斯等地建立了大型造船厂，打算造船500艘，这样将来才能在爱琴海争霸。[④] 公元前282年，德米特里去世，但他为未来的安提柯王朝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德米特里的儿子安提柯·贡那特执掌大权。公元前276年，安提柯·贡那特出兵占领了马其顿，建都塔拉城，自任马其顿国王。[⑤] 安提柯王朝由此建立，安提柯·贡那特称安提柯二世，其祖父安提柯则被称为安提柯一世。

至此，在亚历山大建立的马其顿帝国的广阔疆土上最终形成了三个独立的希腊化国家，或者说，产生了三个希腊化王朝：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安提柯王朝。这些希腊化国家或希腊化王朝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希腊化。不仅它们全都使用

---

① 参看本书，第636—637页。

②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第265页。

③ 参看舒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海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323—前30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年，第79页。

希腊语,接受希腊文化,而且它们全都认为马其顿是它们的发源地。“在希腊化国家的君主和他们的上层军人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中,一般马其顿人的认同感和继承感可能也成为影响他们的因素。他们全都追溯到菲利普二世、亚历山大大帝和亚历山大继承者们的光荣年代,并且足以表明他们的财富作为马其顿人伟大的两代遗产而具有正当性。”[①]这三个王朝之间虽然战争时有发生,但联姻也是不断的。这种联姻的过程,“意味着在希腊化时代的中期,这些王朝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引以自豪”[②],因为他们全都自认为来自“相同的皇家和英雄的祖先”[③]。他们之所以会落到如今这样的三个国家或三个王朝并立的局面,正是由于亚历山大与手下将领互不信任以及将领之间互不信任所致。[④] 这正是悲剧的根源。

三个王朝各自控制一块地盘,各自与当地的文化交融,各自有本地区的特点。而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三个王朝仍存在着社会的融合,而且融合的形式是不一样的。[⑤] 从个人的层次来看,一方面出现了个人地位远较过去增加的流动性,公民活动边界的可渗透性也扩大了。[⑥] 这种融合还表现于许多方面,例如,一

---

① 比罗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国际关系”,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4页。

② 同上书,第305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赫克尔:“不信任的政治:亚历山大和他的后继者们”,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92页。

⑤ 参看戴维斯:“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相互渗透关系”,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8页。

⑥ 参看同上。

个公民可以有双重公民身份，可以购买公民身份，可以被授予荣誉公民权，还有，限制性的公民权继承制瓦解了，等等。[①]

这就是希腊化世界的特色。

## 五、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的原因

希克斯在所著《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对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一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专制君主制之下，“危急时共同体实际上已成为一支军队；然而时机一旦来临，就必须把军队改造成为国民政府的工具。许多事例证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帝国可能不批准它，以致中央政府……只得解散”[②]。希克斯认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的崩溃”[③]。这一分析是可信的。

亚历山大只活了33岁，从20岁即位到33岁去世，13年间他建立了一个东起印度河流域、西到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庞大帝国。但亚历山大一死，这个大帝国怎么一下子就瓦解了呢？不能归因于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政策，也不能归因于他的东方化倾向。希腊化和东方化都不是导致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的原因。

要知道，所谓希腊化实际上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内容是，把希腊城邦一贯奉行的民主和宪制推广于希腊以外的地区。也就是说，不管希腊城邦实行的贵族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

---

① 参看戴维斯：“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相互渗透关系”，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8—9页。

②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17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注。

治，不管是国王体制还是平民和贵族通过选举而执政的体制，全都应当根据法律、惯例和程序，“僭主政治”不管治理得多么好，总是被当作异类，迟早要被赶下台。另一个内容，是把希腊文化传播和推广于希腊以外的地区。也就是说，在希腊以外的地区，推行希腊语，推行希腊式的城市建设，使希腊人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人们交往的方式传播开来。两方面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这才叫真正的希腊化。

但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在所征服的西亚、北非土地上所推行的希腊化仅仅是第二方面的内容。亚历山大对于被他从波斯帝国统治下解救出来的小亚细亚希腊移民城市，虽然保留了它们的自治地位，但却以服从亚历山大为前提，实际上这些希腊移民城市的自治权是有限的。亚历山大在东征途中所兴建的新城市，尽管从城市的建筑风格和公共设施方面看是希腊式的，但这只是外形而已。希腊城邦的体制并没有被引入西亚和北非。

由此看来，马其顿帝国的迅速崩溃，同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政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至于东方化，可以说，亚历山大在占领巴比伦城和由此再向伊朗高原挺进的过程中，东方政治体制和东方文化对他的影响的确越来越大，所以说他有东方化的倾向，符合实际情况。何况，亚历山大的根基在马其顿，马其顿的国王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使他有可能对东方政治体制并不陌生，对东方文化也比较容易接受。为了巩固自己在西亚和北非的统治，亚历山大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扮演为神、神的化身和神的儿子，并要求别人崇拜他，这表明他的东方化倾向已经同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了。然而，这也不能解释马其顿帝国会在他去世之后很快就解体了。

这是因为，东方化的专制国家并不是没有巩固自己的手段的。波斯帝国几度兴衰，维持了300年以上，如果不是遭到亚历山大强大军队的快速进攻和追击，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可能另有深层次的原因。亚历山大统治区的周围没有强大得足以一下子灭掉马其顿帝国的对手，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土地上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或土著居民的叛乱，马其顿王族内部也没有出现有实力能同亚历山大抗衡或夺取王位的兄弟、叔伯、子侄。那么，亚历山大一死，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的原因究竟何在？关键可能在于：亚历山大渡过海峡进入小亚细亚之后，一心想早日消灭波斯帝国，行军的速度快，战果也很辉煌，一直打到印度河流域，而没有认真思考过被征服地区的治理问题。这是一个单纯靠军事征服方式，硬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体制、不同文化的居民统一在一起，却没有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配合的帝国。实际上，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只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集团组织而已。亚历山大所依靠的只是跟随他出征或奉命留守的高级将领们，但这些高级将领只知道领兵打仗，也都没有治理庞大的被征服地区的思想准备和长期规划。他们甚至不想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亚历山大对他们是不放心的，多思考这些问题，反会引起亚历山大的猜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他们服从亚历山大，效忠于他，一切奉命办事，才能继续得到亚历山大的信任和重用。而亚历山大死得太突然，在33岁这个正是年轻有为的青壮年时期就过世了，他本人既没有考虑谁来接班，更没有考虑自己离开人世后如何治理这块新征服的土地，实现长治

久安。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集团组织在失去最高统帅而又缺乏一套有效的维护统治的制度和策略的情况下，不分裂分治是不可能的。

亚历山大不是欢迎希腊人随着东征的大军一起来到被征服的土地上么？从实际情况看，的确有大量希腊商人、希腊手工业者、希腊居民来到了西亚、北非，他们在那里住了下来，尤其是在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中定居了。他们对发展商业和手工业是有帮助的，他们也把希腊人的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带到了那里，有些希腊人还担任了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没有进入高层领导队伍。高层军政领导仍是马其顿人。也许两代、三代以后，他们的后裔可能成为治理这块土地的有决策能力的人才，但那是好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无补于亚历山大去世后马其顿帝国的迅速解体。

希腊人也有在亚历山大军队中当兵的。其中不少是雇佣兵。但亚历山大越来越不相信希腊士兵，包括雇佣兵。雇佣兵只是为了获取薪酬而当兵，只相信招募他们的雇佣兵头目。亚历山大知道利用他们，但不相信他们。亚历山大深信，"相互倾轧、纪律涣散的希腊人是靠不住的"①。他决定把波斯青年吸收到自己的军队中来，用他们替换希腊士兵，"让希腊士兵回家，首先遣返的是伤兵。看来，亚历山大已经决定依靠波斯人而不是希腊人"②。亚历山大高高在上，他起用波斯士兵，波斯士兵却只服从具体指挥他们的军官，而不管军官是马其顿人、希腊人还

①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② 同上。

是波斯人。亚历山大离波斯士兵太远了,波斯士兵只知道亚历山大伟大,但并不从内心拥护他。所以亚历山大一死,他们就服服帖帖地听命于各自的将军了。而被遣送回乡的希腊士兵(包括雇佣兵,也包括希腊军官),心情是复杂的。能够返回希腊本土,免得战死异乡,这是一件好事;遣返时能得一笔安抚费,生活上还算过得去,这也是一件好事;然而较多的被遣返的希腊军官和士兵却对亚历山大不满,认为亚历山大亏待了他们,断送他们的军事前程。[①] 亚历山大在世时,他们的这种情绪没有表现出来,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希腊本土后,他们就把这种反对马其顿和反对亚历山大的情绪表露出来了。其中不少人为亚历山大之死而欢呼,一部分人参加了希腊人反对马其顿的起义。[②] 当然,留守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的马其顿兵力仍然强大,在安提帕特统领下,马其顿军各个击破了起义的希腊人。[③]

至于亚历山大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这一点,固然也是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但相对于亚历山大没有为马其顿帝国设置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而言,则次要得多。在当时,即使亚历山大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军权在握并领兵驻守一方的马其顿将领们能认同并效忠亚历山大指定的接班人吗?即使他们不公开树起独立的旗帜,但割据和混乱的形势能避免吗?可见,制度建设比指定接班人要重要得多。一个缺少制度建设

① 参看特里特尔:"亚历山大和希腊人:艺术家和士兵,朋友和敌人",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129—130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39 页。

的国家不可能不出现领导人死后的无序状态。

## 六、对亚历山大的评价

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必须根据亚历山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来分析。历史学家常以“征服者”称号来评论他，但这并不能作为评论亚历山大的作用的主要根据，因为他建立的马其顿帝国的时间太短了。不管怎样，“亚历山大的征服是古代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之一”[①]。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不妨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阐释。

第一，希腊本土自公元前 4 世纪中叶起已经陷入城邦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交织的困境。希腊人普遍茫茫然不知所措，更不知道前途是什么，出路何在。正是这个时候，亚历山大继承了他父亲菲利普二世的位置，拓展了马其顿的疆土，灭掉了希腊的宿敌——波斯帝国，为希腊人向西亚、北非的移民和经商活动打开了通道。

即使在希腊本土，菲利普二世南下之前的数百年内一直小邦林立，各自为政，城邦与城邦之间时有冲突，严重时互为敌国，兵戎相见。除了商人为了获利而在城邦之间贩运货物而外，普通的希腊人不可能到其他城邦自由旅行和度假休闲，希腊实际上是十分闭塞的。[②] 自从亚历山大继位并对西亚、北非进行扩张之后，希腊人无论在本土还是在亚历山大新征服的地区，活动

---

① 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第 271 页。

②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102 页。

范围大为拓展，他们的眼界也开阔多了，他们谋生、发财和施展一技之长的机会也增多了。亚历山大使得希腊已存在多年的闭塞年代一去不复返。①

从上述情况看，无论是亲马其顿派还是反马其顿派，都从亚历山大的事业中受到启示，一扫公元前4世纪中叶那种迷漫于希腊社会的困惑情绪。

亲马其顿派认为，亚历山大总的说来没有辜负希腊人对他的厚望，希腊人被他从困惑中引领出来，活跃在前波斯帝国的土地上，而且商业往来使希腊的社会危机有所缓解。社会秩序从无序转向有序；即使是专制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随意抄家，随意放逐和逮捕，随意瓜分私人财产，以及随意杀戮等平民极端派的行为消失了，不再像公元前4世纪中叶那样到处横行无阻了。

而反马其顿派则认为，希腊城邦之所以能长期立足，全在于希腊的民主和宪制理念深入人心，并在历史实践中接受了检验；亚历山大不管东征取得了多大战果，都不能被看成是希腊文化的胜利、希腊精神的胜利，因为马其顿的统治恰恰是违反希腊的民主和宪制理念的。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这一事实，证实了当初反马其顿派对专制主义的谴责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也证实了希腊民主制度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反马其顿派由此得到鼓舞，决心继续为捍卫希腊式民主原则和希腊精神而努力。

第二，亚历山大在建立庞大的马其顿帝国的过程中，促进了

---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年初版，1976年重印，第103—104页。

希腊文化的推广，也促进了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交流。除了希腊商人和希腊移民陆续涌入西亚、北非等地而外，随着亚历山大东进的，还有一批随军的文化人，包括画家、乐师、诗人、演员、魔术师、剧作家和运动员，他们是作为亚历山大的朋友或客人来到西亚、北非的。① 这些人来自希腊境内各个城邦，也有来自西西里岛上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移民城邦，他们总人数约为数千人。② 他们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包括公元前 324 年在苏撒举行的马其顿—希腊人同本地女子的盛大婚礼，他们各自显示才能。③ 这样也就把希腊文化传播到波斯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土地上。亚历山大死后，这些随军而来的文化人中，有些返回希腊本土，有些则留在东方。

尽管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迅速崩溃，但随之在西亚兴起的塞琉古王朝和在埃及兴起的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 3 世纪以后的长时间内一直是希腊化世界的繁荣地带，是希腊化文化的中心，说得更确切些，“所谓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历史在这一时代相互汇合下的文化”④。没有亚历山大，就不可能形成希腊化文化和希腊化世界。

最重要的是，“因亚历山大的武功而被希腊化了的东方，对

---

① 参看特里特尔：“亚历山大和希腊人：艺术家和士兵，朋友和敌人”，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第 122—123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23—126 页，129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23、126、127 页。

④ 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75 页。

希腊精神发生新的影响”[1]。这里所说的“对希腊精神发生新的影响”，主要不是指亚历山大吸收了东方文化中专制主义的内容，也不是指亚历山大采纳了东方惯有的对帝王崇拜的传统，而是指：“从东方供给它的神话的表现以及纯粹实用或纯粹魔术的实践的混乱的一堆中，希腊的天才往日曾引申出科学和哲学的理性作品。”[2]希腊精神由此增添了新的成分。此后，“依旧是东方思想那种跳跃不定的火焰，点燃了它最后的光辉”[3]。

第三，从经济方面看，亚历山大对西亚、北非大片地区的征服为希腊经济的恢复以及西亚、北非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增添了活力。在菲利普二世南下和亚历山大继位前后，希腊各个城邦实际上处于经济衰微状态，城乡经济都凋敝不堪。[4] 在这些城邦，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境内动荡不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希腊手工业品无论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在国外市场上，销路已日益萎缩。[5] 而希腊人口过剩现象的不断加剧、手工业生产的逐年下降以及商业活动的相应衰退，使希腊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也更加突出了。[6] 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经济越是停滞、衰退，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而社会问题越严重，工商业生产环境就越糟，有钱人纷纷逃离城邦，经济也就更加衰退了。

出路何在？希腊人自己几乎找不到摆脱困境之路。他们只

---

①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节选），陈修斋译，载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第234页。

② 同上书，第235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026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

能从更换城邦领导人和重组政府方面着手,但这依然未能恢复社会秩序和振兴经济。在这种困难形势下,亚历山大东征为希腊人指明了出路,不管希腊人愿意不愿意,希腊商品的新市场毕竟打开了,希腊的对外移民也就有了发财致富和安居的绝好机会。总之,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帮助了希腊经济的恢复,并且引导希腊人进入一个发展商业活动和振兴经济的新时期。①

虽然亚历山大过早去世和亚历山大死后发生了亚历山大手下将领们争夺继承者地位的长期战争,打乱了希腊经济的复兴行动,但在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安提柯王朝相继建立后,三家分治的大局稳定下来了,希腊人继续在希腊化世界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②

在讨论亚历山大东征对希腊经济的影响时,也不应该忽略下述事实,即波斯帝国大量金银财宝落入亚历山大手中之后,亚历山大把其中一部分投入市场,而从亚洲回到马其顿和希腊后,又把他们带来的金银(一部分作为战利品带回,另一部分作为奖赏或安抚费带回)陆续投入市场,于是市场上的金银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就如同16—17世纪西班牙把在美洲掠夺到的金银运回欧洲,造成“价格革命”,引起欧洲市场上的物价急剧上升一样,这也使得马其顿、希腊和亚历山大新征服的地区的物价大幅度上涨。③ 普通的希腊人在大掠夺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026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026—1027页。

③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年初版,1976年重印,第105页。

处，但纷纷成为物价上涨的受害者。① 他们抱怨不已，这是可以理解的。②

第四，亚历山大在占领西亚、北非并且从印度河返回定居于巴比伦城之后，他不仅传播了希腊文化，而且他本人以及他的将军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或接受了东方文化。从政治理念上说，希腊人同东方国家的君主与臣民是很不一样的。正如前面一再指出的，希腊人从城邦制度建立后，民主和宪制深入人心，连斯巴达都不例外，更不必说雅典等城邦了。在普通希腊人心中，领袖无非是公民中的一员，甚至神和人也没有什么不同，神虽然众多，但神和人却是相通的。领袖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化身或神的儿子。自从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以后，希腊人被带进了希腊化时期。在此后所建立的希腊化王国内，希腊的城邦在王权面前已算不了什么："城邦已不重要，它不再激起那种坚信它能够满足公民们需要的理念：在那些人类的救世主和大恩人、即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面前，城邦的保护神显得苍白无力，只有王国的统治者能够毫无疑问地拯救和帮助他们的朋友"③。这正是东方的观念，因为在东方，君主被尊为神或神的化身，高高在上，神的旨意是通过君主而传达给人间的。

这意味着，尽管亚历山大灭掉了波斯帝国，推翻了西亚当地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4—5 页。

② 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混合拉动的通货膨胀，纯粹消费需求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西方经济史上，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在希腊化世界发生的通货膨胀，就是纯粹消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之一例，物价大幅上涨的时间，长达 100 年之久。16—17 世纪的西欧"价格革命"，又是一例，时间竟长达 200 年以上。

③ 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年，第 11 页。

人原有的政治制度，使希腊文化扩大到近东一带，这是他的功绩，[①]但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下，东方化的要点全都体现在亚历山大的政策措施之中，即东方的上述政治理念制度化了。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希腊化世界的专制政体，也就是实现了多少还带有部落制度传统的马其顿国王体制向东方专制政体的过渡。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城定居后，东方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成了一位保留了希腊文化教养的东方式的最高统治者。他为什么不想回到马其顿或希腊本土去看看？可能他太忙，也可能他更留恋东方。至少可以表明亚历山大变了：他已经不是刚渡过海峡进入小亚细亚时的亚历山大了。“亚历山大死的时候还是个青年，但不再是一个希腊青年，而是沉溺于穷奢极欲、腐败和恣睢暴戾中不可自拔的年轻人。”[②]他征服了波斯，但“被征服的波斯已然俘虏了征服她的人”[③]。

亚历山大的言行和神化自己的行为，影响了他手下的马其顿将领们。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之所以都把东方当作自己的新领地，愿意分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被东方肥沃富饶的土地所吸引的结果。他们热衷于在分治的土地上建立东方的专制体制，而不满足于他们的故乡马其顿王国的体制。他们和他们各自的继承者全都东方化了。安提柯的儿子德米特里和孙子安提柯·贡那特后来之所以率军返回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是在安提柯争夺两河流域的战争中兵败身亡并丢掉了小亚细亚的情形下

---

①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第271页。

②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③ 同上。

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即使如此,安提柯王朝建立后依然念念不忘西亚肥沃的土地。

第五,亚历山大建立的庞大的马其顿帝国,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却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文化交流看,东方和西方人员接触的增加和交流的频繁,使得希腊人对印度的了解,特别是通过印度和中亚细亚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① 希腊人对佛教的了解,以及佛教思想对希腊化时期希腊哲学的影响,也开始于亚历山大进军印度河流域以后。②

从经济交流看,东西方贸易的开展和双方产品的输入输出,虽然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存在,但亚历山大东征以后规模显著扩大了。特别是,西方同远东的商道的开辟,那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的事情。③ 商路就是财源,商路开辟意味着财富的即将获得。有这样一种说法:"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动机一部分也是经济的,就是说,要打破波斯对西方商业的障碍,要消除欧洲和远东间的中间商人。"④亚历山大这方面是成功的。结果,"由于波斯的覆亡,希腊和叙利亚人获得了大利,同时,东方奢侈品的价格,在地中海区域城市的市场上也跌落了"⑤。

亚历山大死后,将领们的主要争夺地区就是西亚,不正是由

---

①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42、444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447 页。

③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172—173 页。

④ J. W.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27 页。

⑤ 同上。

于这一带不仅土地肥沃,而且也是通向印度和远东的商路必经之道吗?财富和权力是不可分的,要征服他国,要扩大权力,必须先有财富,而东方就是巨大的财源。① 这就是古代的重商主义。这种古代的重商主义被认为可以同近代初期欧洲兴起的重商主义相比拟:"东方国家对希腊贸易的开放相当于美洲和印度的发现。"②

在这里还要指出,亚历山大东征和对西亚、北非的控制对于货币标准化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亚历山大继位之前,在马其顿和希腊城邦通行着各种不同的货币,成色也不一;在亚历山大征服西亚、北非之前,在波斯帝国境内通行着不同年代、不同区域发行的货币,标准也不一样。这样,给商业和投资活动带来诸多不便。亚历山大很重视这个问题,他"是文明世界统一思想的主要的积极推动者。这一思想指引着他的货币政策。他打算在他的帝国内建立一种通货,这种通货因其丰富、可靠和成本低廉,并有一定政治措施的帮助,将结束此前盛行的货币混乱和无序状态"③。货币的标准化,正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竭力想实现的结果之一。"亚历山大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他的货币压倒一切而成为帝国的通货。"④这就是当时的标准货币。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后继者们效法他,在各自的国家中都铸造自

---

① 参看 J. W.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 173 页。

② 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173 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291 页。

④ 同上。

己的货币,供市场流通。[①]“这些钱币不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和亚历山大的钱币相似。事实上,塞琉古一世所铸造的钱币和亚历山大的钱币一模一样,只是王冠的名称改变了而已。”[②]

亚历山大铸造的标准货币是银币,“它起源于先前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希腊语地区的阿提卡标准德拉克玛货币。结果,亚历山大币制在历史上成为流行最广泛,也最为人们乐意模仿的币制”[③]。亚历山大钱币可以肯定地说是一种通行的国际性货币。[④] 这些结果都是亚历山大本人始料未及的。

## 七、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亚历山大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是盖世的军事征服?是扩大的疆土?是东方被征服地区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融合后所产生的希腊化世界和希腊化文化。

亚历山大的去世,使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使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怎样理解“一个时代的结束”?所结束的是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的时代。也就是说,马其顿扩张的时代结束了,亚历山大建立的马其顿帝国统治的时代结束了。怎样理解“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开始的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希腊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291页。

②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69页。

③ 同上书,第468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469页。

化世界和希腊化文化的时代。也就是说，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安提柯王朝开始了，它们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各自为希腊化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一由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相融合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在这个希腊化世界内，如此众多的隔离墙倒塌了：这是一个广泛相互交流的时代"[①]。这显然要首先归功于亚历山大，因为正是亚历山大最早把地中海东部地区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帝国。[②] 这个单一的帝国尽管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但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把东西文化广泛交流的格局延续下去了。

再往后，罗马在灭掉安提柯王朝之后，又相继灭掉了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但罗马对希腊化世界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继续交融的趋势。"重建随着亚历山大大帝被埋葬的单一帝国的任务交给了罗马。在罗马和平的极大权威之下，罗马道路把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一个行省又一个行省捆绑在一起，使罗马世界在交流相互的日常生活中连成一片。"[③]虽然罗马为了做到这一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无可否认，"这就是罗马对地中海整体主义所做的贡献"[④]。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才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罗马完成了亚历山大未能完成的事业。

再往后，罗马灭掉了托勒密王朝，结束了希腊化世界各个王

---

① 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年，第 18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同上书，第 19 页。
④ 同上。

国独立的岁月，从亚历山大去世算起，大约过了 300 年。这 300 年间，亚历山大相对于热衷于东方化的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①] 尽管希腊化世界被统一于罗马之后，武功卓越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在巴比伦祭奠了亚历山大大帝；图拉真还自觉地模仿亚历山大，也沿着幼发拉底河航行到海上，并声称他走得比那位马其顿国王更远；[②]但这一切只不过表明亚历山大依旧作为一种象征或符号留在马罗皇帝的心中，表明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融合依旧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目标，至少罗马帝国东部是这样。

---

① 参看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81 页。

② 参看同上。

# 第十一章　安提柯王朝

## 第一节　安提柯王朝的政治体制

### 一、安提柯二世

上一章已经谈到，安提柯王朝是亚历山大的将领安提柯的孙子安提柯·贡那特于公元前276年建立的，又称马其顿王国，建都培拉城。安提柯·贡那特称安提柯二世。

安提柯二世的父亲是德米特里，母亲是安提帕特之女菲拉。由于安提帕特是菲利普二世的宿将，亚历山大东征时奉命留守马其顿，并负责监视希腊，所以安提帕特家族在马其顿和希腊一直拥有很大势力。[①] 现在，安提柯二世继承其父德米特里的权位，他作为安提帕特的外孙，对马其顿和希腊进行统治，是有合法依据的。这正是他所建立的安提柯王朝得以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家族背景，又有德米特里麾下的精悍的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80、94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93—95页。

军队作为实力基础,安提柯二世建立新王朝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马其顿既然是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的老家,亚历山大的将领们又都是从马其顿随着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本人一路建立战功而提升上来的,加之,历来争夺马其顿王位又是那么激烈,所以安提柯要建立新王朝的困难不容低估。[①] 所有的亚历山大事业的继承者都看中马其顿,这里是他们共同的故土,他们都曾指出,要保证继承者在马其顿平稳交替,其办法就是老国王去世前就从诸子中指定并任命其中一人作为"共同执政者",让被选中的接班人获得信任并积累经验,使老国王能够放心,也使得每一个人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②] 德米特里正是这样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安提柯·贡那特的。他希望安提柯·贡那特能够使家族的事业延续下去。[③] 但安提柯·贡那特懂得,仅有父亲德米特里的信任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马其顿和希腊这一大片土地经过多年的战乱已遭到严重破坏,人口不断外流到西亚和北非,兵源也已不足,打仗不得不依赖雇佣军,比如说依靠由希腊人和蛮族加拉太人组成的雇佣军。[④] 他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既要体现马其顿王国国王专制的传统,又要考虑到希腊城邦的稳定对于安提柯王朝兴衰的重要性,即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僚化的,又能在遭到入侵时让城市显

---

① 参看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 年,第 173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 179 页。

示出自信力,并以此作为依托。[1]

因此,尽管德米特里为安提柯王朝的建立准备了很好的条件,但安提柯·贡那特建立新王朝并成为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后,必须着手解决以下三个政治方面的迫切问题:

1. 巩固北部边境的安全,防止蛮族南侵;

2. 协调自己同希腊各个城邦之间的关系,使安提柯王朝得以在希腊人的支持下稳定和发展;

3. 处理好同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关系,这样才能保存安提柯王朝的国力,才能在爱琴海两岸立足,在爱琴海上保证商路的通畅。

安提柯二世是一个有作为的国王,通过他的努力,基本上做到了这些。

## 二、北部边境的安全

马其顿北部边境以外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和多瑙河流域,散居着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游牧部落。他们羡慕和嫉妒希腊本土的富庶,总想乘机南侵,马其顿处于这些游牧部落南侵希腊本土的必经之路上。何况,马其顿在富裕程度上虽然比不上希腊本土,但相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和多瑙河流域而言,仍算是富庶的,所以也是蛮族游牧部落的劫掠对象。公元前4世纪后期,马其顿国王们就一再被北部游牧部落的侵袭所困扰。亚历山大继位后,先率师北上抗击蛮族,是有道理的。

---

① 参看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年,第173—174页。

公元前280年,正值德米特里死后的第三年,安提柯·贡那特已继位,马其顿和希腊本土遭到了来自意大利北部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高卢人与其他游牧部落的侵袭,他们专为劫掠财物而来,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淫,见财物就抢,见房屋就烧,抢了就跑,安提柯·贡那特为此十分头痛。这些侵袭之所以难以应付,很可能有希腊奸细引路。安提柯·贡那特用了很大精力,使用雇佣军的力量,才于公元前277年把高卢人和其他部落赶到小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才安定下来。隔了一年,安提柯·贡那特才建立安提柯王朝。

北部边境的安全还包括对色雷斯人的安抚。色雷斯人是一个老问题了。色雷斯人居住的地区,既不属于马其顿王国,也不属于希腊本土。马其顿王国只是在自己势力强大时,让色雷斯人归顺,但并不把色雷斯划入王国领土。实际上,从马其顿建国到安提柯王朝建立,甚至直到罗马人征服希腊全境之时,色雷斯人一直没有真正服从过中央政权。这些部落居民,"在山区中过着野蛮的生活,并且是十分桀骜不驯的"①。他们不受节制,不服从军事征集,不愿奉命迁移到其他地方,而且反抗向他们征税。"他们手里有武器,有年轻力壮的战士,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②他们的特长是外出当雇佣兵,亚历山大当初就用丰厚的薪酬和奖赏使他们成为一支善战的军队。安提柯王朝为了使北部边境安全,继续对色雷斯人采取安抚政策,而不干预他们的

---

①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7页。

② 同上。

内部事务。甚至后来罗马人也如此。①

## 三、协调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

协调马其顿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安提柯二世之父德米特里提出来的。正如上一章所指出，伊普索之战中，德米特里之父安提柯兵败身亡，德米特里率领余部西进。他认识到今后在马其顿同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上，必须改变马其顿过去一贯的做法，应以友好态度对待希腊人，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② 如果缺少了希腊人的支持，马其顿自身的资源甚至人力资源都是不足的。③ 很可能是由于在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临朝期间，马其顿就已经汲干了马其顿国内的人力，大批成年男性从此离开了故土就再也没有回来。④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队的一大部分在亚历山大死后从未复员回乡。⑤ 相反地，留在东方的马其顿军队有时还从马其顿补充新兵，他们又离开了马其顿；其中许多人以及他们在服役期间所生的孩子都作为移居者而留在东方。⑥ 这样，马其顿的人力就更为短缺了。到安提柯二世建立安提柯王朝时，或再过一段时间，距离亚历山

---

① 参看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238—239 页。

②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42—43 页。

③ 参看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17 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136 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

大东征时已过去六七十年了，马其顿的人力可能渐渐恢复到亚历山大以前的水平，但仍然是经受不了战争的打击的。因此，安提柯二世一上台就把马其顿与希腊之间关系的调整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安提柯二世处理马其顿与希腊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允许希腊城邦自治，只要它们不采取公开反叛的行动，就不干预城邦的自主权，社会矛盾由城邦自己按照根据程序和规则制定的法律处理，即使社会上和学术界有反马其顿的言论，也听之任之，不予置理。安提柯王朝实行的依然是中央集权的体制，国王的地位不能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对希腊城邦采取了适当宽松的政策。这是一种有限的二元政治体制：一方面，维持中央集权的国王体制，另一方面，给予希腊城邦较多的自治权。但这种二元政治体制中，中央集权的国王体制仍是主要的。比如说，只要某一个城邦公开反叛，马其顿国王可以下令予以镇压。

换一种说法，在中央集权的国王体制之下，城邦归顺国王是主要的，是前提。因此，这种有限的二元政治体制不等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的延续。城邦民主自治一词，“在推行君主制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甚至被人滥用”①。雅典如此，甚至原来在实行城邦制方面比雅典毫不逊色的罗得斯，“在安提柯王朝时期也成了王国政府统治下仅有民主政治形式的自治城市”②。

---

① 魏凤莲：《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近现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② 同上。

二元政治体制，更确切地说，有限的二元政治体制，是从属于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王国是这种二元政治体制的主要部分。那么，安提柯王朝是什么性质的王朝？马其顿王国是什么性质的王国？可以简要地说：安提柯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马其顿王国是一个专制的封建王国。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尽管在马其顿境内还保留了部落联盟时期传承下来的贵族参政议政的惯例，尽管在希腊本土境内的城市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城邦自治制度，但这些都不妨碍安提柯王朝是一个封建王朝。奴隶制经济只是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而且是依附其他所有制之上的。

安提柯二世尤其看重的是要处理好马其顿和雅典之间的关系。他"虽然在雅典附近的比利埃夫斯港驻扎了一支警卫部队，但他并不侵蚀雅典的政治权利和自治"①；马其顿警卫部队驻扎于该港的目的也在于他"希望控制这个重要的港口"②，他想"尽可能使它成为自己的商业中心、自己的结算中心，成为罗得斯和提洛（它们是托勒密王朝的大市场）的竞争对手，也成为米利都和以弗所的竞争对手（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反复地争夺对它们的控制权）"③。可见，安提柯二世对雅典是非常重视的。他之所以对雅典采取宽容的态度也出于同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斗争的考虑。④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1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16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216—217页。

这里还需要提到，安提柯二世是斯多噶学说的信奉者，他同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芝诺的关系很好，芝诺也把安提柯二世当成自己的朋友。① 这对于安提柯二世协调马其顿和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②

## 四、处理好与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的关系

安提柯二世根据公元前 3 世纪前期的国际形势，懂得在同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相比时，安提柯王朝的力量要弱得多，③因此不能同这两个王朝硬拼，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该妥协时就妥协。马其顿人力资源不足问题在这一外交决策时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比如说，在马其顿人力不足的条件下，安提柯王朝要扩大军队编制，只有依赖雇佣军，而雇佣军的费用很大，安提柯王朝财政收入有限，不敢扩充。④

相比之下，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控制的疆土要比安提柯王朝（马其顿加上希腊本土）大得多，财力和人力都大大超过安提柯王朝。例如，塞琉古王朝就招募了伊朗人充任骑兵，这是安提柯王朝远远不如的。⑤ 不仅如此，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都吸引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前去工作和移居，安提柯王朝成了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95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08 页。

④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77 页。

⑤ 参看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 年，第 176 页。

人口输出国,这更是安提柯二世所担心的。[①] 考虑到这些情况,安提柯二世决定把自己的抱负局限于对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的控制,不像自己的祖父和父亲那样总想同托勒密和塞琉古争夺小亚细亚、西亚和北非。[②]

安提柯王朝之所以不再同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争霸于小亚细亚、西亚和北非,除了自身实力不如它们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尽管安提柯二世实行了二元政治体制,对希腊城邦较为宽松,让它们在服从中央政府的前提下有较大的自治权,但希腊城邦的反马其顿倾向始终未能消除,甚至在马其顿也发生了反对安提柯二世统治的暴动。

在马其顿,当北方的蛮族侵入马其顿境内时,公元前 279 年发生了阿波洛多鲁斯领导的贫民暴动。据说暴动分子与入侵的高卢人有勾结,并充当内应,[③]至少是乘马其顿军队同入侵的蛮族交战而无力顾及国内治安之机发生暴动的。暴动者抢夺财宝,杀戮富人,洗劫商铺。[④] 结果,马其顿军队既驱逐了入侵的蛮族游牧部落,也无情地镇压了暴动分子。

在雅典,从公元前 266 年起,开始了由克列摩尼德斯率领的反马其顿起义。这实际上是已延续了数十年的反马其顿派活动的再次爆发,所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持续时间长,前后 5 年,到公元前 261 年才结束。另一个特点是:这次反马其顿起义得到

---

① 参看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 年,第 177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76 页。

③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11 页。

④ 参看同上。

托勒密王朝的支持,声势浩大,一度占领了雅典,赶走了马其顿驻军。安提柯二世不得不亲自率军南下平乱,于公元前 262 年重新占领雅典,公元前 261 年最终平定起义。安提柯二世对待雅典的政策仍是宽厚的。[①] 他只是留下了马其顿驻军,禁止雅典以后参加与外国或希腊其他城邦的同盟,也不准它卷入任何战争;而雅典依然是一个自治城邦,它的自治权被保留下来了。[②]

斯巴达也不平静。尽管在菲利普二世南下后,斯巴达一直不顺从马其顿,但由于斯巴达已经衰落,实力大不如前。到安提柯·贡那特统治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时,斯巴达仍不服气,要求独立,结果于公元前 280 年爆发了反安提柯·贡那特的战争。[③] 但希腊一些城邦都站在安提柯·贡那特一边,斯巴达是孤立的,所以它未能如愿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更谈不上称霸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了。[④]

正因为安提柯王朝对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的不安定都有顾虑,所以它对外部的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采取妥协的政策是必然的。

## 五、安提柯王朝的东方化程度

在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分治而成的三个王朝中,安提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12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75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75—76 页。

柯王朝是受希腊文明的影响最大，从而也是东方化程度最低的一个王朝。“对统治者的崇拜尽管在叙利亚被人尊崇，但在马其顿自己的国土上却没有发生。”[1]虽然三个王朝的国王们同样“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东方人，他们是马其顿人”[2]，但安提柯王朝的基地是在马其顿而不是在西亚或北非，而且安提柯王朝所管辖或控制的范围是希腊本土，这里住的都是希腊人，而不是西亚或北非那样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所以安提柯王朝的国王不需要像托勒密王朝或塞琉古王朝的国王那样沿袭亚历山大的做法，用神、神的化身或神的儿子来装扮自己。

比如说，“在希腊化各王朝中，只有安提柯王朝的国王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进行统治”[3]。当然，当安提柯·贡那特之父德米特里最初率军队占领马其顿时，也不是没有仿效亚历山大来神化自己的想法。但他认识到这在马其顿是行不通的，马其顿人依然具有传统的对国王的信任，但并不把后者当作神，否则就会“毫无必要地得罪了这个民族最强烈的感情”[4]，甚至会使臣民抛弃了他。[5] 至于希腊本土，那就更加行不通了，因为这里深受希腊文化、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效法东方对君主的神化和膜拜，只能激起他们更大的反抗情绪。

---

①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9 页。

② 同上。

③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15 页。

④ 同上书，第 118 页。

⑤ 参看同上。

又如,安提柯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不一样之处还在于:在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国王选择大臣、部将和亲信时,都重在国王同他们的私交,“常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①]。而安提柯王朝,则根据传统,根据马其顿王国祖传习俗,“国王在军事机构的辅助下施展他们的权威,军事机构由当地的贵族构成,这些贵族的意见通常会得到认真考虑以维持马其顿人的强大和繁荣”[②]。这意味着马其顿王国的传统统治方式在安提柯王朝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再如,无论是托勒密王朝还是塞琉古王朝,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前提下,由国王派遣总督统治国内各个地区,总督虽有治理地方的权力,但大权是国王独揽的,这正是东方专制体制的体现。而在安提柯王朝,“马其顿本身就是个联盟,至少是一个联盟集团”[③]。也就是说,安提柯王朝更像是一个联邦制国家,马其顿是盟主,希腊各个城邦等于是承认马其顿为盟主的加盟者。弗格森在所著《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做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马其顿同希腊城邦的关系好像是德国统一以前普鲁士同德国其他各邦之间的关系。[④] 这是同东方专制国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截然不同的。

---

①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6页。

② 同上。

③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21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115页。

# 第二节　安提柯王朝的经济和社会概况

## 一、安提柯王朝的城市化

将近一百年前，菲利普二世由马其顿率军南下，到了公元前3世纪前期，安提柯二世建立了安提柯王朝，把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结合在一起了。但这时的马其顿同100年前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马其顿同希腊本土远远没达到融为一体的地步。

这时的马其顿依然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从社会上和经济上看，马其顿仍同过去一样，是一个由部落构成的、而且几乎是分封结构的国家。”①安提柯王朝的国王们在马其顿拥有大片领地以及所征服的广大地区。马其顿的贵族同国王本人一样，也拥有大块地产，他们形成了国王的近臣群体，而小地主则构成国家的中坚分子。② “国王们有时把土地作为‘礼物’分赠给他们的朋友，但这些土地并不是作为接受者的绝对财产，而是作为可以撤销的赏赐。”③可以看出，对安提柯王朝时期的马其顿而言，土地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城市化的进程相当缓慢。在亚历山大登位之前，马其顿已经有了一些城市，亚历山大登位后直到亚历山大去世后，马其顿境内又出现了一些新建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安提柯二世和他的继承人统治期间，一直存在着，并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50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同上书，第251页。

逐渐走向希腊化。[1] 不过，总的说来，这并未改变马其顿仍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的性质。

在安提柯王朝，马其顿同希腊世界仍然是两块不同的土地。希腊本土，即众多希腊城邦所在地区，城市是经济活动中心，农业虽然也重要，但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农村人口外流，战乱又不断，农田荒废的情况常见，所以农业已不像城邦兴盛阶段那样受到重视。安提柯王朝的国王们无疑是希望加快马其顿城市化的速度。这是因为，马其顿城市化的加快意味着马其顿和希腊本土融为一体的速度的加快，这样，"一个统一的希腊会比马其顿强大，但希腊一定不要联合起来反对马其顿"[2]，这就是安提柯王朝的理念。然而，加快马其顿的城市化，以及使马其顿的城市希腊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知道，马其顿人是比较富裕的，不仅因为这里有大片土地、森林、草场，适合于大小土地所有者经营农业、牧业、伐木业，也不仅因为这里有矿藏，而且商业也很兴旺。更重要的是，从菲利普二世时期开始(甚至比这更早一些)，直到亚历山大死后，这里产生了许多将军和官员，还涌现了大批士兵，他们服务期满后回乡，带回了资产，包括国王的赏赐、薪俸和其他财产，他们一般把这些用于本地的地产投资，并建造住宅。[3] 他们不像安提柯王朝那样热衷于城市化，他们认为像现在这样安居于农村，生活很舒适，城市化的快慢同他们有什么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251 页。

②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205 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251—252 页。

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加快马其顿的城市化呢？

再以希腊本土的城市化来说，应当注意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希腊本土的城市发展已经达到了鼎盛阶段。从那时以后，由于长期战乱不止，伯罗奔尼撒战争祸及的区域又广，希腊北部、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公元前4世纪前期一些城邦又有激烈的内部动乱，经济衰退，社会秩序破坏，城市中的富人或被抓被杀，或举家外逃。直到亚历山大登位并进行东征，希腊本土的城市经济才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手工业者、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移民西亚、北非的，也越来越多。这种移民的趋势在安提柯王朝建立后也没有停止。所以说，安提柯二世及其继承人统治期间，希腊本土的城市化至多只是恢复到过去曾经达到的水平，而很难说有什么大的进展。

以大城市来说，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有新建的亚历山大里亚，在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西亚，有安条克这样的大城市，但从来没有听说在安提柯王朝统治区域内有什么能够同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媲美的、有影响的大城市，[①]无论是新建的，还是扩建的，统统没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希腊本土，如果经济恢复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那么恢复到原有的城市规模就够了，不需要建立新的大城市或扩建原有的城市；而在马其顿，那里的贵族、大户习惯住在乡间而不愿住在城市里，他们不屑于经商，也对城市的娱乐活动不感兴趣。[②]

---

①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60页。

② 参看同上。

## 二、安提柯王朝时期的雅典经济

本书第八章已经谈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马其顿人尚未南下时,雅典和当时希腊其他城邦一样正处于城邦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交织的困境中,包括雅典人在内的许多希腊人都对城邦的命运担忧,都在寻找出路。于是在希腊政界形成了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的激烈争论,雅典一直是这两派势力争论的中心。从菲利普二世率领南下,到亚历山大登位、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去世,直到马其顿帝国解体和安提柯王朝的建立,在这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雅典反马其顿派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但历次行动都失败了。因此,雅典的港区一直驻守着马其顿军队,安提柯二世认为雅典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①]这可说是对雅典不同于对待希腊其他城邦的特殊待遇。[②] 但也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安提柯二世对雅典的政策仍比较宽容,他允许只要不再反对马其顿,就继续保留雅典城邦的自治权。对雅典的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过是禁止雅典同外国或同希腊其他城邦结盟,也禁止雅典参加任何城邦组成的同盟。这样,雅典只好专心致志于工商业活动,至多只能关注本城邦的公共事务,而有关希腊其他城邦的问题和各个城邦之间的关系,雅典一律不准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雅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时的雅典急需发展经济,它反而在安提柯王朝时期度过了一段和平发展的岁

---

①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年,第17页。

② 参看同上。

月。[1] 雅典继续作为希腊文化中心发挥作用；雅典作为经济中心，本来地位已经下降，爱琴海上的提洛和罗得斯、希腊本土上的科林斯、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市米利都和以弗所都成为雅典在商业方面的竞争对手，有些还超过了雅典。[2] 雅典必须奋起直追，才能恢复昔日的辉煌。这也正是安提柯王朝对雅典的希望。

但雅典毕竟是雅典，不能认为雅典这样的老城市退化了。说雅典已经退化，"这是一个值得审核的命题。在有些方面，它是错误的"[3]。雅典在安提柯王朝统治之下，不仅在文化上依然有新的建树（参看本书第十四章），在经济上同样也是有成就的。下面分别从手工业、商业、农业、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加以阐述。

1. 手工业

这一时期，雅典的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希腊本土社会治安逐渐好转，市场日益恢复并且扩大，另一方面，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西亚和北非的统治已巩固下来，市场上对雅典手工业品的需求量上升了。雅典的手工业品一直以工艺精良著称，销往西亚、北非的数量不断增多。

但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雅典的手工业劳动力的供给不足。雅典的不少能工巧匠移民到西亚、北非去了，即使干粗活的工人也找不到。于是雅典手工业中所使用的奴隶人数急剧上

①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2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212页。

③ 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4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年，第219页。

升。被释奴隶的增多,也有助于劳动力供给的改善。还应当指出,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家庭中的孩子人数普遍减少,极少见到一个家庭有四个或五个孩子,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①]这显然促使被释奴隶的增加和奴隶使用人数的扩大。

那么,大量奴隶来自何处?来自这些年内战争中俘虏的增多。奴隶贩子通常跟随军队一起行动。军队在战场上俘获了大批败军士兵,甚至把支持败军一方的城乡居民也掳走;如果没有亲属来赎取,就以较低价格卖给奴隶贩子。奴隶贩子把购来的奴隶运到爱琴海上的提洛和罗得斯,那里有兴旺的奴隶市场,雅典等城邦的奴隶商从奴隶市场买进奴隶,运回雅典等地销售。希腊人,不管家境如何困难,总是珍视自由的。他们被俘虏后,唯恐被变卖为奴隶,所以家人即使卖掉家产或向亲戚朋友借钱,也要交付赎金。[②] 这样,势必使家中有人在战争中被俘的家庭变得更加穷困。

2. 商业

安提柯王朝时期,雅典商业日趋活跃。需要指出的是以下四点不同于过去的新情况。

第一,市场扩大了。埃及同雅典之间的贸易往来比过去增加许多,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甚至远至印度,都有雅典商人在活动,输出希腊本土的商品,输入托勒密王朝和塞流古王朝管辖地区的商品。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212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03—204页。

第二，竞争对手增多了。雅典商人在海外贸易中所遇到的新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希腊其他城邦的商人，而且还有这些年来移民于西亚、北非的希腊人。尽管如此，只要市场在扩大，商路继续畅通，对雅典的影响不大。

第三，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海运业有了很大发展。过去长时间内，冬季船只不出海，"几乎是每一个船主的戒律"[①]，这就大大限制了雅典海运业的发展。但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冬季航海已习以为常。商业发展的要求，终于消除了航海业的传统淡季"[②]。

第四，对付海盗成为海外贸易一大难题。安提柯王朝建立前后，海盗横行是"希腊世界生活的一个公认的特征"[③]。过去的海盗主要来自外国，如意大利、伊利里亚和黑海沿岸地区。安提柯王朝时期的海盗则主要不是外国人。这是因为，来自意大利中部的蒂勒尼亚海盗在安提柯二世之父德米特里当政以后已经从爱琴海上匿迹了，伊利里亚人只在他们的海域内进行海上劫掠，而黑海的海盗则从不越过海峡南下。[④] 这样，活跃于爱琴海的海盗都是本地人，他们地势熟悉，又就近抢劫，逃逸也快，因此"爱琴海处于本地海盗的掌握之中"[⑤]。这些本地的海盗都是有组织的，他们或者被托勒密王朝利用，以损害安提柯王朝的利

---

① 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年，第176页。

② 同上。

③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95—196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196页。

⑤ 同上。

益，或者被安提柯王朝利用，以增加自己的收入。① 从而这些有组织并且还有一定支持者的海盗不易对付。他们的根据地有多处，不限于克里特岛一地，而且港口的防守严密。特别是，当他们的船只满载着劫来的财物出现在商业港口时，却受到所有商业港口的欢迎。②

爱琴海甚至说整个地中海的海盗，要再过200年左右，到罗马共和国晚期，才被肃清。

在阐述雅典商业的发展时，还需要提到雅典的金融业状况。雅典当时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城市，它的金融业相当兴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的雅典繁荣时期，在雅典市场上就有了以货币兑换为业务的商人，他们甚至被称为"银行家"，因为他们兼营放贷业务。关于这些，本书上册已经谈过。③ 一个货币兑换商或贷款人，只要拥有一个摊位或一张桌子就可以开展业务了，所以在希腊语中，"银行"和"桌子"是同义的。④ 到了希腊化时期，市场的规模扩大了，以柱廊来划分区域，顾客可以在这里躲雨，买卖双方就在这里谈生意。这成为有较好规划的希腊化城市的一个特色。⑤ 正是在这样的市场中，由货币兑换商或贷款人形成的"银行家"在这里办理存款贷款业务。⑥

在金融业务方面，雅典正日益遭到提洛和罗得斯的竞争威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96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本书，第335—336页。

④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涅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年，第52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书，第53页。

胁,它的优势逐渐减少。但雅典依然有重要地位,不可忽视。第一,雅典的银币是优质的,希腊化世界都使用雅典的银币。[①] 同时,使用雅典银币被看成是该种钱币发行地的地位的清晰反映,还令人勾起对昔日的留恋和崇敬。[②] 第二,雅典仍有广大市场,中部希腊的市场依旧存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仍是雅典手工业品的销售区域。[③]

3. 农业

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农村遭到极大破坏以后,雅典过去以生产橄榄和葡萄为主的种植业,以及从事橄榄油制作和葡萄酒酿造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都受到摧残。更严重的是农田毁损了,水利设施被破坏了,树木被大量砍伐,连草场都荡然无存。这首先同斯巴达军队的蓄意破坏有关,但也同暴雨、洪水的一再冲刷,表层土壤不断流失有密切关系。农产品歉收,粮价波动剧烈。因此,"碑铭上经常载有某人在供应城市食粮方面的功绩。这种供应在当时往往仰赖统治者的慈悲或当地富户的慈善工作"[④]。农业的凋敝、农民的逃生和粮食短缺所引起的粮价波动,加剧了公元前 4 世纪前期的社会危机。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这里没有大的战争。到安提柯王朝建立后,雅典经济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农村中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包括橄榄油制作和葡萄酒酿造,也恢复了。雅典农村趋于稳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43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755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743 页。

④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57 页。

定。但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并未减少，他们或者迁徙到西亚、北非，那里土地多而且肥沃，易于生活，[①]或者迁移到那里改作手工业者，生活状况也不错。到雅典城区工商业中找工作，也被认为是比留在农村务农更好的选择，因为雅典城区的居民也向外西亚、北非迁移，留下了职位空缺。雅典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和人口的外流，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集中。而且并非雅典一地如此，希腊境内其他地方也是如此。[②]

于是，在安提柯王朝时期，在土地集中的情况下，使用奴隶耕作的大型农场或种植园比过去多了。在农业中，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成分，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奴隶制的农业经营需要采取监工制度。由于有了监工，地主通常住在城区，他们很少具体过问农业经营。

4. 社会政策

雅典城邦仍保留了自治权。它大体上仍然是一个有活力的大社区，同以前一样热情地投身于自己的事务之中。[③] 虽然雅典从政治上不得不服从安提柯王朝的统治，但雅典仍在表面上奉行一种自主的政策，并依靠周旋于各个统治者之间而维持着政策的自主。[④] 这就是二元政治体制的体现。

雅典对自己的公民权依然是有严格限制的。保留公民权的人数不多了，可能不到 10,000 人，而外国侨民的数字与此不相

---

①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12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11 页。

③ 参看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 4 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 年，第 224 页。

④ 参看同上。

上下，甚至还多一些。奴隶人数更多，准确数字说不准。一种说法是：当时雅典的奴隶多达 40 万人。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指出：“这项数字不足采信，但亦无其他可以据以反驳的资料。”①

雅典城邦政府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维持治安，二是救济穷人。这两项任务是关联的。这是因为，社会上穷人越多，治安越不容易保持良好的状态，甚至平民极端派还会重新煽动仇视富人，抢劫富人，甚至杀害富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等事件。

雅典城邦政府认识到，穷人人数增加和穷人对社会不满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物价上涨过快。物价上涨不仅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而引起的成本上涨，而且同波斯帝国灭亡后大量被劫夺的金银财宝相继投入市场，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大，形成货币追逐商品的状况有关，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了。② 物价上涨，对雅典城区领取工资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雇员打击最大。例如，雅典手工业工人所挣得的工资收入只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工人还不得不勤勉工作，否则奴隶劳动力就会挤掉工人的职位。物价上涨使得独身者人数增多，因为结婚和抚养子女成了沉重负担。加上，公元前 3 世纪以后，希腊人向海外移民已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穷人的出路狭窄了。③

雅典城邦政府按照城邦制度建立以来救济穷人的惯例，直

---

①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13 页。

② 参看本书，第 649—650 页。

③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第 271 页。

接发放粮食给穷人。然而,政府财力有限。银矿经过多年采掘,资源已经枯竭。雅典再也不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那样可以依靠庞大舰队,获得海外资源来施舍给穷人了。但不管怎样,雅典仍然竭尽自己的力量,救济穷人,稳定社会,这已经很不错了。

为了保证雅典有充裕的粮食供应,雅典城邦政府也竭力去做。这同样是雅典社会政策的内容之一。安提柯王朝时期,希腊的粮食主要来自黑海北岸地区。商船尽管已习惯于冬季也照常出船,但商船既小又慢,平均载货量大约80吨,风浪大,海上运输风险大。① 当时所用的水手通常是奴隶,有时连船长本人也是奴隶。② 然而雅典仍要依靠从黑海沿岸运粮进口,政府一直给予帮助。这是因为,雅典人的主食是小麦面包,本地由于土壤不够好,缺水,所以不生产小麦,只得从黑海沿岸进口。如果在本地种谷物的话,比较适合种大麦,而大麦则可用来做大麦片粥,供奴隶食用,或供救济穷人所需。③

5. 社会结构

安提柯王朝时期,雅典的社会结构如何? 罗斯托夫采夫曾对此进行剖析。他指出,历经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社会混乱和战争,到了安提柯王朝建立和在希腊全境恢复社会秩序,并使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之后,雅典的中产阶级在一段时间内有较大成长。"对希腊财富逐渐下降起作用的一般原因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居民的各个阶级。少数十分富有的居民所受到的损失可能

---

①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年,第12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小于其他人。但一切与公元前 4 世纪和 3 世纪的希腊有关的证据都表明，希腊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坚实基础不在少数有巨额财产的人，而在中产阶级、资产者，他们主要是土地所有者。”①罗斯托夫采夫认为，不仅雅典如此，希腊所有城市（即使不是全部城市）也一样。然而，这段时间只保持了几十年。正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他们承受着大部分赋税，以及强加给他们的公共服务和职位，沉重的负担，再加上战乱，中产阶级在公元前 3 世纪后期和公元前 2 世纪前期，几乎完全消失了。②

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财富，尤其是地产，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一些至今仍然小康的家庭降到了无产者的地位。”③这就是雅典社会和经济日益衰败的主要原因，因为“那些没有财产或只有很少财产的人，以及靠每天从事艰苦劳动才能糊口度日的人的数目日益增多，这本身就是危险的源泉”④。罗斯托夫采夫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工商业者和农村的小土地所有者。这些人经济地位的下降，甚至贫穷破产，使雅典经济失去了活力和希望。

罗斯托夫采夫接着分析道：由此造成了另一种结果，即社会普遍贫困，靠做工为生的贫民人数增多，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低的奴隶不受重视，自由民雇工代替了奴隶。⑤ 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人数的减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导致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206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206—207 页。

③ 同上书，第 206 页。

④ 同上书，第 207 页。

⑤ 参看同上。

社会购买力降低，进而使得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也不断下降。[1] 要知道，雅典经济一直依靠本地手工业产品行销而兴盛，手工业作坊和工场使用了大量奴隶。现在，手工业因产品销路不佳而衰落，再加上自由民雇工取代了奴隶，所以雅典的奴隶人数可能是减少的。[2]

公元前3世纪以后，雅典仍然有许多外国人。“但他们是作为游客和学生前来的，而不是作为企业家和商人来到雅典的。”[3]相对于希腊境内其他一些港口城市，雅典的商业已经相对落后了。雅典还剩下什么？“它依旧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娱乐、艺术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但本地生产的食品虽然质量还是良好的，却较为稀少，食物的短缺是经常的困扰。”[4]总之，“毫无疑问，雅典不再是过去的雅典了”[5]。

对雅典的衰败最感失望的，不仅是雅典人，而且是全体希腊人。雅典最大的损失在于它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消亡。这是因为，雅典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民主和自由底蕴深厚的城邦，“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福地、这个世界上最自由和最骄傲的城市”[6]，然而几经折腾，终于屈从于专制政体，雅典人失望了，全体希腊人也失望了：雅典“曾经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安全的、整洁的、美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07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同上书，第211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丽的家园。而今，星辰已经坠落，家园已然荒芜，他们看不到前程在哪里”①。这就是安提柯王朝晚期的雅典的写照。

## 三、安提柯王朝时期的斯巴达经济

前面已经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达到了鼎盛阶段。但底比斯与斯巴达之战，斯巴达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城邦相继离开了斯巴达，斯巴达衰落了，孤立了。马其顿人南下并控制希腊本土后，斯巴达同希腊其他城邦一样受马其顿的管辖，但斯巴达有意抵制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也有意排斥斯巴达。亚历山大东征时期有意冷落斯巴达，羞辱斯巴达，斯巴达被排除于希腊世界之外，它什么也插不上手，怎么也抬不起头。②关于这些，前面都已提及。

亚历山大死后，在各个将领争夺地盘的长期战争中，“斯巴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在大多数时间里，它只能在幕后等待着上场的机会，与主要的战事或历史事件都没有什么关系”③。安提柯王朝建立后，希腊全境都受到安提柯二世的控制，但希腊各个城邦，无论是过去跟着斯巴达跑的还是过去反对斯巴达称霸的，全都不理睬斯巴达，好像没有这么一个城邦似的。安提柯王朝也不重视斯巴达，只是让它继续保留自治权。

斯巴达这个时期已完全顾不上其他城邦如何看待它，如何

---

①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30 页。

②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10、217 页。

③ 同上书，第 217 页。

冷落它，因为斯巴达的内部问题日益严重，迫使斯巴达贵族统治集团忙于应付，寻求变革之路。斯巴达终于把改革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比雅典大约晚了二百多年，比希腊其他城邦至少也晚了一百年。

1. 斯巴达的制度危机

自古以来，斯巴达一直以农立国，土地共有，农民领有份地，并有服兵役的义务。斯巴达保留了较多的氏族社会共同生活的传统，强调公民之间的平等，生活一律，禁止奢侈，公民一致对付境内的黑劳士，即沦为农奴的原住民。斯巴达强调"公民即战士"，全体成年男性公民都是战士，效忠城邦，作战时视死如归，所以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共有制解体了，份地分配制度行不通了，土地都变成了私产，公民一律平等的基础已经消失。贵族、高官、将领们敛财成风，霸占土地，过着奢侈的生活。贵族的土地变成了雇工耕种的大农场，而原来的小农则陆续沦为失地、无地的佃户或雇工。① 这样一来，斯巴达长期赖以生存和强大的公民兵役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据说，领有完全份地的公民，在传说中的莱库古时期的斯巴达共有 9,000 人。到公元前 5 世纪，据希罗多德提供的数字，这时的公民共有 8,000 人。② 而到了公元前 3 世纪，即安提柯王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740 页。

②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198 页。

朝时期，只剩下700人了。[①] 因为按照斯巴达的法律规定，无地即无公民权。并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中还有许多妇女，她们不服兵役。[②] 而根据斯巴达特有的法律，男女平等，妇女是有继承权的。[③]

那么，斯巴达的军队是靠什么人组成的？黑劳士在这以前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从军。更主要的是靠雇佣兵，包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城邦招募来的雇佣兵。[④] 雇佣兵成了安提柯王朝时期斯巴达军队的主力，这表明斯巴达城邦制度危机的严重程度。

不仅如此，斯巴达的传统继承制度也出现了危机。在斯巴达，历来都实行长子继承制；父亲死后，份地完全归长子，幼子们都担心自己会变得穷困并因此被逐出公民社会，[⑤]以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三兄弟只好共娶一个妻子，从而次子和幼子都可以留在家中了。[⑥]

斯巴达公民人数的不断减少，已被近年来的田野发掘和考古资料所证实，即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时，斯巴达深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198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08页。

③ 参看谢普莱："隐藏的风景：希腊田野调查资料和希腊化历史"，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188页。

④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17页。

⑤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196—197页。

⑥ 参看同上。

受耕地缺乏劳动力之苦。[①] 斯巴达境内虽然有些小农户失去了土地,更常见的却是在远离斯巴达中心的地区,小农只是放弃了自己的土地而外出,而不是出现了大地产。斯巴达社会上层人士对这些土地兴趣不大,因为那里主要是斯巴达东部和东北部的丘陵地带,土地质量很差。[②] 而农民之所以弃地外流,正是出于低产和经营亏损的考虑。[③]

为了使斯巴达那些被农民抛弃而荒芜的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斯巴达可能把一些黑劳士迁移到那里去,成为新农民。[④] 但看来效果是不明显的,因为在斯巴达,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农村居民点(村落)仍在消失。其实,不仅只有斯巴达一地出现上述现象。在安提柯王朝前期希腊南部许多地方都有土地荒芜、农民外出、村落消失的情况。[⑤]

2. 公元前3世纪中叶斯巴达的改革:第一阶段

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起,斯巴达国内要求加快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看来这已经是阻挡不了的趋势。[⑥] 形势对执政的贵族集团造成了巨大压力。

从这时起,斯巴达的改革循着本国的特色进行,即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国王本人。按照斯巴达城邦建立时所制定的法

---

① 参看谢普莱:"隐藏的风景:希腊田野调查资料和希腊化历史",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188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89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189—190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190页。

⑥ 参看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4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年,第219页。

律，斯巴达设国王二人，分别由两个王族产生。国王受长老会议制约，一切重大事务由包括国王在内的长老会议成员决定。长老会议成员虽然由公民大会选出，但实际上全由贵族担任。

改革由国王阿吉斯四世开始，他于公元前245—前241年当政。同时担任国王的是莱昂尼达斯。起初，他们两人都主张取消债务和重新分配土地。这是久已植根于希腊其他城邦平民派的改良或革命的主张，不料现在被斯巴达的改革者捡了起来。① 而且，斯多噶学派的影响逐渐增大，它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这一思想是斯巴达这次改革的因素之一。② 改革的主张得到斯巴达一批人的拥护，因为他们在了解斯巴达实际情况后都认识到，社会对现状的不满在加剧，只有取消债务，才能赢得民心；只有重新分配土地，才能增加公民人数，使政权稳固。阿吉斯四世本人、他的家属和朋友都带头支持改革，他们“献出自己的财产和土地，交给国家分配”③。

取消债务的措施遇到的阻力较小，因为贵族中也有欠债的，或把财产抵押出去的，他们认为取消债务可行。所以这项改革就实现了。④ 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则难以推行：一方面，这涉及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世家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不少人认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08页。

② 参看波梅罗依：“家庭的价值：对过去的利用”，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6页。

③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359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09页。

为阿吉斯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不可行。这个方案是:在斯巴达领土上,划出4,500块份地分给无地的斯巴达人,再划出15,000块份地给皮阿西里人,即所谓的“边民”。[①] 结果,这一改革未能实施。两位国王之一莱昂尼达斯出走国外。

公元前241年,斯巴达国内反对派乘阿吉斯四世率军出战时夺取了王位,并将阿吉斯四世处死,他的母亲、祖母也一同被害。许多支持阿吉斯四世的人被放逐。[②] 莱昂尼达斯回国主政。

当初在推行改革时,阿吉斯四世和莱昂尼达斯之间已有隔阂,两人政见不一,阿吉斯四世似乎更激进一些,他认为斯巴达首先应当实现平等。[③] 这一主张得到年轻公民的响应,而年长的公民却显得保守,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④] 莱昂尼达斯则担心阿吉斯四世献出自己的财产给国家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知道,这样一来,“他和他的朋友难免要破财消灾,所有的荣誉和情面都让阿吉斯攫走”[⑤]。两个国王在改革方面的分歧终于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了莱昂尼达斯出走。

3. 公元前3世纪中叶斯巴达的改革:第二阶段

公元前235年,即阿吉斯四世被害后的第6年,莱昂尼达斯去世了。他的儿子克利奥米尼三世当了斯巴达国王(约公元前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742—743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743页。

③ 参看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1427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同上书,第1430页。

235—前221年）。公元前3世纪中叶斯巴达的改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克利奥米尼三世既是莱昂尼达斯的儿子，又娶了阿吉斯四世的遗孀为妻。据说，阿吉斯四世的遗孀阿基阿蒂斯“曾千方百计地想报杀夫之仇，并且她比自己的丈夫还要急于实行改革的方案，她的丈夫当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遭人谋害的”①。克利奥米尼三世娶了她之后，她便“促使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克利奥米尼三世转变成了一位改革者”②。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应当忽略克利奥米尼三世本人也是一位对斯巴达社会十分不满的人，据说，他“看到所有的市民过着放荡腐败的生活，有钱人把公益丢在脑后热衷于私利的享受，穷人只有在家中过着无以为生的日子，他们失去斯巴达人献身战争的精神和重视训练的抱负”③。于是克利奥米尼三世继任国王后决心推进改革。

斯巴达按法律规定应有两位国王。克利奥米尼三世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决定召回逃往国外的阿吉斯四世的弟弟阿契达穆斯继任另一位国王。但阿契达穆斯的继位引起了斯巴达国内保守派的恐慌，他们又迅速谋杀了他。④ 要知道，阿吉斯四世家族和克利奥米尼家族都是斯巴达最富有的大地主

---

① 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24页。

② 同上。

③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441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1444页。

家族，[①]阿吉斯四世当初的改革重点放在重新分配土地方面，而现在克利奥米尼三世要推动的改革也正是重新分配土地，[②]所以引起斯巴达贵族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是必然的，因为重新分配土地意味着要没收大地产，拿出土地来参与分配；同时还要释放奴隶，因为大地产是靠奴隶耕种的。[③]

阿契达穆斯国王被谋杀后，克利奥米尼三世严厉镇压了贵族保守派，杀了一批，放逐一批，土地的重新分配被强制推行。斯巴达的公民份地恢复为 4,000 份，并使服兵役的 4,500 名皮里阿西人成为拥有份地的公民。这项改革的推行受到斯巴达人的拥护，这反映了斯巴达人的精神力量并未突然终结。[④]

由于斯巴达两位国王之一阿契达穆斯被害，克利奥米尼三世让自己的兄弟优克莱达斯登上国王之位，成为共同治理斯巴达的伙伴。[⑤] 这打破了斯巴达两个王族世系各出一个国王的传统。[⑥]“同一个世系出现两个国王，这在斯巴达是仅有的

---

① 参看波梅罗依：“家庭的价值：对过去的利用”，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15 页。

②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203 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208 页。

④ 参看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 4 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 年，第 219 页。

⑤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26—227 页。

⑥ 卡特利奇认为这实际上是废除了斯巴达传统的双王制。（参看同上书，第 227 页）

一次。”[1]

克利奥米尼三世的改革,尤其是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使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其他希腊城邦大为震惊,那里的平民不仅希望在本城邦也实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而且欢迎克利奥米尼率军队前去,解救他们。这样,改革后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形象大大拔高了,克利奥米尼三世被人们当成解放者了。克利奥米尼三世还真的攻下了一些城邦,甚至一度占领了科林斯。[2] 希腊中部和南部一些城邦领导者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做出选择,即欢迎斯巴达人前来呢,还是继续同马其顿站在一起,随着安提柯王朝去攻打斯巴达?[3] 他们选择了后者。

公元前221年,安提柯三世亲自率领马其顿和希腊一些城市组成的联军击败了斯巴达军队,克利奥米尼三世逃到埃及。[4] 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不愿得罪安提柯王朝,拒绝支持逃亡者克利奥米尼三世,后来又以克利奥米尼三世煽动埃及人反叛为借口,把他逮捕下狱。克利奥米尼三世从监狱中出逃,试图发动起义,但又被抓回监狱。[5] 克利奥米尼三世是怎么死的?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克利奥米尼三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6]

---

①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448—1449页。

②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18—419页。

③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205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206页。

⑤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94页。

⑥ 参看同上。

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兵败后绝望自杀。[①] 至于随他一起逃往埃及的,有他的母亲、子女和一些侍女,也全部被埃及处决。[②] 第三种说法则是:克利奥米尼和他的十二个朋友曾在他死的前夜一齐举行最后的晚餐。他被出卖给他的敌人,于是他吩咐他的朋友们停止他们那毫无希望的战斗。他的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③] 他被处决之后,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中,他的事迹被传开了,称他是一个"英雄和神子"。[④] 人们把一个死亡的领袖崇拜为神,后来又盼望他奇迹般地复活。[⑤] 由于在亚历山大里亚不仅有许多希腊人,还有许多犹太人,所以这个故事也很快传到了犹太人中间。这时距耶稣的出生相隔了二百多年,是否同耶稣蒙难的传说有某种联系,只能凭猜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⑥]

安提柯三世使斯巴达恢复了社会秩序,并再次成为斯巴达的主人、希腊的主人。[⑦] "一般认为,斯巴达王族世系可以克利奥米尼三世作为终点。"[⑧]以后斯巴达虽然仍有国王,但已经不再属于传统的王族世系了。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19页。

② 参看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1469页。

③ 参看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宋桂煌译,载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第199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书,第200页。

⑦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206页。

⑧ 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95页。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阿吉斯四世还是克利奥米尼三世，“都不承认这是革命，皆宣称是以古代立法者莱库古的名义要恢复古代习俗”①。很可能是为了稳定人心，减少阻力。在当时的斯巴达，如果空喊什么革命或改革，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只会增加他们的反感。所以只有号召恢复古制，才能使人们感到放心。人们已厌倦了贵族派和平民派的长期斗争，听腻了自主、民主、平等之类的口号，甚至人们还厌恶作为斯巴达政治体制特色的监察官制度。克利奥米尼三世在镇压反对派时就把五名监察官全部杀死，“大胆地取消了这种为国王和民众所厌恶的官职”②。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打出国王领导恢复古代体制的旗帜可能最符合民众的心理。③

4. 斯巴达的动乱和纳比斯执政

克利奥米尼三世去世和安提柯王朝重新控制斯巴达与受到斯巴达影响的希腊城邦之后，斯巴达国内并未平静下来。斯巴达改革以前的财产分配状况和旧体制相继恢复了。斯巴达平民不服，一再发生暴动，社会陷入混乱之中。最终，纳比斯被拥立执政，建立了长达 15 年的僭主政治(公元前 207—前 192 年)。

根据传统，斯巴达在历史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僭主政治，但在公元前 3 世纪末，阿吉斯和莱昂尼达斯的改革失败之后，这是斯巴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产生的专制政体，纳比斯是这方面

---

①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62 页；参看李玄伯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87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吴晓群译本，第 362 页；李玄伯译本，第 287 页。

的代表人物”[①]。纳比斯不是希腊人，而是叙利亚的闪族人，作战被俘后卖到斯巴达为奴隶。他是依靠雇佣兵的拥戴而成僭主的。

纳比斯作为僭主而执掌斯巴达大权后，推行了比克利奥米尼三世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一是镇压贵族地主，把他们处死，并没收其财产，分配给穷人，二是释放斯巴达国内的奴隶，并把继续受剥削和处于农奴地位的黑劳士解放出来。关于黑劳士在斯巴达的命运，不妨在这里再做一些简单的回顾。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由于兵源不足，曾招募了一些黑劳士从军参战，后来按照他们的忠诚和勇敢程度，给他们以份地，获得自由人身份。此后，又陆续解放了一些黑劳士。阿吉斯四世推行改革过程中，曾设想借重新分配土地的机会，给黑劳士以自由。公元前227年，克利奥米尼三世在拉哥尼亚开始土地重新分配，“在很多方面同阿吉斯的方案是相似的”[②]。克利奥米尼三世的改革方案的受益对象较广，即“不仅涵盖了贫穷的斯巴达人，也照顾到了贫穷的‘边民’。另外，他还释放了6,000名余下的拉哥尼亚黑劳士；这些黑劳士现在可以用现金来向斯巴达换取自己的自由”[③]。也就是说，克利奥米尼三世采取的是让拉哥尼亚黑劳士用金钱赎买人身自由的做法。所支付的赎金，是黑劳士自筹的，这表明同过去相比，斯巴达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否则黑劳士们怎能有积累，或者怎能设法筹集到钱？通过

---

① 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② 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27页。

③ 同上。

赎买而获得人身自由的黑劳士“大概因此就成为土地的所有者”①。

现在，纳比斯推行的改革大大超过了克利奥米尼三世推行的改革。纳比斯不但给黑劳士以自由，还使他们成为斯巴达公民。② 从理念上说，纳比斯同克利奥米尼三世也是不同的。克利奥米尼三世“内心并没有认识到结束黑劳士制度会造成什么样的长期社会影响”③，而纳比斯则把解放黑劳士当作一项确定的政策来加以实施，并把它作为实现自己改变斯巴达状况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④

纳比斯的比克利奥米尼三世激进得多的改革，使希腊中部和南部的城邦转向罗马求救，因为这时罗马的势力已渗入希腊。公元前 195 年，罗马“不再虚伪地保持中立立场，并向斯巴达正式宣战”⑤。纳比斯被迫割让出一部分所控制的地区。公元前 193 年，纳比斯试图夺回失去的土地时，又被罗马和一些希腊城邦的联军击败。公元前 192 年，纳比斯被暗杀。斯巴达改革尽废。

斯巴达的改革为什么会一再失败？敌人太强了，先有马其顿，后有罗马，而且无论是马其顿还是罗马，都有一些希腊城邦跟它们在一起，出兵出钱。阿吉斯四世、克利奥米尼三世和纳比斯全都不是它们的对手，怎能不失败呢？

---

① 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27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229 页。

③ 同上书，第 230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同上书，第 230—231 页。

如何看待公元前3世纪晚期到公元前2世纪初的斯巴达的改革？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中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① 这种类比是不合适的。应当说，改革仍是斯巴达式的、符合斯巴达传统的。② 改革的目的是试图恢复斯巴达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土地分配模式，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那时已经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后，任何人想要恢复公元前6世纪时的氏族社会的土地制度都只是空想，根本无法实现。

## 四、安提柯王朝时期的提洛经济

在爱琴海上，有两个城邦明显得到亚历山大东征后马其顿帝国版图扩大的好处，它们是提洛和罗得斯，都是岛国。

当波斯帝国还占领着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时，爱琴海一直是雅典和波斯长期争夺的海域，战争不断发生，海盗（有腓尼基人、克里特人，甚至希腊西部城邦的人参与）横行无忌。即使在雅典一度击败波斯而成为爱琴海上的霸主后，雅典舰队也只是在爱琴海上巡弋，雅典依旧控制不了西亚和北非的陆地，商路并不通畅，所以提洛和罗得斯的经济并未有大的起色。这种情况直到亚历山大东征并消灭了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之后才彻底改观。

先谈提洛的情况。提洛从历史上说，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中心，"没有宪法，没有自己的军队，而且土地非常贫瘠，没有什

---

① 参看福莱斯特：《斯巴达史》，第3版，布里斯托古典丛书出版社，伦敦，1995年，第144页。

② 参看同上。

么矿产资源”[1]。这里“人口混杂，由雅典官员、神庙祭司、各色商人、艺术家等构成”[2]。那么，提洛是怎样繁荣起来的呢？一靠奴隶贸易，二靠阿波罗神庙。

在奴隶贸易方面，如前面所说，爱琴海上长期海盗横行，海盗向提洛供应奴隶，而且什么地区的奴隶都有，所以提洛的奴隶市场十分兴盛。

在神庙经济方面，这里有著名的阿波罗神庙，远近的希腊人，包括富人和生活上还过得去的信徒，纷纷到这里祭拜，并向神庙捐献，神庙富起来了，它拥有庞大的地产和房产，有巨额的地产和房产收入。[3] 神庙还成为放贷的金融机构，罗斯托夫采夫为此使用了“神庙银行”一词。[4] 提洛的“神庙银行”当时被认为不仅非常富有，而且十分有名。[5]

亚历山大去世后，马其顿帝国分裂为三个王朝，提洛和罗德斯归安提柯王朝管辖，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分别统治西亚和北非。这反而促成了提洛的进一步繁荣，因为来到西亚和北非的希腊商人和希腊移民的人数越来越多，提洛作为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商业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了。罗马商人、意大利半岛上各地的商人也纷纷来到提洛，他们除了经商而外，有些还长住于岛上。[6] 虽然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之间的

---

①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08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09 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279—1280 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161 页。

冲突不断,但没有出现过为争夺提洛而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大家都想利用提洛的交通位置和良好港口,谁都不愿破坏这里的商业环境。塞琉古王朝同安提柯王朝之间有过多次战争,但这些战争不在爱琴海海域进行,主要战场在小亚细亚陆地上。塞琉古军队和托勒密军队的战争主要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一带,也不妨碍爱琴海海上的贸易往来。从西亚输往希腊本土的奴隶人数,在公元前 2 世纪时期不断增多。这些奴隶主要来自海盗的劫掠和当地部落交战时抓获的俘虏,提洛依然是兴旺的奴隶市场所在地。① 因此,提洛在公元前 2 世纪后仍继续繁荣,财富继续增长。②

提洛距雅典较近,历史上的交往很多,例如雅典兴盛时以雅典为核心并由雅典一手操纵的提洛同盟就设在提洛岛上。在安提柯王朝时期,雅典由于多次反抗马其顿,战火危及雅典,雅典的居民和资金纷纷流入提洛,提洛的经济繁荣也使雅典人受益,认为这里是远离战火的乡土。雅典商人在提洛的人数很多,这里生活安定、舒适,赚钱机会也多,雅典商人在这里主要从事希腊本土同西亚、北非之间的贸易。一些较穷的雅典人移居提洛以后,能得到一块土地,还能得到住房。其中有些人由于把自己的房屋和土地出租或出售给外国人而富裕起来。③ 较为有钱的雅典人可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特别是参与了对提洛的投资而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18 页。

②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09 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41—742 页。

继续发财。[①] 即使是雅典本地的农业，也受惠于提洛的经济发展，因为雅典的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制品（尤其是橄榄油和蜂蜜）在提洛有很好的销路。[②] 此外，雅典的艺术家也纷纷来到提洛，谋求发展。[③] 这些都说明了雅典人因提洛的繁荣而找到了发展的机会。

虽然雅典人因提洛繁荣而受益，但很难说雅典城邦是否由此而富裕了，因为它无法从提洛的关税和港口停泊费得到什么收入。[④]

还应当指出香料贸易的发展对提洛的繁荣所起的作用。香料作为一种调味品（尤其是胡椒），原产于印度，它通过两条路径输入希腊化世界：一条是陆路，通过印度河流域，经波斯帝国原疆土，输往西亚、北非和希腊本土；另一条是海路，即由印度从海上经波斯湾，或绕阿拉伯半岛南部运来。提洛成为香料贸易的中心之一。其实，香料不仅销往西亚、北非和爱琴海沿岸，而且同其他东方商品一起，还销往意大利半岛、西西里等地。[⑤] 另一种来自印度并运往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商品是烟香，这是供祭祀仪式上用的。[⑥] 提洛也是集散地。

在提洛岛上居住了不少外国人，以商人为主，包括他们的家属、助手、仆役。这里有很多外国商栈、外国人住宅和外来宗教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42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161—162 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 162 页。

⑥ 参看同上书，第 161—162 页。

庙宇。在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攻占和焚烧科林斯之前，提洛已经是一个繁华的港湾城市。科林斯被马罗人焚烧一空之后，提洛代替了科林斯，进一步兴旺。罗马有意把提洛开辟为自由港，而不像罗得斯那样是征税的商港。于是提洛变成了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商业运输中心。① 提洛的居民大约有20,000人到30,000人之多。② 这里还有数以百计的店铺和作坊，以及几百座私人住宅，其中有些装饰得富丽堂皇，表明主人十分富有。③ 然而，提洛贫富悬殊，下层阶级生活困难，而且奴隶人数众多，提洛一直有一个古代世界的主要奴隶市场。④ 近年来在提洛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提洛沿街都是小商店，商店铺面虽然很小，但紧密地排列相依。十字路口是小市场，四面八方都有面包房，而且越靠近市场，没有窗子的作坊越多。市中心有大市场，中有祭坛，四边有宽敞的长廊，长廊中有成行成列的店铺。⑤ 这表明提洛已经有古代世界大城市的样子。

## 五、安提柯王朝时期的罗得斯经济

罗得斯城邦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它不仅港湾良好，港口设施齐全，而且位于爱琴海上南北商路的交汇点，距西亚、北非又近，所以能够逐渐替代希腊本土的一些港口城市，成为除提洛以外的又一个贸易中心。

---

①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43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798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798—799页。

⑤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51页。

罗得斯城邦的领导者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独立支撑的，只有见机行事，谁强大就投靠谁，依赖谁。它先后投靠过波斯帝国、雅典、斯巴达、马其顿。后来，罗马兴盛了，罗得斯又投靠罗马，这样它就维持下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罗得斯城邦的治理井井有条，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罗得斯水手的技术水平是公认的。[①] 由它本国公民组成的陆军和海军都英勇善战。罗得斯的舰队肃清了附近海域的海盗，保护了过往商船的安全。[②]

罗得斯同周围的国家的关系融洽。例如，公元前 225 年罗得斯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受到很大损失，房屋、桥梁、城墙都被震坍，连有名的阿波罗神像也倾倒了。同罗得斯平时有交往的希腊城邦全都前来援助。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都捐赠了钱财、粮食和各种物资。甚至远在西西里的叙拉古也慷慨解囊，尽管这时已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西西里已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但叙拉古作为希腊移民城市被保留下来，所以仍保持着同罗得斯的商业往来。各国和希腊各个城邦援助罗得斯的灾后恢复重建一事，可以证明罗得斯在地中海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各个国家同罗得斯商业往来的频繁。

公元前 205 年，正值罗马发动的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的后期，安提柯王朝衰落了，罗得斯乘机宣布中立，不听从安提柯王朝的摆布。罗得斯宣布中立，符合罗马的利益，因此受到罗马的欢迎；同时，这也得到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的认可，因为它们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207 页。

② 参看同上。

全都认为,在爱琴海海域能有一个中立的城邦,对大家都有好处,对爱琴海的贸易有利,商路也不至于被切断。

罗得斯一直同罗马的宿敌迦太基保持密切的商业往来,双方关系友好。[①] 即使在公元前 168 年罗马灭掉安提柯王朝后,罗得斯仍同迦太基有商业往来。[②] 罗得斯之所以如此,很可能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但罗得斯作为一个岛国,不得不考虑政治大局,它不可能同迦太基在政治上亲近,因为它不愿得罪罗马。

罗得斯也是当时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这里的富人通过自己建立的私人银行,把大笔款项借给各个城市。[③] 同提洛一样,这里也有"神庙银行",但私人银行可能比"神庙银行"更为重要,放贷对象的范围也更为广泛,私人银行的金融业务同商业之间的联系也更多一些。[④]

罗得斯同黑海沿岸地区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早在马其顿人南下希腊本土之前,希腊移民就在黑海周边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有些还发展为城市,但后者同希腊本土的城邦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只有贸易上的往来。亚历山大东征时越过了海峡,经小亚细亚南下,没有顾及黑海沿岸,更没有顾及黑海北岸的希腊移民城市和非希腊人的国家。[⑤] 黑海北岸的希腊移民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76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280—1281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布朗德:"大草原和海:公元前一世纪以前黑海地区的希腊化北方",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199 页。

城市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周围那些强大的游牧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缴纳贡赋，从而相对地保持了和平。[1] 亚历山大死后的各个分治者争夺继承权的战争期间，黑海北岸的希腊移民城市既没有卷入这场战争，也从未明确地支持哪一方，它们依然同过去一样，专心从事贸易，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农牧业产品而外，还包括奴隶，奴隶主要是蛮族人。直到罗得斯强盛和富裕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罗得斯对黑海北岸地区十分关注。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却没有强大的对手。于是罗得斯充当了黑海与地中海之间重要的贸易中介人。[2] 当时，对黑海北岸感兴趣的还有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但经营黑海贸易的希腊人并不支持拜占庭，因为拜占庭对黑海贸易征收重税，以便用来维持拜占庭的财政开支，包括向黑海北岸内陆地区的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支付贡金，从而使外来的希腊人不满。[3] 罗得斯和拜占庭在黑海贸易中的矛盾一直存在，所以罗得斯不通过拜占庭而同黑海北岸地区直接发生联系。罗得斯的强盛使它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公元前 2 世纪后半期，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可以明显地感到罗得斯在这里的影响，罗得斯在这里主要从事粮食贸易，把这里的粮食运往爱琴海地区。[4] 除粮食以外，罗得斯商

---

① 参看布朗德："大草原和海：公元前一世纪以前黑海地区的希腊化北方"，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199—200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208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207 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76—777 页。

人还从黑海北岸地区向爱琴海地区输出牲畜、蜂蜜、蜡、干鱼等产品和奴隶。[①] 而输往黑海北岸的，除了希腊化国家制造的手工业品外，还有橄榄油等食品，因为那里的气候不适合种植橄榄树。[②] 罗得斯人一直在这一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

罗得斯同小亚细亚境内的帕加马王国之间也有密切的商业联系。关于帕加马王国，本书下一章将会提及。在这里只提一下帕加马王国经济比较繁荣，文化相当发达，但却是一个缺少粮食的国家。罗得斯不仅向它供应来自黑海北岸地区的粮食，有时甚至向它赠送粮食，以表示善意。[③] 帕加马王国自身也生产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它也很可能想借助于罗得斯把自己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推销出去并找到一个贸易结算中心。[④]

公元前2世纪，罗得斯达到了极盛阶段，它被认为是希腊城市中最适合人们居住和最符合商人经营发展的城市，简单地说，它继续既自由，又富庶。[⑤] 各国的商人都把年轻人派到那里去学习做生意。[⑥] 当时，有人说罗得斯的财富来自转运贸易，进出口的货物都要缴纳关税，[⑦]罗得斯对此做了辩解，说它所征的不是关税，也不是一种城镇出入税，而是向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征收

---

①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年,第75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76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777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4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年,第224页。

⑥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年初版,1976年重印,第333—334页。

⑦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43页。

的船舶停靠税。① 正因为转运的货物多,停靠港口的船泊多,所以税收甚丰。

罗德斯还制定了一部海上法,处理海上纠纷有法可依,从而被各国商人认可。

## 第三节　安提柯王朝走向衰亡

在安提柯王朝统治之下,希腊境内一些城邦纷纷组成同盟,这既反映了马期顿征服希腊本土以前的希腊传统,也是城邦之间相互渗透的表现。② 因此,要了解安提柯王朝是如何统治希腊本土的,有必要先了解希腊城邦在这段时间内所组成的同盟。而要了解希腊境内一些城邦如何力争摆脱马其顿统治,使安提柯王朝逐渐丧失控制力,并如何逐步走向衰亡的,也必须先了解希腊本土所组成的城邦同盟。

当时,希腊城邦组成的同盟,最重要的是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除这两个同盟以外,还有伊奥尼亚同盟、卢奇亚同盟、克里索利亚同盟等。③ 它们全都是一种利益的结合。

下面,首先谈谈埃陀利亚同盟。

### 一、埃陀利亚同盟

埃陀利亚人一向住在希腊西北的山区,同马其顿人过去一

---

①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56 页。

② 参看戴维斯:"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相互渗透关系",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9 页。

③ 参看同上。

样，被认为是一个半开化的部落，他们都是些村民和山里人。[1]埃陀利亚人从未被希腊其他城邦征服过，这多半是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山峦重叠、林木繁密、道路崎岖所致。[2] 在历史上，他们对希腊是有功的，因为骁勇善战，曾抗击过高卢人南下，拯救了希腊。[3]

埃陀利亚人是在马其顿王国建立以后才逐渐融入希腊社会的，埃陀利亚人建立自己的城邦可能是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后期。从这以后，埃陀利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仍未摆脱以畜牧业为主的格局。年轻的埃陀利亚人外出充任雇佣兵的，不在少数。[4]

安提柯二世继位前不久，埃陀利亚已逐渐强盛。他们信奉的是太阳神。信奉太阳神的，不仅有埃陀利亚人，还有居住在希腊西北部的一些城邦的居民。大约在公元前 279 年前后，以埃陀利亚为中心，联合了附近共同信仰太阳神的城邦一起组成了埃陀利亚同盟。从时间上说，埃陀利亚同盟成立略早于安提柯王朝的建立(安提柯王朝建立于公元前 276 年)。

埃陀利亚同盟规定，所有入盟的城邦完全平等，对内保持独立地位，对外一律统一口径，采取一致行动。同盟设置全盟公民大会，所有入盟城邦的公民均可参加全盟公民大会，选举同盟领导人。埃陀利亚同盟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议事规则和组织形式，

---

①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77 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208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并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很可能是由入盟城邦选举代表的体制，①而不是按照以前曾经在希腊实行过的办法，即根据入盟各部人口所占比例产生代表，因为那样一来，就使得“地区而不是城市成为组成单位”②，从而“较小的城市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倾向于反对联合在一起”③。

埃陀利亚同盟刚建立之时，只是互助互保性质的城邦联合。当初，不仅看不出埃陀利亚同盟是针对马其顿的，也看不出是旨在驱逐马其顿人的。甚至在某些场合它还是同马其顿人合作的。比如说，埃陀利亚和后来同它一起建立埃陀利亚同盟的城邦，在公元前 4 世纪末曾同安提柯家族一起对付安提帕特的儿子卡桑德，④公元前 3 世纪初期又同安提柯家族一起抗击过高卢人的南侵。⑤

埃陀利亚人很早就进行海上劫掠活动，这是他们惯常的职业之一，为此，他们还同“希腊海上掠夺中心——克里特岛建立起联系”⑥。即使埃陀利亚人的海上劫掠活动也损害了马其顿人的利益，但安提柯二世并没有对埃陀利亚人或埃陀利亚同盟采取过报复行动。安提柯二世认为，只要埃陀利亚同盟尊重马其顿王国的至尊地位就行了。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25—126 页。

② 同上书，第 126 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79 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 76 页。

⑥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53 页。

在安提柯王朝基本上不干预的情况下，埃陀利亚同盟继续扩展，加入这一同盟的城邦增多了。希腊中部的一些城邦，甚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依利斯城邦也参加了埃陀利亚同盟。不仅如此，埃陀利亚同盟的活动范围也有所变化，它已经不再限于军事上对外一致行动（如某个加盟城邦受到同盟以外的敌人攻击时，有共同出兵作战，统一指挥的规定），而且还扩大到经济方面，如采取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采取统一的通用货币，以便于商业往来。为了取得更多的希腊城邦的平民支持，埃陀利亚还经常支持希腊城邦中的民主派。① 埃陀利亚的野心随之滋长，它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决心推行独立的政策而不再受马其顿的节制。② 与此同时，埃陀利亚人的海上劫掠活动更加放肆，它的海上劫掠范围已不限于海上，甚至攻击爱琴海一些岛屿上的城市和希腊本土沿岸的城市。它同克里特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它"利用克里特的一些港湾作为集合点和可以处置俘虏的场所"③。有些希腊城邦甚至同埃陀利亚订立和平协定，以保证今后不再受到埃陀利亚人的袭击。④ 可以说，在整个公元前 3 世纪内，埃陀利亚人始终是爱琴海上横行无阻的海上劫掠者。⑤

这一切显然引起了安提柯王朝的不满，也引起了爱琴海沿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54 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210 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99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198 页。

⑤ 参看同上。

岸希腊城邦的痛恨。

## 二、阿卡亚同盟

阿卡亚是希腊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阿卡亚同盟就是阿卡亚城邦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些希腊城邦组成的。它和埃陀利亚同盟一样，很可能也遵循着“一城一票”的原则。① 各入盟城邦一律平等。

从建立的时间上说，阿卡亚同盟大约建立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略晚于埃陀利亚同盟。建立阿卡亚同盟的目的，同埃陀利亚同盟相同，即对内保持独立，对外一致行动。具体地说，军事上，对外作战时，入盟各城邦出兵，选出一位统帅，指挥同盟军队；经济上，也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采用通用的货币。此外，阿卡亚同盟也召开全盟公民大会，所有入盟城邦的公民都可参加。

最早参加阿卡亚同盟的主要是农业城邦，城邦居民以从事种植业、畜牧业、葡萄业为主。后来，科林斯、麦加腊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也加入了阿卡亚同盟。科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单独予以说明。

科林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乘雅典衰落在先、斯巴达衰落在后的有利时机，使经济有较大发展。在马其顿王国南下和亚历山大东征之际，科林斯又获得了两个机遇，一是马其顿军队毕竟维持着希腊本土的秩序，工商业活动毕竟有了和平的环境；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26页。

二是亚历山大东征把西亚和北非纳入了统治范围，商机增加很多。科林斯抓住这些机遇，成为受益较多的一个希腊城邦。加之，科林斯地理位置良好，它处于科林斯地峡上，可以“把船舶从一个海拖到另一个海”①，这条拖道一直被使用，使科林斯成了不亚于提洛和罗得斯的贸易中心。

安提柯王朝建立后，科林斯总是“脚踩两只船”：一方面，它服从安提柯王朝，绝不反对安提柯王朝；另一方面，它同当时已建立的阿卡亚同盟保持良好的关系，却一直不愿加入阿卡亚同盟。它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既不得罪安提柯王朝和阿卡亚同盟，又不至于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但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阿卡亚同盟中的西库昂城邦领导人阿拉图斯通过政变上台，并于公元前 245 年被选为阿卡亚同盟的军事统帅，那时他可能还不到 30 岁。以后他连任此职，直到公元前 235 年。② 他原来就有反对马其顿王国驻兵科林斯地峡的想法，于是他鼓动阿卡亚同盟各城邦出兵攻占科林斯，并逼迫驻守科林斯地峡的马其顿军队撤走。这样，科林斯加入了阿卡亚同盟，紧接着，麦加腊也加入阿卡亚同盟。③ 阿卡亚同盟至此进入全盛时期，安提柯王朝虽然对阿卡亚同盟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安提柯王朝认为，如果对阿卡亚同盟采取强硬措施，结果将引发一场希腊全境的内战，对安提柯王朝是不利的。而阿卡亚同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

---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42 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733 页。

③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54—355 页。

方面同埃陀利亚同盟接近，以便相互支援（尽管这只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则同托勒密王朝结盟，以便取得后者的帮助。①

这样，阿卡亚同盟的影响增大了。要知道，希腊本土过去两大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都被排斥在阿卡亚同盟和埃陀利亚同盟之外：安提柯王朝禁止雅典参加任何同盟，斯巴达则被阿卡亚同盟拒绝，埃陀利亚同盟也对斯巴达冷淡，不愿同它在一起。斯巴达这时内部矛盾激烈，国王和贵族们都为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着急，斯巴达也无意加入任何同盟。② 特别是斯巴达绝对不愿意同阿卡亚城邦站在一起，更不用说尊奉阿卡亚城邦为首的同盟了，因为斯巴达和阿卡亚城邦是宿敌，现在斯巴达怎么可能承认阿卡亚城邦的主导地位呢？③ 然而事情的进展不依斯巴达的意志为转移，公元前 192 年，阿卡亚城邦强迫斯巴达加入阿卡亚同盟。"对斯巴达人来说，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耻辱和打击。曾经，而且就在不久以前，斯巴达至少在伯罗奔尼撒的政治活动中，仍然还算得上是一个有份量的角色，可现在，其地位竟然与阿卡亚同盟中其他最低贱的小城邦没有什么两样了。"④

从阿卡亚同盟和埃陀利亚同盟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安提柯王朝的二元政治体制的特色。安提柯王朝尽管高踞于希腊境内各个城邦之上，它可以对希腊各邦发号施令，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55 页。

②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25—227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231 页。

④ 同上书，第 232 页。

必要时可以出动军队来肃清一切反马其顿的势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安提柯王朝不仅让希腊城邦保留一定自治权，容许像雅典、提洛、罗得斯这样的城邦放手发展，而且还容许建立埃陀利亚同盟、阿卡亚同盟等带有摆脱马其顿控制权性质的同盟。实际上，这仍然是因为安提柯王朝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希腊本土推行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地步，所以在许多场合，安提柯王朝是包容的、忍让的。

从根本上说，阿卡亚同盟对马其顿是有意疏远的，因为“在阿卡亚人的制度中也表现了对君主制的不信任和对‘僭主政治’的反感，而安提柯的希腊帝国，正建立在僭主政治的基础上”①。在阿卡亚同盟看来，民主是传统，传统不可违背，而“一个由僭主统治的城市，与它在同盟中的盟员资格不可并存”②。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卡亚同盟是由一些抛弃了亲马其顿政策并反对僭主政治的城邦所组成的城邦同盟。③

安提柯王朝，如果说在阿卡亚同盟刚建立时还不很了解阿卡亚城邦和参加阿卡亚同盟的那些城邦的反马其顿的倾向，但后来，尤其是在阿卡亚同盟军队攻入科林斯，迫使科林斯加入该同盟，并逼迫马其顿军队撤出科林斯地峡之时，安提柯王朝终于明白了阿卡亚同盟是把安提柯王朝当做对手来看待的。但安提柯王朝又有什么办法呢？安提柯王朝知道驻军于科林斯地峡的军事政治意义，因为只要地峡由马其顿军队驻防，希腊南部和中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27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第 62 页。

部、北部的城邦就不可能统一起来。① 安提柯王朝曾经准备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科林斯和科林斯地峡，这实际上意味着保卫马其顿自身。② 但反复思量之后，安提柯王朝还是容忍下来了，因为它不愿意同阿卡亚同盟的冲突升级，关系破裂，它总想在今后同阿卡亚同盟打交道时留有余地。

## 三、罗马共和国和马其顿之间关系的变化

根据以上所述，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的建立和存在是安提柯王朝二元政治体制的反映。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即使在安提柯王朝的兴盛时期，由于实力仍不如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所以不仅不可能同这两个王朝争夺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霸权，甚至不敢同希腊境内的城邦把关系弄僵，这就形成了安提柯王朝在对待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时一再容忍，以维持大局稳定的政策。③ 换句话说，在安提柯王朝统治时期，它对待希腊城邦时，已主要不是同雅典和斯巴达打交道，而是同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打交道了。④

然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即罗马共和国兴起了，强盛了，罗马不断进逼希腊本土，使罗马和马其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使安提柯王朝同埃陀利亚同盟、阿卡亚同盟之间的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205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24 页。

④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浩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第 266 页。

关系发生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谈起。

1. 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

早在安提柯二世于公元前 276 年登上王位并建立安提柯王朝之前 4 年,即公元前 280 年,罗马在进攻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移民城邦塔兰托时,塔兰托深受威胁,便向巴尔干半岛上的伊庇鲁斯王国(今阿尔巴尼亚南部)国王皮洛士求救。伊庇鲁斯人原来都是些山民,国王皮洛士自称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的后裔。伊庇鲁斯不在希腊城邦之列,但伊庇鲁斯人却自称是希腊人的代表,因为他们曾经追随亚历山大远征东方,包括远征印度。塔兰托人向皮洛士求救,被皮洛士看成是一个可以显示自己军事实力和提升自己声望的机会,于是率领骑兵、步兵和从印度带回的大象,渡海到意大利半岛去迎战罗马军队。①

皮洛士自信自己是有力量击败罗马人的,因为在这之前,即公元前 289 年他曾击败马其顿军队,据说俘虏达 5,000 人之多。② 这件事引起安提柯王朝和希腊本土各城邦的震惊,甚至当时有人吹捧皮洛士的武功可以同亚历山大大帝媲美。③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86 页。

② 参看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2 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 710 页。

③ 参看同上。

但皮洛士与罗马人之战注定是一场伊庇鲁斯失败的战争。罗马是倾全国之力来进行这场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战争，而伊庇鲁斯王国却得不到希腊各城邦的真心真意的援助，皮洛士率领的只是一支雇佣军，而罗马使用的则是民兵，所以，这是罗马民兵和皮洛士的雇佣军之间的战斗，皮洛士必败无疑。①

战争开始时，皮洛士率军在意大利半岛登陆，虽然击败了罗马人，但皮洛士也损失惨重，据说皮洛士当时就惊呼，再有这样一次胜利他就完了。② 由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移民城邦叙拉古正受到迦太基人的攻击，也向皮洛士求救。皮洛士便于公元前278年率主力驰援叙拉古，只留下少数军队防守塔兰托。就在这时，皮洛士横加干涉塔兰托和叙拉古两个城邦的政务，并恣意征收税赋，引起两地希腊移民的不满，最终不得不先撤出西西里，再撤出意大利半岛。③ 皮洛士在意大利作战6年，不仅没有挽救塔兰托的命运，反而得罪了罗马，伊庇鲁斯的军力也受到损失。皮洛士在同罗马人作战时，曾寄希望于从安提柯王朝那里得到帮助，但安提柯王朝不愿同罗马人交战，拒绝出兵支援，皮洛士深为不满，竟于公元前274年带兵攻打马其顿，占领了马其顿大部分领土，安提柯二世逃到帖萨罗尼卡。皮洛士留下自己的儿子来管辖马其顿。过了两年，即公元前272年夏天，安提柯

① 参看蒙森：《罗马史》第2卷，李稼年译，李澍泖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4页。

②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86页。

③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391—392页。

二世才依靠雇佣军收复了大部分失地。[1]

皮洛士从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撤军回来后，不甘心自己的失利，仍想在希腊本土称雄称霸。他最担心的是希腊各城邦同马其顿站在一起，那样一来，伊庇鲁斯就下降到第二流国家的地位。[2] 于是他决定出兵进攻希腊，并把重点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公元前 272 年，皮洛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同马其顿和希腊城邦的联军作战时，路过一个村镇，被一个老妇人在屋顶上用瓦片击中头部，晕倒在地。[3] 在他恢复知觉之前，被联军的一个来自伊利里亚的雇佣兵认出来了，于是砍下了他的头颅。[4] 皮洛士死后，伊庇鲁斯军队匆匆逃散。这场战争也就此告终。

### 2. 罗马和安提柯王朝的正面冲突

公元前 239 年，安提柯二世在执政 37 年之后去世。德米特里二世继位，在位 10 年(公元前 239—前 229 年)。接着任马其顿国王的是安提柯三世(公元前 229—前 221 年)和菲利普五世(公元前 221—前 179 年)。由于罗马共和国已日益强大，马其顿西部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知道，罗马和希腊世界的接触很早就有了。除了商业往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213 页。

②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181 页。

③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215 页。

④ 参看同上。

来以及前往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移民同罗马人有接触之外，从政治上说，据说早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时，曾派过使臣前去罗马；[①]而在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前几个月，罗马的使臣也拜见了当时住在巴比伦城的亚历山大大帝。[②] 但从那以后，随着亚历山大去世和马其顿帝国分裂、分治，希腊世界同罗马的往来就停止了。安提柯王朝建立前后，发生过前面已提到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同罗马人的战争，不过皮洛士不能代表安提柯王朝。安提柯二世本人是不愿介入同罗马的战争的。

到了安提柯二世执政后期，罗马的地位大大增强。罗马不仅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南部，使当地的希腊移民城市归属自己，而且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中击败了迦太基，整个西西里划归了罗马，岛上的迦太基人被赶走了，岛东部的希腊移民城市也都归顺罗马。接着，罗马又占领了地中海上的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安提柯二世去世后，罗马一方面继续把迦太基当作今后作战的主要目标，以便独霸地中海西部，另一方面开始把希腊本土和马其顿作为另一个进攻目标，以便控制地中海东部。罗马进攻希腊本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报皮洛士率军登陆意大利半岛同罗马人作战之仇。

在安提柯王朝，这时明显地存在三股势力，一是安提柯王朝的基地马其顿，二是埃陀利亚同盟，三是阿卡亚同盟。在马其顿看来，只有联合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再加上未参加这两

---

① 参看比罗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国际关系"，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② 参看同上。

个同盟的其他希腊城邦，才能与罗马共和国抗衡。而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则不然。在罗马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感觉到，虽然马其顿的控制使希腊人难以接受，如果换成罗马人的统治，他们也会感到同样难以接受。但假设罗马不对希腊城邦进行直接的统治，而是保护希腊各个城邦的利益，甚至使希腊各个城邦的安全得到保障，自治权得以维持，那么希腊各个城邦是愿意同罗马站在一起，反对马其顿王国的。也就是说，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在罗马与马其顿的冲突中，实际上处于观望状态，一切以罗马对希腊人的态度和政策为转移。

公元前230年，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东部海盗猖獗，这些海盗同伊利里亚王国(今阿尔巴尼亚北部)勾结在一起。罗马为了肃清海盗，保障商路通畅，专派使者到伊利里亚王国去，要求国王下令臣民停止对海盗的支持，停止坐地分赃的勾当，不料伊利里亚国王竟杀害了罗马使者。罗马出兵消灭了伊利里亚王国，把它变为附庸。罗马的行动得到了埃陀利亚同盟、阿卡亚同盟和雅典等城邦的支持，它们拥护罗马占领伊利里亚这一蛮族国家和打击海盗的举措，它们甚至把罗马看成是解救者，而不考虑罗马在紧挨着希腊本土的伊利里亚建立了一个随时可以南下的据点。尽管“对罗马人的威胁，希腊的有识之士呼吁停止内战，注意‘西方升起的乌云’，然而，为了在内战中占得先机，一些希腊城邦请求罗马人帮助”①，这就为罗马的入侵希腊本土提供了

①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75页。

条件。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的主要精力仍用来对付迦太基，因为迦太基虽然失去了西西里岛，但无论陆军还是海军实力都很强大，罗马不敢掉以轻心。恰恰在这个时候，马其顿王国意识到罗马的继续扩张对马其顿王国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迦太基的存在所带来的威胁，于是改变策略，转而同迦太基结盟，与迦太基一起对付罗马。这样，罗马与马其顿之间产生了正面冲突，这一正面冲突加速了安提柯王朝的衰亡。

### 3. 第一次和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

公元前 219 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发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战争初期，迦太基军队在汉尼拔率领下从阿尔卑斯山南下，进入意大利境内并大败罗马军队。在安提柯王朝，国王菲利普五世于公元前 221 年继位，他同汉尼拔约定夹击罗马军队于意大利半岛，于是马其顿军队登陆意大利，进攻罗马城。

埃陀利亚同盟在这种形势下是不是支持马其顿呢？它犹豫不决：一方面，它看到了罗马的强大的确是未来希腊城邦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又害怕马其顿战胜以后对希腊本土统治的加强。稍后，菲利普五世同迦太基签订的密约内容被泄露出来，原来双方约定，迦太基承认菲利普五世在出兵进攻罗马后，有权重新控制希腊全境。这样，埃陀利亚同盟马上就转变了立场，拒绝与迦太基站在一起，拒绝派军队协同马其顿作战。菲利普五世只能得到阿卡亚同盟的帮助，而埃陀利亚同盟则站到罗马一边，

并获得罗马的支持。①

罗马痛恨马其顿王国在紧要关头同迦太基结盟出兵意大利。在意大利战局渐趋稳定后，公元前 215 年，罗马决定向马其顿开战，这就是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在战争期间，埃陀利亚同盟成为罗马的盟友。② 战争在希腊境内进行；由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此时尚未结束，罗马的主要精力依然放在同迦太基作战的战场上，无意于在希腊境内把同马其顿的战争拖延下去，于是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于公元前 204 年结束。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前，阿卡亚同盟的立场也转变了，它不再相信马其顿会操胜算，也不相信马其顿会任凭希腊城邦保持自治，于是转到了倾向于罗马一方的立场。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尽管马其顿还控制了希腊一些城邦，但却“失去了在欧洲希腊部分建立统一国家的最后机会”③。而对罗马来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马其顿战争，罗马人第一次带有决定意义地干预了东方世界”④。

公元前 201 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惨败而告结束，迦太基失去了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势力仅限于北非一角。迦太基只被允许保留 10 艘战舰，其余全部销毁。从这以后，罗马在地中海西部的霸权已经确立，于是罗马把进攻的目标转移到马其顿。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仅隔一年，即公元前 200 年，罗马便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221 页。

②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第 68—69 页。

③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31 页。

④ 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175 页。

发动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历时 4 年，到公元前 197 年结束。罗马的军事优势十分明显，拥有较多的舰船，海军人数也较多。[①] 罗马的海军士兵供给充足，意大利沿海地区都是罗马海军士兵的补充来源。[②] 此外，罗马社会上有一些最底层的普通罗马公民，还有一些被释奴隶，愿意进入海军服役。[③] 罗马军队之所以能跨海作战，是同它海军的强大有关的。而罗马陆军的军团方阵，已被布匿战争证实其作战能力。因此，安提柯王朝的菲利普五世不得不在惨败之后求和。议和的条件是苛刻的：马其顿向罗马赔款，马其顿军队撤出希腊本土，退回马其顿，船只全部交出。

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都是罗马的盟友，站在罗马一边。

## 四、安提柯王朝的结束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被认为是罗马征服希腊本土的战争的开始，也是征服希腊化世界的整个战争的开始。[④] 为了彻底粉碎菲利普五世东山再起的图谋，罗马元老院做出如下的规定，宣布希腊完全自由，不受罗马约束，不受马其顿约束，不进贡，甚至不

---

① 参看舒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海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63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364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364—365 页。

④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435 页。

被驻军。[1] 以后的实际情况证明，所谓希腊不受罗马约束只是一句空话，但在当时，这一承诺却大大减少了罗马消灭安提柯王朝的阻力。

那么，罗马为什么不乘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胜利之势，一举而灭掉安提柯王朝呢？它主要考虑到以下两点：

第一，在罗马看来，马其顿边境以北，有不少蛮族游牧部落一直在伺机南下，这些游牧部落剽悍善战，流动而无定所，通常寻找边境上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然后烧杀抢劫，抢了就跑，不易对付。现在，幸亏有马其顿王国置身于北部边境第一线，挡住了蛮族游牧部落南侵之道。如果这时罗马一举灭掉了马其顿王国，岂不是把火引到了罗马人自己身上？所以不如暂时保留安提柯王朝，让它替罗马看守北边的门户。

第二，罗马担心西亚的塞琉古王朝会倾力援助安提柯王朝，因为这时塞琉古王朝正值安条克三世执政（公元前223—前187年），国力很强，而且同安提柯王朝有结盟关系，并自称是"亲希腊派"。如果罗马继续追击马其顿军队，可能导致塞琉古王朝出兵进入希腊，局势可能变得不利于罗马。因此，罗马暂时保留安提柯王朝，从战略上看是可取的。

实际上，上述第二个考虑与后来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塞琉古王朝并不因罗马还保存马其顿王国而放松对罗马入侵者的警惕，也不认为罗马会从此满足于已订立的和约。安条克三世决心以西征的方式来援助菲利普五世，于是就开始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了长达4年的塞琉古王朝同罗马的战争(公元前192—前188年)。

安条克三世自恃军力强大,有轻敌思想,于公元前192年渡海攻入希腊境内。埃陀利亚同盟本来是倒向罗马人一边,反对马其顿王国的,一看形势变化,塞琉古王朝的军队既已进入希腊本土,便转而支持塞琉古王朝。菲利普五世则乘此机会,同塞琉古军队一起,向罗马人进攻。罗马急忙从意大利调来大军。埃陀利亚同盟虽然扼守亚得里亚海东岸,但苦于没有什么大型舰只,缺乏一支可以阻击罗马军队登陆希腊本土的舰队,①所以挡不住罗马增援部队的来到。结果,公元前189年,罗马军队同塞琉古军队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进行会战,塞琉古军队大败,退回本国。罗马军队还乘势击退了骚扰小亚细亚的北方游牧部落,赢得了小亚细亚境内希腊移民城市的好感。② 小亚细亚本来是归塞琉古王朝管辖的区域,这时它看到安条克三世战败,也就宣布脱离塞琉古王朝,倒向罗马一边。公元前188年,塞琉古王朝与罗马议和,罗马提出的条件是:塞琉古王朝撤出它所占领的色雷斯,放弃小亚细亚的主权。安条克三世答允了。隔了一年,即公元前187年,安条克三世去世。塞琉古四世继任塞琉古王朝的国王。他不敢再向马其顿派出援兵,因为他已经领教了罗马的强大。

---

① 参看舒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海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3页。

②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失败和塞琉古王朝援军的撤回，已经使安提柯王朝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战争耗尽了国库，安提柯王朝难以再进行同罗马的战争。菲利普五世于公元前179年去世，其子珀修斯继位，他是安提柯王朝的末代国王、亡国之君。珀修斯为了使安提柯王朝摆脱困境，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是派出使者到迦太基，向迦太基保证，只要两国联合打败了罗马，他一定同迦太基长期友好共处；二是向塞琉古王朝新国王塞琉古四世示好，娶塞琉古四世的女儿为妻，以便得到塞琉古王朝的支持；三是拉拢希腊城邦，要它们同马其顿站在一起，共同对抗罗马，因为那些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和在塞琉古王朝同罗马的战争中受到罗马军队掠夺的希腊城邦是痛恨罗马入侵者的。一时间珀修斯竟成了不少希腊人敬重的英雄人物，认为他担任了希腊世界新阶段的领导人角色。

但这只是普通希腊人的看法，而不是希腊城邦的看法，因为希腊城邦对于派兵参加抗击罗马的战争始终是心有畏惧的。在出兵方面支持珀修斯最为积极的，是希腊西北部两个过去被罗马严惩的国家，即伊利里亚王国和伊庇鲁斯王国。

罗马得知珀修斯准备向罗马反击的消息后，决定灭掉马其顿王国。公元前171年，罗马发动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历时4年，至公元前168年结束。这是马其顿同罗马之间的最后较量。马其顿动员全国力量，将29,000人投入战场，“比完成征服亚洲的安排时，亚历山大麾下的士兵还要多2,000人”①。然而罗马军队多达10万人。结果，罗马大军歼灭了马其顿军队，据说马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6页。

其顿适合服役的男人有一半阵亡了。[①] 罗马还破坏了马其顿境内的几十座城镇。国王珀修斯被俘，押解到意大利，他在那里备受虐待，两年后在幽禁中死于意大利，珀修斯的儿子流落于意大利，后来在一个小镇当了一名小办事员，收入微薄，勉强度生。[②]安提柯王朝灭亡。

罗马下令把马其顿划分为四个自治区。虽然自治区有自治权，但都必须向罗马纳贡。四个自治区之间禁止贸易往来。马其顿最后一个国王珀修斯被俘虏后，他的私人文件和书信都被查抄，罗马军队按文件和书信的记载，搜捕一切被认为有反罗马言行的马其顿官员，他们全被押解到意大利，长期关押，其中大部分被关押者死于意大利。马基顿境内一切有身份的人、贵族、官员都被驱逐出境。罗马认为，当整个国家没有上层阶级时，他们的影响也就消失了。[③]

伊利里亚和伊庇鲁斯这两个王国支持马其顿人最为积极，因此遭到罗马的报复也最严厉。两国大批被俘兵士和民众被卖为奴隶。仅伊庇鲁斯一国被变卖为奴隶的就有 15 万人之多，[④]以致意大利境内的奴隶价格大跌。劫后的伊庇鲁斯大片土地空无一人，原有的希腊文化荡然无存。[⑤]

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的各个城邦也遭到报复和惩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16 页。

②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562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558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书，第 558—559 页。

罚,因为在罗马看来,它们总是摇摆不定,一会儿亲罗马,反马其顿,一会儿又亲马其顿,反罗马。特别是在珀修斯继位后,这两个同盟都支持马其顿,所以罗马决定予以严惩。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被强制解散,阿卡亚的全部贵族也被强迫移民,安置于意大利各地。① 此后,罗马严禁希腊城邦再结成同盟。

公元前 168 年,即罗马消灭安提柯王朝这一年,罗马占领希腊这件事对希腊全境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这以前,希腊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地中海东部,希腊的注意力主要在东方,它不属于欧洲。当时的欧洲是指地中海西部而言,希腊一直置身于欧洲以外。但从这时起,希腊归罗马统治了,希腊也就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② 而且,从这时起,不仅罗马驻军于希腊,大批意大利商人也在罗马驻军保护下陆续来到希腊和希腊化世界,其中不少人还移居于希腊城市,从事商业工作。这同样对希腊经济发生有力的影响。③

也正是从公元前 168 年以后,罗马把自己的下一个征服对象放到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当时的塞琉古王朝的国王是安条克四世,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是托勒密六世,他们二人正在进行战争,旨在各自扩大疆土,根本顾不上安提柯王朝的生死存亡。战争中,塞琉古军队获胜,大军进入埃及境内,包围了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向罗马求救,罗马的

---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562 页。

②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247 页。

③ 参看同上。

意图是明显的：在这两个希腊化国家的争斗中，它不希望偏袒哪一方，更不愿意双方停止冲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罗马。而在两国之中，罗马又不愿意看到哪一个变得更强大，哪一方变得衰弱。[①] 因此，罗马采取的方针是尽可能协调两国的冲突，罗马派出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使团进行调停。[②] 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欢迎罗马使团的到来，并同使团会谈。结果，安条克四世自知军力不如罗马，同意从埃及撤军。从此，罗马的扩张越过了希腊本土，延伸到了西亚和北非。

公元前 149 年，马其顿人安德里斯克自称是安提柯王朝末代国王珀修斯的儿子(这时珀修斯去世已经 17 年了)，领导了反罗马的斗争。第二年，即公元前 148 年，希腊南部又发生了暴动。这些暴动都遭到罗马的镇压。从此，马其顿的自治地位被取消，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本土也并入马其顿行省。希腊城邦分治状态到此结束。

## 五、对安提柯王朝的总的评价

安提柯王朝从公元前 276 年建立时算起，到公元前 168 年被罗马共和国灭掉为止，一共存在了 108 年。如果把安提柯二世的祖父和父亲的统治时间也计算在内，至多也不过 150 年。对安提柯家族这些年的统治，总的评价如何？下面做一些分析。

首先应当指出，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领们为争夺继承权

---

① 参看比罗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国际关系"，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24 页。

② 参看同上。

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中，无论对西亚、小亚细亚、色雷斯、马其顿还是希腊本土都破坏严重，人员损失很大，生产力呈倒退之势。安提柯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作为分治的一方之主，经过多年的战争，终于把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平定下来，取代安提帕特势力，使马其顿和希腊本土从无序转入有序状态，使农业恢复生产，使商路变得通畅，也使城市逐渐繁荣。时间虽然不太长，但至少也有半个世纪之上(从公元前 276 年安提柯王朝建立到公元前 3 世纪末年)，这对于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是难能可贵的。如前所述，马其顿的城市化加快了，马其顿对希腊文化的接受程度比过去提高了，而希腊本土的大多数城邦，尤其是雅典、科林斯、提洛、罗得斯，经济发展迅速，又成为工商业、海运业兴旺的地区。这些事实是不容忽略的。这就是安提柯王朝的功绩。还应当注意到，安提柯王朝对待希腊人对外移民的政策是宽松的。随着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站住了脚跟和托勒密王朝在北非的基础巩固了，希腊人，包括手工业者、商人、知识界人士、农民还有雇佣兵，纷纷来到西亚、北非，他们的移居促进了西亚、北非的希腊化。要知道，亚历山大东征和随军而来到西亚、北非的希腊人，只是这一被征服地区的希腊人移居的开始，希腊化事业的推进有赖于安提柯王朝建立后大批希腊人的到来。这与安提柯王朝的宽松的移民政策是分不开的。

其次，二元政治体制是安提柯王朝的特色，在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都不存在类似的二元政治体制，而都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为什么安提柯王朝同那两个王朝不同？主要原因是：希腊本土城邦政治制度的影响长期存在。前面也多次提到，当初菲利普二世南下建立了他对希腊本土的控制地位以后，希

腊城邦顺从了马其顿王国，但菲利普二世一去世，希腊城邦又相继暴动，以至于亚历山大继位后出兵镇压了暴动，希腊城邦才又归顺了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人认为东征是摧毁希腊宿敌波斯帝国的战争，所以支持东征，亚历山大也把战利品回赠给除斯巴达以外（因斯巴达不合作）的希腊城邦。但亚历山大一死，希腊城邦仍照常起义，争取独立。亚历山大留驻马其顿的将领安提帕特率军平息了希腊人的起义。由此可见，民主和主权是希腊人历经数百年的传统，马其顿以强大兵力只能控制希腊于一时，只要中央的力量有所削弱，希腊城邦总会摆脱马其顿的统治。这一点已被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来的希腊本土的历史所证实。

安提柯二世建立王朝以后，采取了二元政治体制。这就是：马其顿是安提柯王朝的基地，首都设在这里，实行直属于安提柯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国王大权独揽，官员由国王任命；而对希腊城邦，则实行受中央节制的分权自治的体制。只要城邦不公开违抗中央，不树立独立的旗帜，不举兵反叛，安提柯王朝就不予干涉。比如，雅典曾经起义，安提柯王朝平息了起义，驻军于港区，并给予一定的惩罚，即不准雅典参加任何城邦同盟。

对于城邦同盟，如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安提柯王朝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逐渐发现这两个同盟有摆脱马其顿控制的倾向，但从大局出发，一直不做反应。它总打算息事宁人，维持二元政治体制不变，直到马其顿与罗马之间爆发战争。

安提柯王朝之所以这样做，固然与安提柯王朝本身实力不够强大有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懂得希腊人的理想、追求和愿望，要让希腊城邦在马其顿节制下实现一定自主权，才能以

较小的代价换得希腊本土的宁静。二元政治体制从安提柯王朝建立一直维持到它的灭亡。罗马人自持军力强大,终于取消了希腊本土的城邦自治制度。

再次,虽然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都是希腊化的王朝,都受到东方化的影响,但相形之下,安提柯王朝是三个王朝中东方化程度最低的一个。这主要表现于以下三点:

1. 自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他所推行的东方化表现于对君主的神化,即认为君主是神,是神的化身、神的儿子,让臣民像尊奉神一样地尊奉亚历山大本人。然而,在安提柯王朝,仍然依照亚历山大东征以前的马其顿王国传统和惯例,并不把国王尊奉为神。国王是人不是神,这是安提柯王朝的特色,也是它不同于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之处。

2. 亚历山大东征后所推行的东方化还表现于他搬用了东方的君主绝对专政的中央集权体制,君主的旨意就是法律,臣民必须服从,不容许违抗,也不容许怀疑或议论。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都是如此,安提柯王朝则不然。不能说安提柯王朝在这方面没有受到东方化影响,而是说,安提柯王朝更多地是受到马其顿自身的中央集权制的影响,国王虽有最高权威,但他是贵族集团中的一员,他是靠贵族集团的拥戴而登上王位的。贵族集团拥戴安提柯家族世代执政,是因为他们感到安提柯家族代表了马其顿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

3. 亚历山大东征后所推行的东方化也表现于他采纳了东方宫廷的一整套仪式,这些仪式带有深厚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使臣民感到君主的威严,感到君主有高不可攀的地位,从而必须俯首听命。这些仪式被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承袭了。安提

柯王朝仍坚持亚历山大东征前马其顿王国的传统和惯例:虽然中央集权,但不采取东方的仪式;虽然国王掌握大权,但没有给国王添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为什么安提柯王朝在三个希腊化王朝中的东方化程度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安提柯王朝统治地区是在马其顿本土和希腊本土,而不是像塞琉古王朝那样以西亚(甚至中亚)为统治地区,也不像托勒密王朝那样以埃及为统治地区。在安提柯王朝的统治地区中,马其顿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已经多年,而希腊本土则更是希腊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各个城邦不管它们选择的是平民派掌权的政府还是贵族派掌权的政府,全都坚持希腊的民主政治的传统、规则和程序,抵制僭主政治,这些都使安提柯王朝只能沿着菲利普二世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

最后,在对安提柯王朝做总的评价时,不能忽视安提柯王朝对希腊文化的传承所起的作用。这同安提柯王朝采取的文化宽容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安提柯王朝统治时期,即使在它兴盛阶段(安提柯二世临朝时),它不仅不干预雅典等城邦的繁荣学术和文化的活动,而且对于学术界人士的讲学、授徒等活动还予以提倡,它认为这是使这些希腊城邦安定和归顺的好办法。希腊历来的宗教活动、祭祀仪式、民众对传统节日的庆典,一直保存下来。学者有机会跨地区讲学,喜爱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人可以四处寻师求教。其结果,雅典依然是希腊文化中心,雅典是出思想家和出学者的基地。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也都把雅典视为希腊文化的发源地,从这里邀请学者到他们那里去讲学。关于这些,本书第十四章中将会有专门的论述。

那么，对于安提柯王朝的衰亡，应该怎样看待呢？

可以这样说，安提柯王朝的敌人罗马共和国太强大了，罗马的陆军和海军比马其顿强大得多。而安提柯王朝后来的几个国王，尤其是菲利普五世错误地估计形势，外交上有重大失误，加速了安提柯王朝衰亡。安提柯王朝外交上最大的失误就是同罗马共和国的宿敌迦太基结成联盟，企图东西夹击罗马，特别是乘汉尼拔率迦太基军队进入意大利境内，直逼罗马城之际，马其顿军队也渡海进入意大利。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惨败告终。罗马下决心非征服马其顿不可。于是马其顿一步步被罗马军队摧毁。当然，按照罗马元老院的设计，罗马共和国的向东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安提柯王朝又首当其冲，即使马其顿不同迦太基结盟，而始终保持中立地位，最终仍难免被罗马征服，但也许安提柯王朝的灭亡可能拖延一些年，而且结局可能不至于那么悲惨。包括雅典、科林斯在内的希腊城邦最终也难免被罗马统治，但同样不一定会落得后来那样的下场：希腊城邦自治制度最终烟消云散。

## 六、罗马占领后的希腊本土经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马其顿的大多数城镇被罗马军队摧毁了，马其顿的贵族、官员、知名人士被押送到意大利境内居住，安提柯王朝的末代国王珀修斯在意大利幽禁中死去，其家人流落于意大利小城镇。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关于马其顿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这里有必要做一些补充。

罗马统治马其顿并成立马其顿行省后，马其顿的青壮年已大量死亡，马其顿成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地区，而罗马的各种征

调又使马其顿的经济遭到极大破坏。[1] 不仅如此，在马其顿北部边境不断发生蛮族侵扰事件。公元前 2 世纪后期和公元前 1 世纪初期，蛮族经常越过马其顿北部边界，对马其顿的乡村和农民大肆劫掠。[2] 只有马其顿沿海城市情况才稍好一些。

罗马马其顿行省的省会设在帖萨罗尼卡，这里的破坏较少，人口较多，同外地的贸易开展得也比较顺利，一部分贸易掌握在某些有影响力的意大利商人手中。[3] 意大利商人涌入马其顿城市后，有助于马其顿从战争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也有利于巩固罗马在马其顿的统治。

下面再谈谈希腊本土的情况。

罗马占领希腊，把希腊本土并入马其顿行省后，为了装饰门面，象征性地保留了雅典、斯巴达、特尔菲三个城市的自治权，实际上这些城市的自治权非常有限，一切大事都必须听命于罗马直接任命的马其顿行省的行政长官，它们绝对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希腊城邦，甚至连安提柯王朝下的希腊城邦都远远不及。这是因为，城市所辖地区划入罗马设置的行省之后，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宪法、法律和自治权，而且税收也直接缴付给罗马，其中包括农民缴纳的地租或土地税等等。[4] 此外，罗马当局还有权以任何方式处置土地，包括把原来属于城邦或个人的土地拿去赏赐给罗马当局所看中的人。[5] 要知道，希腊各个城邦自建立之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58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759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 748—749 页。

⑤ 参看同上。

日起，就十分珍视城邦对于本城邦城乡土地的处置权，即本城邦的土地归本城邦的公民拥有，任何官员都不得动用属于公民的地，也不得把某一公民的土地授予他人。这一传统或惯例在罗马建立行省之后消失得干干净净。

罗马行省的行政长官就是省内各个城市的主宰，他们"有权染指希腊的所有事务"①。希腊中上层阶级人士，只要他们听从罗马行政当局的命令，经商、经营手工业的个人自由还是有保证的，因为罗马不愿看到一个萧条的希腊本土经济，那对罗马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希腊下层社会的遭遇则大不相同了。在过去，不管希腊城邦内部贵族派和平民派斗争得多么激烈，但下层社会的大众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有可能取代贵族派而实行平民派的执政，让穷人多少改善自己的处境。但罗马占领后，情况变了，"无产者不再被看成是一支政治力量，从而被时代的主人所忽视"②。同时，由于廉价奴隶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多，穷人寻找工作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了。廉价奴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则同海盗的再度猖獗和提洛岛奴隶贩运业的兴盛有关。虽然奴隶的主要销售地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利用奴隶种植的大地产比希腊多，大地产的面积比希腊大，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的企业主比希腊的企业主富裕得多。但不管怎样，总有一些奴隶是销往希腊本土的，这就促成了希腊劳动力供给增加。③ 公元前 134—前 133 年和公元前 104—前 100 年，在希腊的阿提卡

---

①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57 页。

②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56 页。

③ 参看同上。

就发生过两次奴隶暴动，这可以看成是奴隶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的普遍恶化所导致的。①

下面，再分区域谈一下罗马占领后安提柯王朝原来统治的希腊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

雅典：总的说来，罗马占领后，雅典城邦自治结束了，虽然罗马还给了雅典有限的自治权，但正如前面所说，那只是象征性的形式而已。从经济上说，雅典仍然是繁荣的。一方面，在罗马的统治下，商路是通畅的，城区的社会秩序也逐渐正常了，意大利商人、西亚和北非的商人都来到雅典，寻找发财的机会。来到雅典（和其他一些希腊本土城市）的，除意大利的商人而外，还有意大利的农民或经营农业的企业主。他们以较低的价格买下土地，经营葡萄园、橄榄园和菜园，生产葡萄酒、橄榄油和蔬菜，运往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等地。另一方面，罗马送给雅典一件“礼物”，就是把提洛岛划归雅典管辖，提洛由于实行免关税制度，奴隶贸易又很兴旺，所以提洛划归雅典管辖，雅典和提洛都受益。② 加之，由于科林斯遭到罗马摧毁，雅典少了一个有力的商业竞争对手，所以雅典得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商业繁荣。③ 对雅典商人来说，政治上的自由比过去少多了，但只要有生意可做，有钱可赚，他们也就满足了。

斯巴达：与亚历山大对斯巴达的态度不同，在亚历山大统治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56—757 页。

②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253 页。

③ 参看同上。

时期，它一直把斯巴达看成是有可能对它产生威胁的潜在对手，所以排斥斯巴达，打击斯巴达。安提柯王朝基本上同亚历山大时期一样，冷落斯巴达，而看重阿卡亚和阿卡亚同盟。罗马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同原阿卡亚同盟的各城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因为阿卡亚同盟时而亲马其顿，时而反马其顿，最后则同马其顿末代国王柏修斯站在一起反对罗马。罗马俘获了珀修斯，押送他到意大利之后，着手严惩阿卡亚等城邦，解散阿卡亚同盟，相形之下却宽待斯巴达人，因为在马其顿战争中，斯巴达一直持中立态度。①

此后，罗马决定把斯巴达作为一个旅游观光的城市，以显示斯巴达文化的特色。② 斯巴达依然同过去相似，是一个农业城邦，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但经过自从公元前 4 世纪晚期以来多年的折腾，包括改革的尝试和改革的失败，阿卡亚同盟军队的入侵和斯巴达的自卫反击，斯巴达的社会结构改变了。皮里阿西人（即边民）的城镇再也看不到了，连斯巴达平原上也不再有任何黑劳士了，他们全都获得解放。③ 斯巴达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严格地说，这里已经是罗马人的斯巴达了”④。

科林斯：作为一个工商业城邦，科林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以前的较长时间内同罗马保持较好的关系，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科林斯来说，同罗马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有利于开拓地中海

---

① 参看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32—233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233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234 页。

④ 同上。

西部的市场；对罗马来说，通过科林斯商人的中介，可以得到东方的商品。当公元前 229 年罗马为肃清地中海上的海盗而征服海盗的同伙伊利里亚王国时，科林斯是为此而欢呼的，它称罗马是"解放者"，因为罗马维护了海上的安全，保护了进行东西方贸易的商人。

科林斯和罗马之间关系的恶化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这时，安提柯王朝已摇摇欲坠，马其顿末代国王珀修斯居于劣势，仍想恢复其祖辈的事业，联合希腊城邦，反击罗马入侵者。科林斯居于连接希腊南北的险要地带，罗马和马其顿都希望科林斯站在自己一边，科林斯举棋不定。公元前 171 年，罗马发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于公元前 168 年大败马其顿联军，珀修斯被俘，安提柯王朝亡。阿卡亚同盟因对珀修斯公开支持，其领导人或被逮捕，或被流放。科林斯此时是阿卡亚同盟的成员之一，处于惊恐之中。

公元前 149 年，马其顿反罗马统治的战争失利，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各城邦直接受到罗马行政长官的统治。科林斯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代表上层，主张亲罗马，顺从罗马统治当局；另一派代表平民，主张反罗马，拒绝服从罗马统治当局。公元前 148 年，科林斯政局变动，反罗马的、带有极端主义情绪的平民派上台，[①]实行废除债务，释放负债人出狱，令富户捐钱充实国库，重新分配土地，释放奴隶等措施，城市中主张亲罗马的人纷纷外逃。罗马极其愤怒，出兵攻占了科林斯，并对全城大肆抢

① 据说，并非科林斯一城如此，原阿卡亚同盟各城邦都这样。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69 页。

劫，店铺被洗劫一空，城市也被焚毁。被俘的科林斯人中，男子全被杀害，妇女儿童全被变卖为奴，所有的财富和艺术品一律运回罗马。①

罗马为什么只摧毁了科林斯而没有对原阿卡亚同盟的其他城邦下手，显然具有警告性质，即以后再有哪个城邦效法科林斯，就会遭到同样的惩罚。从此，劫后的科林斯的繁华中断了一百多年，直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临朝才使科林斯的经济有所恢复，又过了一段时期，科林斯又成了兴旺的商港和货物集散地。②

在爱琴海的各个岛屿上，除了提洛和罗得斯等少数岛屿经济繁荣如旧外，许多岛屿都衰落了，它们大多数人烟稀少，经济萧条，“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山岩”③。

叙拉古：叙拉古不在希腊本土，而是由希腊移民在西西里岛东部建立的一个城邦。但它的兴衰同希腊本土有密切的关系。

安提柯王朝建立之初，国力较强，除了控制希腊本土各个城邦以外，叙拉古也归顺了安提柯王朝。这是因为，西西里岛的西部由迦太基管辖，迦太基一直想占领西西里全岛，赶走东部的希腊人，叙拉古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寻找一个保护人。由于叙拉古城邦的母邦是科林斯，所以安提柯王朝便充当了希腊化时期叙拉古的后盾的角色。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69 页。

②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42 页。

③ J. W.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21 页。

叙拉古国王海厄洛二世即位于公元前270年，死于公元前216年，执政54年。他虽是一个独裁者，但在他执政期间经济比较繁荣，社会也比较稳定，因为他一方面依靠安提柯王朝，另一方面又交好于罗马，同罗马一起抵抗迦太基，而且当时安提柯王朝与罗马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彼此相安无事。

第一次布匿战争于公元前241年结束，迦太基失败，退出了西西里岛。罗马占领了全部西西里，并把西西里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但罗马仍然允许包括叙拉古在内的希腊移民城邦有自治权：只要它们遵守约定，不支持迦太基，不反对罗马，就一直享有自治地位。叙拉古商人照常在海运和商业方面十分活跃。

情况的变化发生于公元前221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继位之时，他担心罗马势力会进一步扩张，便同迦太基结盟，东西夹击罗马。叙拉古国王海厄洛二世在公元前216年去世之前，曾有意放弃独裁政体，恢复民主政治。其女儿不愿意，海厄洛二世只好传给外孙海厄洛尼姆斯。海厄洛尼姆斯继位后，抛弃了其父亲一贯奉行的亲罗马政策，同迦太基结好，甚至想让叙拉古归附于迦太基人，于是触怒了罗马。

第二次布匿战争于公元前202年结束，迦太基惨败。罗马人为了报复，紧接着于公元前200年发动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菲利普五世战败乞和，放弃了除马其顿本土以外的全部地区。罗马人也就顺势取消了叙拉古的自治权，没收了叙拉古的土地，它的大部分地区并入了西西里行省。①

---

①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323—前30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年，第164页。

罗马占领叙拉古以后，开始时仍保留希腊文化，包括希腊语的使用，大约过了一百多年才加速推行罗马化。[1] 严格地说，拉丁语的使用和推广开始于奥古斯都在西西里建立罗马人移民区以后。罗马人向西西里的移民引起当地居民结构的改变。从此，罗马文化在西西里的影响增大了，拉丁语的使用范围也渐渐扩大了。[2] 然而，由于希腊移民城邦在西西里的建立到奥古斯都时期已经六七百年甚至更久，这一罗马化过程依然是缓慢的，在公元一世纪时，在西西里仍普遍使用希腊语。[3] 至今发现的罗马时期叙拉古的碑铭中，极大部分仍是希腊文的，不过一些荣誉性的铭文和建筑物上的铭文则主要是拉丁文的。[4]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叙拉古地区的碑铭主要还是希腊文的。可是希腊文化对叙拉古的影响不可忽视。[5]

安提柯王朝亡了，马其顿王国消失了，马其顿和希腊各个城邦屈从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了，这既使得马其顿人、希腊人感到沮丧，也使得罗马人感到骄傲。

希腊人之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希腊人引以自

---

① 参看科洛能："罗马叙拉古希腊语与拉丁语地位不相等的三个案例"，载奥斯顿费尔德编：《希腊的罗马人和罗马的希腊人：文化相互作用研究》，阿鲁斯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0—71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70 页。

③ 参看奥斯顿费尔德编：《希腊的罗马人和罗马的希腊人：文化相互作用研究》，导言，阿鲁斯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1 页。

④ 参看科洛能："罗马叙拉古希腊语与拉丁语地位不相等的三个案例"，载奥斯顿费尔德编：《希腊的罗马人和罗马的希腊人：文化相互作用研究》，阿鲁斯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5 页。

⑤ 参看同上。

豪的城邦制度终于宣告结束，他们不愿回顾这一过程，因为往事只会引起失望和绝望。城邦之间的攻战，彼此削弱，社会矛盾尖锐，人心逐渐涣散，这就造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不堪回首的局面。从菲利普二世南下，到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去世后的混乱，再到安提柯王朝的建立，最后到罗马人的占领，城邦自治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希腊人不能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称雄于地中海世界？为什么民主政体本来是一有生气、有活力、得到公民支持的政体，却最后导致了派系倾轧，社会动荡，对外则一再失败，国破家亡？"战场上的较量，让战争的双方把胜负与自己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①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的政治制度击败了希腊城邦制度、希腊民主政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这已经是往事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战胜了马其顿王国，而且连希腊城邦自治的政体也被一扫而空。罗马人认为"民主政治意味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②，希腊人自身也感到民主政治尤其是平民极端派的执政值得反思。从此，希腊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起当年民主政治的成就和功绩了。

罗马人之所以感到骄傲，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大一统造成了军事上的优势和所向无敌的作战能力，也认为自己的共和制造成了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是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击败了北方蛮族的入侵，消灭了宿敌迦太基，占领了马其顿和希腊各个城邦，还把前哨阵地伸进了小亚细亚。罗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把至今仍

① 魏凤莲：《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近现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② 同上。

盘踞于西亚的塞琉古王朝和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视为必取的目标。在罗马人把马其顿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官员、名流押解到意大利半岛居住时,谁能想到一百年以后罗马共和制就被取代,罗马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呢?更没有人会想到罗马帝国过了三百多年以后会分裂,罗马军队不堪来自北方的蛮族的攻击,而让帝国的西部地区变成蛮族的天下呢?

骄傲,只是暂时的。引以自豪的东西并不能永远存在。罗马人在灭掉安提柯王朝时还不可能懂得这个道理。

# 第十二章　塞琉古王朝

## 第一节　塞琉古王朝的兴起

### 一、塞琉古王朝的特色

塞琉古王朝是这样一个王朝：

第一，它是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分治的产物。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对西亚的征服和波斯帝国的灭亡，没有马其顿帝国的解体和群雄的征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所占的面积最大，最为富庶，而且民族构成最复杂。

第二，它是马其顿人—希腊人统治的国家、一个希腊化的王国。它的创建者塞琉古原是亚历山大手下的大将，亚历山大去世时担任巴比伦总督，率领重兵驻防于巴比伦一带。塞琉古就是马其顿人。朝中的高级军政人员都是当初跟随亚历山大东征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如果没有这样一批追随者，塞琉古王朝不仅不可能建立，而且在建立之后不可能维持二百多年。与安提柯王朝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这就是：在安提柯王朝，由于马其顿王国的根据地是马其顿本土，希腊各个城邦是从属于马其顿王国的，要受到马其顿政府的管辖，所以希腊人同马其顿人之间

总是存在着某些隔阂,希腊人往往并不认同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不存在这种情况。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身处西亚,这里到处都是西亚居民,马其顿人少,希腊人较多,他们同说希腊语,文化相近,所以紧密地站在一起了。也只能如此,马其顿人—希腊人才不至于孤独无援。无怪乎塞琉古王朝历代国王“都自称是‘亲希腊派’,并且在政策与军事需要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与旧希腊的城市保持着友好”①。

第三,它是一个以希腊文化为主,但又吸纳了较多东方文化的国家,是一个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交融的社会。马其顿帝国解体后陆续建立的三个希腊化国家或王朝中,前面已经提到,安提柯王朝的东方化程度最低。相形之下,塞琉古王朝的东方化程度最高,托勒密王朝居中,并另有自身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塞琉古王朝的东方化程度之所以最高,一是由于这里原是波斯帝国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区,塞琉古王朝正是在波斯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二是东方文化更适合于国王专政和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塞琉古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有必要更多地采纳东方的政治制度。但这并不否定在城市建设和治理方面塞琉古王朝保留了许多希腊式城市的风格,以至于“叙利亚北部作为塞琉古王国的中心地区,几乎成为第二个马其顿”②。此外,这里也可以说是亚历山大帝国中希腊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们普遍

---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88页。

②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王新刚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页。

使用希腊语，新建的建筑物一律是希腊式的。[①] 希腊化的叙利亚人全都忠于塞琉古王室，这里从未发生过反对塞琉古王朝的行动。[②]

第四，在亚历山大后继者开创的三个希腊化王朝中，塞琉古王朝可能是马其顿人同当地土著妇女结婚人数最多的一个王朝。要知道，留在塞琉古王朝的马其顿军人并不很多。亚历山大死后留在亚洲的马其顿兵士不会超过25,000人。[③] 其中一部分兵士稍后返回马其顿，投入安提帕特等将领的麾下。[④] 从公元前321年以后，马其顿移民来到亚洲的很少，马其顿妇女更少。因此，塞琉古王朝建立后就让这些马其顿人早日与亚洲女子结婚成家，以便让他们安心留在塞琉古王朝服役。[⑤] 此后二百多年内，在塞琉古王朝服役的马其顿兵士实际上都是混血儿和混血儿的后代。[⑥] 其实，在塞琉古王朝，不仅马其顿兵士如此，连王室本身也这样。塞琉古王室都有同波斯女子通婚的惯例：不仅塞琉古一世有波斯籍的妻子，而且后来的塞琉古王族也都有波斯籍的王族系统的妻子。[⑦] 于是塞琉古王族就有了半波斯血统，这被认为是有利于土著的归顺的做法。[⑧] 在安提柯王

---

①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97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年，第154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

⑦ 参看同上书，第87页。

⑧ 参看同上。

朝和托勒密王朝都看不到类似的情况。

第五,在塞琉古王朝有效管辖的地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界限是明显的,或者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很突出。希腊文化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和城市,东方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下层社会,以及农村、内地、边远地区特别是原波斯帝国的东部一带。两种文化的融合,则主要反映于中层社会,以及城乡接合部。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影响,不仅反映于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也反映于学校教育、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方面。不过在塞琉古王朝各地仍可以发现上述这些方面两种文化交融的现象。这应被看成是亚历山大的功绩,因为是他开了先例。[①] 在马其顿人、希腊人、西亚土著居民共存的环境中,尽管塞琉古国王和他周围的显贵、地方上有权势的官员、上层社会的重要人物都是马其顿人、希腊人,基层的官员则多半由西亚本地人担任,下层社会大众几乎全是西亚本地人,但在塞琉古王朝的法律上并没有对不同族群的歧视。[②] 这样,在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是由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以前它从未出现于东方世界,也从未出现于希腊世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在马其顿帝国解体后所形成的三个希腊化王朝中,塞琉古王朝最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安提柯王朝保留了较多的古典希腊晚期的特征,东方文化的影响较少,而托勒密王朝(正如本

---

① 参看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 4 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 年,第 224 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070 页。

书下一章所要论述的）还保留了较浓厚的古代埃及文化和传统，塞琉古王朝则是希腊文化和以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文化并存并且相互渗透的例子。

## 二、塞琉古王朝的建立

塞琉古王朝究竟建立于什么时候，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一种说法是公元前 312 年，即创立者塞琉古（后称塞琉古一世）返回巴比伦城，以此作为驻节地之时，这就是塞琉古王朝确立的年份。① 另一种说法是在公元前 302—前 301 年，即塞琉古和托勒密联手在伊普索战役中击败安提柯，夺取了小亚细亚，巩固了在西亚的统治的年份。② 还有一种说法：塞琉古王朝建立于公元前 305 年，因为塞琉古自公元前 311 年到前 305 年任总督，自公元前 305 年起任国王，称塞琉古一世。③

不管学者们在塞琉古王朝建立的年代上有什么分歧，但大家都确认公元前 302—前 301 年的伊普索战役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决定了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三个王朝并立格局的形成”④。但弗格森在所著《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塞琉古诸王把他们王朝建立的时间定在塞琉古返回巴比伦的公元前 312 年。”⑤他还认为，“关于他们的帝国是在伊普索之役后才建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00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523 页。

④ 参看本书，第 637—638 页。

⑤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00 页。

立的看法，仍有许多需要讨论之处”①。

关于弗格森的说法，可以做一些探讨。假定以公元前312年为塞琉古王朝建立之时，那么塞琉古王朝初建时的领土是不大的，因为当时塞琉古作为总督，主要占据两河流域以东和巴比伦城一带。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是塞琉古同托勒密争夺不已的战场。安提柯既想争夺叙利亚，更想从他所控制的小亚细亚南下，夺取巴比伦。关于小亚细亚的情况，这里可以做些说明。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和南海岸，很早就有希腊移民城邦和希腊殖民地。小亚细亚北部，即黑海南岸地区，也很早就有希腊移民城邦和希腊殖民地了。但所有这些希腊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从没有移民于小亚细亚腹地。他们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打算，或者他们还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样，在远离黑海海岸和地中海海岸的小亚细亚腹地，始终由非希腊人居住。② 这一大片被称为小亚细亚腹地的地区，长时期内归波斯帝国统治。在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只是名义上替代波斯帝国接管这块土地，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法，更没有实施过有效的统治。③ 亚历山大死后的继承战争中，小亚细亚(包括地中海沿岸地区、黑海沿岸地区和腹地)都是将领们争夺之地，但谁都没有解决腹地的管理问题。④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难题。马其顿帝国解体后一度统治过小亚细亚的莱西马库斯和安提柯，也都无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0页。

② 参看米列塔:“国王和他的土地:关于希腊化小亚细亚王室土地的若干看法”，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157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法解决。这里没有城市，没有希腊化，依然保存着过去的社会结构。[①] 无论怎么说，伊普索战役中安提柯的失败，使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小亚细亚腹地，转到了塞琉古王朝手中。至于如何治理小亚细亚腹地，依旧是一个难题。

重要的是，伊普索战役之后，叙利亚终于归属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对巴比伦一带的统治也就巩固下来。因此弗格森的意见，即把公元前 312 年视为塞琉古王朝建立的年份，未免太早了。可以说，塞琉古称国王是公元前 305 年，而公元前 302—前 301 年，则是塞琉古王朝疆域大致上确定的年代，也就是塞琉古王朝强盛时期开始的年份。真正的塞琉古王朝的有效统治，还是应当从伊普索战役（公元前 302—前 301 年）以后算起。

### 三、塞琉古王朝的强盛

伊普索战役之后，塞琉古王朝转入巩固和强盛阶段，因为安提柯余部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托勒密虽然也是胜利的一方，但担心战线太长，战场距埃及过远，也有收兵之意。西亚便成为塞琉古王朝独霸的领土。

塞琉古王朝的创建者塞琉古称塞琉古一世。在他执政期间，国力最强，版图最大。这时归塞琉古王朝管辖的疆土，北抵黑海海边，西达地中海东岸，东到印度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阿富汗、中亚细亚南部地区，都在塞琉古王朝管辖领域之内。博斯普鲁斯海峡西面的拜占庭，也归塞

---

① 参看米列塔："国王和他的土地：关于希腊化小亚细亚王室土地的若干看法"，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158 页。

琉古王朝统治。后来,塞琉古王朝为了收缩战线,同印度孔雀王朝媾和,退出了印度河地区,把东部边界线巩固在今伊朗和阿富汗境内。中亚细亚南部地区仍在塞琉古王朝管辖之中,只不过中央的管理比较松弛。

塞琉古一世仿效亚历山大,在塞琉古王朝境内大建城市。他的目的同亚历山大一样,新建城市一是为了弘扬希腊文化,二是为了巩固自己在西亚的统治。第二个目的更加重要,因为可以在新建城市内或周围常驻卫戍部队,以保一方安宁。① 这一做法后来也被罗马人仿效,他们也在新征服的地区建立移民城市。②

塞琉古一世建了多少城市?没有精确的统计。据说,他建立了 16 座以他父亲安条克命名的城市,5 座以他的母亲拉奥迪西亚命名的城市,9 座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塞琉西亚,4 座以他的后妃命名的城市。③ 他还新建了其他一些以希腊城市或马其顿命名的城市。④ 所有这些新建的城市,从公共建筑、城市规划到学校的课程,都同希腊的城市一样,这都是为了维持希腊的文化传统。⑤

在选择地方各省的总督时,亚历山大一贯的做法是以是否忠诚于他本人为标准,所以除了考虑马其顿人、希腊人以外,波

---

① 参看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45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斯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 年,第 16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斯贵族也在考虑之列。[①] 塞琉古王朝承袭了这一用人原则，而且越往东走，越要考虑波斯帝国的旧官员，以便统治该地区。[②]

新建的希腊式城市是否采取希腊传统的自治制度，塞琉古一世是有考虑的。他认为，既然这些新建的希腊式城市将来要成为巩固塞琉古王朝统治的基地，所以不能仅仅赋予它们以希腊城市的外观，而应当使它们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那就容许它们自治。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新建的希腊式城市都必须听命于塞琉古王朝，而不能演变为反塞琉古王朝的势力的聚集点和活动中心，它们的自治权需要有一定的限度。塞琉古王朝正是这么做的。在原有的希腊移民城邦的自治权方面，塞琉古王朝也想给予限制，甚至一度想取消这种民主权利。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拜占庭。要知道，小亚细亚西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很早就存在希腊移民城邦，它们都是自治的。拜占庭虽然处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但也属于小亚细亚希腊自治城邦之列。塞琉古王朝本来想取消包括拜占庭在内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和北海岸的希腊移民城邦的自治权，正在这时，即公元前 278 年，即塞琉古一世死后不久，北方的蛮族加拉太人侵入拜占庭境内，大肆掠夺，拜占庭不能不到处求援。接着，加拉太人试图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给塞琉古王朝很大威胁。[③] 新国王是塞琉古王朝创建人塞琉古一世之子安条克一世，他为了安抚小

---

① 参看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37—238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238、276—277 页。

③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1—22 页。

亚细亚的民众,改变了原来预定的取消小亚细亚一些城市自治权的计划。也就是说,对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邦来说,加拉太人的入侵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①

一般认为,塞琉古王朝先后有两个都城:先是在塞琉西亚,后是在安条克。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安条克后来成为首都,这是对的。但早期的首都不止一处:塞琉西亚和阿克巴特那都是都城,而且苏撒的原波斯王宫和那里的行政设施也继续得到利用。② 无论是塞琉西亚还是安条克,都是以希腊移民为主的新建城市,都是繁华的商业中心。这里所说的塞琉西亚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交汇点附近,距离巴比伦城不远,距离后来的巴格达城也不远。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很适宜于商业的发展,因为它的航运条件好,顺河流南下波斯湾,便于同外国通商。这里所说的安条克位于奥龙特斯河上,离河口不远,是通往叙利亚北部和直下地中海的商路中心。后来的塞琉古国王们都住在安条克。所以中国史书上把塞琉古王朝及其首都安条克称为条支。③

塞琉西亚和安条克是当时世界各国商人的聚居地,也是当时西亚最繁华的两座城市。各有几十万人口。城内建有宫殿、神庙、广场、剧院、竞技场、公园和林荫大道。希腊文化色彩浓厚,希腊本土的手工业者向往这两个城市,前来定居、开业,希腊

---

①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2 页。

② 参看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黄民兴著,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53 页。

③ 参看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19—123 页。

本土的学者也乐意在此讲学、研究。

塞琉古一世于公元前 281 年遭人暗杀身亡，其子继位，称安条克一世（公元前 280—前 261 年）。安条克一世的母亲是原波斯帝国贵族斯皮塔米尼斯的女儿阿帕美，她和塞琉古是在亚历山大主持的马其顿军人同波斯女子的盛大婚礼上成亲的。[①] 所以安条克一世是一个混血儿。安条克一世以后的一些国王继续尊重这一传统，同波斯王族成员联姻，“从而加强了政治合法性”[②]。

安条克一世不是一个治国之君，[③]他酗酒成性，不理朝政，宫廷阴谋不绝，一部分领土被外国占领。以后的三位国王，即安条克二世（公元前 261—前 247 年）、塞琉古二世（公元前 247—前 226 年）、塞琉古三世（公元前 226—前 223 年），也都是平庸之辈，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段时间发生的几件大事是：

其一，安条克二世去世后，小亚细亚的形势发生变化，小亚细亚腹地实际上独立了，塞琉古王朝失去了对小亚细亚的统治。[④]

其二，正如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将会提到的，塞琉古王朝在中亚细亚南部和伊朗高原北部的一些地方割据形势已经形成，塞琉古王朝对此无可奈何，只得任其存在。

---

① 参看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117 页。

②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黄民兴著，商务印书馆，2002 年。

③ 塞琉古一世在位时，安条克在其父领导下工作相当出色，如在王国东部地区和小亚细亚新建希腊式城市。（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05 页）

④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05 页。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安提柯王朝之间为争夺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海上霸权，以及为了争夺叙利亚，连续发生了五次叙利亚战争。这是影响塞琉古国运的一件大事。

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76—前 272 年。这时，安条克一世刚登位不久。战争起因是托勒密王朝的军队乘塞琉古王朝忙于巩固在小亚细亚的统治之机，侵占了叙利亚南部和地中海东海岸部分地区。安条克一世为夺回失地，便同托勒密王朝开战。但托勒密王朝在军事上占优势，塞琉古军队未能如愿。

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61—前 255 年。这时安条克一世已去世，安条克二世刚登位。为了报第一次叙利亚战争期间塞琉古军队被击败之仇，塞琉古新国王安条克二世便联合安提柯王朝共同对托勒密王朝作战。海上，安提柯王朝的舰队击败了托勒密王朝的舰队，取得了爱琴海的海上霸权。陆上，塞琉古王朝的军队终于收复了失去的爱琴海东岸的一些领土。但由于后方空虚，小亚细亚内陆地区摆脱了塞琉古王朝的控制，实际上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

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46—前 241 年。这时安条克二世已去世，塞琉古二世继位。塞琉古二世继位后，因宫廷斗争不止，有些企图夺取王位的人便充当托勒密王朝的内应，所以战争初期塞琉古军队节节败退，托勒密军队不仅占领了叙利亚，而且还进入两河流域。稍后塞琉古二世率军反攻，击退了托勒密军队。但安提柯王朝则乘此机会在小亚细亚沿岸和爱琴海上击败塞琉古军队。塞琉古王朝依然处于困境之中。

第四次叙利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21—前 217 年。这时，塞琉古二世去世不久，塞琉古三世继位才四年又被安条克三世夺走王位(公元前 223—前 187 年)。安条克三世是塞琉古王朝一位有作为的国王，在他执政期间，塞琉古王朝又强盛了。他先同托勒密王朝交战，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中获胜。同时他念念不忘希腊世界，他用兵伯罗奔尼撒半岛，同安提柯王朝争夺对希腊的控制权。

第五次叙利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01—前 195 年。这仍然是安条克三世在位期间。塞琉古王朝依旧取得胜利，陆续收回自塞琉古一世后历年所丧失的领土。

此外，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与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之间，即公元前 208 年，安条克三世为了重振塞琉古王朝，仿效亚历山大大帝实行东征，带兵攻打中亚细亚和印度，取得胜利。到公元前 2 世纪初年，塞琉古王朝又成为西亚的强国。

为什么争夺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的战争多次发生？这是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的。从政治上说，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是战略要地，谁控制了这些地方，北可以直通小亚细亚，抵达黑海沿岸，由此转向西部，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可以进入色雷斯和马其顿；南可以到达巴勒斯坦，进入埃及，并可以通过埃及，把利比亚、迦太基列入控制在内；向东，则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细亚和印度都是通向的目标。叙利亚处于地中海东岸，只要占领了叙利亚沿岸，并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不仅可以称雄于爱琴海上，还可以控制希腊本土，再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所以，塞琉古王朝必须牢牢保住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而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也看中了这块地方，它们认为，塞琉

古作为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亚历山大临终时，本来只担任巴比伦的总督，能拥有两河流域及其以东的伊朗高原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为什么要扩张到叙利亚沿岸地区呢？塞琉古王朝有波斯湾作为海上通道就够了，凭什么还要插足于地中海一带呢？这就是三个王朝为夺取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而一再爆发战争的政治方面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经济原因。这一地区是地中海航线的起始点或终点，谁夺得这一地区就可以控制商路，把北通黑海，南到尼罗河入海口，西到希腊本土各个港口，再往西直达罗马、迦太基沿岸都包括在内，从而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① 不仅如此，谁夺得这一地区，谁就有可能控制希腊本土各个城邦，于是可以在人力资源方面得到充足的供应，包括从希腊本土招到雇佣兵（无论是希腊本土的中部、北部和西部，还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二三百年来都是强悍善战的雇佣兵的故土），以及吸收能工巧匠前去，甚至可以在引进的希腊移民中得到希腊籍的行政管理人员，②这些都是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所急需补充的。各国正是从经济上考虑，终于使得争夺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之战不可避免。

安条克三世在位长达 36 年，从公元前 223 年到公元前 187 年。在他执政期间，塞琉古王朝再度强盛了。但也是在他执政时，由于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误，导致塞琉古王朝同罗马共和国的宿敌迦太基结盟，从而同罗马共和国发生正面冲突，导致塞琉古

---

①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第 266 页。

② 参看同上。

王朝大败，塞琉古王朝从此由盛转衰。这是公元前190年的事情，留在本章第三节“塞琉古王朝的衰亡”中再加以评述。

## 四、塞琉古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

从政治体制上分析，塞琉古王朝无疑是一个东方色彩十分浓厚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国王高高在上，独揽大权，并且在宫廷仪式中吸收了原波斯帝国的许多做法，国王的权力被认为来自神授，国王本人就是神的化身、神的传人。国王绝对专制，不受任何民选代表的制约，而且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民选的机构。塞琉古王朝之所以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同所处的环境有关。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前的千百年来，这里一直由东方式的巴比伦、赫梯、吕底亚、新巴比伦等国家统治，它们全都是国王绝对专制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建立以后，后者把专制制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是使自己神化。例如，当阿黑门尼德王朝创建者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后，就公布了以巴比伦语写成的致巴比伦人的告示，上面写道：“我是居鲁士、宇宙之王、伟大的王、强有力的王、巴比伦王、苏美尔王、阿卡德王、天下四方之王……”[①]接着，告示中写出了他是神派来治理人间的：“他的统治为贝勒（神）与那波（神）喜爱，他的权力为他们衷心喜爱。”[②]塞琉古一世建立自己的王朝后，为了巩固统治，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古老的东方政治传统。

然而，塞琉古一世毕竟不是西亚人，他周围的将领和高官也

---

①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61页。

② 同上。

不是西亚人，而是马其顿人，追随他的还有很多希腊人。在东方专制帝国的西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并能长久存在的国家，仅靠“神的意志”或“神的指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塞琉古一世除了完善亚历山大时期修建的希腊式城市之外，还新建了数十座希腊式城市。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这些老的、新的希腊式城市不仅有传播希腊文化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凝聚马其顿人、希腊人，巩固塞琉古王朝统治的作用。这些都是在塞琉古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下的希腊式城市，不同于安提柯王朝二元政治体制下的希腊本土各城邦的体制。区别在于：在安提柯王朝的二元政治体制之下，希腊本土城邦既被赋予了自治权，同时还拥有较大的自主性，这些城邦以不违背安提柯王朝的命令和不摆脱安提柯王朝而谋求独立为前提，否则就会遭到安提柯王朝的镇压。希腊城邦可以组成同盟（如埃伦利亚同盟、阿卡亚同盟等），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并服从城邦的命令（如阿卡亚同盟的联军攻打斯巴达，以及占领过科林斯）。更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各个城邦实际上并不认同马其顿，不认同安提柯王朝。可以用“若即若离”四个字来形容希腊各个城邦同马其顿王国之间的关系。

然而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式城市的情况却不一样。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式城市处于西亚，有的甚至远到中亚细亚，它们好像一座座孤岛那样处于当地土著居民的海洋之中。塞琉古王朝帮助这些希腊式城市，也给予它们一定的自治权。尽管它们的自治权和自主性都是有限的，但它们认同塞琉古王朝，它们首先想到的是：它们是希腊人的集居地，是希腊文化的中心，它们不认同塞琉古王朝还能认同谁？塞琉古王朝需要这些希腊式城市，这

些希腊式城市也需要塞琉古王朝。因此，在塞琉古王朝不存在像安提柯王朝那样的二元政治体制，它存在的是中央集权体制，希腊式城市是从属于塞琉古王朝中央政府的。

塞琉古王朝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之所以还保存了若干座希腊式城市并给予一定自治权，正是由塞琉古王朝所处的西亚特殊环境所造成的。东方式的中央集权体制是从原波斯帝国那里承袭下来的，马其顿人、希腊人既然来到西亚，成为塞琉古社会的上层人士或同上层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人士，那么他们就难以摆脱社会上东方文化和东方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① 而塞琉古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之所以还保留了若干座希腊式城市，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塞琉古王朝建立之初，它所面临的政治上的困难要比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安提柯王朝在马其顿和希腊所面临的困难大得多。②

塞琉古王朝不采取分封制而采取行省制，也不是偶然的。居鲁士确立波斯帝国之后，曾把波斯全境划分成 20 个行省，后来有的行省合并，行省总数减少，但依然是行省制。③ 波斯帝国之所以采取行省制，正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防止帝国的分裂。④ 在波斯帝国统治期间，行省是直属中央政府的，行省的总督由中央任命，主要是国王信得过的波斯人。行省对中央政府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57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56—157 页。

③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354 页。

④ 居鲁士攻占吕底亚王国后在这里建立行省，行省管理机构当时还处于实验阶段。后来征服其他国家，都相继建立行省。（参看同上书，第 52、66、68 页）

的主要任务是缴纳贡赋，贡赋总额是纳入名册的，有金银、牲畜、饲料等。有的行省还规定当地部落每5年要奉献童男童女各若干名。① 这表明波斯帝国对行省的控制是有效的。这些贡赋是加在当地的巨大负担，行省往往不堪重负，所以只要中央的控制减弱了，地方的分离主义倾向便会滋长，这正是波斯帝国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塞琉古王朝在西亚、中亚细亚等确立统治之后，仍然承袭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维持行省制度，不愿让出中央对全国各地的直接管辖权。

关于塞琉古王朝的地方行政体制，下面将有进一步的分析。这里仍继续讨论中央的体制。在塞琉古王朝，王室成员、王亲、贵族、有功将领等，并没有自己的世袭封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但他们和他们的子弟只要忠诚于国王本人，就有机会担任文武官员。其中，最受国王信赖和宠爱的人得到一个特殊的头衔——"国王之友"。② 这些人几乎都是马其顿人、希腊人。至于本地人，即使尽力而为并忠于职守，但很少有人获得"国王之友"头衔的荣幸。③ 塞琉古王朝的宫廷完全是东方式的，有宦官，有众多的嫔妃。拜见国王的仪式，也是东方式的，而且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以显示国王不同于凡人。连宫廷服饰都是东方式的，据说只有内衣才是希腊式的。④ 官员和宫廷侍卫都身穿

---

①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55页。

② 参看T.R.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

制服，以显示庄重。宫廷内烟香散发出特殊的气味，再加上音乐声，更令人感到国王的崇高和臣下的渺小，以至于有人认为这简直跟旧波斯帝国宫中没有什么区别。

## 五、塞琉古王朝的地方行政体制

在塞琉古王朝中央集权体制之下，行省制和城市自治制是并存的。这是塞琉古王朝地方行政体制的独特之处。

塞琉古全国分为二十多个行省。行省设省长、将军、财务使等高级职务，均由国王任命。而在东部一些行省和小亚细亚一些行省，由于其重要性，省长和将军两个职务由一个人担任，称为总督，即统军，又治民。[①] 总督也是国王任命的。财务使由中央派遣，掌握该省财政大权，兼管王家地产。[②] 财务使在某种程度上受省长或总督指挥。[③]

塞琉古王朝在划分行省时，充分考察了原波斯帝国的体制和行省的划分，特别是考虑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者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定下的体制。[④] 由于塞琉古国家“由许多民族和许多地区所构成，所以不得不划分为一些单独的行政单位。这种划分是自然的、历史的而不是人造的，整个说来，仍同波斯人和亚历山大统治下一模一样”[⑤]。

比较特殊的是塞琉古王朝下的城市：一是西亚本来就已存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66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67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166 页。

⑤ 同上。

在的神庙城市，二是原来就存在于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老的希腊移民城市，三是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新建的和塞琉古王朝建立后新建的希腊式城市，或称新希腊移民城市。三类城市的差别是历史形成的。

（一）神庙城市

波斯帝国时期西亚地区就有一些神庙城市。与希腊移民城市不同，"那里的首领是祭司，他们不仅负责主持仪式，指导改宗者，而且管理着神庙的奴隶，他们耕种周围的土地，供养他们自己以及神庙人员"①。神庙城市，也就是"地方组织的这种宗教形式，是由波斯人精心培育的"②，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波斯的统治。塞琉古王朝建立后，在引入希腊式城市制度的同时，如何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神庙城市是一个难题，因为神庙一般是地方商业中心、定期集市、庙会所在地。"因此，对塞琉古王朝来说，有可能给它提供一个城市组织：一个人民大会，一个议事会以及官员，这样，新的城市国家创建起来。"③换言之，这就是搬用希腊人的做法，把本来已存在的神庙城市重新改装了。

在塞琉古王朝期间，原有的西亚神庙城市增添了一些希腊式的内容，得到了改造。"除某些限制外，城市无例外地控制着圣地。"④具体地说，是在神庙周围把原来的集市、庙会纳入了城市范围，"是让大祭司和神职人员服从邻近的城市当局"⑤。如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0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果神庙不服从,就强制没收神庙的土地。①

同希腊化时期其他王国一样,在塞琉古王朝境内,神庙,尤其是那些著名的神庙,也是财富的集中地。这些财富除地产外,主要是金银或铸币的蓄积,它们或者来自信徒捐献,或者是信徒谢罪的奉献。② 神庙拥有大量财富,就用于经营工商业和放贷,并以放贷为主。③ 久而久之,“神庙逐渐发展为正规的银行”④。当然,罗斯托夫采夫在这里所提到的希腊化时期的“银行”,同以前他提到的古典希腊时期雅典的“银行”一样,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银行。⑤ 但无论如何它们是塞琉古王朝所看重的金融机构,所以平时决不放松对它们的监视,以便控制它们。

(二)小亚细亚沿岸的旧希腊移民城市

当塞琉古王朝控制小亚细亚时,如何对待已存在数百年之久的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移民城市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从战略上考虑,这些希腊移民城市处于爱琴海东岸,海港很早就被开发,商路通畅,对塞琉古王朝十分重要。加之,这些城市当初都是来自希腊的移民所建,一直是希腊文化传播的中心,虽然几次被波斯帝国征服过,但仍坚持希腊精神、希腊人文思想。因此,塞琉古王朝认为有必要继续保持这些希腊移民城市的自治权。

问题在于:在塞琉古王朝统治下,小亚细亚这些原有的希腊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07 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278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同上。

⑤ 参看本书,第 335—336 页。

移民城市会不会忠诚于塞琉古王朝，还是会转而倾向于安提柯王朝或托勒密王朝？因此，塞琉古王朝决定对这些希腊移民城市维持宽松的政策，即维持亚历山大的政策不变，如给予它们特权，给予它们相当多的自由，允许它们有自己选出的政府和自己制定法律，只要它们尊奉塞琉古国王，服从塞琉古王朝的最高权威就行了。① 从这种角度看，小亚细亚原来的希腊移民城市所受到的政治待遇，是塞琉古王朝各类城市中的一个例外。

正因为塞琉古王朝对这些小亚细亚希腊移民城市采取了宽松的政策，所以在塞琉古王朝仍能控制小亚细亚的情况下，它从这些希腊移民城市得到了不少好处。例如，这些城市起着联系希腊本土各城邦的作用，塞琉古王朝可以通过它们加强同希腊本土的联系，以免使塞琉古王朝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处于同希腊本土隔绝的状态。② 又如，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市历来是提供熟练工匠和雇佣兵的地方，塞琉古王朝可以从这些地方得到所需要的人才和雇佣兵，它可以由此得到充足的人力储备。③ 再如，这些希腊移民城市经济兴旺，财政收入丰裕，塞琉古王朝既能从这里获取丰裕的财政收入，还可以在紧急的场合从这里得到资金的支持。④

(三)塞琉古王朝新建的西亚城市

前面已经提到，从亚历山大东征时开始，到塞琉古王朝最初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525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524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 525 页。

几个国王执政时期，在西亚境内新建了好几十座希腊式的城市。这些新建的城市从外观上看全是希腊建筑风格的，规划、布局也都是希腊式的，有希腊本土城市中常见的公共设施，包括广场、祭坛、柱廊、议事厅，等等，还有希腊式的学校、剧场、集市等。那么，西亚的这些新建希腊式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些新建城市的主要居民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以及他们的后裔。他们把自己所熟悉的希腊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带进塞琉古王朝所控制的西亚地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引进的希腊城市生活方式并不等于希腊城邦制度的移植。要知道，长期以来，甚至直到马其顿王国统治希腊本土以后，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都是一个政治实体，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尽管面积都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却拥有主权。即使在菲利普二世南下，希腊本土顺从马其顿王国之后，希腊城邦的主权受到了限制，但城邦自治制度依旧保存下来。塞琉古王朝对于西亚境内新建的城市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既不同于西亚境内的“神庙城市”，又不同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小亚细亚希腊移民城市，塞琉古王朝实行的是如下的政策：

一方面，国王的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的领导权、统治权必须维护。国王们绝对不允许这些新建城市利用自治权来对抗中央的权威，更不容许出现分离或独立的倾向。也就是说，塞琉古王朝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才准许新建的希腊城市有一定的自治权。

另一方面，塞琉古王朝之所以鼓励马其顿人、希腊人来到西亚地区移民，是从巩固王朝在西亚的统治着眼的。在西亚，处处

都是西亚当地人，马其顿人建立的王朝如果没有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支持，在西亚难以长期立足。因此，塞琉古王朝有必要在这些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中给予移民前来的马其顿人一定的自治权。换言之，一定要从塞琉古王朝本身生存这一头等重要的问题来理解它容许希腊式城市保留一定自治权这件事。陈恒在所著《希腊化研究》一书中有这样的论点："与马其顿单一人口不同的是——甚至和埃及不同的是：在埃及除了希腊人外，当地的土著是比较单纯的——而塞琉古那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复杂民族成分则使这个王朝具有不同的社会心态。"①塞琉古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既要依靠国王的专制体制和军事力量，还要依靠希腊人的城市结构，即"对希腊城市自由的认可是施加塞琉古王朝影响最有效的办法"②。这就是塞琉古王朝西亚境内希腊式城市得以长期存在并保留一定自治权的依据。说得更确切些，在塞琉古这样一个多民族而且东方文化影响很大的专制国家中，"少数马其顿—希腊人的统治权力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依靠对象和政治基础。如果马其顿—希腊人消失在伊朗人、闪米特人和安那托利亚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能意味着这个希腊化王国在东方消失"③。一个个新建的西亚境内的希腊式城市，就好像嵌入这一大片西亚土著居民居住区内的基石，它们保障了塞琉古王国的持久统治。

还应当指出，这些新建的希腊式城市是塞琉古王朝驻军的

---

①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81页。

③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46页。

城市。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些新建的希腊式城市对塞琉古王朝统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塞琉古王朝一直想使得分散的、遍布西亚各地的希腊式城市联合起来，形成一股足以控制西亚全境的亲塞琉古的力量。但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体制，塞琉古的国王们不愿在自己的王国内重演古典希腊时期的城市同盟的历史（如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或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也不愿意看到在塞琉古王朝下出现像安提柯王朝下希腊本土所组成的城市同盟（如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因为这样的同盟逐渐成为反中央控制、反马其顿王国的力量。于是，塞琉古王朝设计了以国王派驻希腊式城市的军队联成一个防务链条的模式，"通过国王的军队将经济和社会状况相异的各片领土结合起来，形成集中的军事化的希腊马其顿殖民城市"①。这样一来，塞琉古王朝在这些希腊式城市的驻军起着双重作用：一是使这些希腊式城市听命于国王，顺从国王的意志，防止任何城市出现分离主义倾向；二是通过城市这一交通枢纽，把广大的西亚领土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而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式城市中的主要居民——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也就被调动起来了，他们在必要时会支持国王的军队，共同对付西亚土著居民中的不稳分子。于是塞琉古王朝创立者塞琉古一世所希望建立的"一个政治上统一的马其顿—希腊人统治的希腊化帝国"②也就建成并巩固下来了。

西亚境内希腊式城市的建立，使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显然划

---

①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② 同上。

分为两个阶层：一是本地居民，二是在本地居民之上产生的希腊—马其顿人阶层。[①] 后一个阶层同国王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他们无疑享有多多少少的特权，并且要比原来的居民有较高的社会地位。[②] 在这个希腊—马其顿人组成的阶层的最上层就是塞琉古王朝的新贵族，他们是同王室和宫廷连在一起的显贵们，其次就是高级官员，他们也都是巨富，拥有大量财产。[③] 大商业城市中富商也可以包括在新贵族之内。再次，应当提到驻防于首都和重要城市的卫戍部队的军官和士兵、各级官员、财产评估人和收税人等。[④] 其中大多数人都从国王那里得到土地，而这些土地是从本地人那里取得的。[⑤] 总之，一个人数众多的希腊—马其顿人的阶层形成了。这就是塞琉古王朝新建城市中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

在这些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中，也居住着一些当地居民。总的说来，当地居民处于希腊—马其顿人之下，无形之中成为二等公民。[⑥] 至于当地居民中以前的上层分子内，“一部分与征服者合作获得信任，担任中下级官吏”[⑦]。这是因为，“希腊—马其顿统治者深知，仅靠一时的军威不足以长治久安，尚须借重原有的统治者”[⑧]。这种做法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之后所采取的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17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518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2页。
⑦ 同上书，第453页。
⑧ 同上。

做法是一致的。

至于在西亚境内所建立的这些希腊式城市同中央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一般说来，城市自治权的取得同它们缴纳贡金和税收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国王也把收到的贡金的一部分返还给这些城市，用于宗教活动等开支。① 可以这样说："国王越弱，他就越需要得到希腊式城市的支持和认同，他就越有可能克制对这些城市内部事务和自治的干预，以及降低或放弃自己对贡金和税收的要求。"②而在国王势力强大之时，"国王的意愿就是最高的法律，国王的命令毫不理睬人民的任何决定"③。这完全符合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情况，塞琉古王朝并非例外。

那么，塞琉古王朝是什么性质的王朝？可以说，它同安提柯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一样，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西亚社会，是封建社会。只不过这三个希腊化王朝各有特点而已。从以上所分析过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地方行政体制，以及存在于塞琉古王朝境内希腊式城市制度来看，在国王独揽大权方面，塞琉古王朝要比安提柯王朝更为突出。而从下面(本章第二节)有关塞琉古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塞琉古王朝统治下西亚境内的土地制度，以及王室土地同佃户之间的关系更能说明塞琉古社会是典型的封建社会。④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78页。

③ 同上。

④ 不言而喻，把塞琉古王朝说成是奴隶制的希腊化王朝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从公元前2世纪初年起，随着塞琉古王朝由盛转衰，塞琉古王朝统治范围内，不仅土著居民所聚居的地区先后出现了叛离中央的地方割据和独立，而且在新建的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中，也有分离主义的趋势。这意味着庞大的塞琉古封建王朝从这时起已进入走向衰亡的阶段，或者说，塞琉古封建王朝的解体过程已经开始了。

## 第二节　塞琉古王朝的经济

### 一、土地关系

塞琉古王朝统治期间，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国王。土地分为王室土地、神庙土地、城市土地、军屯土地几大类。塞琉古的国王在土地政策方面，充分考虑了原波斯帝国的土地占有状况，一般不做大的变更。“国王们的土地政策是谨慎而富有远见的。他们需要小心地处理那巨大的领地，因为他们收入中最有价值、最稳定的部分就来源于此。”①

1. 王室土地

王室土地的前身多半是原波斯帝国的王家土地或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由国王掌握和有权处置的土地。塞琉古王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接管了原波斯帝国的庞大的土地遗产。

塞琉古王朝的王室土地，由国王亲自掌握，其中，有专供王室享有的农田、牧场、林场、水塘、尚未开垦的土地等。国王常把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8页。

王室土地赏赐给受宠的或有功的贵族、将领和大地主。实际上，国王所赏赐的并不是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而是这些土地的收益权。如果这些土地原来由王室的农户耕种，在直接由国王掌握时，租赋归于王室；如果国王把某一块王室土地赏赐给某一个贵族占有，那么王室的农户就把租赋缴纳给受赏赐的贵族。如果因某种原因该受赐土地的贵族犯了罪或不受国王宠信了，国王可以收回所赐予的王室土地。

以前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王公贵族的土地，一律被没收为塞琉古王朝的王室土地。其中，归顺塞琉古王朝的那些王公贵族，可以在获得国王恩准后保留原来的土地，收取租赋，但这些土地依然是属于塞琉古国王的土地，而并非受恩准的原波斯帝国的王公贵族私有财产。

2. 神庙土地

神庙土地名义上也属于塞琉古国王，它们也是经国王恩准后归神庙占有和使用的。这些土地的租赋归神庙所有。有些神庙的历史悠久，神庙在过去漫长的年代内因种种原因拥有了地产，比如，地产来自信徒的捐赠，来自附近受神庙庇护的农民的奉献（作为依附于神庙的条件）等；其中也有在天灾人祸时期神庙并购的土地，或者神庙自己开垦出来的耕地。这些土地，“由高级祭司来领有，或以神的名义由祭司团体来领有，而这些地产常常是很大的”①。

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很早以前，西亚本地居民习惯于把土地看成是神的财产，神庙祭司不仅在地方的宗教生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6页。

活中，而且在地方的社会、行政、司法和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西亚各个神庙附近的村民虔信祭司，尊敬神庙，把自己的土地奉献给神庙，是有道理的。塞琉古王朝建立后，为了稳定地方秩序，神庙自有的土地维持原状。

在西亚，不仅有本地的神庙，也有新建的希腊神庙，后者是陆续来到西亚的希腊人、马其顿人建立的。这些希腊神庙多半建立在新建的希腊式城市的辖区，它们同西亚本地人的神庙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新建的神庙经过国王批准，可以得到国王新赏赐的土地。

无论是本地的神庙还是希腊移民建立的神庙，都有自己的土地，地产收入照例归神庙所有，实际上归祭司们所有。某些地方，"在某些例行的仪式中，其祭司长头戴冠冕，被认为是国中仅次于国王的大人物"[②]。

塞琉古王朝对神庙和神庙财产的政策维持了大约一个世纪稍长一些。自从公元前 190 年塞琉古军队被罗马军队击败以后，塞琉古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它对神庙尤其是西亚本地人的神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可能随着塞琉古王朝被逐出小亚细亚，国王多多少少修改了他们对东方神庙的态度。"[③]具体地说，这反映于有关安条克三世及其继承人洗劫一些东方神庙的事件。[④] 为什么会这样？一种解释是：可能是由于塞琉古王朝在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503—504 页。

②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07 页。

③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63 页。

④ 参看同上。

战场上遭到惨败，缺钱用；另一种解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地方分离主义抬头，国王们就以这种对待东方神庙的方式来强调自己对神庙产业的至高无上的权利。① 其实，效果恰恰相反，塞琉古王朝越是这样做，当地的非希腊居民对塞琉古王朝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统治的维持就越困难，进而塞琉古王朝不得不更加依靠马其顿人和希腊人。②

在王室土地和神庙土地上耕种的农民，是佃户。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但世世代代被束缚在这块土地上，子承父业，不得离去。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世袭的农奴。

为了管理村庄，管理好王室的土地，塞琉古王朝的措施是"把整片土地，连同村庄、村民和所有其他财产，一并赐予……马其顿人或希腊人封臣，他们当然要为应交给国王的费用负责"③。由于担心这些封臣比村民更不听话，所以"塞琉古王朝拒绝给予那些他们赐予王室领地的人一个明确的封号"④，以便随时可以收回这些桀骜不驯的封臣的领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塞琉古王朝的土地关系是一种封建的土地关系，即在国内存在着国王颁赐的领地，领地的主人实际上行使着统治的权力。⑤只要受赏赐的领地的主人顺从国王的旨意，不违抗国王，他们就可以一直统治下去，尽管所赐的领地最终仍属于国王。与此同时，在塞琉古王朝管辖的很大范围内，"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地区：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63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64页。

③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9页。

④ 同上。

⑤ 参看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3页。

它们的居民被视为君主土地的依附者或者个人的隶农，并按领地的方式由他的家族进行管理”①。

3. 城市土地

城市土地是国王批准拨给每一个拥有自治权的城市的土地。城市土地名义上依然隶属于国王，但城市对这些土地具有使用权和处置权，不过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用于建设。

在有自治权的城市管辖范围内，存在着一些农业经营主体。关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根据现有资料还不能确定。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土地是希腊移民个人占有的，是私有土地，它们被用于经营农业和饲养业。来自希腊的移民把葡萄种植技术带到了两河流域和西亚沿海区域，如果这些土地不归经营者个人占有和使用，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种植葡萄树的积极性，因为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条件下希腊移民才愿意推广葡萄树的种植。后来，葡萄种植业在西亚特别发达与希腊移民的创业不无关系。②

除了种植葡萄树以外，在西亚，橄榄树和蔬菜的种植，以及小麦、大麦的大面积播种也是希腊移民来到这里以后所出现的新情况。这可能同土地占有和收成除纳税外主要归种植者、经营者自己所有有关。当然，这也有赖于灌溉工程的进展，而两河流域灌溉工程的建设同样应当归功于希腊移民。希腊工人比当地“原有的工人数目众多，积极而聪明，这对于水利工程的修复与维护发生了有利的影响”③。从这一点可以推论，如果灌溉工

---

①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3页。

②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5页。

③ 同上书，第96页。

程建成或完善后受益的土地的产权和未来的收成在产权方面不确定的话，希腊移民会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么？

4. 军屯土地

军屯土地的存在同塞琉古王朝推行的屯田制有关。在塞琉古王朝的疆域内，除西部濒临地中海而外，东、南、北三部分都有陆上边境，而且这些地区的闲置土地较多，人口又相对稀少，所以塞琉古王朝决定，凡是戍边的兵士，以及退役的老兵都领有份地，没有战事时就地耕种，这样，既可供应粮食，供军队食用，又有利于边境地区安定，老兵还可以在这里安家。

在军屯地区，由于聚居的人渐渐多了，包括下级军官的家属、退役老兵的家属以及前来经营手工业作坊和商店的各色人等，就形成了军屯城镇。[①] 有些地方在马其顿人来到以前已有村落，军屯以后这些村落仍继续存在。[②]

从历史上看，塞琉古王朝的军屯政策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本人，因为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帝国以后曾把许多雇佣兵安置于近东各地。[③] 塞琉古王朝的国王们继续实施这一做法，把大片土地授予退伍军人和以前的雇佣兵，把他们安置下来。[④] 由于塞琉古军队的主力是希腊士兵，这些希腊士兵到达一定年龄后就以屯垦土地为业。他们对塞琉古王朝有强烈的认同感，而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79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5页。

④ 参看同上。

且对希腊的城市自治制度有好感，所以凡是以希腊士兵为主的军屯社会都是希腊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希腊城市自治制度的特征，以及希腊本土本来就存在并起过作用的社会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都被他们保持下来了。[①] 在军屯地区形成的军屯城镇和军屯村庄，也都实行希腊人的自治制度。这是塞琉古王朝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军屯的土地是属于塞琉古国王的，但久而久之，那些老兵都把国王所授予的份地变成自己的了。这情况恰如当初希腊部落把份地分配给部落成员，土地从原来的部落共有逐渐变成部落成员私有一样。关键在于实行份地制的家庭继承制。[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继承份地成了一种惯例，大家都这么做，就变成一种制度了。[③] 妇女是有份地继承权的，“继承成为惯例，似乎从刚开始起，妇女就包括在内”[④]。其结果，“塞琉古王朝这些从事军屯的士兵变得更像很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而不像部队的主要兵源”[⑤]。

军屯工作是希腊士兵的事情，一般同本地土著居民无关，因为塞琉古王朝历来很少使用土著居民作为兵士。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语言隔阂，不便指挥，二是担心他们可能兵变。[⑥] 土著

---

①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5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同上书，第476页。

⑤ 同上。

⑥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第268页。

居民即使有当兵的，至多只是参加辅助部门工作，或充当杂役等。如果塞琉古王朝兵力不足，它宁肯花钱到爱琴海各岛屿去招募雇佣军。[①] 这些雇佣军士兵同样是希腊人。他们对希腊化的王朝——塞琉古王朝——也是认同的。

总的说来，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农业的情况是较好的。虽然塞琉古王朝多次与托勒密王朝作战，但战事时开时停，和平时期仍长于战争时期，而且大部分战事在边境进行。塞琉古王朝也同安提柯王朝多次发生战争，但战争的年份仍然少于和平的年份，战争主要在小亚细亚、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进行。塞琉古王朝的农业地区大部分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畜牧业地区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腹地和伊朗高原，受上述战争的影响不大。

在这一时期小亚细亚许多城市铸币上的图案和肖像可以看出各地所产谷物和酒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它们常用农业女神像、麦穗，或酒神像、葡萄串、酒杯、酒瓶作钱币上的图样”[②]。塞琉古王朝对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还反映于它对灌溉工程的修复和建设的重视。前面已经指出，城市和城市辖区的农业经营者为灌溉工程的修建出了许多力，但也不能忽视塞琉古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政体仍遵循原波斯帝国的传统，调集民工参与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建设。这使城市生活和农业生产都受益。例如，“当叙利亚的国王们轻视巴比伦城而喜欢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时，由该王朝的首领所建筑的这座新城，受

---

①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第 268 页。

②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97 页。

到了这一切水利工程的恩惠，所采用的方法则没有任何改变”①。

两河流域的土地一向是很肥沃的，依靠灌溉工程，产量很高。当地农民尽管都依附于土地的主人，并被束缚在村庄里，不得自由迁移，但生活一般还过得去，所以没有发生大批因饥饿而逃离本村的情况。塞琉古王朝生产的粮食，自给之外还有富裕，向外国出口。只是到了塞琉古王朝后期，农民负担的徭役大大增加了。“国家和国王用一大套义务来束缚他们的臣民，而徭役就变成了这套义务中的一个新添的正规项目。”②沉重的徭役是加在土著居民尤其是农民身上的。至于希腊移民，他们不承担徭役。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充当徭役监督人等角色。③

## 二、手工业和商业

西亚的城市在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就以手工业闻名远近。不仅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移民城市早以精致的纺织品著称，而且巴比伦城和叙利亚的城市也生产纺织品，行销各地。除纺织品外，金属制品、兵器、首饰、陶器、玻璃器皿、酿酒、船舶等，都是塞琉古王朝吸引外国商人的产品。尤其是染料，更是驰名国内外市场的产品。要知道，“‘腓尼基’原是紫红色的意思，它起源于本地出产的一种紫红色染料，这种染料是人们潜入海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01 页。

②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9 页。

③ 参看同上。

底捕捞一种海螺，从中提取出一种可作染料的紫红色颜料”①。

小型手工作坊的主人大多数是本地人。本地工匠担任作坊主，参加劳动并传艺给学徒、帮手。他们有时也雇用少量工人，其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国人。小型手工作坊中也有使用奴隶劳动的。而大型工场（如冶炼、造船、制陶、纺织和酿酒工场）中则普遍使用奴隶，波斯帝国时期就已如此，塞琉古王朝时期仍维持原状。

在这里需要指出，在塞琉古王朝统治范围内，矿产资源是丰富的。铁矿、铜矿、银矿的开采和冶炼成为塞琉古王朝的重要产业，其产品供应国内外。塞琉古王朝的铸币业也很发达。在一些城市中设有市政当局所辖的铸币工场，生产铸币。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并逐步取代了塞琉古王朝境内某些地方的实物交换方式。②

塞琉古王朝境内矿产资源之丰富使希腊移民大吃一惊。例如，“希腊人在亚述、巴比伦尼亚和苏细亚那所新认识的物产中，甚至有石油，不过当时不叫做石油，而叫做土沥青液或石脑油”③。在巴比伦尼亚有石油井，在苏细亚那石油开采更多一些，采出来的石油代替橄榄油，用于点灯照明。④ 塞琉古王朝辖境内还有丰富的硝石和盐，包括岩盐和池盐。硝被用于去污和

---

①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王新刚著，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5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57 页。

③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18—119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119 页。

漂布。[1] 还值得一提的是玻璃的制造。腓尼基生产的玻璃制品在当时十分有名，据说，只有埃及生产的玻璃制品胜过腓尼基的玻璃制品，因为埃及玻璃制品比腓尼基生产出来的玻璃制品更有艺术性。[2] 而希腊人过去是不知道玻璃的生产的，他们来到东方以后才学会制造玻璃和玻璃制品的手艺。[3]

塞琉古王朝的手工业虽然发达，但它的国内市场始终有限。当地的广大农民都被束缚在村庄内，束缚在土地上。由于土地肥沃，农业生产较好，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还过得去，但对手工业品的购买量却不多，他们在市场上所购买的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农具和农民住房的建筑材料。塞琉古王朝境内城市手工作坊生产的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奢侈品性质，如金银器皿、首饰、香水、高级纺织品、精美家具、艺术品、高档服饰等，购买者或者是宫廷和王公贵族，或者是城市中的富人。此外，市场上供应的还有兵器、甲胄、马鞍、舰船等，购买者是政府和军队，与一般居民无缘。因此，塞琉古王朝的手工业发展是受到居民购买力限制的。其实，这种情况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塞琉古王朝来说，开展对外贸易就显得格外重要。塞琉古的国王们都采取鼓励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疏通河流通往海上的航道，扩大港口建设，完善港口设施，欢迎外国商人和商船到塞琉古王朝的城市来经商或居住，就是国王们的愿望。手工业产品是塞琉古王朝出口商品中的重要部分。塞琉西亚、安条克和其他一些城市都是经营出口贸易的大港，商品

①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18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24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23 页。

从这里装船运往希腊本土、爱琴海上各个岛屿、黑海沿岸、印度、阿拉伯半岛、埃及和地中海西部地区。经营出口贸易的，不仅有来自希腊的商人，还有来自印度、阿拉伯、埃及、迦太基和罗马的商人。[①] 除了通过海上航道进行的对外贸易而外，陆上也有一些著名的商道。主要的有四条商道：一是由两河流域向东，经伊朗，到达中亚细亚，再进入中国的商路，或经伊朗，越过印度河，进入印度的商道；二是由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向南进入阿拉伯半岛或向西进入埃及的商道；三是由伊朗或小亚细亚，经过里海沿岸或黑海沿岸，进入俄罗斯草原，甚至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的商道；四是由小亚细亚，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色雷斯、马其顿，再进入巴尔干半岛，由此向西或向北通往西欧、中欧的商道。尽管这些陆上的商道在战争期间遭阻，但和平的年份多于战争的年份，所以陆上贸易是不受大的影响的。后来，塞琉古王朝被罗马灭掉，但上述这些由西亚通往四方的商道仍是被商队利用的。[②]

塞琉古王朝不仅向国外输出产品，也从印度、中亚细亚、黑海沿岸、西欧、中欧、东欧、阿拉伯半岛、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进口当地的特产。甚至中国的产品也有可能循着商道而进入西亚。

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钱币使用问题引起塞琉古王朝的关注。在亚历山大东征前的很长时间内，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

---

① 这应归功于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肃清海盗的努力。塞琉古王朝是受益者之一。

② 这些商道一般较宽，可通行马车，其中许多道路是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建成的。

朝铸造的钱币，以及吕底亚王国铸造的钱币，在西亚一带信誉良好，商人喜欢使用。亚历山大征服西亚地区，按照希腊标准铸造了钱币，成色好，同样受到商人们的欢迎。塞琉古王朝刚建立时，也仿照亚历山大的做法，严格遵守亚历山大按希腊标准铸币的方针来铸造自己的钱币，力求钱币的稳定、可靠和优质。①

塞琉古王朝的钱币以三种金属铸成：金币、银币、铜币。金币直到公元前 3 世纪后半期为止，一直常规地铸造，公元前 3 世纪以后才停止铸造。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由晚期塞琉古王朝的国王们间或恢复铸造。② 据罗斯托夫采夫分析，这可能是由于近东一带黄金稀缺所致。塞琉古王朝铸造金币所需要的黄金可能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东一带，但由于塞琉古王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削弱了，中东一带产金地区因巴克特利亚独立和帕提亚王国崛起，使得塞琉古王朝得不到足够的黄金，于是晚期塞琉古王朝的国王们不再常规地铸造金币。③

塞琉古王朝的主要货币是银币。小亚细亚有丰富的银矿，塞琉古王朝前期由于控制了小亚细亚，所以并不缺少白银，足够铸造银币所需。到了安条克三世临朝晚期，公元前 190 年马格尼西亚战役被罗马军队大败后，小亚细亚丢掉了，铸造银币所需要的白银也稀缺了。④ 塞琉古王朝铸造银币面临困难。

至于铜币，则主要用作辅币，或在地方交易中使用。铜币的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446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447 页。

④ 参看同上。

流通范围是十分有限的。①

铸币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塞琉古国王手中。尤其是金币和银币的铸造权,国王绝对不容许境内任何希腊式城市的竞争,由国王垄断。只有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国王才偶尔有所让步,让个别城市有权铸币,但这只是例外而已。② 最后应指出,尽管塞琉古王朝一直遵守亚历山大的铸币政策,但日久天长,塞琉古钱币仍然逐渐地(虽然不是完全地)取代了亚历山大的钱币。③

由于币值稳定和货币信誉良好,商人的融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前面已经提到,西亚境内的神庙积蓄了庞大财富,所以神庙实际上是重要的金融机构,商人们经常通过神庙融到资金,神庙的利息收入也是可观的。塞琉古王朝的一些重要的希腊式城市中,也有所谓的"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它们也进行借贷业务。

塞琉古王朝的商业发展还得益于东方国家早已存在的对合同有效性确认的技术手段和法律规定。据说,商业上的证书制度早在巴比伦汉谟拉比王朝就已通行。④ 证书上开列的是所有者的姓名,清清楚楚。⑤ 为了使证书有效,"证书技术由两种罗马人所没有的制度所掌握:法院裁判员和公证员"⑥。换言之,罗马法上并没有这种证书制度,"罗马法根本不知它为何物"⑦。罗马在共和国晚期灭掉塞琉古王朝;罗马帝国建立以后,罗马接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448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447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449页。

④ 参看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7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受了这套做法:“公证员制度是从(罗马)帝国的东部传播到西方的。”①

关于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工商业组织情况,根据现有资料,后人了解得不多。可以说明的是:中央政府和希腊式城市当局都没有强行组织工商业行业组织的做法,工商业中尚未存在以后在罗马帝国时期越来越表现为官方控制性组织的工商业行业协会。手工业者看起来仍有一定的组织,商人也有类似的组织,但这些组织具有民间性质,由业主们自行组织,带有互助性,也互相约束。这可能是早已存在于西亚的一种惯例。

希腊来的商人所采取的集体行动比西亚本地的商人多。这是因为,在希腊来的商人的心目中,塞琉古王朝的管辖地区毕竟是异地他乡,希腊来的商人无依无靠,只有靠塞琉古王朝中央政府的政策,靠同是希腊移民建立的城邦当局的照顾,因此,他们除了遵守当地的法律规定和结成与中央政府官员的友好关系,以及同希腊式城市当局办事人员的友好关系而外,唯有依靠希腊来的商人们自己的相互帮助。他们的组织更带有互助会、同乡会的性质。他们低调经商,不炫富,不越轨,这样才能在西亚站稳脚跟。

## 三、奴隶的使用

在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建立以前,西亚地区就已经普遍使用奴隶了。波斯帝国统治西亚后,继续普遍使用奴隶,而且奴隶的来源更多了;有把被俘虏的敌军士兵沦为奴隶的,有把反

①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7页。

对波斯帝国统治的原其他国家的贵族、官员和不愿归顺的人本人及其家属变为奴隶的，有因犯罪而又无法赎身的人被卖为奴隶的，还有一些欠债未还而被判为奴的。此外，北方的一些部落和海上一些劫匪也把俘获的人卖作奴隶。有钱人家里，特别是贵族、官员家里，都使用众多的奴隶。一些庞大的建筑工程、矿山、大型工场和其他艰苦的劳动，都使用奴隶。在小型的工场和作坊中也使用奴隶，这被看成是“一种生利息的财富的投入形式”①。

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后，成为西亚土地的主人。他释放了沦为奴隶的希腊人和因反抗波斯帝国统治而被变卖为奴的人，同时又把一些反抗马其顿军队而成为战俘的人变成奴隶。至于那些归顺亚历山大的原波斯帝国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仍然使用自己的奴隶。亚历山大从未颁布过废奴的法令。

塞琉古一世自称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他建立塞琉古王朝后，在境内仍然使用奴隶，其情况如同古代巴比伦、原波斯帝国和雅典一模一样。② 但在塞琉古王朝前期（其实不仅是塞琉古王朝的前期，而且是所有各个希腊化王朝的前期），奴隶的供给都是不足的。③ 这是因为，当时各个希腊化王朝刚建立，为了保护自己的臣民，也就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从而禁止或限制奴隶贩子到自己管辖的地区内收购奴隶。④ 这种情况到后来才有

---

①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9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168 页。

④ 参看同上。

所改变。

塞琉古王朝境内的奴隶以外国人为主,并且大部分奴隶从事采矿业、建筑业和大型工场中的艰苦劳动。一般手工作坊中,奴隶和自由民雇工兼用,因为这些手工作坊中的劳动很多带有手工技艺的性质,自由民雇工可能更适合此类工作。

农业中使用的奴隶不多。在塞琉古王朝境内,无论是王室土地还是神庙土地,所使用的都是束缚在土地上、世代耕种、不得自由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不是奴隶。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包括农具、耕畜和车辆。他们必须按规定缴纳租赋,但也有权利把剩余的农产品和饲养的家禽家畜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但这些情况并不排斥奴隶的存在。王室土地上有奴隶,这种奴隶是隶属于王室的,听从主人的使唤,充当管理人员的帮手,或从事杂役、搬运工等。神庙也大量使用奴隶。这些人称为"神庙奴隶"[①],在小亚细亚、巴比伦、巴勒斯坦等地区都存在。他们奉神庙祭司之命从事各项工作:"祭司既是神庙的主人,也是神庙奴隶的主人。"[②]有的神庙的奴隶多达数千人,其中有男有女,年轻的女奴隶都是"神庙妓女"[③]。

城市土地中用于农业的部分,主要由小农自己经营,他们种植葡萄树、橄榄树、蔬菜、果树或饲养家禽家畜,他们一般不使用奴隶,有时雇用自由民身份的长工、短工。

比较特殊的是巴比伦和腓尼基等地。由于这些地方早在塞琉古王朝建立以前地主们就已习惯于在农业中使用奴隶作为劳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动力,所以这种现象继续存在。[1] 只是使用奴隶作为农业劳动力要缴纳一种特别税。[2]

塞琉古王朝时期奴隶价格的变动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情况。在这一时期,食物价格显然是波动的,即丰收年份粮价下跌,歉收年份粮价上升,这种波动属于正常现象。但奴隶价格则不然,它呈下降趋势,并且大幅度低于原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的奴隶价格。[3] 女奴隶的价格则高于男奴隶的价格。[4]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供求关系上看,可能是由于奴隶的供给一直超过了对奴隶的需求。这与前面提到的奴隶供给来源多样化有关。至于女奴隶价格高于男奴隶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所出售的奴隶中,女奴隶相对稀少。

第二,很可能同希腊本土使用奴隶劳动的状况变化有关。进入马其顿王国统治阶段(自菲利普二世率军南下和后来安提柯王朝建立以后),希腊本土经济中减少奴隶使用人数已是惯见的现象。原因在于:奴隶使用的效率低,成本又高,所以释放奴隶是常见的。移居西亚的希腊人,自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后越来越多,他们根据希腊本土的经验,懂得了使用奴隶无效率,使用自由民雇工效率较高的道理,所以在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时,宁肯雇用自由民工人而不愿使用奴隶。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261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37页。

④ 参看同上。

有时,他们还把农场、作坊、商店承包给其他自由民经营。当然,这种情况在希腊移民较多的城市中较为常见,而本地居民经营的工商业企业仍同过去一样使用奴隶,他们对奴隶仍有一定的需求。

有关释放奴隶的记载很多。释放的奴隶主要是为家庭服务的奴隶和在工商业中所使用的奴隶。被释奴隶中,很多人是女奴隶。在塞琉西亚,被释的奴隶全都是女奴隶。①

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奴隶暴动有时也发生,但主要在内陆地区,而且往往同该地区被征服、被统治的民族叛乱有关。这些地区原来就是波斯帝国征服和统治的地区,后来被亚历山大接管,最后又被塞琉古王朝接手过来。那里民族矛盾尖锐,时常发生动荡。在中央集权势力削弱时常常发生民族叛乱,于是同一民族的沦为奴隶的人也就随之暴动。

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奴隶制经济仍然作为经济成分之一而存在。这种情况同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和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希腊本土一样。社会的经济成分是多元的,奴隶制经济是经济成分之一。与奴隶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有小农经济、农奴制经济(主要体现于王室土地和神庙土地的经营上)、国有经济以及私营工商业中的小生产者经济和雇佣经济等经济成分。奴隶制经济很难被判断为当时经济中的最重要的经济成分,而且它通常依附于其他某种经济成分。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38页。

## 四、城市生活

### (一)城市生活的一般特征

前面已经指出,塞琉古王朝新建的希腊式城市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还被允许保留一定程度的城市自治权。至于原来就存在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市,由于历史悠久和情况相对特殊,所保留的城市自治权相对多一些。最能反映塞琉古王朝城市生活的,应该是新建立的希腊式城市和原有的小亚细亚希腊移民城市。

无论是原有的希腊移民城市还是新建的希腊式城市,都是繁华富庶的城市,塞琉古王朝正是靠这样一些城市的发展而繁荣昌盛的。罗马作家塔西佗在其《编年史》中曾描述了塞琉古王朝的城市概况,他记述道:"塞琉西亚这个有城墙围绕的强大城市,虽然风行谄媚,但仍谨守建城者塞琉古的遗教,没有堕落成为野蛮之邦。"[①]这是一座浸透希腊文化的城市、商业兴旺的城市,而从制度上说,又是一座希腊人自治的城市。从地理位置上说,它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是交通的枢纽,过往的商人和旅客很多,所以它还起着希腊文化和希腊城市自治制度的示范作用。塔西佗写道,这座按照希腊城市治理方式来治理的大城市,"以其财产或智慧而被选拔出来的三百名成员组成了元老院。人民则有他们自己的特权"[②]。塞琉古王朝的创建人来自马其顿,塞琉西亚的城市居民来自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在马其顿帝国分裂

---

①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07页。
② 同上。

和分治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同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在领土上连接一起了，但他们仍念念不忘故土马其顿和希腊。他们想从安提柯王朝手中以武力夺回马其顿和希腊的愿望，看来难以实现。[1]这样，唯一可以实现的，就是在塞琉古王朝的管辖范围内再造一个马其顿——新马其顿，再造一个希腊——新希腊。这个愿望最后落实在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之中。[2]

要知道，塔西佗记述这段事情之时，塞琉古王朝已被罗马征服多年，但他的记述仍能反映出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城市概况，而且还表明塞琉西亚等希腊式城市在塞琉古王朝灭亡之后未经大的破坏，依然繁华如初。

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原有的希腊移民城市和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中，除了主要是希腊人而外，还住了一些西亚本地人，其中既有当地的上层社会成员，也有一些经营工商业的中层人士，还有一些充当雇工的人。但他们既然来到这些城市，同希腊人生活在一个城市中，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希腊式城市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当地的上层社会成员，受城市希腊化的影响更为明显。不少杰出的本地人家庭还接受了希腊式教育和希腊生活方式。[3]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逐渐希腊化了。这是一个自然进行的过程，并没有城市的强制因素。在西顿，一些出名的腓尼基人取了希腊姓名，按希腊人习惯过日子，结果，他们不仅在本城的事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479页。

②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5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071页。

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在外国（如在托勒密王朝）的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①

在两河流域和波斯湾沿岸一带，存在着若干原来就已存在的当地人的城市。塞琉古王朝建立后，这些当地人的城市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它们的主要居民是当地人，其中，有上层社会人士，也有中下层居民，但希腊人从亚历山大统治该地区后就已来到这里，塞琉古王朝建立后，由于欢迎希腊人前来，所以希腊人渐渐多起来，希腊人在这些城市中多多少少有些特权。塞琉古王朝认为，这些原先归波斯帝国管辖的、而且是以当地人为主的城市，如果没有希腊人搬进去居住，很可能引起社会上的分离主义倾向滋长，于是有必要对希腊居民采取保护政策，让他们安心住下，经商致富，并成为支持塞琉古王朝的基础。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城市中的当地上层社会成员（他们原来在这些城市的政治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②），同希腊上层家庭的来往增多了，通婚的也越来越多，这表明希腊上层社会和本地人上层社会已开始融合，并进而走向合作。③ 本地上层家庭和希腊人上层家族通婚的一个结果是：塞琉古王朝早期担任城市政府官员的，都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后来在一些城市中，由居民的上层阶级出任政府官员的似乎是混血出身的。④ 有的城市里，“妇女大多数有一个闪族的名字，其中有些可能是闪族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071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19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523页。

出身。而男子大多数保留了他们祖先的马其顿名字或希腊名字,但却穿着东方的服饰,崇拜东方的神"①。这可能意味着,在塞琉古王朝的一些城市中,希腊上层社会妇女较少,移民到东方城市来的希腊人中男子占大多数,所以希腊女子不愁找不到希腊男性配偶,而希腊上层社会的男子因结婚难,所以就找了本地上层妇女为妻。这还意味着,在这些东方城市中,城市生活的希腊化趋势和东方化趋势是并存的,否则,有些城市中的男子为什么既保留了他们祖先的马其顿或希腊的名字却又穿着东方的服饰,崇拜东方的神呢?为什么本地的家庭,尤其是同希腊人接触较多的本地上层社会的家庭会逐渐接受希腊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理念呢?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腓尼基的一些城市和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城市居民以本地人为主,但那里的上层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希腊化了。塞琉古王朝指定希腊语为官方语言,这些城市里的上层阶级接受了这一点。然而,上层阶级以外的本地居民仍旧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②

前面提到,在塞琉古王朝境内还有一些神庙城市,主要在两河流域一带。神庙城市的保留是塞琉古王朝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通常是先有神庙,再有城市。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神庙内先聚集了一批僧侣,神庙周围增添一些为信徒、朝圣者服务的商店、手工作坊、餐饮店、旅舍,还有摊贩。城镇的框架就这样初步形成了。为了便于管理,神庙及其周围地区就采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23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519、522页。

取了城市管理方式。这些神庙城市历史悠久,塞琉古王朝只不过承袭了传统而已。

塞琉古王朝尊重神庙城市的原有管理方式,保留了以神庙为管理机构、以祭司为管理者的自治原则,但仍须听命于国王和国王派遣的地方官员。神庙附近有驻军,以保护神庙及其财产,所以被国王派遣的地方官员有时可能就是王家军队的指挥官。①

实际上,所有的塞琉古王朝的城市,包括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市、塞琉古国王们新建的希腊式城市、神庙城市,还包括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存在的以东方人为主的原有城市,都是具有双重地位的,即它们既是国王管辖的城市,必须服从国王的命令,不得违背塞琉古王朝制定的法律,又可以享有程度不等的城市自治地位、自治权。也就是说,上述双重地位反映于:"它们的公民不仅要服从他们自己通过的法律,而且要服从国王发布的诏令。"②二者冲突时,国王的诏令是最高权威。

但也应当看到,正是城市的这种双重地位造成了塞琉古王朝的致命弱点。这是因为,在塞琉古王朝统治下,城市居民的"忠诚"是有顺序的:由于他们长年生活在城市中,工作在城市中,他们更直接地认为自己的命运和前景、家人的幸福和子女的前程都同城市息息相关,因此"人们忠诚的对象,首先是他们的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11 页。

② 同上。

城市"[①]。城市居民不背叛自己的城市,这是"第一忠诚";不背叛王朝,这是"第二忠诚",顺序不会颠倒,于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城市考虑的总是:如果放弃塞琉古王朝,把它们的忠诚转移到塞琉古王朝的敌人或者某一其他国王,它们到底是得是失"[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塞琉古王朝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给予已有的、新建的城市以一定的自治地位和自治权,王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王国的实力不会增强,甚至城市地区就会动荡不宁;如果给了它们自治地位和自治权,这些城市居民将首先忠于本城市,在利益方面会倾向于本城市,结果不利于塞琉古王朝。

(二)城市居民的构成

塞琉古王朝的城市中,既有希腊人,又有本地人,还有外国人。外国人这里可以略去不计,即以希腊人和本地人同居一个城市而言,塞琉古王朝的城市几乎都是不同族群混合居住的城市,只是希腊人在城市居民中的比例有多有少而已。

塞琉古王朝的首都后来定在安条克,它就是一个混合型城市,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到这里居住,但仍以希腊人和本地人为主。最初,安条克城分成两个居民区:第一区的居民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因为对西亚这块土地上的本地人来说,马其顿人作为征服者来到这里,而希腊人是跟随征服者马其顿人一起过来的。第二区的居民是本地人。这里所说的本地人是指西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波斯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以及受波斯帝国统治多年的西亚其他地方的居民。安条克不断发展、扩大,前来居住的人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2—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

越来越多，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居民区。这两个新增的居民区都是各个不同民族混合居住的。新居民区中可能有按街道居住的区别，即希腊人、马其顿人集中居住在某些街道，本地人集中居住在另一些街道，但都在一个居民区内。

在塞琉古王朝的城市中，居民人数一般要多于希腊城邦时期的城市人口。[①] 此外，由于人口混杂，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是并存的。[②] 城市居民中的希腊人，形形色色，有为塞琉古王朝服务的官员，有富商，也有军官及其家属，还有驻防的兵士，但更多的是普通人，有一般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如教员、医生、学者、艺术家、演员等），还有冒险家、流浪汉、妓女和乞丐。而且，来到西亚的不仅有希腊本土、爱琴海各岛屿上的希腊人，还有远至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前面已经说过，前来塞琉古王朝管辖地区的希腊人男多于女，希腊男子娶不到妻子，只有选择本地妇女结婚成家。这种情况可能长期没有改变，于是希腊人和本地人所生的混血儿越来越多。混血儿本身就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在哪一类型的塞琉古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普遍存在，其中有希腊人，也有非希腊人。因城市情况的差异，各自的中产阶级人数多少不一。但是，“无论他们人数的多少，他们都构成希腊化城市中的中坚分子”[③]。按职业划分，他们有的是专家、官员、教师、医生、律师，有的是店主、作

---

①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9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48 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119 页。

坊主、放债人、船主，还有的是土地所有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比较富裕，至少也是小康之家。他们的收入可能来自投资所得、经营所得、地产收益，也可能来自薪酬。其中有些人还可能使用奴隶干活，或出租奴隶供他人使用，由此取得收入。① 但所有这些人都是生活在城市中，为希腊化的城市工作，并在塞琉古王朝的城市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② 此外还应看到，在塞琉古王朝的一些城市，本地人中从事上述工作的，也应被列入城市中产阶级之列，③他们中有些人已同希腊中产阶级融合了。④

城市中的中层社会家庭为城市带来了希腊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风俗习惯和日常礼仪，也包括希腊式的饮食、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重视孩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在塞琉古王朝各城市所有的希腊人居住区都设立了希腊私立初等学校。⑤ 希腊式的健身房也到处都有，并且成为希腊城市生活的基本设施。⑥ 这种情况和埃及等其他希腊化国家一样。⑦

以宗教信仰来说，希腊人来到西亚地区以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文化、宗教观念”⑧。这主要指西亚的城市而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116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123—1124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1156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书，第1047页。

⑥ 参看同上。

⑦ 参看同上。

⑧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王新刚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页。

言。例如,当地人的"主神巴勒神转变为宙斯奥林庇亚神。安条克南部的宗教圣地被命名为达弗尼女神圣地。安条克阿波罗神殿成为来自各地叙利亚香客定期朝拜的圣地"①。至于西亚的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居民所信仰的仍是当地人原来的宗教、原来的神。

在塞琉古王朝的一些城市,街头竖立了希腊雕塑家设计的神和人的塑像;街道、街道两侧的公共建筑和店铺的式样,小巷内居民住宅的样式,基本上都是希腊式的。在较大的城市中,希腊各派哲学思想都有信奉者、研究者,演讲活跃,争辩也激烈。市内还有剧场、音乐厅,上演希腊剧作家和音乐家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学术演讲和戏剧的上演,以及音乐会的举行,在同时代的希腊本土大多数城市已经衰落,在某些城市已经不再时尚,然而在塞琉古王朝所辖西亚的希腊式城市中却正处于欣欣向荣的阶段。于是就吸引了更多的希腊人前来定居或游览。这是希腊化时期塞琉古王朝和安提柯王朝在文化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

这两个王朝在文化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居民们对马其顿的看法的不一致。在塞琉古王朝管辖范围内,希腊人之中大多数有如下的看法:尽管他们认为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率军南下后,希腊本土的各个城邦不得不作为依附者而受到马其顿这个半开化的民族的统治,但另一方面,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毕竟率领马其顿大军东征,灭掉了希腊的宿敌波斯帝国,把小亚细

①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王新刚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页。

亚、西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直到中亚细亚的一部分和印度河地区纳入了统一帝国的版图，塞琉古王朝正是在这个基础建立的。亚历山大的东征和塞琉古王朝的建立不仅使希腊人扬眉吐气，一雪前耻，而且为大批在希腊本土找不到出路的希腊人找到了发展和致富的机会。特别是，塞琉古王朝建立后长达一百年的时间内是繁荣昌盛的、社会稳定的，塞琉古国王们在西亚广大地区建立了数十座甚至更多的希腊式城市，这些新建的希腊式城市恢复了希腊本土城市的活力，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希腊本土的城市。这样，希腊人感到在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生活和工作，是一种比留在希腊本土更好的选择。

在西亚城市兴旺、发展的过程中，马其顿人接受了希腊文化，认同了希腊人文精神，而来到西亚的希腊人则接受了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也认同了马其顿人所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在新建的塞琉古王朝的首都安条克，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被划在同一个居民区内而同西亚本地人分开居住，就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相互认同的一个例证。

相形之下，在同一时期的希腊本土，即在安提柯王朝管辖下的地区内，希腊人对马其顿人（从国王、官员、军人到普通百姓）却始终是心存芥蒂的。希腊人把马其顿人看成是半开化的部落成员，是不懂希腊文化的化外之民，把马其顿商人看成是竞争者，甚至是靠官方势力庇护的、有特殊权利的竞争者，更把马其顿国王和他手下的驻军看成是外来统治者，是强加于希腊人头上的异己力量。在安提柯王朝之下，处处看不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相互认同，他们之间在情绪上是对立的。这也许是由于马其顿军队几次击败了希腊城邦的联军，破坏过一些希腊城市，

使希腊人不仅有屈辱感，而且不少希腊人有国破家亡之恨，更重要的是这里不像塞琉古王朝那样，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周围全是西亚本地人。处于西亚本地人的汪洋大海中，塞琉古国王们所建立的数十座希腊式城市就像是几十个小岛，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不抱成团，不相互认同，怎能平安地生活下去呢？

西亚本地人人数众多，他们之中有些人（主要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希腊式城市中的居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较大，但更多得多的本地人并非如此。从地中海的东岸，越往东走，或越往内地走，城市中的东方文化的色彩越浓郁。这里的城市大多是原有的，新建的不多。在这些以本地人为主的城市中，虽然也可以看到一些希腊商人，或有少数希腊人定居下来，但丝毫不改变这些城市的本地生活方式、本地风俗习惯和东方的宗教信仰。就连巴比伦城这样古老的、一度成为政治中心的著名城市，希腊人、马其顿人虽说不少，但很难认为它变成了希腊式城市。

塞琉古王朝管辖范围内的原有城市，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具有下述三个文化特征：

第一，这些城市的居民主要是本地人，他们是东方宗教的虔诚的信徒。东方式的宗教信仰不仅体现在众多信徒的宗教意识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神庙活动之中。神庙是本地人经常光临的场所，他们重仪式，重祭祀，在神与人的关系上，神居于无上崇高的位置，人则是受神庇护，受神指使，听受神的旨意的渺小生灵。国王被认为是神的化身、神的传人。

第二，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这与希腊式城市中妇女的地位截然不同。在这些希腊式城市中，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可以参加公共生活，可以担任公职；尽管城市事务的大权仍

由男性掌握，但妇女的自由仍是有保证的。但一般家庭的妇女，包括希腊式城市中一般家庭的妇女，却受到东方文化和社会惯例的束缚。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地位，可以出来做工，但这丝毫不改变她们受到父亲或丈夫的约束，她们无法摆脱附属于父亲和丈夫的地位。① 还有，抛弃女婴的现象在塞琉古王朝的城市中是普遍的，即使是有钱人家也抛弃女婴。②

第三，在塞琉古王朝的原有的城市中，希腊语的使用不普遍。希腊语只通行于上层社会的一部分人，中下层社会之间全使用本地的语言，日常交易中也使用本地的语言。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穿着的服装也全是东方式的。

当然，对于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化程度可以归结为：上层社会的希腊化程度大大超过中下层社会，希腊式城市的希腊化程度大大超过原有的以本地居民为主的城市；同时，所有城市的希腊化程度又大大超过农村。

罗斯托夫采夫在论述塞琉古王朝的移民政策时，曾这样写道："当我们讨论希腊化时，我们实际上在使用一个现代的、而不是古代的概念。"③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并未使用希腊化这个概念，后者是现代研究者强加给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罗斯托夫采夫接着写道："希腊人在他们的长期历史中从未试图使任何人希

① 参看 T. R. 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207—208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407—408 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502 页。

腊化。"[①]这句话表明：希腊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不是希腊化王国中的任何一个王国实施某种政策的产物。日常生活方面尤其如此。

而且，即使在某些场合不能否认塞琉古王朝的政策的作用（例如塞琉古王朝建立希腊式城市，或鼓励希腊移民来到西亚，或规定希腊语为官方语言，等等），但也不能忽略，塞琉古王朝既在促使本地人希腊化，又在促使希腊人本地化、东方化。[②] 如果说希腊化是政策影响之一的话，那么，是不是也应当承认东方化也是政策影响之一呢？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说，"希腊移民逐渐成为本地诸神的崇拜者，他们用希腊名字来称呼本地诸神"[③]。这就是明显的东方化。又如，有的原来只祭祀希腊神的神庙后来逐渐变成了也祭祀东方神的神庙。[④] 可见，文化的渗透力远强于政策的影响力。

## 五、犹太人

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中，犹太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塞琉古王朝的兴盛和衰落都同犹太人有一定关系：兴，在于塞琉古王朝采取宽容政策，既有利于塞琉古王朝的社会稳定，又有利于塞琉古王朝经济的发展；衰，在于塞琉古王朝后来对待犹太人的政策的转变，变为排斥犹太人，打击犹太人，从而引发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02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同上书，第522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523页。

犹太人的起义，大大损害了塞琉古王朝的国力。

关于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犹太人问题的由来，有必要从亚历山大东征谈起。亚历山大东征时，先占领小亚细亚，然后沿地中海东岸南下，一路击败波斯帝国军队，进入叙利亚，大马士革城向马其顿人投降。同时，腓尼基人的首府西顿也归顺了马其顿。接着，亚历山大率军继续南下，以征服埃及为目标。途中，腓尼基南部海港提尔城，驻扎军队，港口还有一支强大的腓尼基舰队。腓尼基人在提尔城抵御马其顿军队，经过激战，亚历山大攻占提尔城，大肆屠杀，把俘虏全部变卖为奴隶。腓尼基以南是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聚居地区。巴勒斯坦北部城市耶路撒冷向亚历山大投降，亚历山大采取了宽容政策。“根据犹太教资料，亚历山大进入耶路撒冷后准许犹太人继续信仰先前的传统，奉行犹太教律法，并免征该年的赋税。”①不仅亚历山大善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且“犹太人要求亚历山大也同样对待在巴比伦的教友，他也同意了”②。

归顺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得到了亚历山大善待的结果是，当地的犹太人对亚历山大产生好感，③也对他们接受希腊文化具有积极作用。④

但犹太人聚居地区如果抵抗亚历山大军队，那么亚历山大依旧会毫不容情地予以严惩。例如，耶路撒冷以南的城市加沙

---

①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43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103页。

抵抗激烈，被马其顿军队攻下后，居民惨遭杀戮。

巴勒斯坦被亚历山大占领后，从西亚通往埃及的陆路畅通了，马其顿军队由此进入埃及。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庞大帝国分裂、分治，巴勒斯坦成为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长期争夺的地区。塞琉古王朝统治了西亚，包括两河流域、巴比伦、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以及两河流域以东的伊朗高原、小亚细亚南部和印度河畔。这一大片土地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最富饶地区，三个王朝都想夺取，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处要害，是西亚进入埃及的必经之道，争夺尤为激烈。后来，塞琉古一世和托勒密一世联手击败了安提柯一世，安提柯一世的势力才被逐出西亚和小亚细亚，转入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此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争夺战便在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间进行。这就是前面已提到的五次叙利亚战争。五次叙利亚战争，断断续续，从公元前 276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195 年，长达 81 年之久。在叙利亚战争过程中，巴勒斯坦成为拉锯的战略要地，时而归托勒密王朝统治，时而归塞琉古王朝统治，相对而言，托勒密王朝占领巴勒斯坦的时间较多。直到第五次叙利亚战争结束，巴勒斯坦才最终被纳入塞琉古王朝版图，埃及丧失了对地中海东海岸的控制权。

犹太人长期居住在巴勒斯坦。在亚历山大去世的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托勒密和塞琉古两大力量对峙的夹缝中生存”①。长期的战争，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生活动

---

①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9 页。

荡，家园屡遭破坏，其中不少人离开巴勒斯坦，进入塞琉古王朝境内的其他城市避难、谋生。在当时的希腊化国家中，人们通常按照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居民们惯用的标准，把会讲希腊语的人和不会讲希腊语的人清楚地划分为两类：会讲希腊语的人被视为希腊人，不会讲希腊语的人则被视为“蛮族”。[①] 由于亚历山大对于归顺的西亚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采取宽容的政策，希腊文化自从亚历山大征服西亚以后已经传播开来，成为文化变迁的主流，[②]所以进入塞琉古王朝境内其他城市的犹太人不仅学习讲希腊语，而且也逐渐接受了希腊文化，他们还给自己起了个希腊名字。这样，进入其他城市的犹太人的生活比较安定，他们和希腊人之间相安无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至于仍然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则多数采取顺从占领者的态度：塞琉古军队占领巴勒斯坦时服从塞琉古王朝；托勒密军队占领巴勒斯坦时服从托勒密王朝。

进入塞琉古王朝各个城市的犹太人内部是有很大凝聚力的。不仅犹太教信仰和犹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常常紧抱成团，而且离乡背井的遭遇也迫使他们必须互助互信，这才使他们找到谋生之道，平安地生活在异乡。犹太人虽然渐渐学会了希腊语，但他们内部仍通行犹太人的民族语言。除了工作上、业务上和需要而同非犹太人来往而外，平时他们很少同非犹太人来往。

犹太人在塞琉古王朝的城市中，有担任公职的，开手工业作

---

① 参看卡尔德利斯：《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4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25页。

坊的，从事自由职业的，也有经商的。要知道，这个时期的犹太人还不是一个以经商或经营货币业务为最重要谋生手段的民族，所以从商的并不多，而且主要是开设小商店或从事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贩运。塞琉古王朝这时仍奉行对待犹太人的宽容政策，并不歧视犹太人，允许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教堂和神职人员。犹太人作为离乡背井的谋生者，处事很谨慎，也很低调，所以他们同叙利亚人、波斯人、巴比伦人等相处也比较融洽。犹太人在塞琉古王朝境内受歧视和受打击，并被视为异教徒，是在公元前 168 年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人为非法之后。关于这一点，本章下一节将会分析。

其实，在安条克三世为国王时，塞琉古王朝对待犹太人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好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在安条克三世击败托勒密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帮助塞琉古军队肃清了暗藏在耶路撒冷的埃及士兵，从而得到了安条克三世的嘉奖。安条克三世“颁发诏书，宣布对犹太人的优惠政策，包括对城市及圣殿建设的经济援助，免除祭司及圣殿神职人员的税务，免除耶路撒冷居民三年的税务并减税三分之一”①。在政治上，安条克三世也宽待犹太人，如允许犹太人“可以继续享有在波斯及托勒密时期享有的一些特权，并按自己的传统与宗教而生活等等”②。

为什么安条克三世采取如此优惠犹太人的政策？“也许不

①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1 页。
② 同上。

仅仅是为了答谢犹太人的善意和仿效波斯人的宽容。”[①]可能安条克三世有更深刻的政治态度。罗马共和国这时已经崛起，它已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确立了自己的霸权，正伺机东侵。塞琉古王国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急，竭力想调整政策：“塞琉古王国需要一个稳定的联邦王国”[②]，一方面要安抚犹太人，另一方面要准备迎战日益强大的罗马共和国。优待犹太人，从属于塞琉古王朝绥靖内部的需要。此外，安条克三世还想笼络托勒密国王，他把女儿嫁给了托勒密五世。[③]

犹太人在塞琉古王朝境内各个城市逐渐成为散居的民族。散居就是指一个民族散居于各地。犹太人最早不是散居的，他们集中居住于巴勒斯坦。“散居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征。”[④]马其顿人、希腊人来到西亚后，都是散居的，犹太人也渐渐变成散居。塞琉古王朝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为犹太人在异教城市定居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保障”[⑤]。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伴随着犹太人的散居，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遇，有所交融。”[⑥]

在塞琉古王朝首都安条克，有许多犹太人，其处境同本书下一章（第十三章）将会提到的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里亚

---

①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1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西欧文明》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09 页。

⑤ 同上书，第 109—110 页。

⑥ 同上书，第 110 页。

的犹太人一样，享有特权，[1]也就是与希腊人相同的权利。[2] 犹太人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显然是高于本地人的。这很可能是塞琉古王朝和城市当局出于稳定社会和繁荣经济的考虑，决定对散居的犹太人实行优待的政策。[3]

尽管犹太人在塞琉古王朝各个城市中不受歧视，但为什么他们仍然采取很少同外界来往的生活方式，并且常常住在同一个街区呢？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参加宗教活动的需要。犹太人都信奉犹太教，一个犹太教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便是犹太人聚集和交流的地方。同时，依照犹太人的传统，规定犹太人不得与非犹太人通婚，犹太人也不准独身，所以他们在塞琉古王朝的城市中常住在同一个街区，是有道理的。

一般的犹太人在城市中，生活简朴，远离奢侈的生活，甚至禁酒，禁止到歌舞场去寻乐。塞琉古王朝前期，这种传统一直被坚持，后来才有所松弛。变化是从犹太人学习希腊语开始的。前面已经指出，由于政府官员和城市上层人士之间通行希腊语，过的是希腊式的生活，所以不少犹太人，包括犹太人的上层社会人士、准备从事公职的人士，或是在政治上有抱负的犹太人，都忙于学习希腊语，以便有朝一日能进入希腊上层社会的社交圈。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还勤于学习希腊人的礼仪，过希腊式的生活，花钱大手大脚。[4] 当然，这不是犹太社会的主流。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368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377 页。

④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 年，第 104 页。

犹太社会的主流是什么？依然是遵循本民族的传统、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且有钱而不外露。关于犹太人对希腊生活和文化的向往，犹太教徒中的虔诚者，“对此感到恐怖”①，他们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更不能同意本民族的成员越来越希腊化了，从而他们“在崇拜皇帝方面后退，农民则对所有外国的事物摇头”②。这种情绪在犹太人中间滋长，显然不合塞琉古国王的心意。加之，犹太教的神庙里积蓄了很多金银财宝，引起塞琉古国王的注意，总想找个机会把它们攫为己有。③ 关于这一点，下面会有较详细的记述。

## 第三节 塞琉古王朝的衰亡

### 一、马格尼西亚战役：塞琉古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前面已经提到，在安条克三世任塞琉古国王以后，通过第四次叙利亚战争和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两度击败托勒密王朝的军队，使塞琉古王朝又恢复了军事强国的地位。但安条克三世最大的失误是错误估计了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国际形势，同迦太基结盟，跟罗马共和国直接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安条克三世低估了罗马的军事实力，低估了罗马元老院摧毁迦太基的决心。④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3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104页。

④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2页。

结果，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一役中，塞琉古军队被罗马军队击溃。塞琉古军队不得不退出色雷斯和希腊中部。但罗马元老院不依不饶，准备乘势南进。公元前188年，塞琉古王朝被迫与罗马订立屈辱性的和约，永远放弃小亚细亚。这对于塞琉古王朝此后的影响极大："小亚细亚从此丧失。陆上通往希腊本土和通往小亚细亚希腊港口的道路永远被切断了。"①从经济上看，马格尼西亚战役之后，对塞琉古王朝打击最沉重的是地中海地区贸易优势的失去。小亚细亚既然已经丢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港口城市也受到罗马的控制。色雷斯丢失了，由塞琉古境内通往黑海周边地区和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商路也被截断。"叙利亚商人变得依赖于罗得斯岛和提洛岛的善意的协助，而后者已越来越成为罗马的港口了。"②塞琉古王朝为了避免罗马军队进一步进攻，还不得不派出王子到罗马做人质。③

公元前190年的马格尼西亚战役是塞琉古王朝走向衰亡的开始。

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187年因病去世。其子塞琉古四世继位。据说，塞琉古四世渴望和平，以节俭和智慧治理国家，④不幸于公元前175年遇刺身亡。塞琉古四世的长子德米特里本来

---

①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59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年初版，1976年重印，第460页。

④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2页。

可以正式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但他正作为人质留在罗马，无法脱身回国。[①] 于是塞琉古四世的弟弟在帕加马王国的帮助下，匆匆返回首都安条克，登上王位，称安条克四世。[②]

安条克四世是一个昏君，他听任官员腐败，不问不管。无论是中央政府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在他的纵容包庇下，都恣意搜括民财，滥用刑罚，以致怨声载道。他甚至赐给自己的情妇管辖三个城市的权力。[③] 他还不顾国力已衰的事实，仍花费大笔钱财，以振兴希腊文化为名，重修神庙，新建剧院、体育馆、竞技场，并把血腥的角斗竞技引入塞琉古王朝境内。[④]

安条克四世还十分好战，于公元前 169 年试图征服埃及，率军攻入埃及，对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呈包围之势，只是由于罗马出面干涉，才不得不撤兵。他由于挥霍无度，财力空虚，竟下令洗劫耶路撒冷的犹太神庙，掠夺金银财宝，激起犹太人的愤怒和反抗，他又于公元前 168 年宣布犹太教为非法，使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大为增加。[⑤] 最为荒唐的是，在塞琉古王朝已经衰微的情况下，他竟仿照亚历山大开创马其顿帝国时的东征活动以及安条克三世东征印度的事迹，准备率兵再一次东征。公元前 164 年，在东征期间，“以癫痫、疯狂或其他疾病死于前往波斯的途

---

①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272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22 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 422—423 页。

⑤ 详见本节的第四部分“犹太起义”。

中”①。

正如历史学家所评论的：塞琉古王朝的衰亡正是从安条克四世执政时期开始的。② 马格尼西亚战役的失败只是拉开了塞琉古王朝由盛转衰的序幕。如果塞琉古四世不被暗杀，致力于整顿朝政，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也许还可以使塞琉古王朝转危为安，因为当时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精力正在全力对付安提柯王朝，“罗马元老院在处理叙利亚问题时，所关心的只有一个：让塞琉古王朝无害于罗马”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安条克四世在位的11年间，塞琉古王朝终于一步步走向崩溃和灭亡。

## 二、地方割据和独立

### （一）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冲突

前面在谈到塞琉古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时已经指出，大权由国王独揽，军队由国王统帅，国王任命和派遣分掌各个行省要害部门的行政长官，不实行分封制。虽然城市被允许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城市必须听从国王的旨意，不得有分离倾向。这样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是不是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财力，国王本人有没有足够的威望。国王是神，是神的化身或神的传人，这种政治理念尽管有

①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②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323—前30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年，第272页。

③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2—103页。

一定的作用，但国王掌握的实力依然是核心问题。塞琉古王朝前期，由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强大，是能够维持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就会发现，在塞琉古王朝始终存在着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的斗争。对塞琉古的国王来说，在这一大片原波斯帝国的领土上，向心力本来就是不强的。这里的居民，除了少数跟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和后来陆续移民西亚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而外，其他都是被亚历山大征服的当地居民，他们怎么可能向心于出身于马其顿的塞琉古国王家族呢？希腊文化的影响可能有助于向心力的增长，但在被征服的中亚地区，“没有一个全盘接受希腊文化”①；至于在小亚细亚、叙利亚、黑海沿岸地区，“乡村里的人民大众也从来没有受过希腊文明的影响，他们墨守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②。这就谈不上向心力的存在和增强了。那么，在塞琉古王朝前期，这些缺少向心力的地区为什么仍由国王统治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叛离中央的行动？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由于当时中央政府有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柱，在各个行省驻扎军队，维护稳定。地方稍有叛离迹象就会遭到镇压，支持叛乱的当地居民，或遭到杀戮，或全村人口被变卖为奴隶；而且塞琉古王朝当时军队的主力是“公民方阵”，即由希腊人组成的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1 页。

方阵，[1]战斗力强。虽然当时也有外邦人组成的雇佣军，但平时经常分散使用于各地的警备队，[2]有时也作为轻步兵、弓箭手等。[3] 塞琉古王朝一般不用本地人为兵士，以免他们叛离中央。

第二，由于塞琉古一世制定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税收政策等。在民族政策方面，塞琉古一世虽然重视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但并不歧视西亚当地人，他们可以迁移进城，可以从事工商业和自由职业，也可以担任公职（中层公职较少，基层公职较多），只有王室土地上的农民需要定居在农村。在宗教政策方面，塞琉古一世容许境内各种不同的宗教存在，当地的神庙依然是地方宗教中心，祭司的权力和社会地位都受到尊重。希腊人信奉希腊的宗教，有自己的神庙、自己的祭司、自己的祭祀活动，但并不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塞琉古王朝没有国教，没有某种宗教独尊的现象。在税收政策方面，塞琉古王朝前期财力充实，税收并不很重，民众的生活还过得去。同时，国王还让军队进行屯垦，不仅可以安定军心，使兵士和退伍老兵各有一块耕地，防止扰民，而且也减轻了财政的负担，使地方经济得以发展。

以上这些措施可以起着减弱离心力的作用。但一个像塞琉古王朝这样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体制是经不起对外战争的大败的，也是经不起财力的削弱的。对外战争的大败，必然使军力削

---

① 参看塞孔达："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陆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43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弱，中央政府控制境内各地的能力就骤然下降，离心倾向便会滋长，导致地方割据甚至独立。而财力的削弱又必然使税赋加重，地方负担加重，这也会激起地方的反抗。在离心倾向增大的情况下，塞琉古王朝的大一统局面就会消失。正如一幢大楼一样，基础动摇了，支柱垮掉了，大楼的解体和倒塌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其实，早在公元前190年马格尼西亚战役之前，塞琉古王朝统治地区就已发生了地方分离和割据的例子。

印度河流域和中亚细亚腹地，是最早脱离塞琉古王朝管辖的地区。在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中亚细亚腹地很晚才被马其顿人占领，而且是在遭遇激烈抵抗后才进驻的。这些地方即使在波斯帝国时期，也谈不上是波斯的疆土，所以亚历山大占领和塞琉古王朝继承后，它们对塞琉古王朝只有离心力而没有向心力。印度河流域同样如此，亚历山大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占领，占领以后印度河流域仍不平静，不断发生反对马其顿人的战争。塞琉古王朝接受亚历山大帝国的遗产，但无论是中亚细亚腹地还是印度河流域都只是名义上归塞琉古国王统治，实际上却归属于当地的王公贵族或部落领袖。塞琉古王朝终于认识到，这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了，只得撤回驻军，放弃该地。

公元前3世纪中叶起，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间发生了多次叙利亚战争。这就为巴克特利亚、亚美尼亚、帕提亚摆脱塞琉古王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二)巴克特利亚

巴克特利亚位于原波斯帝国的东北部边境一带，包括中亚细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这两条河流都注入咸海），相当于现

在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里海东部地区的一些游牧部落经常在这里活动。这里文化闭塞，经济落后，民众剽悍。直到亚历山大东征时，这里还保留着这样一种陋习，即病人和老人被扔给守候在一旁的狗吃掉，这种狗在巴克特利亚语中称作“丧葬狗”。[1] 是亚历山大最早给这块野蛮土地带来了文明——希腊文明。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在这一带留下了若干总督，进行地方的统治。[2] 亚历山大去世后，塞琉古王朝接管了巴克特利亚地区，辟为一个行省，由国王派出总督管辖。由于当地水草丰盛，土地肥沃，所以吸引了一些希腊移民，并且建立了希腊式的城市和集镇。公元前 250 年左右，塞琉古王朝巴克特利亚总督狄奥多特乘塞流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为争夺叙利亚而战争不休的机会，割据称王。他脱离了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但这时还依附于塞琉古王朝。[3] 塞琉古国王塞琉古二世承认狄奥多特的巴克特利亚的半独立地位，并且很可能还把自己姐妹中的一人嫁给狄奥多特，以便争取狄奥多特依旧承认塞琉古王朝的主权。[4] 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这一片中亚土地已经不再归属塞琉古王朝了。[5] 狄奥多特死于公元前 230 年左右，其子继位，称狄奥多特

①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5 页。

② 参看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陶笑虹、庄万友、周柏青等译，涂厚善校，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63 页。

③ 参看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72—73 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542 页。

⑤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602 页。

二世。为了摆脱塞琉古王朝势力的威胁，狄奥多特争取到新独立不久的帕提亚王国国王提里台特的支持，继续对抗塞琉古王朝的中央政府。①

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王朝粟特行省（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东部）总督欧提德姆攻占了巴克特利亚，杀死了狄奥多特二世，于是粟特和巴克特利亚两个行省合并为一，称巴克特利亚王国，完全脱离了塞琉古王朝。巴克特利亚就是中国史书中所称的大夏国。② 无论是狄奥多特还是欧提德姆，都是希腊人。他们首先依靠希腊人组成的军队的支持，否则是难以摆脱塞琉古王朝的统治的。③ 欧提德姆是巴克特利亚这一希腊化王国的真正创立者。④

新建立的巴克特利亚不仅国王是希腊人，而且军官和地方高级官员也都是希腊人。他们把自己同本地人即“蛮族”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一直不同意“混入到蛮族人中间去”的想法，⑤尽管也使用本地人或西亚其他地方的人作为基层官员和士兵。在巴克特利亚和粟特两省，以前就有一些希腊式城市，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亚历山大时期建立的，并且是军事要塞，至少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42页。

② 参看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11—15页。

③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603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42页。

⑤ 参看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7页。

一部分居民是希腊人。[1] 塞琉古王朝建立后，在境内按希腊风格又建立了不少希腊式城市，其中包括了在巴克特利亚建立的城市，这些城市以后一直保存下来。[2] 可见，希腊人领导的巴克特利亚王国的建立，实际上是塞琉古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激化的反映，也是在中央政府权力削弱条件下，地方实力派高层人士乘机割据的产物。

然而，当时的塞琉古王朝尽管卷入了同托勒密王朝的长期战争，但毕竟处于强盛阶段，它是不能容忍像巴克特利亚王国这种割据势力得逞的。公元前 208 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出兵击败了巴克特利亚国王欧提德姆的军队，双方议和，约定巴克特利亚王国继续存在，但其领土限定为以前的巴克特利亚和粟特两省，不得扩大；欧提德姆仍为国王，但必须承认是塞琉古王朝的属国，有义务向塞琉古王朝提供军需给养和战象。

为什么安条克三世在战胜巴克特利亚军队之际还承认欧提德姆继续任巴克特利亚国王，并让巴克特利亚王国继续存在呢？一来是因为安条克三世的重点放在同托勒密王朝争夺叙利亚的战争上，不想分散军力来对付巴克特利亚军队，更重要的可能是：从塞琉古王朝的总体利益来考虑，保留一个作为属国的希腊化王国——巴克特利亚王国——是有利于塞琉古王朝东部安全的，因为“巴克特利亚是希腊文明的前哨”[3]，巴克特利亚挡住了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547 页。

②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第 269 页。

③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76 页。

中亚细亚腹地游牧部落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削弱巴克特利亚国，这对希腊人将是致命的打击”①。这样，塞琉古王朝于公元前206年承认巴克特利亚国王的国王称号，一个重要条件是“后者应当负责保卫北部边境，免遭萨迦游牧人的进攻”②。

当然，这只不过是双方的暂时妥协，国际环境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因为罗马共和国已经兴起，正竭力向地中海东岸地区扩张其势力。但不管怎样，从经济上看，巴克特利亚的发展是有很大潜力的，只要给它以时间，它会越来越富庶。这是因为，塞琉古王朝过去管辖的巴克特利亚行省和粟特行省都是水草丰盛和土地肥沃之地，尤其是粟特行省，资源十分丰富，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兴旺，所生产的马匹远近驰名，只要有和平发展的环境，它会富裕起来，所以欧提德姆承认自己是塞琉古王朝的属国，正是为了赢得发展的时间。他着手巩固自己统治的地盘，静待形势的变化。③

此外，欧提德姆所占据的地盘，处于由印度通往两河流域和叙利亚的通道上，境内有一些著名城市和集镇，印度的特产（如象牙、香料等）、叙利亚的特产（如玻璃等手工业品）都由商队运输过境，并部分在此地交易。由此向北，商路进入西伯利亚和南俄罗斯，也是通畅的。商业的繁荣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欧提德姆巩固自己的统治。④

---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545页。

④ 参看同上。

公元前201—前195年,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间的第五次叙利亚战争爆发,安条克三世获胜,进入埃及境内,包围了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埃及向罗马求援,安条克三世在罗马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撤出埃及。接着安条克三世为了支持安提柯王朝同罗马发生正面冲突。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战役中被罗马军队大败,丢失了小亚细亚。巴克特利亚王国的政局也发生了变化,欧提德姆国王大约于公元前190年去世,其子德米特里继位(约公元前190—前160年)。德米特里乘塞琉古王朝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大败之机,不久就宣布不再受当初欧提德姆和安条克三世所订和约的束缚,不再把疆土局限于原巴克特利亚和粟特两省,派兵占领了伊朗高原东部、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德米特里在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以后,就长期驻在那里,不返回巴克特利亚,奢羯罗成了他的政治中心。”①

就在德米特里逗留于印度西北部不归的同时,大约在公元前174年,在巴克特利亚发生了政变,欧克拉提德斯夺位称王,“此人似与塞琉古王朝皇室有亲族关系,故完全依附于塞琉古王朝”②。他同样是希腊人,而且更进一步推广希腊化。③ 为了巩固政权,他率军攻打德米特里,并进入印度西北部,德米特里大约在公元前160年被杀或被废。④ 但来自中亚细亚腹地的游牧民族仍不断地向巴克特利亚王国进攻,直到把它逐出中亚细亚,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77—79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79页。

退居印度西北部。[1] 最后，巴克特利亚王国可能被自中亚细亚南下的大月氏人所灭。[2] 大月氏各部落后来在这一带建立了贵霜王国。

(三)亚美尼亚

在黑海和里海之间以及黑海东南沿岸一带居住着亚美尼亚人。大约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以前，亚美尼亚人就是一个与西亚人操着不同的语言的民族，在这里活动，以游牧为生。[3] 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亚美尼亚一度归米底王国统治，居鲁士征服了米底王国，从而把米底人控制的两河流域、叙利亚、小亚细亚腹地和亚美尼亚一并纳入自己的版图，稍后亚美尼亚又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亚米纳行省。[4] 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时，他的军队可能到过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但亚历山大本人并未去过。而在波斯军队中，则有亚美尼亚人。他们的服饰是典型的波斯服饰。[5] 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亚美尼亚人受波斯帝国统治，不仅每年需要向波斯帝国纳税，而且还要向波斯国王进贡马匹。[6] 亚美尼亚人当兵为波斯帝国出战，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后，亚美尼亚

---

① "公元前2世纪，巴克特利亚的希腊人在(印度)西北部定居下来。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些国王都热衷于铸造钱币。主要是依靠古钱学的证据，它们的历史面貌才得到部分的恢复。"(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陶笑虹、庄万友、周柏青等译，涂厚善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页)

② 参看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8页。

③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8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49、51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294页。

⑥ 参看同上书，第355页。

人居住的地区也就归亚历山大所管辖，亚历山大派遣在萨迪斯开门投降的波斯官员密特里尼斯为亚美尼亚总督，“但他似乎从未有效地控制过亚美尼亚”①。这意味着在亚历山大统治西亚时期，亚美尼亚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原波斯帝国太大了，谁顾得上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偏远地区呢？

亚历山大死后，西亚地区落入塞琉古王朝手中。亚美尼亚人居住的西部地区，即被称为小亚美尼亚的地区，处于塞琉古王朝统治之下，有向塞琉古国王纳贡的义务，它实际上仍是独立的。亚美尼亚人居住的东部地区，即被称为大亚美尼亚的地区，表面上归顺了塞琉古王朝，但由本地的世袭领主按自己的治理方式治理，归顺塞琉古王朝只是表面上的承诺而已。但塞琉古王朝这时是强盛的，黑海南岸地区和里海沿岸一带仍归塞琉古王朝管辖，所以大亚美尼亚和小亚美尼亚始终未能合并、统一。②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公元前2世纪初年。公元前190年，塞琉古军队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被罗马击败后，塞琉古王朝不得不放弃小亚细亚。于是亚美尼亚人乘机摆脱了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并形成了一些小国。这就是“最早的完全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③。由于大亚美尼亚地区和小亚美尼亚地区尽管实际上都是独立的，但形式上仍尊奉塞琉古国王为最高权威，而塞琉古

---

①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625页。

②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592页。

③ 同上书，第593页。

王朝又推行希腊化政策，官方语言是希腊语，这些都激起亚美尼亚人的反感，因此，一些亚美尼亚人国家的形成“与当地居民的反希腊化运动有一定程度的关系”①。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这些亚美尼亚人的小国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强国。这时塞琉古王朝已经越来越衰弱了，它已经没有实力抗拒亚美尼亚人的西征和南下了。统一的亚美尼亚国家的军队侵占了塞琉古王朝所控制的底格里斯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还一度攻下叙利亚和腓尼基的一些富裕的商业城市。② 塞琉古王朝的命运岌岌可危。至于小亚美尼亚和大亚美尼亚归属于罗马，则是在罗马消灭塞琉古王朝以后很多年。罗马皇帝尼禄临朝时期取消了小亚美尼亚的半独立地位；韦斯巴芗安临朝时期，把这里辟为一个行省；到了图拉真临朝时期，又占领了大亚美尼亚，也设立了一个行省。③

（四）帕提亚

帕勒—达依人居住在黑海东南沿岸一带，包括现代伊朗的东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南部，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这一带原来是波斯帝国的领土，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后，统治这一带。亚历山大死后，这一带又归塞琉古王朝管辖。

帕勒—达依人一直反抗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公元前3世纪

---

①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593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596页。

③ 参看J.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8页。

中期，他们发动起义，部落首领阿尔息斯建立帕提亚王国，自称国王，这就是帕提亚阿尔息斯王朝的开始。中国史书上把帕提亚阿尔息斯王朝称为安息。①

据阿尔息斯王朝自称，其家族的祖辈做过塞琉古王朝帕提亚省的省长。② 再往上推，可能与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王族有关。③ 这也许同阿尔息斯家族为了巩固政权而攀上王族血缘关系，以证明自己领导伊朗人执政的合法性有关。④ 跟随阿尔息斯家族一起来到伊朗东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南部的，还有中亚细亚的游牧民族萨迦人，阿尔息斯把萨迦人编入骑兵并成为帕提亚王国骑兵的主要成分，战斗力很强。⑤ 阿尔息斯还赏赐他们大块土地，以获取他们的忠诚。⑥ 这样，帕提亚境内的萨迦人也就与当地的农民混合了，信仰同伊朗人一样的宗教，成为地道的伊朗人。⑦

帕提亚王国与另一个产生于中亚地区南部和伊朗东部的巴克特利亚王国不同。前面已经提到，巴克特利亚王国的国王和高层官员都是希腊人，推行希腊化政策，崇尚希腊文化，而帕提亚王国的国王和高层官员都是伊朗人，还有后来融入伊朗人社会的中亚细亚游牧民萨迦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信

---

① 参看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5、38—43 页。

② 参看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黄民兴著，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56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74 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 75 页。

⑥ 参看同上书，第 74 页。

⑦ 参看同上书，第 75 页。

仰，自己的风俗习惯。但这不排除在它们两国初创阶段的结盟，以便对付共同的对手塞琉古王朝。

但应当注意到，虽然帕提亚王国把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视为压迫者和敌人，帕提亚王国在建国初期却热衷于学习希腊化国家的制度、文化和城市治理方式。“安息统治者在早期竟宣称自己是‘希腊迷’，仰慕希腊文化，采用希腊的语言和艺术。”①这很可能是帕提亚王国在建国之初由于缺乏治国经验所致。随着帕提亚王国的政局逐渐趋于稳定，“统治者便抛弃希腊化的政策，提倡帕提亚（即伊朗）民族主义”②。

公元前 190 年塞琉古王朝军队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被罗马军队击败，元气大伤，接着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 187 年去世。帕提亚王国乘机加剧了反对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统治的斗争，由东向西扩展自己的版图。此时的帕提亚国王密特里达提一世（公元前 171—前 138 年）的兵力日益强大，成为塞琉古王朝东方的劲敌，伊朗高原西部和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都被帕提亚军队攻占。塞琉古王朝退到幼发拉底河西岸，防御帕提亚军队续续西进。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帕提亚军队攻占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美索不达米亚的最重要的希腊式城市塞琉西亚也落入帕提亚王国之手。塞琉古王朝根本抵挡不住帕提亚军队的西进，因为“当地的居民常常欢迎帕提亚人的到来，他们把帕提亚人看成是他们摆脱希腊—马其顿的压迫的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 74 页。
② 同上书。

救星"[①]。这是很自然的，在伊朗人看来，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灭亡已经将近二百年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这一带这么久了，应该赶走希腊—马其顿人。他们坚信恢复伊朗人自己的帝国的时候已经来临。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帕提亚王国的战略有所调整，它认为自己后方的巩固是最重要的，后方就是帕提亚的东部地区。巴克特利亚王国此时已经衰败，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来自中亚细亚腹地和阿富汗的游牧民族正陆续南下，他们不会以占领巴克特利亚的大部分领土为满足，他们会威胁帕提亚王国东部边境的安全。于是公元前 2 世纪末年，帕提亚王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东方，把伊朗高原东部、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收入版图，并把阿姆河作为帕提亚王国的国界。[②] 在这期间，塞琉古王朝暂时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塞琉古王朝心有不甘，它不自量力，企图乘帕提亚王国把注意力放在巩固后方之机收复两河流域，结果大败。帕提亚王国也不敢对塞琉古王朝掉以轻心，东部边境既已巩固，它的战略重心又移到了西部。[③]

此时塞琉古王朝的形势已十分危急。它处于西有罗马、东有帕提亚的两面夹击之中。幸亏这时亚美尼亚已经成为另一个强国，它既想夺得两河流域这块肥沃的土地，又想扩大在小亚细亚的地盘，还想把西部繁荣地带的叙利亚攫为己有，于是亚美尼亚同塞琉古王朝、罗马共和国、帕提亚王国三方都有正面的冲

①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610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613 页。

③ 参看同上。

突，相互牵制。这样，塞琉古王朝总算还能在夹缝中又生存了几十年。

此外，在帕提亚王国和叙利亚之间，在叙利亚的沙漠地带，还有一支继续过着独立生活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部落中，有些紧挨着某些重要的马其顿军事移民区，并建立了它们对一些希腊—马其顿城市的控制。[①] 这是除罗马、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以外的另一支威胁塞琉古王朝的力量。这些阿拉伯部落是从哪里迁徙到叙利亚的？可能他们原来住在叙利亚以东的地区，是遭到帕提亚军队西进的影响而迁移来的。特别是在帕提亚王国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以后，他们就迁移到了叙利亚。[②] 可见，即使塞琉古王朝已经退缩到叙利亚了，这里同样不安定。

叙利亚境内有一些希腊式城市，它们或者是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建立的，或者是塞琉古王朝前期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只赋予这些城市有限的自治地位和自治权。尽管它们要求更多的自治，但塞琉古王朝在国力强盛时仍坚持中央集权体制不变。现在，塞琉古王朝衰败了，已退缩到叙利亚一带。这里的城市几乎全都要求获得自由，国王只得恩准。[③] 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几乎完全政治独立了。比如说，它们有权铸造钱币，有权同外国签订协议等。[④] 可见，塞琉古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越来越狭小。等待着它的，只是王朝的覆灭。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42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843 页。

④ 参看同上。

## 三、帕加马王国并入罗马

帕加马王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脱离塞琉古王朝的过程，完全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巴克特利亚王国、亚美尼亚王国、帕提亚王国由割据走向独立的过程。

帕加马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爱琴海东岸。它原是古典时期的希腊移民城邦，多年以来一直比较安定和繁荣，它致力于发展农业，经营对外贸易。亚历山大东征后，制定了对待小亚细亚各个希腊移民城邦的政策，这些希腊移民城市都继续保持自治权。这种权利是作为同波斯帝国战争的产物而被正式宣布。[①]但这种自治权仅限于希腊人享有而不得给予蛮族臣民。[②]帕加马城邦就是因亚历山大的上述优惠政策而继续安定、繁荣。

亚历山大去世后，在部将们争夺继承权的过程中，帕加马也是争夺对象之一。公元前 301 年，帕加马归莱西马库斯统治。当时，争夺小亚细亚的主要作战方，一是安提柯一世，另一是塞琉古一世，莱西马库斯支持塞琉古一世，双方合力击败安提柯，夺得小亚细亚西部地区，莱西马库斯率军驻守帕加马，名义上隶属于塞疏古一世，实际上由莱西马库斯控制。莱西马库斯后来让他的侄子欧迈尼斯接班。

公元前 284 年，欧迈尼斯宣布独立，建立帕加马王国，自称国王，即欧迈尼斯一世。这是一个希腊人的国家。当时，希腊化王国当中，除了安提柯、托勒密和塞琉古以外，再往下数，就算是

---

① 参看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50 页。

② 参看同上。

帕加马王国了。[①] 但帕加马建国后,处境仍是相当艰难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常受到托勒密舰队的骚扰,而小亚细亚腹地又归塞琉古王朝统治,帕加马的北面还时常受到蛮族游牧部落的侵袭,它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②] 帕加马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它不想向小亚细亚的中部、南部和东部扩张,因为那里是塞琉古王朝控制地带,而且即使在小亚细亚西部,除帕加马以外,还存在着几个小王国,如比塞尼亚、本都等。[③] 欧迈尼斯一世作为帕加马国王,只想巩固自己的地盘,为此,他十分注意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它招募雇佣军,以壮大军力,使其他国家不敢来犯。[④]

在帕加马王国,奴隶劳动力被广泛使用。贩运奴隶是国内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之一。[⑤] 除了农业中使用奴隶而外,城市中也有大量奴隶。奴隶可能被派往矿山劳动,这些矿山或属于国王,或属于私人。[⑥]

帕加马王国手工业较发达,手工业中较普遍地使用奴隶干活。一个公民如果有点钱,他就可以投资兴办一家手工作坊,雇

---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154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米列塔:"国王和他的土地:关于希腊化小亚细亚王室土地的若干看法",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165 页。

④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第 46—47 页。

⑤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06 页。

⑥ 参看同上。

一个监工,再用上几个奴隶,就行了。[①] 这在希腊化国家是常见的事情,帕加马王国也一样。帕加马国内大多数手工作坊都是小型的,通常都是一个工匠带领少数奴隶在家里干活,生产手工业品。[②] 当然,帕加马王国也有一些大型的纺织工场,生产供外销的羊毛织品,那里使用了大批奴隶。[③]

在帕加马王国,王室的土地、牧场、矿山、森林和作坊、工场中都使用奴隶。[④] 政府机构中同样使用奴隶。奴隶有时还担任一定的职务,从事管理工作。与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农业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农业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很少,而在帕加马王国,农业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很多,有男奴隶,也有女奴隶,他们被用于大地产的耕种、经营和管理。[⑤] 这很可能是帕加马王国从母邦希腊一些城市采纳过来的。[⑥] 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帕加马原来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个希腊移民城邦,这里的手工业和商业向来比较发达,从希腊母邦一些城市移民到这里的,务农者的比较少,从事其他职业的比较多。加之,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广人稀,适合于大地产经营,当地没有那么多农民可作为佃户或雇工,所以就使用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

帕加马王国是富庶的,但财富也相当集中,大部分财富都集

---

①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 年,第 61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62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47 页。

⑤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261 页。

⑥ 参看同上书,第 1159 页。

中在国王手中。[①] 至于财富在国内各个居民群体中的分配情况，则同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相似，即国王周围的近臣们都是富人，城市中的一些富裕公民是靠国王的赏赐而增加财富的。[②] 如果说帕加马王国财富分配状况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巨大的财富迅速地在城市中产阶级手中积累起来，国内较富庶的地区更是如此。[③]

公元前241—前197年，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执政期间，曾击退了由色雷斯渡海而侵入小亚细亚的高卢人，解除了小亚细亚的恐慌，声名大振。他还同托勒密王朝结盟，共同对抗塞琉古王朝。阿塔罗斯一世武功显赫，在帕加马曾建立雅典娜圣殿以庆祝自己的胜利。[④]

帕加马王国的经济从这以后进一步发展，因为北方蛮族入侵的威胁解除了，商路畅通了，帕加马王国的威望也提高了。帕加马在手工业方面有一远近驰名的特产，即羊皮纸。帕加马的羊皮纸与埃及的草纸并称为当时西方世界的特种商品，都行销各国。由于羊皮纸昂贵而草纸价廉，所以帕加马致力于改进羊皮纸的生产工艺，不仅使羊皮纸的质量改善，而且制造成本也大大降低，进而推动了帕加马羊皮纸制造业的发展。[⑤] 此外，帕加马后来致力农业发展，转而盛产粮食，自给有余，大量出口。当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157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1157—1158页。

④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8—109页。

⑤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4—125页。

时，埃及是东地中海地区的粮仓，“帕加马的谷物输出仅次于埃及”[1]。

帕加马作为一个希腊化国家，力求在传播希腊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甚至想把帕加马城建设成为可以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媲美的希腊文化中心。当时，帕加马城有宫殿、公共广场、神庙、祭坛、剧院、竞技场和浴室等，全是希腊式建筑。尤其是帕加马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其藏书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至于托勒密王朝为了担心帕加马图书馆会超过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而禁止草纸出口。[2] 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在希腊化世界有几个希腊文化中心，排在前列的除亚历山大里亚外，就是帕加马城了。[3] 帕加马在保存和发展希腊人文主义方面，其重要性超过了安条克等著名的希腊化城市。[4]

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去世后，其长子欧迈尼斯二世继位（公元前 197—前 160 年）。由于帕加马王国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是站在罗马共和国一边的，所以在马格尼西亚战役结束后，它一直面临塞琉古王朝报复的威胁，便主动与罗马结盟。其实，罗马的当务之急是先彻底摧毁迦太基，统一地中海西部地区，同时要征服马其顿，消灭安提柯王朝，因为安提柯王朝同迦太基一

---

① 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76 页。

②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24—125 页。

③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152 页。

④ 参看同上。

起反对罗马。罗马这时并没有占领或合并帕加马王国的打算。[1] 罗马对小亚细亚和西亚地区的战略主要是稳住塞琉古王朝,使它不敢再向罗马挑衅,以维持权力的平衡。[2] 而帕加马的意图则在于自保,防止塞琉古王朝乘罗马把军队进攻的方向放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和希腊本土、马其顿之时攻打帕加马。帕加马还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作为罗马的盟友,可以同罗马分享战利品。这是有先例的,例如,希腊城邦纳比斯在安提柯王朝国王菲利普五世同意下,于公元前 197 年占领了阿果斯,帕加马那时就同罗马一起战胜了纳比斯,并分享了战利品。[3] 当时,纳比斯归斯巴达控制,帕加马对纳比斯的进攻就是对斯巴达的进攻。[4] 帕加马在罗马的支持下,认为后台硬了,不怕得罪斯巴达。这个例子告诉人们,帕加马结交罗马的战略由来已久。

但帕加马王国的亲罗马政策使希腊人感到震惊。[5] 有些人把帕加马视为希腊世界的叛徒。帕加马则认为,同塞琉古王朝相比,帕加马是一个小国,既然面临塞琉古王朝复仇的威胁,除了投靠罗马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加之,在欧迈尼斯二世和其弟阿塔罗斯二世(公元前 160—前 138 年)在位期间,高卢人再次肆虐于小亚细亚,这两位帕加马国王不得不忙于应付高卢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03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09—110 页。

④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第 74—75 页。

⑤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26 页。

人的攻击。[1] 这也可能是帕加马王国急于想结盟罗马的原因之一。

帕加马王国的亲罗马政策使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机会。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帕加马王国的以弗所城发展很快，已成为它的第二首都。这里港口设施良好，商业兴旺，成了成长中的贸易中心。[2] 帕加马王国更加富足了，帕加马城和以弗所城都列为当时希腊化世界最华丽的都城。帕加马王国的丰富的资源依旧由国王掌握。它的岁入同以往一样来自王国的税收，来自神庙、下属城市和依附于王国的各部落的贡赋。[3]

在这种形势下，帕加马乘塞琉古王朝势力退出小亚细亚之机，不断进入小亚细亚腹地。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二世在未继承其兄欧迈尼斯二世的王位之前（即公元前160年之前），作为王弟，曾经奉欧迈尼斯二世之命负责管理小亚细亚腹地，这里新开辟了大片王室土地，也由他负责经营。[4] 阿塔罗斯二世继位后，根据自己经营管理小亚细亚腹地的经验，把开放和开垦作为重点，在小亚细亚腹地变为国王个人直属的王室地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建立村庄，并着手向这里移民。[5] 这一政策既有助于增加农产数量，扩大粮食出口，又便于希腊人在这块新开垦

---

①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2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年，第91—92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804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米列塔："国王和他的土地：关于希腊化小亚细亚王室土地的若干看法"，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166页。

⑤ 参看同上。

的地区巩固自己的统治。当然，小亚细亚腹地的面积很大，帕加马王国所控制的只是小亚细亚腹地的一部分。但阿塔罗斯二世的做法同当初亚历山大设计的使小亚细亚腹地希腊化的方针相符。①

阿塔罗斯二世任帕加马国王 22 年。他一方面继续保持帕加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开发小亚细亚的腹地，并在那里推行希腊化。与此同时，他关心自己身后的帕加马王位继承人问题。他把兄弟欧迈尼斯二世之子，即后来的阿塔罗斯三世，立为王储。他要王储的老师对这位年轻人多方教育，以应付将会面临的新形势。② 在他临终前，他认为即将继承王位的阿塔罗斯三世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没有能力维护帕加马王国的安全，于是立下遗嘱，吩咐后者把帕加马王国转交给罗马共和国，由罗马人来管理。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不少人对此举大为不解，但阿塔罗斯二世就这么走了，因为他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办法"③。在他看来，既然"一个藩侯，一个受奴役的国王，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国土来应付小亚细亚那日高一日的混乱局面……(倒不如)把他的王国遗赠给罗马元老院和罗马民族"④。

阿塔罗斯二世于公元前 138 年去世，同年阿塔罗斯三世即

---

① 参看米列塔："国王和他的土地：关于希腊化小亚细亚王室土地的若干看法"，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166—167 页。

②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15 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3 页。

④ 同上。

位。他遵照先王遗嘱，于公元前 133 年把帕加马交给了罗马。[1] 帕加马王国，从欧迈尼斯一世建国称王算起，存在了 151 年，即从公元前 284 年到公元前 133 年。罗马得到帕加马之后，设置了亚细亚行省，并赋予帕加马以自由城市地位。[2] 所以说，罗马在以武力消灭了安提柯王朝之后，是以和平的方式、接收的方式吞并帕加马这个希腊化王国的。[3]

阿塔罗斯二世和阿塔罗斯三世的上述举措，被同时代的昔兰尼统治者所仿效，后者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4] 所不同的是：帕加马此前并未发生内战，而昔兰尼则是在内战之后做出把领土赠给罗马的决定的。此外，帕加马交出的是一个国家，而昔兰尼交出的则是分裂后的托勒密王朝的一个分治地区。

昔兰尼的情况是这样的：公元前 2 世纪 60 年代，托勒密王朝内战不已，实行了两个托勒密国王分治的做法，即托勒密六世管辖埃及本土和塞浦路斯岛，托勒密七世管辖昔兰尼。分治昔兰尼的托勒密七世在公元前 155 年就有把昔兰尼交给罗马的愿望。[5] 但当时因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并未实现。到了公元前 96 年，分治昔兰尼的最后一个国王托勒密·阿皮雍遵守先王的遗愿，“于自己临死时将这块土地遗赠给罗马人，当时（罗马的）元

---

①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15—116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16 页。

③ 参看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 年，第 4 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3 页。

⑤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34—135 页。

老院承认这里的希腊城市为自由的盟友"[1]。后来,由于昔兰尼的内乱继续,公元前74年,昔兰尼终于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2]而罗马法令明确规定昔兰尼为行省,则在罗马帝国成立之后(公元67年)。[3] 再说,昔兰尼与帕加马是不能相比的:帕加马是一个经济繁荣,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而且居民富裕的国家,昔兰尼则是并不繁华富足的分治的城市。[4]

## 四、犹太起义

前面在谈到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时曾经指出,直到国王塞琉古四世于公元前175年遇刺身亡以前,犹太人在塞琉古王朝境内的处境还是不错的。其弟安条克四世继位后,出兵攻打埃及,深入埃及本土,对托勒密王朝首都呈包围之势。在罗马干预之下撤回军队,途经巴勒斯坦时因贪图耶路撒冷犹太神庙的财宝,大肆掠夺,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抗。[5] 这一事件最后酿成犹太人的暴动,他们赶走了驻在耶路撒冷的塞琉古军队。[6]

安条克四世大为震怒,他认为犹太教徒是一神论者,是对塞琉古王朝国王权威的侵犯。[7] 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四世下令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38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本书,第810页。

⑥ 据记载,塞琉古军队不仅掠走金银祭祀用具和圣坛,还把圣殿墙壁上的金子刮走,把圣殿中的财宝洗劫一空。(参看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⑦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13页。

宣布犹太教为非法，予以取缔。他命令境内的犹太人接受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否则视为叛逆。[①] 在耶路撒冷，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逃往山区，塞琉古军队进剿山区，犹太人被认定为叛民而遭杀害。但塞琉古军队越是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就越是反抗，也越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公元前 166 年的犹太起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

这次犹太起义的领导者是犹大·马卡比。据说，犹大是他的名字，马卡比是他的绰号，意为锤子。起义军出没于巴勒斯坦的山区，四处袭击塞琉古驻军，并杀死那些顺从塞琉古王朝而改变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犹太人，烧毁希腊人的神庙，作为报复。安条克四世派遣大军前去清剿，甚至随军带着一些奴隶贩子，准备把俘获的犹太人卖给他们，在当地公开标价出售，[②]或运往外地出售。公元前 165 年，犹太起义军击溃了安条克四世派来征剿的军队，占领了耶路撒冷，希腊人的神庙均被拆除，重建了犹太教的神庙。起义军这一过激的行动改变了塞琉古王朝境内犹太人的命运。如上所述，在公元前 168 年以前，一部分犹太人已经走向同希腊人共处、交融的道路，他们或者完全接受了作为主流文化的希腊文化，甚至不再是犹太人了，[③]或者已经希腊化了。另有少数犹太教的狂热分子学习、研究希伯来文，竭力

① 安条克四世甚至下令“把自己作为奥林匹亚的宙斯的偶像摆进（犹太）圣地的圣所”。（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13 页）

②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29 页。

③ 参看卡尔德利斯：《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 页。

保持犹太人的传统文化，以免受到外国风俗习惯的侵蚀。[①] 这两种犹太人各处一端，其余大部分犹太人处于中间状态。[②] 公元前 168 年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的压制和对犹太教的取缔，以及由此激起的马卡比领导的犹太起义，使局势完全改变。犹太人和希腊人陷于严重敌对状态，相互仇视，族群关系极度恶化，二者和平共处已无可能。

公元前 164 年，安条克四世病死。其子继位，称安条克五世，他还是一个孩子。这时，塞琉古四世的长子德米特里仍在罗马当人质，过着俘虏一样的生活。公元前 162 年，德米特里冒险逃出意大利，在塞琉古王朝卫戍部队的拥戴下，在首都夺取了王位，称德米特里一世。[③] 在位不到两年的安条克五世被害。[④]

德米特里一世执政（公元前 162—前 150 年）以后，他知道罗马人一定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是从意大利逃跑出来的，所以把对付罗马东侵放在首要位置。他希望塞琉古王朝能同犹太起义军和解，于是向犹大・马卡比提出条件：犹太起义军放下武器，塞琉古王朝恢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犹大・马卡比则提出，犹太人不仅应享有信教自由，还应当享有政治上的自主权。谈判不成，塞琉古军队大举进攻。为了报复，犹大・马卡比下令在耶路撒冷和其他被犹太起义军占领的城市搜捕希腊人。[⑤] 两

---

① 参看卡尔德利斯：《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272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29 页。

个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和仇恨越来越加深了。同时,为了对付德米特里一世,犹大·马卡比与罗马订立了盟约:规定如果罗马及其盟邦发生战争,犹太人要和罗马共同作战,并且不向敌人供应粮食、武器、货币、船舶等;如果犹太人的国家发生战争,罗马也要和犹太人站在一起,同样不向敌人供应粮食、武器、货币、船舶等,以表示双方相互支持。① 罗马人和犹太人双方都信誓旦旦地表明忠于盟约,决不食言。②

公元前161年,犹太起义军击败了塞琉古军队。也正在这一年,犹大·马卡比战死,其弟约纳桑领导起义军,继续同塞琉古军队作战。到了公元前143年,约纳桑也在战争中被杀。犹大·马卡比的另一个弟弟西门接着担任起义军主帅。在罗马的帮助下,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公元前142年,塞琉古王朝承认犹太的独立。西门成为世袭的犹太国哈斯蒙尼王朝的开国君主。

犹大·马卡比起义历时二十多年,对此后犹太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这"在政治上挽救了犹太民族被异教文化所同化的危机"③;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极端主义情绪被大大激发了,这又未必给犹太民族带来幸福。比如说,哈斯蒙尼王朝是在犹太起义领导人同罗马结盟条件下,击败塞琉古军队之后建立的。但罗马未必同意哈斯蒙尼王朝的继续扩张,更不能容忍罗马消灭塞琉古王朝之后犹太国哈斯蒙尼王朝独霸巴勒斯坦的事实。罗马时

---

①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代犹太人无数次反对罗马统治的行动，以及罗马当局对犹太人的严厉镇压，就是明显的例证。[①]

从另一个角度看，犹太人今后的遭遇是悲惨的。尽管在犹太起义战争进行过程中，犹太起义领导人同罗马当局信誓旦旦结为盟友，但罗马占领叙利亚以后，希腊人顺从了罗马，腓尼基人也顺从了罗马，只有犹太人不愿意仿效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以至于最后在罗马人的镇压和强制统治下，犹太亡国了，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流浪他乡。

其实，从公元前168年以前塞琉古王朝同犹太人的关系来考察，犹太人和希腊人不是不可能友好相处的。即使哈斯蒙尼王朝建立了，犹太人向希腊文化学习、借鉴的路并非从此走到了尽头。[②] 哈斯蒙尼王朝在此后一段时间还继续学习并仿效希腊化国家的王权制和治理的方式、风格。[③] 犹太起义军所采取的极端主义措施，实际上是安条克四世逼出来的。这并不符合犹太民族的最大利益。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罗马在攻占叙利亚之后，把哈斯蒙尼王朝，把犹太国，也就是把巴勒斯坦视为进攻的下一个目标。这是因为，罗马一心想消灭最后一个希腊化王朝——托勒密王朝。陆路的进军路线必须通过巴勒斯坦，在这里，独立的犹太国便是一个必须扫除的障碍。罗马占领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灭亡之时，

---

① 参看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2页。

② 参看卡尔德利斯：《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③ 参看同上。

正值哈斯蒙尼王朝发生内乱，两位王子为争夺王位而发动了继承之战。公元前63年，犹太国两个王子都派人向驻扎在叙利亚的罗马军队求援，并请求罗马承认。罗马统帅庞培决定支持王子希尔卡努斯二世。另一个王子阿里斯托布鲁二世坚守耶路撒冷城抵抗。罗马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城，大肆屠杀，死者无数。希尔卡努斯二世名义上仍保留了犹太教最高祭司职位和犹太国王的称谓，但实际权力已被剥夺，一切大事均须服从罗马驻军长官的命令。巴勒斯坦则归罗马的叙利亚行省管辖。

## 五、塞琉古王朝的结束

塞琉古王朝同犹太起义军的多年战争，使国力大受损失，从而使东面的帕提亚王国和西面的罗马共和国有机会不断蚕食塞琉古王朝的领土。公元前138年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七世登上王位，他决心收复失地，一路出兵攻打耶路撒冷，另一路出兵攻打帕提亚王国。攻打耶路撒冷的一路取得胜利，公元前131年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迫使犹太国哈斯蒙尼王朝退守山区，但攻打帕提亚的一路却被帕提亚军队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两河流域尽失。安条克七世也在这场战争中死去(公元前129年)。这时，塞琉古王朝只剩下叙利亚和腓尼基等一小块领土。

塞琉古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德米特里二世继位，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国王，就被杀害。公元前124年，安条克八世登上王位，不久，安条克九世又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塞琉古国王，两人为争得正统地位，内讧不止。最终于公元前109—前108年，相持不下的两位国王采取分治的妥协办法，剩下的国土面积已经有限的塞琉古王朝形成了两位国王

分治的局面，安条克八世被多数人尊奉为正统。[1]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公元前96—前95年，因为安条克八世于公元前96年去世，安条克九世于公元前95年去世。[2] 安条克八世去世后，留下至少五个儿子，他们又争夺王位，并一个接一个死去。[3] 最后死去的那个儿子名为菲利普，死于公元前84年，也就是塞琉古王朝灭亡之前20年。[4] 这个菲利普的儿子也名叫菲利普，由于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所以仍拥兵割据一方。[5] 至于安条克九世去世后，其子继位，称安条克十世。安条克十世娶其父亲的遗孀塞伦为妻，以巩固自己的王位，于是塞伦掌握了实权。[6] 但叙利亚内战始终未停止。[7]

这时，亚美尼亚王国的势力日益扩张，亚美尼亚国王底格朗尼斯在帕提亚庇护下攻入叙利亚，占领了一部分土地。塞琉古王朝实际统治的地区只剩下叙利亚的一部分地区了。公元前75年，面临亚美尼亚军队的攻击，塞伦只得向罗马求援。[8] 但亚美尼亚军队攻势未减，塞伦被俘，不久被杀害(公元前69年)。[9]

亚美尼亚国王底格朗尼斯对塞琉古王朝所控制地区的攻击行径，引起邻国不满，使他陷于孤立状态。结果，亚美尼亚军队

---

①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323—前30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年,第267—268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277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

⑦ 参看同上。

⑧ 参看同上。

⑨ 参看同上。

不得不撤出叙利亚。这时，滞留于罗马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境内的塞伦之子安条克回到叙利亚，于公元前69年登上王位，这就是塞琉古王朝的末代国王安条克十三世。罗马是他的靠山。[①]与安条克十三世争夺正统地位的，是安条克八世的孙子菲利普，后者靠阿拉伯人的支撑而继续存在。与当年安条克八世和安条克九世之争不同的是，正统还是非正统的位置颠倒过来了：当年是安条克八世居于正统地位，现在则安条克九世之孙末代国王安条克十三世这一系居于正统了。[②]

因此，塞琉古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在于王族内部的夺位斗争，它把本来已衰弱不堪的塞琉古王朝分裂为两块领土，攻战不已。安条克八世是德米特里的儿子（名为格里普斯），安条克九世是安条克七世的儿子（名为昔芝塞诺斯）。[③] 他们两人是堂兄弟，又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因为他们的母亲是一人，即克娄巴特拉·泰娅。[④] 从安条克八世登上王位之时（公元前124年）算起，直到塞琉古王朝末代国王安条克十三世去世（公元前65年）为止，长达59年的时间内，塞琉古王朝的内战就没有停止过。塞琉古王朝怎能不亡？[⑤]

---

①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323—前30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年，第277页。

② 参看同上。茹贵在所著《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101、402页）称安条克十三世为安条克十二世。

③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2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年，第101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101、402页。

末代国王安条克十三世一死，国内没有人能够接下这个烂摊子。公元前64年，罗马军队在庞培的指挥下攻占了叙利亚境内尚属于塞琉古王朝管辖的地区，塞琉古王朝亡。

庞培本来可以早一些动手灭掉塞琉古王朝的，为什么迟到公元前64年才做出这个决定呢？一方面，这与罗马内部的派别斗争的激化有关，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主要政界人士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斗争上，谁都不愿把精力放在国外，否则会因小失大。另一方面，罗马的元老院原来是想乘消灭安提柯王朝之机，一举而攻占西亚和北非，顺势灭掉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但考虑到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这两个希腊化王朝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如果要硬打，所付出的代价肯定是沉重的，不如先放一放，等它们内乱、内战而力量削弱之后再动手。到了公元前1世纪60年代，罗马认为攻占叙利亚，最终消灭塞琉古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庞培才做出决定。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新情况也是罗马当局考虑到的。一是，罗马商人这时已比过去活跃多了，他们越来越关心西亚这个大市场，认为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商机。而要顺利打开罗马的西亚市场，则不仅要肃清地中海东部海域的猖獗的海盗，还要直接占领叙利亚，控制叙利亚沿海的港口城市。这是经济上的考虑，虽然也很重要，但毕竟是处于第二位的。[①] 二是，庞培作为罗马军队的统帅，眼看着帕提亚王国对于恢复原波斯帝国的疆土有极大的野心，它已经攻占了两河流域，正竭力向西推进，大有先取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870页。

叙利亚、腓尼基，再进入埃及之势，因此这些地方正是亚历山大从原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的。叙利亚内战的最大受益者，竟变成了帕提亚王国。这是罗马不甘心的。庞培意识到，帕提亚王国完全有可能变成罗马国家今后最大的竞争对手，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大战看来不可避免，而且可能最近就会发生，因此趁早占领叙利亚对罗马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①

在庞培的这一决策之下，塞琉古王朝在苟延残喘几十年之后终于被灭掉。

从此，叙利亚成为罗马又一个行省。庞培对叙利亚的政策是相当宽松的，因为这里是罗马即将从陆路进攻埃及的基地，有必要从这里向罗马军队提供各种军需物资。在罗马的叙利亚行省中，安条克城享有自治城市的优惠，即可以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传统做法，并免于向罗马进贡。②

塞琉古王朝灭亡后，它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分成三大块，分别由三个国家管辖。

第一块是帕提亚王国的管辖地区，包括黑海东岸、南岸和西岸，伊朗高原全境，阿富汗，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波斯湾北岸等地③。原来在伊朗高原东部、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存在着希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70 页。

②　参看欧林登：《希腊化世界史：公元前 323—前 30 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8 年，第 277 页。

③　据记载，班超在担任东汉西域都护时，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到达波斯湾，因受到波斯人的劝阻而未能再往西进。这是公元 97 年之事。塞琉古王朝已灭亡多年，西亚地区分别归大秦（罗马）和安息（帕提亚）统治。帕提亚阻隔了东方从陆上通往罗马的通道。（参看何芳川：《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 页）

腊化的巴克特利亚王国，它曾一度强大，同样是从塞琉古王朝领土上分离出来的，但在帕提亚王国日益强盛和向东扩张之时，巴克特利亚王国已分裂，大部分领土归属于帕提亚王国了。[①]

第二块是亚美尼亚王国的管辖地区，包括黑海东岸地区、小亚细亚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它也是从塞琉古王朝分离出来的，起初疆土面积不大，但乘着塞琉古王朝内乱之际扩大了许多。

第三块是罗马共和国的管辖地区。它们最初只包括小亚细亚西海岸，后来又把小亚细亚腹地、叙利亚北部包括在内，在灭掉塞琉古王朝之后，把叙利亚、两河流域西部、腓尼基、巴勒斯坦也包括在内。罗马和帕提亚王国管辖的分界线大体上在幼发拉底河，河的东岸归帕提亚，河的西岸归罗马。

罗马在东方的最大敌人不出庞培之所料，果然是帕提亚王国。直到将近二百年后，帕提亚王国因发生内乱而被推翻，兴起的是强大的萨珊王朝。同帕提亚王国一样，萨珊王朝也是伊朗人的国家，它一直是罗马的劲敌、拜占庭的劲敌。亚美尼亚的疆土的大部分陆续被帕提亚王国和萨珊王朝所夺走。萨珊王朝存在了四百多年，最后被阿拉伯人灭掉。

## 六、对塞琉古王朝总的评价

前面已经指出，在亚历山大去世的继承战争中形成的希腊

---

① 巴克特利亚最后一位国王是赫尔迈乌斯，在位于公元前 75—前 55 年。(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528 页)巴克特利亚作为一个希腊人的王国，其最终灭亡的时间在塞琉古王朝灭亡之后，略早于托勒密王朝的亡国。(参看本书，第 819—820 页)

化国家中，塞琉古王朝是面积最大和居民成分最多元化的国家。希腊人在原波斯帝国长期统治的这一大片土地，人数很少，因此要维持这样一个希腊化国家，而且还是中央集权、国王独揽大权的专制国家，是很不容易的。

塞琉古王朝的前期，做到了这一点。它起到了维护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作用，在文化方面它也有所建树，包括在新建的和扩建的希腊式城市中不仅建筑了许多希腊风格的公共设施，传播了希腊文化，推行了希腊式的教育，而且还保留了一定的城市自治权。塞琉古王朝最初的几个国王，在制度的设计、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以及在使本地居民也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从而在大体上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的安定局势。

然而，也正如前面一再提及的，塞琉古王朝最担心的事情是中央政权削弱而地方分离主义抬头，而中央政权削弱或者来自对外战争失败，或者来自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激化，从而没有力量控制地方割据势力。这种情况在公元前 3 世纪末和 2 世纪初都已出现。马格尼西亚战役中，塞琉古军队被罗马军队击败，小亚细亚丢失了，东部的地方割据势力抬头了。而多次的叙利亚战争，又使得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双方受到损害，使得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王国坐收其利，形成向塞琉古王朝东西夹击的局面。

经过一系列战争，塞琉古军队的军队结构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过去塞琉古王朝引以自豪的“希腊方阵”消失了，由于希腊人兵源不足，西亚本地人成为塞琉古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现在的方阵不再是有战斗力的“希腊

方阵”,而变成了多民族混合方阵,[①]难以阻挡罗马军队和帕提亚军队的攻击。塞琉古军队优势的丧失,使中央政权控制的地盘越来越狭小。再加上犹太起义,塞琉古王朝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塞琉古王朝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在国王独揽大权的体制下,出现了安条克四世这样下令洗劫犹太教神庙和宣布犹太教为非法的昏君、暴君。有什么制衡国王专制的办法?没有。接着,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出现了安条克八世和安条克九世这样的宫廷斗争和两位国王分治疆土、内战长期不止的局面时,有什么纠正和制止这场混乱的办法?没有。塞琉古王朝的晚期,就像一辆失控的载人载货马车从山坡上向下奔跑,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挽救这辆马车,只得由它坠入深渊,车毁人亡。塞琉古王朝的国王独裁制度决定了它自己的命运。

在塞琉古王朝初建之时,它确实给自己管辖区域内的居民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从军屯制度的推行还可以了解到,它既让士兵和退伍的老兵及其家属生活无虑,又减轻了境内纳税人的负担。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居民们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不再存在。地方的割据,边境的烽火,再加上连年内乱,无休止的战争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一场真正的大灾难。[②] 对塞琉古王朝来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完全用在军备支出上,而为了解决日益

① 参看塞孔达:“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陆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5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页。

严重的财政困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对经济活动实行管制的措施日益严重。“这种制度，初行虽有利于国家，但逐渐造成官吏方面进行欺诈和不法行为，同时又使国民方面在个人能力上的自由活动和竞争几乎完全趋于消灭。”[①]从此，塞琉古王朝再也不是可以吸引希腊移民前来，吸引西亚本地居民搬进城市和创业谋生的去处了。

塞琉古王朝在前期是富庶的。它经过前几位国王们的努力，积蓄了大量财富，这可以从新建希腊式城市的豪华和壮丽而得到证明。到了后来，又如何呢？罗马的军队日益逼近，但是，“积累起来的物资并没有用于反抗罗马的斗争，而用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内部战争”[②]。罗马对于东方的希腊化国家，就是采取帮助小国、攻击大国的做法，以便各个击破。罗马帮助帕加马，打击塞琉古王朝，是一个例子。罗马支持较弱的托勒密王朝，逼使塞琉古军队撤出埃及，退回叙利亚，又是一个例子。总之，“在这些战争中，那些较小的国家反倒受罗马的保护和援助而致力于耗损那些较大的国家的力量”[③]。塞琉古王朝就这样在实力逐渐耗尽之后被罗马灭掉了。

对于塞琉古王国来说，后期的战略思想是可以反思的：在塞琉古王朝的东部地区先后出现两个地方割据势力，即巴克特利亚王国（希腊人的国家）和帕提亚王国（波斯人的国家）的时候，塞琉古国王为什么不扶植、帮助一下巴克特利亚王国而遏制帕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同上。

提亚王国呢？当罗马军队攻入小亚细亚西部时，塞琉古王朝为什么不拉拢帕加马王国（希腊人的国家），同它化解前嫌，而共同对付罗马共和国呢？特别是，在罗马已经灭掉安提柯王朝，把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都列为下一阶段的进攻目标时，塞琉古王朝为什么还要同托勒密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派遣大军攻进埃及，包围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把托勒密王朝逼到罗马一边去呢？这一切只能从塞琉古王朝后期国王们缺乏远见，单纯从自身的短期利益出发而采取的下下之策来解释。

庞大的、一度强盛的塞琉古王朝终于解体了，覆灭了。大臣们、高级将领们、城市的领导者们，只顾自身的利益，而把国家的前途置之脑后，最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 七、罗马占领后希腊人在西亚的处境

塞琉古王朝是亚历山大的将领塞琉古（即后来的开国君主塞琉古一世）建立的，他是马其顿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一起，担任了塞琉古王朝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大量希腊移民在塞琉古王朝的鼓励下来到西亚各地，或经商，或从事自由职业，或为各级政府服务，生活舒适，收入丰裕。罗马占领塞琉古王朝的领土后，认为希腊人、马其顿人同犹太人、波斯人、西亚其他各族居民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之处在于：只要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不反对罗马人，不企图复辟塞琉古王朝，罗马人要统治西亚，还必须依靠他们提供服务；罗马人要发展西亚经济，繁荣西亚的城市，希腊商人是可以继续做出贡献的。在罗马统治者看来，希腊人的问题主要在希腊本土而不在叙利亚。这是因为，

希腊本土是希腊各个城邦的故土，几百年的希腊城邦历史使这里成为希腊人政治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之地，那里的人追求自主，追求独立，向往民主政治。他们从内心就不服从马其顿人的统治，菲利普二世被刺和亚历山大去世后这里都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即使安提柯王朝建立了，雅典、斯巴达和由一些希腊城邦组成的埃陀利亚同盟、阿卡亚同盟仍然同安提柯王朝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从未真正站在一起。因此罗马人必须对付希腊本土的居民所采取的反罗马的行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采取镇压的手段。公元前 146 年罗马对科林斯的严惩就是一例。罗马当局认为非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不足以警告被罗马统治的希腊其他各个城邦。

然而，罗马认为塞琉古王朝被消灭后，留在西亚的希腊人同希腊本土上的希腊人是不同的。塞琉古王朝是在原波斯帝国的亚洲领土上建立起来的希腊化王朝，到处都是西亚人，即原波斯帝国的臣民，希腊移民主要住在亚历山大时期建立的和塞琉古最初几个国王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中，而这些希腊式城市不像希腊本土的城邦那样是独立的主体，它们是塞琉古王朝中央专制、集权体制下被赋予一定自治权的、以国王旨意为最高权威的城市。何况，这些城市像被包围在西亚人乡村海洋中的一些孤岛，在罗马控制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西岸之后，能掀起多大风浪？罗马决定继续采取宽容政策来安抚希腊人，只要他们愿意同罗马当局合作就行了。罗马不担心这里的希腊人会起来造反。罗马认定了这些希腊人犹如一棵棵树木一样，在罗马统治区域中可以继续生长，但他们不会像一大片茂密的森林那样，能挡得住罗马以军队为后盾所刮起的暴风的袭击。

犹太人则不一样了。他们虽然在被罗马征服过程中屡遭清洗、驱逐和杀害，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独有的风俗习惯却始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犹太人无时无刻不想恢复自己的哈斯蒙尼王朝。即使哈斯蒙尼王朝已亡，但巴勒斯坦仍然生活着一大批犹太居民，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想重建哈斯蒙尼王朝，他们认为这是先人的遗愿，不可违背。事实果真如此，公元前 43 年，即塞琉古王朝灭亡 21 年后，当帕提亚王国的军队从两河流域向西推进之际，正值罗马领导层内讧，叙利亚南部防务松懈，帕提亚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把哈斯蒙尼家族一位王室成员推上了犹太国王宝座，使他成了帕提亚王国的傀儡。① 这件事惊动了罗马，于是罗马派兵逐走了帕提亚军队，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帕提亚人扶植的那个哈斯蒙尼家族成员的傀儡国王被捕处死。所有支持帕提亚王国和支持这个傀儡国王的犹太人领袖，也一律处死，另有 30,000 名犹太人被卖为奴隶。② 为了便于统治巴勒斯坦，罗马人选择了一个听命于罗马当局的犹太人希律（他的父亲协助过罗马军队）为新的犹太国国王。③

希律被任命为新的犹太国国王之后，他效忠于罗马，以至于罗马认为让他治理一个小国未免大材小用了，就把过去哈斯蒙尼王朝统治过的巴勒斯坦各个地区统统归他管辖。他逮捕一切有反罗马言行的人，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④ 他担任国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94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395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397 页。

王长达 33 年(公元前 37—前 4 年)。公元前 4 年,他因病死去。他被犹太人痛恨,有人说他"窃取王位像一只狐狸,统治像一只老虎,死时像一只狗"①。希律死后,他的犹太国由多个儿子中仅存的三个儿子分治。犹太人的反抗再度掀起,罗马决定彻底摧毁犹太人的反叛行径,由罗马驻叙利亚的总督派兵进入巴勒斯坦,大开杀戒,毁掉了大批城镇,废除犹太国,改为罗马的二级行省,其省长受叙利亚行省总督管辖(公元 6 年)。② 可见,犹太人始终是不受罗马信任的,其待遇与希腊人不同。

对于波斯人(包括后来的帕提亚人),罗马同样是极不放心的。罗马灭掉塞琉古王朝之时,帕提亚王国已经占领了东起印度河流域,包括阿富汗、伊朗高原,西抵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广大地区,意在恢复原波斯帝国的疆域。西亚的波斯人本来就不满意希腊人、马其顿人的东侵,现在罗马人代替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占领了叙利亚等地,同样引起西亚的波斯人的不满。而从罗马这方面来看,它认为今后东方的主要对手是帕提亚王国,而西亚境内的当地人尤其是波斯人,都是罗马管辖区域内的不稳定分子,帕提亚王国进攻时他们是希望帕提亚获胜的。这是罗马当局不信任波斯人的主要原因。当时,罗马只顾得上叙利亚境内的平静,只关心叙利亚以南通往埃及必经之地巴勒斯坦的安全与否,而顾不上两河流域以东的昔日塞琉古王朝广大领土的整顿与治理,而是听任一些自称王公的小邦的存在,罗马军队没有

---

①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397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403 页。

渡过幼发拉底河东进,没有到达这些地方。[①] 帕提亚军队则有时进入这些区域,有时又撤回原地。这些地区可以称作"三不管"的地区。罗马有意保留这块"三不管"之地,作为阻碍帕提亚王朝向西扩张的缓冲地带,防止叙利亚的西亚本地人的不稳。直到罗马灭掉塞琉古王朝之后100年,即罗马帝国第二个王朝弗拉维王朝的韦斯巴芾安皇帝临朝期间(公元69—79年),才发挥罗马军队戍边的作用,使罗马东部模糊不清的边界线确定下来。[②]

与犹太人、波斯人和西亚其他的本地人相比,希腊人(包括马其顿人)在罗马统治下的西亚地区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他们成为罗马人的合作者,为罗马当局服务。希腊本土的学者和自由职业人士,依旧把西亚看成是生活舒适而安全的地区,纷纷前来讲学、工作或定居。希腊商人,不管是希腊本土的还是爱琴海各个岛屿上的,也陆续来到叙利亚,同原来就在塞琉古王朝境内各城市经营的希腊商人一起,既合作又竞争,使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商业比过去更兴旺。罗马舰队在这一带肃清海盗的行动取得胜利,商路通畅无阻,罗马商人、希腊商人全都受益。但罗马人则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罗马人的受益不仅反映于商路的通畅和市场的扩大方面,更重要的反映于大量资本源源不断地从西亚流进了意大利半岛,流进了地中海西部地区。

流进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有赃物、战利品、赔

---

① 参看威廉姆斯:《罗马的来临:公元1—5世纪罗马帝国边疆史》,康斯达伯尔出版公司,伦敦,1996年,第16页。

② 参看同上。

偿、赎金，等等，它们落到罗马统治阶层和富人手中，而这些都是塞琉古王朝的城市和乡村多年累积下来的财富。[①] 然而，通过罗马人作为占领下的西亚地区的新移民，又使这些资本部分地回到了东方，使得"患贫血症的"和"被打乱了的"东方经济"重新得到活力和再度组织起来"。[②] 叙利亚的经济有所复苏，即使还没有恢复到昔日的繁华，但毕竟大大胜过塞琉古王朝晚期的状况。[③] 对于经营工商业和靠垦殖土地发家的希腊人来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再以黑海沿岸为例。即使在塞琉古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即最初几个国王执政时期，它控制了小亚细亚，但势力仅仅达到黑海南岸。后来，塞琉古王朝的国力减弱了，它的影响实际上只限于小亚细亚的西部。再往后，塞琉古王朝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被罗马军队击败，塞琉古王朝不得已放弃了小亚细亚，罗马把黑海两岸和南岸都纳入自己的版图。再往后，帕加马王国也并入了罗马。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经营黑海沿岸贸易的希腊商人十分失望，因为他们的黑海沿岸贸易大大缩减了。恺撒曾经有过把黑海变成罗马内湖的梦想。[④] 但是这个梦想难以实现，原因在于黑海东岸和东南海岸始终控制在亚美尼亚人手中，罗马人奈何不了他们。[⑤] 罗马的东部边疆，在小亚细亚地区，最远到达黑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030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威廉姆斯：《罗马的来临：公元 1—5 世纪罗马帝国边疆史》，康斯达伯尔出版公司，伦敦，1996 年，第 22—23 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 23 页。

海南岸的希腊移民城市特拉布松。[1] 至于黑海北岸的希腊移民所建的城邦和殖民地，在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相继灭亡之后，都归顺了罗马，希腊商人照常同俄罗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进行贸易，向地中海沿岸贩运。[2] 与过去不同的是，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保护不了希腊商人，而现在，希腊商人在罗马的保护下，重新占领和扩大了黑海沿岸的广阔市场，又从这里输出粮食、木材等商品，并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城市的手工业品输往黑海沿岸地区。因此，谁是黑海沿岸广阔市场的重新开辟的最大受益者？除了罗马政府和罗马商人，还有原塞琉古王朝境内的希腊商人。

此外，在塞琉古王朝还存在的时候，小亚细亚经常遭到来自北方的“蛮族”游牧部落的袭击，他们抢劫城市，掠走财物，屠杀平民，把一些男女老幼掳走为奴隶，塞琉古王朝尤其是位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王国，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来阻击这些游牧部落的南下。罗马占领了马其顿、色雷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之后，把阻击北方游牧部落的任务承担下来了。是罗马军队在保卫罗马的北部边疆，使北部边境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正如罗马在攻占叙利亚之后决心肃清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海盗，使商路畅通一样。罗马人是受益者，希腊人同样受益。[3]

罗马消灭了塞琉古王朝，并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

① 参看威廉姆斯：《罗马的来临：公元1—5世纪罗马帝国边疆史》，康斯达伯尔出版公司，伦敦，1996年，第23页。

② 参看J.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23页。

后，这里的希腊式城市或半希腊式城市依然保存下去，城市里的希腊人照常生活，而且生活方式和习惯同过去一样。这里还出现了少数新的半希腊式的城市，这里指“乡村居民中有一些人迁居到城市里去了”①。至于塞琉古王朝的东部地区，“在罗马统治下一如往昔。都会化运动没有产生显著的进步，这个地方也没有希腊化”②。这是因为，从叙利亚越往东走，西亚的本地色彩就越浓，乡村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大多数居民仍按照旧方式生活，致力于他们自己的神祇和祠庙、自己的田地和畜群”③。不仅如此，他们敌视外来人（包括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和城里人的情绪始终没有消失。“他们一有机会就想把城里人杀掉，再恢复由土著祭司—国王和酋长统治的那种农民生活和牧民生活。”④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罗马在灭掉塞琉古王朝之后一定要善待希腊人，同他们合作，共同对付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对手西亚本地人的理由。

同塞琉古王朝时期的情况一样，希腊人主要生活在城市里，工作也在城市里。这里有希腊式的街道和公共设施，有希腊式的学校、文化娱乐和体育场所，也有希腊人自己的神庙。以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来说，这里同希腊本土的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街头政治少多了，这里的希腊人更关心的是生活舒适和收入丰厚，而不像希腊本土的不少城市居民那样关心政治，关心自己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389—390 页。

② 同上书，第 389 页。

③ 同上书，第 390 页。

④ 同上。

的民主权利，或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示威，甚至引发城市骚乱。

在塞琉古王朝前期，城市中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仍与古典时期希腊妇女的地位相似：妇女是可以在亲戚面前露面的，但妇女并不习惯于伴随自己的丈夫出席主餐，妇女单独吃饭，这是限制妇女活动的一项惯例。[①] 到了塞琉古王朝后朝，妇女的处境有所变化：希腊妇女能够自由参加社会活动了。这是妇女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②] 而在罗马消灭塞琉古王朝，占领叙利亚之后，希腊人的家庭生活受到罗马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受的限制进一步减少。这是因为，在罗马，妇女是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不受限制的。[③] 据记载，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叙利亚等地的希腊人家庭中，妇女生活在罗马人的影响下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甚至连希腊人住宅的结构和内部的布置都越来越接近罗马人的家庭，以便扩大家庭社交活动的空间，用以接待宾客等。[④] 这表明，罗马占领以后，希腊人的家庭，尤其是较富裕的希腊人家庭，正在实现走向"罗马化"的转变。

但有一点是没有变化的，即在希腊式的城市中，希腊语仍是希腊人之间通行的语言，也是希腊式城市中常用的语言。

---

① 参看奈维特："罗马统治下希腊人家庭的继续和变化：妇女在家务中的作用"，载奥斯顿费尔德编：《希腊的罗马人和罗马的希腊人：文化相互作用研究》，阿鲁斯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82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82—83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 84—85 页。

# 第十三章　托勒密王朝

## 第一节　托勒密王朝的兴起

### 一、托勒密王朝的建立

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中，最富饶的领土就是埃及。亚历山大意识到："将这样实力雄厚的地方置于任何人的单独统治之下，都是不安全的。"①这就是说，埃及归属亚历山大后，大权不能独揽于某一地方长官手中，而必须使权力分散。于是亚历山大对派驻埃及的地方长官的职权进行划分，有的管征收税赋贡金，有的管民事，有的管军队，财权、政权、军权分掌于几个长官，而这些地方长官"只能从马其顿人或希腊人之中挑选"②。即使是军权，也是由几个军事指挥官分管，如有人担任孟菲斯驻军司令，有人担任培琉喜阿姆（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驻军司令，有人管辖希腊雇佣军。③

---

①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620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 620—621 页。

亚历山大去世后，经过将领们多年的战争，埃及由托勒密占有。托勒密原来是亚历山大近卫军的一名军官、马其顿人。当初根据亚历山大的旨意，托勒密曾经同一位有波斯王室血统的女子结婚，但他在接受亚历山大的调令，被亚历山大派遣前往领导军队驻防后，托勒密便抛弃了那位有波斯王室血统的妻子，在埃及先后同两位马其顿的公主结婚。① 在争夺亚历山大死后继承权的战争过程中，托勒密终于站稳了，他不仅拥有埃及，而且还对巴勒斯坦、腓尼基、叙利亚感兴趣，同塞琉古、安提柯发生战争。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使埃及免于遭受来自海上的攻击，还控制了塞浦路斯、克里特、罗得斯等岛屿。② 他甚至一度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为在黑海地区争霸创造了条件。③ 同时，由于托勒密占据的领土主要是埃及，它不是亚历山大死后各个将领争夺的主要地区——马其顿、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所以战争主要在塞琉古和安提柯二人之间进行，托勒密有时帮助塞琉古对付安提柯，有时帮助安提柯对付塞琉古，这样，埃及反而牢牢地掌握于托勒密之手。公元前 305 年，托勒密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自称国王。他的国王的头衔，除了埃及之外，总是加上腓尼基、阿拉伯、叙利亚、小亚细亚、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基克拉泽斯群岛等地主人的称号。④ 但不管添加什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82 页。

②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31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83 页。

么样的称号，埃及始终是托勒密王室的基地，他必须先治理好埃及。[1]

然而，要治理好埃及是很不容易的。埃及有深远的文化传统，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埃及有固定的和系统化的文明，支配着行政管理、宗教、社会经济生活。波斯帝国两度统治这里，留下了不少痕迹。因此，在托勒密家族统治下，都必须按照新的原则来予以重组，以实现新的目的。[2] 这个目的就是按照希腊文化、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希腊人高高在上的原则而又尊重埃及本地居民的习惯来治理好这个国家，使这里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富足，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

关键在于托勒密王朝怎样进行重组？依靠谁来进行重组？重组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就是希腊化、城市化和东方化，三管齐下，缺一不可。本章以下各节都将围绕着这“三化”加以阐述。实际上，托勒密王朝治理埃及的做法同塞琉古王朝治理自己管辖的西亚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塞琉古王朝的版图过于广阔，民族成分比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复杂得多，因此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也比埃及所遇到的困难更大。

那么，托勒密王朝依靠谁来治理埃及？主要依靠希腊人。当时，“希腊城邦在政治上的瓦解使希腊人准备外出到任何地方去从事任何工作，并在城邦以外的环境中生活。于是他们愿意来到埃及，而埃及也准备接受他们”[3]。埃及大量引进希腊人，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0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同上。

以优惠的政策欢迎他们前来，其中包括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人士，也包括雇佣兵。

依靠源源不断前来的希腊人，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的统治巩固了。希腊本土各个城邦原有的、在希腊本土行之有效并受到希腊人欢迎的不少做法，移植到埃及新建的城市中。善于经营和管理的希腊人，使埃及走向稳定和繁荣，至少在托勒密王朝的前期，甚至中期，都是如此。在马其顿帝国分裂和分治而形成的三个希腊化王朝中，托勒密王朝相对而言，是最安定的，动荡最少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最不突出的一个王朝，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 305 年算起，一直存在到公元前 30 年。

由于亚历山大东征前埃及归波斯帝国统治，所以亚历山大从波斯帝国手中夺取了埃及后自认为“解放者”，许多埃及人因痛恨波斯官员的腐败、徇私和无能，也认为亚历山大解救了自己。这样，亚历山大在埃及境内的希腊人和本地人心目中都有很高的威望。托勒密作为亚历山大手下的军官，他知道要巩固在埃及的统治，必须借用亚历山大的威望。他占领埃及后，特地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到埃及孟菲斯城予以厚葬。实际上，托勒密违背了亚历山大的一条重要的遗训，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不要把埃及的大权独揽于一人手中，而要实行分权制。① 托勒密占领埃及后，不仅独揽大权，实行国王专制，家族世袭，而且“托勒密王家把埃及视为他们征服得来的私产。他们认为埃及是他

① 参看本书，第 859 页。

们的‘家业’(o ἰοκος)或私有地产”[1]。这一看法后来一直被罗马皇帝所继承。

托勒密王朝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了。创立者托勒密任国王后，称托勒密一世。他统治埃及长达 38 年(公元前 323 年到公元前 285 年)。其间称国王 20 年之久，即从公元前 305 年到公元前 285 年。

## 二、托勒密王朝的强盛

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前，埃及境内有波斯驻军，以及波斯帝国所雇佣的外籍兵士，包括腓尼基人和犹太人。犹太人是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埃及的，他们为波斯帝国服务，当兵，拿薪酬，还得到口粮供应。[2] 埃及本地人有充当海军士兵的，但很少进入陆军，因为波斯人不相信他们会效忠波斯帝国。[3]

托勒密王朝的强盛主要依靠希腊人、马其顿人。托勒密作为亚历山大的军官被派到埃及来时，并不是孤身一人。“他随身带着一支由希腊军人或希腊化军人组成的强大的异族军队。”[4]这支军队成为托勒密日后统治埃及的基本力量。除了希腊人军队而外，跟着托勒密前来的，或听说托勒密控制了埃及后而纷纷涌往埃及的，“还有一大群希腊的或希腊化的猎取名利者，这些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398—399 页。

②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97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296 页。

④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395 页。

人有知识，有能力，他们把埃及视为最利于表现自己才能和猎取名利的园地”①。

托勒密王朝不仅在强盛阶段，而且在衰落阶段都始终把希腊—马其顿军人视为可以信任的依靠力量。在埃及，希腊—马其顿人的军事移民区遍布全境。直到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前203年)，由于同塞琉古王朝作战而感到兵力不足，才逐渐扩充埃及本地人的军队。② 但土著军队依然是补充力量、辅助力量。

托勒密王朝还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在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的海军还比较弱，雅典的海军已经衰落。整个地中海区域，西部和东部两个海域分别由迦太基的舰队和托勒密王朝的舰队称霸。③ 可以说，当时“迦太基的商业贵族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开明君主平分了地中海”④。有了强大的舰队，托勒密王朝的海上野心显现出来了：“拥有埃及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海洋及其海洋所冲刷的海岸以及由海洋围绕的岛屿，是托勒密王朝早期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⑤

公元前285年，托勒密一世已经82岁，将王位传给次子，即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一世的长子因行为不端而被剥夺了继承权，并被放逐于边境。托勒密二世继位时，据说受到了所有埃及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95页。

②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第268页。

③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84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欢迎。[①]

托勒密二世执政期间，对埃及的税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即在埃及推行农业什一税制度。这一税制"不仅旨在使他得到用于军事冒险行动的经费，而且还为了使军队得到食物的供给"[②]。这里所说的食物，除粮食外，还包括啤酒、葡萄酒、食用油等，它们都是用农业什一税收缴上来的农产品再由王家作坊加工制成的。[③] 至于农业什一税的实际征收额，则远高于农业收成的十分之一。[④] 这一税制后来成为托勒密王朝的主要收入来源。[⑤] 托勒密二世临朝时，埃及国库充实，境内安定，还把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建设得富丽堂皇，国王的宫廷、卫戍部队和高级官员、大臣们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托勒密二世重视希腊文化。他的父亲托勒密一世在世时，从公元前 290 年左右开始建造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博物馆。其宏伟壮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让人们惊叹和佩服。托勒密二世继续完成托勒密一世开始兴建的伟大工程。此外，为了弘扬希腊文化，托勒密二世还邀请希腊学者来此讲学，给他们舒适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研究条件，这样就使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博物馆成为

---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161—162、199 页。

② 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70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471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470 页。关于埃及农民的税收负担，本章第二节将有进一步说明。

⑤ 参看同上书，第 470 页。

大批学者前来研究和讲演的希腊文化中心，以及著名的研究机构。[①] 托勒密王朝是一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王朝，它在欢迎希腊人、马其顿人来到埃及的同时，并不拒绝来自东方的其他民族，如叙利亚人、小亚细亚人、犹太人等等进入埃及。[②]

托勒密二世在位39年，死于公元前246年。继位者是托勒密三世。托勒密二世和托勒密三世两人有相同之处，都是既注重发展经济和弘扬希腊文化，也致力于扩大疆域。他们认为托勒密王朝既然是亚历山大辉煌事业的继承者，就不应当仅限在埃及一地发展，而应效法亚历山大，把西亚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托勒密二世和托勒密三世都把塞琉古王朝看成是阻挡自己向东方挺进的障碍，因此必须首先从塞琉古手中夺取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在托勒密二世在位期间，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之间发生过两次叙利亚战争：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76—前272年；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61—前255年。在这两次叙利亚战争中，陆上交战双方各有胜负，而海上战役则使托勒密王朝的舰队遭到大败，这主要是由于安提柯王朝的舰队帮助了塞琉古王朝，使托勒密王朝的舰队蒙受巨大损失。从此，托勒密王朝的海军独霸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格局被打破了，托勒密王朝的舰队依然活跃，但再也不能像此前几十年那样在地中海东部海域称雄了。

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46—前241年）发生于托勒密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1页。

② 参看同上。

三世在位期间。埃及军队曾经一度攻占叙利亚，甚至还占领了两河流域不少领土，但接着又被塞琉古军队击退，不得已撤出所占塞琉古王朝领土的大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托勒密王朝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同塞琉古王朝发生战争，争夺叙利亚及其周围地区，固然同领土的扩大和实现大国的美梦有关，[①]但不能忽视经济上的、商业上的利益。叙利亚和腓尼基沿地中海的港口城市，是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以及中亚细亚南部和远至印度河流域通向希腊本土、马其顿、意大利半岛、西西里的海上商路的起点。塞琉古王朝必须确保这些港口城市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托勒密王朝的考虑则是：一旦这些港口城市落入塞琉古王朝手中，塞琉古王朝的经济就活了，财富就增多了，而如果这些港口城市被托勒密王朝占领，那么这里的港口城市将同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利比亚的港口连成一线，地中海东部的商业利益全都被托勒密王朝所垄断。因此，这场发生多次并旷日持久的叙利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与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的。

托勒密三世于公元前 221 年去世，其子托勒密四世继位。为了同塞琉古王朝继续争夺西亚的控制，托勒密四世继位后，立即进行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从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前 217 年。托勒密四世终于在公元前 217 年击败了塞琉古王朝。这是托勒密王朝的鼎盛阶段，因为托勒密四世在西亚的胜利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未能取得的。公元前 203 年，托勒密四世去世。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87—88 页。

托勒密四世虽然战胜了塞琉古军队,但维持这一胜利成果的时间能有多长呢?很难说,因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西面看,罗马共和国越来越强大,它对东方土地的野心已日益显现出来。从东面看,塞琉古王朝是绝对不会甘心失败的,它正在蓄积力量,准备反击,而塞琉古王朝毕竟是一个大国,它仍然是不可轻视的。公元前203年托勒密四世死去,托勒密王朝的强盛时期便告结束。根据弗格森在所著《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的论述[①],托勒密王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托勒密一世实际控制埃及的时间(公元前323年)算起,经历四个国王(托勒密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到托勒密四世去世(公元前203年)为止,共120年。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强盛时期。第二阶段,强盛时期结束以后,到公元前80年为止,大约120年略多一些,是托勒密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公元前80年到公元前30年,即托勒密王朝灭亡的年份,共50年,这是托勒密王朝的第三阶段,即受罗马控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托勒密王朝已处于被罗马灭亡的前夕,"那时埃及不是在罗马元老院的掌心里,而是在那些把元老院拉下王位的全权将军们的手中"[②]。

关于托勒密王朝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将在本章第三节中论述。

## 三、托勒密王朝的政治体制

关于托勒密王朝的政治体制,可以从三个方面(政治和宗教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82页。
② 同上。

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和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先讨论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一)政教合一体制

在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这三个希腊化王朝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教合一体制在托勒密王朝最为明显，最为突出，塞琉古王朝次之，而安提柯王朝则最不明显，或者可以说，在安提柯王朝实际上不存在政教合一的体制。

托勒密王朝的政教合一体制是有历史渊源的。埃及虽然文化、历史悠久，但学术不发达。“埃及人看来似乎不曾有过希腊人所谓的那种学术生活。”①这可能与神权长期统治有关。埃及从很古的时候起就是一个神权国家。“在埃及人的思想中，神灵一度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后来退回到神圣的居所，但留下了一个神来统治世界。当然，这个世界就是埃及。他们所有的国王，都是他的后代。”②因此，古代埃及的国王都被臣民尊奉为神或神的儿子。古代埃及留下的石刻、雕像和壁画都把国王雕成或画成巨神的模样，或以神鹰、神蛇的形象来形容或表现国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代埃及人“苦心编制出一套很复杂的死后生存的学说”③。

在古代埃及，国王一直被尊称为法老，法老既是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又是大祭司，即宗教领袖。或者说，“法老是唯一生活

① 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5页。
②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88页。
③ 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5页。

在地球上的神，适合做人类与生活在上天及冥府众神的中介”[1]。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说在希腊本土，即使后来有了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但氏族组织的力量一直是强大的，氏族组织在城邦建立后的较长时间仍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埃及，由于埃及的国王力量强大，“国家不允许氏族组织的存在，所以这种组织消失得无影无踪了”[2]。没有氏族组织，国家如何管理社会基层呢？国王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埃及的官僚制度由此发展起来。或者说，正是由于埃及的“皇权害怕氏族，所以鼓励官僚阶级的发展”[3]。

波斯帝国统治埃及期间，埃及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都未变，他们依旧迷恋于埃及古老的神权与政治合一的制度。波斯国王在埃及实际上只是控制了主要的城市和由埃及通往西亚、利比亚和尼罗河中游等地的交通要道。广大乡村仍被埃及的基层官员控制着，只不过这些基层官员听命于波斯派驻埃及的总督而已。埃及人照常信奉他们自己的神，不把波斯国王当成神。

亚历山大东征途中，在叙利亚境内亲自指挥马其顿军队击败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大军，大流士三世逃往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亚历山大则分兵追击，他自己率军南下，先后攻占了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由陆路进入埃及。亚历山大为了笼络埃及人心，就先笼络埃及的祭司，在后者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把自己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88页。

②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1—42页。

③ 同上书，第42页。

装扮成神的儿子进入埃及境内。这样，就得到了埃及本地人的拥戴。亚历山大被埃及人尊为新的法老，埃及人相信这位新的法老是神派来拯救埃及人，使他们摆脱波斯帝国奴役的。甚至在埃及境内还流传着一个十分荒唐的传闻，说亚历山大并不是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儿子，而是神幻化为埃及的一个法老同菲利普二世的王后交配而生下的儿子。[①] 尽管这个传闻完全是无稽之谈，居然有人传，也有人信。正因为有了这种传闻的散布，不仅亚历山大在埃及的统治有了合法性，而且“通过这种方法，把他们国王系谱中几千年的空白接上”[②]。托勒密一世统治了埃及，他仿效亚历山大的做法，让埃及人也把他当作神。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一个个接位之后，同样如此。古老埃及的传统，被托勒密王朝继承下来了。

从亚历山大到托勒密一世，再到托勒密王朝的历代国王，在推行政教合一体制时，都利用了埃及祭司，让埃及祭司为自己造舆论，造声势，并传达“神谕”。据说，在埃及以西的利比亚锡瓦的阿蒙绿洲有一座古老的神庙，崇拜阿蒙神。不仅埃及本地人，连移民于埃及和利比亚的希腊人，甚至希腊本土的人，都相信这座神庙的“神谕”是灵验的。[③] 亚历山大当初进入埃及以后，亲率军队沿着海岸来到这座神庙。“代言人使神像通过点头和手势作出了反应，并向亚历山大宣布，他就是阿蒙神之子。”[④]亚历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88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614 页。

④ 同上书，第 615 页。

山大曾问到“他能否成为整个人类的君王和主人。这位神回答说，这一切都将赐给他”[①]。可见，亚历山大通过祭司，通过祭司所传达的“神谕”，在埃及奠定了自己的权力基础，神权和王权合而为一了，“王权崇拜就这样进入了希腊世界”[②]。

托勒密王朝的历代国王都懂得祭司的重要作用，都想依靠祭司所传达的“神谕”来体现国王的意志，以及使国王神化，使人们牢牢树立“国王即神”的观念。在具体做法上，首先是把已经去世的亚历山大神化，厚葬他，祭拜他，并宣布“死去的亚历山大现在是托勒密王室的镇邪之宝”[③]。托勒密王朝从刚建立之时起，就把亚历山大奉为神，并由托勒密一世亲自指定祭祀亚历山大神的祭司。[④] 其次，托勒密二世继位后，下令把已死的国王托勒密一世尊为神，以后代代如此，直到托勒密王朝末年都一直保留这一惯例。[⑤]

这还不够。既然祭司的作用如此重要，祭司可以传达体现国王旨意的“神谕”，所以托勒密王朝对埃及传统的祭司制度进行重大的改动，这就是：祭司的收入和神庙的收入不再由埃及本地人尤其是本地的农民供给，而由王室提供，由国库开销。这样，“托勒密国王使农民同寺庙和祭司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的变化，即切断了农民和祭司之间的直接联系：从此以后，农民不把

---

①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615页。

② 同上书，第616页。

③ 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0页。

④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89页。

⑤ 参看同上。

租赋交给祭司，而是交给国王的官员，国家则保证供给每个寺庙和它的祭祀活动的需要”①。这一变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削弱埃及农民同寺庙、祭司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加强王室的权威性，使祭司服从国王的旨意。类似的改变也体现于对葡萄栽培者的一项特别税的征收上：过去这笔税收是归于寺庙的，现在也归属政府了。② 这同样有助于使祭司和神庙更加顺从国王。

（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托勒密王朝保留了古代埃及的国王独揽大权的中央集权体制，同时又采纳了波斯帝国在其本土和在统治埃及期间所实行的行省制。也就是说，“托勒密王家的确从来不曾致力于使埃及彻底希腊化”③。这里所说的“彻底希腊化”，是指在政治体制上推行希腊城邦固有的“公民大会—议事机构—通过规则和程序而产生的政府”这样一套民主政体。托勒密王朝继承的是亚历山大创建的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同亚历山大一样，希腊文化可以推广，希腊人可以得到重用，但希腊城邦的体制同亚历山大的帝国是不能相容的。托勒密王朝同样如此。

在托勒密王朝，中央集权不可动摇：国王具有最高权威，国王的旨意就是法律，各级官员都必须服从国王的意志，听从国王的命令。从地方治理的角度看，全埃及分为上下两部分，简称上

①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37—138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38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5页。

埃及和下埃及。上埃及泛指尼罗河中上游地区,下埃及泛指尼罗河下游地区。上埃及和下埃及都设置若干省(州),省(州)以下设县。省县两级地方行政官员都由国王任命。为了集权于中央,托勒密王朝不分封王公贵族,他们有领地,只是靠田庄取得收入,不管地方行政,也没有军队指挥权。托勒密王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等级分明,通常按照国王的信任程度和同国王私人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任免和升降。这样,国王周边的内侍的权力实际上是很大的。财政官员和税务官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和最肥的文官职位,都靠同国王和宫廷的密切程度而被任命。

埃及人似乎是根据其出生地而划入当地的行政区域的。① 托勒密王朝刚建立时,地方行政机构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省(州)级的地方长官主要由希腊人、马其顿人担任,他们既管民政,又是地方部队的指挥官;县级是基层地方机构,在那里工作的官员最初由埃及本地人担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收税。最底层的行政机构是村庄,但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机构,而是带有村民自治组织性质的。村庄由本地人管理。②

但随着托勒密王朝政权的巩固,直到公元前2世纪前,已经看不到埃及本地人担任基层地方官员的情况。地方行政完全由希腊—马其顿人军事移民区的军官担任,他们既指挥军队,还维护地方治安。③ 这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不放心埃及本地人,由于他们同地方上的不满分子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万一他们串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300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300—301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301、324页。

通起来，会滋长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二是由于希腊—马其顿人出身的军官需要做些安排，军队中和中央政府机构中哪有那么多职位，所以就把原来由埃及本地人充当的地方官员职务让给希腊—马其顿人担任了。

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审判制度具有自己的特色。埃及的最高法庭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由底比斯、孟菲斯和赫里奥波里斯的宗教社团中推选出来。① 埃及审判制度的宗教性质十分明显，因为从高层来说，国王、官员和祭司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从群众的角度看，这样的法庭判决既是合法的，也是合乎神的意愿的。这再次说明托勒密王朝统治的神权性质。

（三）中央政府和自治城市之间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境内的城市是实行自治的，尽管这种自治是有限的城市自治。同塞琉古王朝一样，托勒密王朝的城市自治制度从希腊本土引进，但必须听从国王的旨意，城市要遵守国王的法令，不能越轨。

托勒密王朝的自治城市和塞琉古王朝的自治城市相比，可以得出两点看法：第一，自治城市在托勒密王朝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塞琉古王朝所起的作用小得多。② 也就是说，自治城市在托勒密王朝下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小于自治城市在塞琉古王朝下对政治的影响力；从历史上看，在塞琉古王朝走向衰落时，可以发现某些希腊式城市有摆脱国王控制的分离主义倾向，而在托

---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年初版，1976年重印，第169页。

②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319页。

勒密王朝走向衰落时，这种分离主义倾向不突出。第二，托勒密王朝期间，埃及城市的管理效率较高，城市的富裕程度一般要高于塞琉古王朝下的城市。

关于托勒密王朝自治城市的情况，本章第二节将会有较详细的阐述。

## 四、希腊人在埃及政治中的地位

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以前的几百年内，希腊人就陆陆续续来到北非建立移民城市和商站，其中最出名的和最有影响的是在尼罗河三角洲所建立的瑙克拉梯斯城。埃及的国王（法老）欢迎希腊人前来，优待这些希腊移民，希望他们对埃及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希腊本土和当时的埃及之间主要靠海上通道，即由希腊的一些港口用木船把人和货物渡过地中海并在埃及北岸登陆。陆路是被波斯帝国隔断的，因为波斯帝国控制了叙利亚及其以南的一些地方。这一时期来到埃及的希腊人，除了建立并居住在沿海的希腊移民城市而外，有些希腊人还深入埃及内地，如孟菲斯、底比斯等较大的埃及城市。①

波斯帝国在公元前525年进兵攻占埃及，并把埃及划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由波斯国王派遣总督治理。从这时起，希腊人便不再受到埃及新统治者的欢迎。原因是：这时的波斯帝国，既然已经夺取了西亚、北非和小亚细亚一部分地区，很自然地把希腊本土作为下一阶段的攻击目标，所以它不想让更多的希腊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2页。

人来到埃及。加之，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期间，进入埃及境内的小亚细亚人、叙利亚人、犹太人日益增多，他们是波斯帝国的臣民，来到埃及后受波斯帝国的信任程度大于希腊人，他们担任了官员、士兵、包税人等职务。① 于是埃及境内的希腊人受冷落、受排斥。因此，当200年后亚历山大率军于公元前332年进入埃及，赶走波斯人时，希腊人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已不起作用，而在埃及经济生活中也已不起重要作用了。

亚历山大认为希腊人是可以重用的，尤其是在西亚、北非这样一些以本地人为主的社会中，希腊人只要被赋以职务，就会尽力帮助马其顿人管理好这块土地。亚历山大随军就带来了一批希腊人，其中一部分留在埃及，一部分留在西亚、两河流域和更东的地区。托勒密一世建立王朝后，为了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以及为了加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格外重用希腊人，特别是任命希腊人担任高级官员，参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本地人中的统治阶级成员也有留在政府工作的，但他们完全从属于他们的这些新主人。② 这不仅因为希腊人比埃及本地人更令托勒密国王放心，而且也同希腊人有卓越的才能有关。③ 在这样的条件下，希腊人来到埃及的越来越多了。据说在托勒密王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2页。

② 参看劳埃德："早期托勒密时期的埃及精英：若干象形文字的证据"，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117页。

③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324页。

朝的盛期，埃及各级政府为希腊人提供了10万个职位。[①] 如果连同他们抚养的家属一起计算，埃及各级政府养活了几十万名希腊人（当然，正如后面会提到的，由于希腊人前来埃及的，女少男多，所以有些希腊男子娶本地女子为妻）。

在托勒密王朝期间，官员和军人是不必缴纳人头税的，此外人人都要缴纳人头税。[②] 由于官员都是希腊人（包括马其顿人），在托勒密王朝前期，士兵也主要是希腊人，所以免缴人头税是对希腊人的恩惠。

在埃及，军人是最受国王重视的。军事服役世代相传，年轻一代的军人子弟通常先到卫戍部队受训，等待有空缺时才成为正式军人。[③] 由于托勒密王朝的军队本质上是一支付酬的武装力量，所以队伍很稳定，不会出现逃兵等现象。“军人被赐予一块土地”[④]，可以养家，也可以保证后代无忧无虑地生活。[⑤] 军队除了负有作战任务而外，历来还被用于维护地方治安，即执行警察的职能。[⑥] 托勒密王朝不仅供养一支军队，而且需要军队对国王效忠，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建立军队对王室的崇拜：宗教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认定国王即神的代表，也就是宗教领袖。可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35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39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117页。

④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70页。

⑤ 这意味着，一名军人的儿子实际上继承他父亲的两重身份：一是军人，二是份地的主人。（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3页）

⑥ 参看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70页。

以归结为:"这支军队的忠诚主要建立在两个支撑点上,一是对国王的经济上的依赖性,二是在国王所赋予军人的在国内生活中的特权地位。"[①]而军队对国王的崇拜和盲信,以及国家所采取的政教合一体制,又对国王同这支希腊人军队之间的关系起着特殊的维系作用。

托勒密王朝的军队人数有多少?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弗格森在所著《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更可信的估计是:托勒密二世时代,埃及陆军为八万多人。"[②]这时的埃及军人全都是希腊人。"在托勒密四世时代,(埃及的陆军人数)低于四万九千多人"[③],而且这里不包括埃及本地人的士兵,当时埃及土著军队有二万六千人。[④]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埃及兵源不足,即希腊人兵源不足,所以从托勒密四世起招募埃及本地人当兵,这一举措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当时埃及中央政府认为这是必要的改变,但这只不过是"一次有着危险后果的试验"[⑤];尽管托勒密四世的确依靠土著军队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此后紧随着的却是一系列因埃及人被武装起来后所掀起的暴动。[⑥] 具体地说,以前,当埃及本地人不准当兵时,希腊人认为天下太平,无可忧虑。这是因为,埃及土著居民"被彻底解除武

---

①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3页。

②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0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同上。

⑤ 塞孔达:"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陆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5页。

⑥ 参看同上。

装，使得（希腊人）对他们的统治成为一桩简单的任务”①，高压政策就足够了。那时埃及土著居民至多只是“在服徭役时由于食不果腹而燃起的反抗，大约只能采取桀骜不驯或罢工的形式”②。现在，埃及本地人成为托勒密军队的兵士，掌握武器了，他们的不满就会以武装暴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将在本章第三节中论述。

在公元前 2 世纪以前，希腊人在埃及一直是最受国王信任的。他们高居于埃及当地人之上。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埃及的希腊人便感到“他们自己是主子，是统治者，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让受轻视的土著来分享靠征服获得和靠强力维持的特权”③。他们围绕着国王，宫内宫外，军内军外，全都是希腊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埃及本地人是不可靠的，是迟早想把国王赶下台的。如果国王想重用埃及本地人，想让埃及本地人建立武装力量，“国王中的希腊人就会认为这是通敌卖友的行为，是犯罪，是侵犯他们在埃及的神圣权利”④。然而，自从托勒密四世建立埃及土著军队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本来由希腊人独霸军队（包括陆军作战部队、卫戍部队、国王卫队等）时，希腊人瞧不起埃及当地人，埃及当地人也无法同希腊人竞争，这时希腊人和埃及当地人反而大体上还相处得可以，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用埃及的希腊人的话来说，希腊人是主子，埃及本地人是下等人，主子犯不

---

①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70 页。

② 同上。

③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398 页。

④ 同上。

着同下等人计较。公元前2世纪以后，情况变了，在托勒密王朝境内，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渐渐多起来了。正如本章第三节在谈到“托勒密王朝晚期的埃及本土化”时将会讨论的：到了托勒密王朝晚期，埃及本土化加速了，希腊人对托勒密王朝的忠诚度也相应地下降了。托勒密王朝最后的几代国王面临着来自内部日益严峻的双重威胁：一是来自埃及本土化过程中埃及本地人的威胁，二是对埃及本土化越来越不满的希腊人信心下降和忠诚度减退的威胁。

## 五、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体系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多方鼓励希腊人前来埃及工作、经商和定居。希腊人涌入埃及，把希腊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带到了埃及。

在埃及，远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以前，埃及就存在古代流传下来的法律法规。前面在谈到古老埃及的审判规则时已经指出，埃及一直是一个神权国家，所以审判中要由祭司们按照所谓神的意志进行裁定。审判的结果之所以能够被当事人和公众接受、认可，因为神的意志是谁都无法违背的。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希腊城邦制定的法律被引入埃及。希腊城邦法律实际上有两个体系。一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法律体系，重视氏族社会的平等原则，同时强调公民的自律，强调集体遵循的习惯和约定以及对公民行为的限制。另一是以雅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重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强调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对土地投资、工商业投资、财富积累和雇工经营的积极性的调动。斯巴达的法律体系和雅典的法律体系在希腊本土的不同城邦被采纳并施行，这与各个城邦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有关。

托勒密王朝在引进希腊城邦法律的过程中，考虑到斯巴达法律体系和雅典法律体系虽然在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但对法律原则和审判程序的严格遵守却是一致的。而从推行法律的效果来说，无论是斯巴达法律体系还是雅典法律体系，根据不同城邦的情况，它们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就是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看重希腊城邦法律的理由。

由于托勒密王朝所统治的埃及毕竟是一个有古老文明的神权国家，当地的传统必须尊重，包括传统的由祭司们参与并在审判员队伍中占主要位置的法庭审判。托勒密王朝懂得，在本地人为主的地区，在祭司们被看成是“神谕”的传达者而享有极大权威的乡村，不沿用古代埃及就存在的法律体系，是难以统治这些地区和乡村的。于是托勒密王朝把希腊城邦法律和埃及古代法律传统结合在一起，施行于埃及境内。

在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主要遵循与希腊城邦法律相符的法律。比如说，在这些城市中，希腊人在司法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① 这就是希腊城邦法律的应用范围。除亚历山大里亚以外，其他各个希腊人聚居的城市，援引希腊城邦法律，市民可以选举市长、市议员和法官。尽管托勒密王朝的希腊人聚居城市已经不再是希腊式的城邦了，但希腊城邦法律仍然在这些城市中被遵循。亚历山大里亚作为首都，或者说，作为“希腊籍国王的一个希腊式的驻跸之所”②，在刚建立之时，即亚历山大统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305 页。

②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405 页。

治时期，享有较多的城市自治权，但托勒密王朝建立并成为王宫所在地之后，自治权大受限制，目的是不要让城市自治地位使国王权力有所削弱。结果，亚历山大里亚的“自治组织被裁削的程度已经使它与埃及其他行政区域的中心毫无差异，只不过它在城市建设方面较为美丽壮观罢了”①。

至于在埃及本地人聚居的地区，包括乡村和集镇在内，埃及传统的法律、惯例和神庙祭司的作用则占据主要地位。在埃及，祭司的地位历来最高，审判也由他们主持。各个神庙都有祭司，全由国王任命埃及本地人担任。“虽然祭司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排外的阶层，但他们组成一个多少有所选择的团体，不会轻易容外人搀入其列。”②法老时代如此，托勒密王朝依然如此。后来，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仍保留埃及这一古老的传统。③

由此可见，在托勒密王朝，希腊城邦法律体系和埃及古老传统、惯例一直并存。

## 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埃及的融合

在安提柯王朝，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是有很大隔阂的，希腊人不认同马其顿王国，不认同马其顿王国建立的安提柯王朝。因此，在安提柯王朝存在的一百多年时间内谈不上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融合问题。

在塞琉古王朝，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关系要好得多。这是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5页。

② 同上书，第392页。

③ 参看同上。

因为，在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地区内，西亚本地人占绝大多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主要居住于希腊式城市内，它们好比是一些小岛，散落于西亚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只有凝聚在一起，才能形成力量，生存下来。但塞琉古王朝的国王们对马其顿人最为信任，因为国王们自身是马其顿人。塞琉古王朝派驻各个行省的总督，几乎全来自马其顿。希腊人虽然也得到重用，但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却在国王的亲信手中，而国王的亲信大多是马其顿人，他们是跟随亚历山大军队一起渡过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和西亚的将领或将领们的子弟，也正是这样一些马其顿军官及其子弟在亚历山大去世后拥戴塞琉古当上国王的。因此，在塞琉古王朝，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之间多多少少仍存在隔阂，否则怎能理解塞琉古王朝境内一些希腊式城市总是等待机会想摆脱国王的统治，走向自主独立呢？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之间的关系最为融洽。他们说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文字，希腊人涌入埃及的人数越来越多，马其顿人少，所以二者在埃及都被称作希腊人。在埃及，到处都可以看到希腊人，其中包括了马其顿人，因为他们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不仅马其顿人融入了希腊人之中，甚至像色雷斯人、帖撒利亚人、克里特人等希腊本土边境上的居民，来到埃及后也都同希腊本土来的人融合了。这与托勒密王朝的政策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第一，托勒密王朝不像塞琉古王朝那样只着重引进希腊本土的商人，而是既引进商人，也引进希腊本土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同时更着重引进希腊文化。正是希腊文化的引进，促进了“大希腊”的居民的认同，并导致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融合。第二，托勒密王朝的主

要统治区域是埃及，而不像塞琉古王朝在兴盛时版图过大，民族成分复杂，尤其是伊朗高原以东地区更是如此。正是由于塞琉古王朝要巩固疆域，防止地方的割据、分裂，所以一定要紧紧把握住兵权，让马其顿人出身的将领统率各地的驻军，所以在希腊人看来，自己虽然也担任一定的公职，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大权都掌握在马其顿人手中，自己不过是替马其顿人服务的。这就阻碍了他们同马其顿人的融合。托勒密王朝不是这样，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一起，对外同塞琉古王朝或安提柯王朝的军队作战，对内共同对付埃及本地人，这就行了。于是，马其顿人融入希腊人之中，可能更有利于托勒密王朝的治理。

最后，还应当指出，托勒密王朝更加注重发展经济，托勒密的前几任国王都想把埃及建设得更富裕，更能显示希腊化王朝的成就。引进希腊人才一直是托勒密王朝的重要决策。除充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队伍，建立一支可信赖的军队而外，“托勒密国王们需要资本和商人，这和建立部队同样重要”①。还有，这时的埃及需要众多的承包商和包税人，国王的工场需要工程师，需要开发和利用本地资源的能人，需要农业专家，需要管理金融机构和理财的专家，这样的人才非从希腊本土引进不可。尤其是理财事务，托勒密国王们认为这是很难信得过埃及本地人的。② 尽管犹太人也可以从事上述工作，但在托勒密王朝看来，最受关照的仍是希腊人。③ 对希腊人的重视、重用，也

---

① 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326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326—327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327 页。

在促进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融合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 七、埃及境内的本地居民

埃及本地人毕竟是托勒密王朝境内的主要居民。托勒密王朝被埃及本地人看成是外来的统治者,所以国王们只有依靠宗教势力,由祭司传达"神谕",以"国王即神"来指引埃及本地人把国王看成是"解救者",但这只能暂时起作用。埃及本地人同托勒密王朝领导层之间的关系没有大的改善。对埃及本地人,托勒密国王们既轻视他们,认为他们不文明,未接受希腊文化,又不信任他们,认为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反抗国王政权,恢复过去,甚至回到很多年前的法老时代。所以在托勒密王朝建立以后政权已经巩固下来的时候,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全部由希腊人来担任,而不再任用埃及本地人了。

在社会上,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之间的隔阂也是长期存在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单位共事,可以在生意上有交往,甚至还有合作,但这谈不上什么友谊,因为希腊人自视甚高,不愿别人说自己同埃及本地人混在一起。根据托勒密王朝的法律,希腊人是禁止同埃及本地人结婚的。① 这种禁令可能长期保持。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这不仅由于来到埃及的希腊人中男多女少,还由于他们的居住区在许多地方是同埃及本地人混杂的。比如说,在托勒密王朝境内不像塞琉古王朝境内那样建立那么多希腊式城市,所以这里的不少希腊人不一定住在希腊式城市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91 页。

里，即使住在城市里也不一定有专门归希腊人居住的特定街区。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如果希腊人住在城市里，可能同一个街区也有埃及本地人，彼此是混居的。还有不少希腊人住在乡村内，那更是同埃及本地人混居在一起了。[①] 而且，只有少数希腊男子娶希腊女子为妻，大多数希腊男子只得娶埃及女子成家，只不过女方婚后也说希腊语，按希腊方式生活。[②]

到了托勒密王朝晚期，由于国王们加速了埃及本土化，埃及本地人的社会地位上升了，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通婚的现象也增多了。禁止通婚的法律即使没有被废止，但人们已不再理会它。“结果出现了相当大一群混血和双语人口。”[③]据说，这些“混血和双语人口”，“外表上是希腊人，性格和文化则是土著”。[④]

最后，还可以用托勒密王朝在塞浦路斯岛的统治为例，因为塞浦路斯岛不属于希腊本土，塞浦路斯人不被看成是希腊人，他们是土著居民。

塞浦路斯是托勒密王朝最重要的海外领地之一。[⑤] 托勒密国王占领塞浦路斯岛以后，认为这既是保卫埃及的前哨阵地，又是托勒密王朝的海军和陆军可以向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地区和马其顿进攻的基地。因此，他把管理埃及和对待埃及本地人的

---

①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158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97 页。

④ 同上。

⑤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26 页。

一套做法搬到了塞浦路斯岛。“从碑铭上可以了解到，塞浦路斯处于一个负有军事使命的总督管辖之下，他统领驻扎在塞浦路斯各城市数量可观的军队，并且是按埃及的方式组织管理的，这支军队来自国王的埃及正规军。”①这就是说，从总督到正规军士兵都是希腊人，塞浦路斯总督等于是托勒密王朝派驻该岛既管军、又管民的边疆大臣。

在公元前2世纪时，塞浦路斯总督还拥有自己的舰队，它可能由塞浦路斯沿海岸大城镇提供给养和装备。② 实际上，这笔由当地居民承受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如何对待塞浦路斯岛上的本地人？托勒密王朝把在埃及实行的那一套神权与王权合一的体制搬过来了：考虑到大而富庶的寺庙在塞浦路斯岛上所起的经济和政治作用，所以塞浦路斯总督又拥有塞浦路斯寺庙总祭司的头衔。③ 总祭司无疑就是塞浦路斯的宗教领袖，本地的各个祭司都听命于他。

塞浦路斯矿藏丰富，采矿收入是一项主要收入。为此，托勒密王朝赋予塞浦路斯总督以军事权威机构的名义把一切有开采价值的矿山统管起来，矿山属于国家，并由国家经营，托勒密王朝由此获得巨额收入。④

至于塞浦路斯岛上的城市，则从未享受过希腊式的自治权。⑤ 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这些城市是过去就有的，居

---

①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26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民主要是塞浦路斯本地人。

托勒密王朝对塞浦路斯的管理方式就是它对埃及境内本地人聚居地区的管理方式的缩影。

## 第二节 托勒密王朝的经济

希罗多德曾对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埃及等级划分状况做过如下的记述，他写道："埃及人分成七个阶级：他们各自的头衔是祭司、武士、牧羊人、牧猪人、商贩、通译和舵手。有这样多的阶级，每一个阶级都是以它自己的职业命名。"①大体上可以判断出：祭司的社会地位最高，武士次之，下面依次是农牧民、商贩、有一技之长的人，如会两种和两种以上语言的翻译、会驾船使舵的水手。这里所谈到的处于第二等级的武士，专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而只能打仗，打仗是他们的世袭职业"②。处于最低等级的，是指有一技之长的人，工匠大约也包括在内，这些"从事一种职能的人，是不如其他人那样受尊重的"③。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于农牧民，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农牧业社会常见的现象。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商贩，则是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这可能由于商业在当时的埃及境内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对市场的作用已有初步认识所致。

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上述这种社会等级划分不可能有很大变化。祭司肯定处于首位，武士也会处于其次。至于农牧民、

---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84 页。
② 同上书，第 185 页。
③ 同上。

商贩和工匠的社会地位可能基本上处于原状。这势必会对埃及经济继续发生影响。下面,让我们从土地关系、手工业和商业、奴隶的使用、城市生活等方面,对托勒密王朝的经济状况做一些论述。

## 一、土地关系

按照土地归属和使用的不同,可以对国有土地或王室土地、神庙土地、私有土地、军人份地、未开垦土地分别讨论。

(一)国有土地或王室土地

总的说来,“托勒密王朝的新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东方的,但被强烈地希腊化了”①。土地制度就是如此。这里所说的“强烈地希腊化”的主要表现,并不是指托勒密王朝采纳了希腊城邦的土地制度,而是对各部门的实际管理依靠严格的成文法律、规章和细致的指令,而这种成文的文件在近东君主国家是前所未有的。② 虽然托勒密王朝的某些财政和经济立法可以追溯到古代东方的原型,但这些规则就其精神、逻辑和连贯性而言,则是严格希腊式的。③

对国有土地或王室土地的规定,就是明显的例证。

同埃及古代传统一致,托勒密王朝境内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也就是归国王所有。国家土地就是王室土地。王室土地由财政大臣掌管,土地由国王颁授给农民耕种。历史上,这些由国王颁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73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授土地的农民通称“王田农夫”。从身份上说，他们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是佃户。他们除了替王室耕种外，自己也可以得到国家颁授的一块土地，世代耕种。从此，他们也就被束缚在所颁授的份地上，未经政府许可不得离开自己的份地和所耕种的王室土地（至少在播种和收割季节是如此），不得迁往他处（除非短期离开）。[①]

托勒密王朝在王室土地的归属和使用上，沿袭埃及古代的制度。这时的“王田农民”和以前的“王田农夫”并没有什么区别。[②]

作为佃户的王田农民，除了有依附土地、不得迁移的义务外，还有沉重的纳税义务。前面已经指出，农民要缴纳农业什一税，税率为收成的10%，实际上要比10%多得多[③]：“托勒密国王们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是互惠的，在那里，农民提供种子和必要的农具，收获时农民被要求把固定数额的粮食上交，按照其他古代和中世纪的什一税制度的标准来看，这一固定数额的粮食上缴量则是过大的，有时竟多达60%，必然难以承担。”[④]也就是说，什一税不过是税的名称而已，它并不意味着税率的多少。

政府下面有庞大的工作队伍，核定农田的产量，征收什一

---

① 参看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1页。

② 参看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年，第177页。

③ 参看本书，第865页。

④ 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0—471页。

税,有时还管粮食的运输。[①]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原来波斯帝国王公贵族和官员的土地,以及在波斯帝国时期同波斯当局关系较好的埃及上层人士的土地,都陆续被托勒密王朝收归国有,并利用这些土地建立了大型的国王庄园,即王家农庄,交给有自由人身份的农民耕种,他们是佃户。这些王家农庄土地的耕种、收割和粮食交售都由政府派遣的官员负责,收获的粮食经过严格的检查、过秤、登记验收后,运入国家粮仓。

国有土地的佃户除了纳税以外,还要服劳役,如修路、修水渠,此外"他们还有众多与测量、灌溉、运输、邮政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此类的义务需要履行"[②]。可见劳役是沉重的。有时,佃户们"还可能被集体迁移或者强制去开垦和耕种他们房屋附近的旱地和沼泽地"[③]。这些也是加在佃户身上的负担。

(二)神庙土地

神庙有自己的土地。尽管这些土地是国王拨给神庙的,但名义上仍属于国王。换言之,"神田都被认为是从王室领地分离出来的"[④]。例如,托勒密王朝曾在密利斯湖进行排水工程,排水后所得到的土地中,一部分拨归神庙作为神庙土地了。这些新增加的土地,在理论上"当然属于国王,而拨给神庙的地产权

---

①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0页。

②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1页。

③ 同上。

④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9页。

只是些让与"①。

土地划拨给神庙后，归神庙世代所有。这些土地由当地农民耕种，向神庙交租，他们是神庙的佃户。那么，神庙是否要向国家纳税呢？埃及一直存在着神庙土地不交租、不纳税的惯例，而且是经过国王同意的，目的是"出于敬神和为获得祭司的好感"②。

神庙是很有钱的。它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产收入，即佃户们向神庙交纳的地租，而神庙自身又不必向国家交租纳税。神庙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信徒的捐献。神庙的香火越旺盛，名气越大，这方面的收入也就越多。

国王也时常对神庙有恩赐，包括恩赐土地、各种物品等。对神庙的恩赐还有如下的"礼物"：国王的佃户如果有葡萄园或橄榄园，"需要把其中的六分之一交给国王指定的神庙当局"③。

（三）私有土地

在托勒密王朝境内，也有一些地方是归私人所有的。拥有这些私有土地的，主要是官员、军官和国王的宠幸。为了笼络这些官员和宠幸，让他们听话，顺从，对国王更加忠诚可靠，或者作为对朝中有功之人的奖赏，国王有时把大块土地，甚至连同土地上的村庄，送给上述这些人作为"礼物"。"朝臣们这样得到的土地是免租、免税的。"④这些得到国王赏赐土地的主人，"是不在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9页。
② 同上。
③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1页。
④ 同上书，第93页。

地主，依靠埃及佃户缴纳的租金，住在首都奢华的房屋中”①。

这些由国王赏赐而得到土地的人，的确成了私有土地的所有者。但这同希腊城邦时代的私有土地主人是不一样的。第一，希腊城邦的土地制度实质上是城邦通过法律而承认并加以保护的私有财产制度，城邦对私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运作和私有者的积极性很少直接干预；②而在托勒密王朝，土地所有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国王是最终所有者，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和限制始终存在，只是有时紧一些，有时松一些而已。③ 第二，在希腊城邦时代，私有土地一般是不能被政府没收的，一切都要依法处理，除非法律规定对证据确凿的叛国者的私有财产可以充公，但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这样做；但在托勒密王朝，国王既可以把土地赐给他所宠幸的朝臣，但也可以在国王对受赐者的宠幸程度消失时收回所赐给的土地，这并没有法定的程序可遵守，一切取决于国王个人的好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私有土地还包括了托勒密王朝境内的城市居民的土地。城市是可以拥有土地的，这些土地主要用于建设城市的公共设施，但也可以出售给私人，用于建设私人住宅和私人庭园。希腊人，或者通过购买城市的土地置了私产，或者通过其他居民的转让而买到私人住宅和私人庭园。这在托勒密王朝的城市中被认为是正常的个人经济行为。那么，城市的土地是怎样获得的呢？仍然是靠国王拨给的。没有国王的恩准，城市不可能有土地，更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3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73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273—274页。

谈不到把城市土地卖给私人建立私人住宅和私人庭园。

希腊人买地建房，建私人庭园，甚至在城郊建立私人别墅，经营园圃，这些活动的意义是深远的：

一方面，“希腊人既与土地发生了联系，就不再是暂时寄寓此邦的人而成为永久的定居户了”[①]。这是与托勒密王朝一直想吸引更多的希腊人前来埃及的愿望相符的。

另一方面，希腊人拥有了土地，不管是用于建设私人住宅、私人庭园，还是用于经营园圃，都意味着埃及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知道，在托勒密王朝以前或托勒密王朝刚建立时，“事实上，在埃及仅仅有过两种形式的土地所有者——国王和神。现在，希腊异族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不是种地人，与国王和神庙并列而三了”[②]。这意味着，凡人也能拥有土地作为私产，并且可以世代相传，这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土地所有制。

当然，希腊人作为托勒密王朝的城市居民，他们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是不能和国王和神庙并列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产“仅限于房屋和园圃的土地”[③]，而且仅限于城市区域之内，包括城市的郊区。何况，“就是对这种地产也还加以若干限制，那就是说，所有权只是一种暂时的特权，是可以被政府取消的”[④]。

可见，希腊人的土地所有权，是东方式的，而绝对不是希腊城邦式的。但一切按既定的程序办，仍体现了希腊的规则。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404 页。

② 同上书，第 405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四)军人份地

这里还需要谈一下托勒密王朝授予军人的土地。前面已经提出,托勒密王朝前期,军人都是希腊人(包括马其顿人),也包括少数非希腊人又非埃及人的其他民族成员,如西亚人、利比亚人。为了防止军队不稳,所以军队不招收埃及本地人。军人作为替托勒密国王服役的战士就可以得到国王授予他们的土地(份地)。起初,这种份地是没有继承权的,而且只限于用来经营果园、葡萄园、橄榄园,所得到的收入足以养家。"如果士兵们去世或者离开军队,份地要交还国王,国王可以把这些份地补充到他的封地中,或者把它们再分配给其他士兵。"①

关于授予军人的份地没有继承权问题,应做如下理解:士兵如果退役,他的儿子也已成年,可以服兵役,同时也就继续领取这块份地。② 但是,如果退役士兵的儿子尚未成年,那么能否有份地的继承权呢?如果退役士兵的儿子不愿服役,份地是否就被政府收回呢?这是一个与广大军人队伍及其子孙后代密切有关的重大问题,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妥善处理。军人们不停地呼吁要明确份地的继承权,理由是:既然这些份地只限于经营果园、葡萄园和橄榄园,而这种经营都需要投入精力、资金和技艺,如果不容许父子相传,那么谁还有积极性去经营这些土地呢?正因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所以从托勒密王朝建立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在长达150年左右的时间内,一直拖延未决。但民间习惯已经承认军人父子相传份地的做法了。即使法律并没有承

---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4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94—95页。

认这一世袭制度，人们只尊重习惯，只承认事实，不去追究这种世袭是否合法。大约又过了几十年，到了公元前1世纪，法律才认可军人份地可以世代相传。

授给军人的份地面积有多大？这是因人而异的。后来埃及人被允许当兵了，他们同样被授予份地。一个埃及士兵所得到的份地大约是5—7阿鲁拉(aroura)。① 一阿鲁拉大约是3,305平方码。② 而一个希腊步兵得到的份地是30阿鲁拉，一个骑兵军官和警卫军步兵所得到的份地则多达70—100阿鲁拉不等。③ 可见差别很大。至于国王赐给官员的庄园土地，则比给军官的份地更大得多，有上千阿鲁拉的，甚至有多达10,000阿鲁拉的。④

由此还可以看到，在托勒密王朝授予军人份地，以及军人份地实际上成为军人世代相传的私有地产的条件下，在埃及乡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而且军人土地所有者在乡村中产阶级中居于重要地位。⑤ 他们同城市中那些经营园圃的私有土地主人一样，都是靠经营果园、葡萄园、橄榄园发家致富的。尽管已有的资料无法说明埃及境内的中产阶级中有多大的比例是希腊人，但明显的是这一中产阶级在埃及经济生活中起着日益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329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328页注②。另据《英汉辞海》，“阿鲁拉，古代埃及土地面积单位，一阿鲁拉等于0.677英亩”。（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辞海》上，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277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329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887页。

重要的作用。政府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从中产阶级补充的，他们之中还提供了为王家收税的包税人，并为政府所有的或控制的工商业企业提供承包人等等。①

在这里，可以再分析一下私有土地（包括城市居民的私营园圃和逐渐世袭的军人份地）在托勒密王朝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粮食是王室土地上靠广大埃及本地人佃户生产出来的，而像葡萄树、橄榄树的栽培则是私人园圃和军人份地的贡献。在埃及，葡萄园的大片开辟，是希腊人的功绩，而希腊人之所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精心培植葡萄树，改进葡萄的质量，并促进埃及葡萄酒业的发展，正因为葡萄园是私有土地上的，产权明确，可以父子传承。② 橄榄园的开辟提供了相同的经验，必须确定土地产权的归属，橄榄树的培育者才有积极性。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埃及的橄榄油的质量始终上不去，停留于二流水平。③

对托勒密王朝来说，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用材林的匮乏。埃及没有大片森林，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的建设和船舰建造都感到木材短缺。木材只有依靠进口，但进口木材又耗资过多。托勒密王朝认为，要鼓励种树，就应当明确产权，否则谁愿意为此投资和培育树木呢？在土地产权确定的条件下，居民根据埃及的自然状况，大种椰枣树。椰枣树的树干是可用之材，而且它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88 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31—132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32 页。

的枝叶也极有价值，可用于编织筐篓，制作席垫和绳索。[1]

（五）未开垦土地

埃及境内有大片未开垦土地，但这些宝贵的土地资源自古就未得到利用。自从波斯帝国征服埃及后，由于波斯国王和官员的恣意掠夺和专横跋扈，不仅开发不了未开垦的土地，甚至连原来的已开发土地都被农民遗弃而四处逃难。灾情不断，兵祸连年，严重损害了埃及的经济组织，埃及的农业是衰落的。[2] 埃及自古因尼罗河定期泛滥，使埃及农业受益，现在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埃及农民弃地外逃，农业怎么会保持良好状态？

埃及变成地中海世界真正意义上的粮仓，是在托勒密王朝时期。[3] 托勒密王朝为了巩固边防和整治国内秩序，使托勒密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战争都在埃及以外的战场进行。这显然是使埃及农业得以恢复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对未开垦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也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增产。

开垦这些荒地的主要是什么人？大多数垦荒者是"不在服现役而在服后备役期间"的军人。[4] 托勒密王朝让他们开垦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他们。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在于：如果把现有的耕地从土著居民那里划拨出来，分给军人去耕种，就会减少王室的税赋（因为这些土地由土著居民耕种时，他们须向王室纳税和服劳役）；如果让军人们开垦荒地，并让他们在开垦出来

---

①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31—132页。

②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3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3页。

的土地上耕种并获得收成，国家却可以省去给他们发薪饷了。[①]此外，被开垦出来的土地固然可以种植粮食，从而充实国家的粮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太适宜于种谷物，而极宜于开成葡萄园或橄榄林"[②]，而前来开垦的军人来自希腊本土或小亚细亚，他们在老家就已熟悉如何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这样，他们既有把荒地开辟为葡萄园或橄榄林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加市场上酒和油的供应量，岂不是对托勒密王朝更加有利？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容许军人土地（包括新开垦出来的军人土地）有继承权，即子承父业，对于加速土地开垦进程和精耕细作，是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的。但应当注意到，由于军人家庭世代传承土地，这样，军人身份也随之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具体地说，这种变化如下：

尽管长时期以内这些被军人开垦出来的土地，像埃及其他任何地方的土地一样，在理论上都属于国王，军人作为开垦者，无权出售它们，抵押它们，或遗赠给亲属，并且在开垦者本人去世后便宣告中止垦殖权，[③]实际上，垦户的土地逐渐演变为个人终身所有并传给子孙。虽然后代仍像其祖辈那样以相同的身份服兵役，但不少垦户的身份改变了。他们被认为更像是有土地的乡绅，而不像一名士兵，一直到他们的年龄超过了适合服务的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4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4页。

界限却依旧把持着这块土地。[1] 情况继续变化。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叶,军人垦户的土地已经被垦户买卖。到了公元前1世纪,发现妇女也继承垦殖的土地。“这意味着军事服役同土地的授予已不再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2]

由于被开垦的土地主要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一带,所以无论从农业丰收的角度看,还是从保障尼罗河下游和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城市和居民的安全的角度看,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修都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由埃及的中央政府负责。托勒密王朝遵循这一古老的传统。它从希腊聘来一些水利工程建设和维修的技术人员,改造了老式的灌溉器械,水渠的灌溉效率和排水效率大大提高了。它在水利方面的投入为经济的昌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从托勒密王朝建立直到它被罗马灭掉期间,埃及农业中使用的奴隶很少,未开垦土地的开发同样很少使用奴隶。在埃及农业中,耕种土地的是本地农民;在垦殖的土地上从事劳动的,除了移民、军人外,也包括后者所使用的雇工。[3] 为了鼓励移民、军人到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开垦土地,托勒密王朝还实行了一种由国家担保的贷款制度,包括购买种子的贷款、雇用工人费用的贷款,以鼓励移民和军人等的个人垦殖活动,这也是有利于国

---

①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4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90—391页。

家的。[1]

(六)村庄的管理和赋税的征收

在对村庄的管理和赋税的征收方面,托勒密王朝的做法和塞琉古王朝的做法是有区别的。在授予军人土地,包括军人垦殖的土地的管理方面,两个王朝同样存在着差别。

先谈一般村庄的管理。本书第十二章已经指出,塞琉古国王们把一大片一大片土地连同村庄和村民都授予国王所信任的官员管理,他们有权代表国王来治理这块地方,并对上缴给国王的赋税负责。而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则由国王挑选出埃及农村中的长老这样的人,让他们负责收取村民的税收,并且从事管理中的一般工作。"这些人与其说是官员,不如说是人质,由中央政府而不是村民任命。"[2]

托勒密王朝农村不同于塞琉古王朝农村的另一个特点是:埃及对本地农民的管理更严格、更死板。"对埃及的土著来说,从来不存在什么自治或参预任何国家事务(除非他们的本业)的观念。"[3]不仅如此,埃及的农民,同埃及的工匠、作坊工人、渔民、水手、赶牲口者一样,都要参加一个同业团体,农民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同业团体的成员。农民同业团体及其成员,"在国家所指定的头目以及一系列国家官吏的领导下必须完成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这些任务就是耕种土地、制造橄榄油和衣料或其他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331页。

②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09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91页。

工作”[1]。因此，在托勒密王朝建立后，甚至早在托勒密王朝建立以前，埃及的村庄居民都处于对国王政府的依附关系中，这种关系反映于他们全体所承担的劳役义务之上，反映于“村庄对所负义务的连带责任上”[2]，即埃及农民“不但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还被束缚在他所在的村庄上，一个农民如不能证明他的户籍，事实上就是一个歹徒”[3]。

在军人土地（包括军人垦殖土地）的管理方面，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朝也是不同的。前面已经提到，塞琉古王朝也授予军人以土地，让他们在所授予的土地上种植，让他们在未开垦的土地上开垦，但它是整村整村授予的，在那里形成一个个军屯社会。而托勒密王朝个别授予的方式，授予的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屯垦区的组织，从而在接受所授予的土地（包括未开垦的土地）之后，军人一个个移居到所授予的土地上。[4] 在这种情况下，托勒密王朝境内的军人对自己被授予的和开垦出来的土地有更大程度的关注和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也较少受到屯垦区内的组织的制约。

在这里，还需要对托勒密王朝所实行的包税制做一些说明。在税收制度上，向来只有两方，即一方是纳税人，另一方是收税人。在托勒密王朝境内，引入了第三方，即包税人。包税人处于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91页。

②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50页。

③ 同上。

④ 参看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5页。

纳税人和收税人之间，具有中间人的性质。[①] 包税制很可能是原来就已存在于东方某些国家的一种简便的税制，被托勒密王朝采纳了。这种税制下，包税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协会，他们在托勒密王朝的王家税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②] 这种税制同希腊原有的税制是不同的："在希腊，这种中间人就是岁收的实际收税人。他们向国家支付一次总付的税款，从而有权从纳税人那里收到一些特殊的收入。"[③]而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所实行的包税制则不一样。在埃及，"岁收的实际征集是国家官员的任务，他们把征集到的款项和实物转送到王家银行或仓库。埃及的包税人对实际征集额不可能有什么变更；但他们在这里有诱人的利益，并在监视岁收的生产者和收税人双方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④]。这是因为，他们同国王之间订立了合同，只要他们替国王征收到全部征集额，他们可以拿到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⑤] 如果他们所收到的税或实物超过他们应当征集到的数额，即有了多余部分，那就成了他们的利润。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到政府给予的红利或薪酬"[⑥]。

在这里，还应当补充一段：在将近300年的时间内（从托勒密一世控制埃及到托勒密王朝灭亡），托勒密王朝的农业生产技术是有较大进步的。一个例子是出现了扬水车。扬水车有较复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328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同上书，第329页。

杂的装置，即有一根可以转动的直轴，轴上安装几个齿轮，齿轮上拴上吊斗。当直轴转动时，吊斗就舀着水，把水灌到位处较高地方的田里。直轴由牲口牵引。① 另一个例子是：农民实行了较科学的轮作制，豆科植物在轮作中起了很大作用。②

## 二、手工业和商业

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不仅因农业的发展而成为粮仓，而且也是手工业兴旺、商业繁荣的国家。

### （一）手工业

在手工业方面，埃及的手工业品是远近闻名的，其名声不下于塞琉古王朝叙利亚地区生产的手工业品。首先是纺织业，这是埃及的传统产业。埃及的纺织业包括三大部门，即毛纺织业、亚麻纺织业和大麻纺织业。③ 其中，亚麻纺品很早就有盛名，其次是毛纺织品。至于大麻纺织品，则主要用于制造船具，如绳索、网等等。由于亚麻布行销很广，又同广大群众的需求有关，所以受到政府的管制。④ 对亚麻布的管制是相当严格的，其管制方式可能与下面将会提到的对食用油的管制方式相似。⑤ 毛纺织业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在托勒密王朝时期依旧兴盛，尤其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毛纺织业十分发达。不过，在那里，“很少制造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20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305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306 页。

⑤ 参看同上。

普通的毛织品，多半制造以神秘景物作装饰的毛织品”①。此外，在亚历山大里亚还有用金线织的毛织品，以及丝织品，丝线可能是从中亚细亚和远东输入的。②

造纸业是埃及最享有盛誉的手工业。埃及生产的草纸（正式译名为纸莎草），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 4,000—5,000 年了。“纸莎草的原料现在只有在尼罗河上游才有。这种原料和芦苇差不多。造纸时，先把纸莎草的干割开，切平，沿着纤维纵向摊平成条状，然而把多条纸莎草并在一起，再上下挤压，等水分挤干，纤维就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纤维平面。”③上面就可以写字、作画。“所以严格讲，纸莎草并不是纸，只是一个纤维平面。”④但不管怎么说，埃及的草纸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被称为“纸”的东西。⑤

埃及生产的草纸与同时期塞琉古王朝境内生产的羊皮纸一样，受到西亚和希腊本土的欢迎。只是“羊皮纸太贵，似乎只留作贵重书卷之用，从来没有像草纸那样普及”⑥。当时，尼罗河一带，包括尼罗河三角洲，都生产这种纸的原料，它成为埃及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埃及人除用纸草造纸外，还用它作许多别的东西，例如小船、帆布、衣服、地毯、草鞋、筛子和绳子。”⑦不过这些产品都是埃及人自用的。

---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21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葛剑雄：“纸的起源与传播”，载上海《文汇报》，2011 年 8 月 15 日。
④ 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25 页。
⑦ 同上。

埃及的另一个出色的手工业行业是生产各种珠宝、首饰、装饰品和艺术性较高的玻璃制品的制造业。西亚、北非、意大利半岛、西西里以及希腊本土的一些城市，都是埃及珠宝首饰业和装饰品制造业的行销地。

埃及的造船业也很发达。造船技术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有所突破。例如，托勒密二世曾下令建造四十桨的大型战舰，足见造船技术已超过希腊古典时期的水平。

此外，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铁器生产也有较大进步，铁犁开始广泛使用，农业生产率提高了。[①] 其他手工业，如木器、马车、染料、家庭生活用品的制造都有发展。

重要的是，埃及的工匠是根据某种合同而为托勒密国王工作的。[②] 工匠们的人身自由也因此受到限制，主要反映于工匠们不能自由择业，强加给这些工匠的还有某些附带的义务。[③] 关于托勒密王朝对手工业和商业的管制情况，下面将有较详细的分析。

（二）商业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商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乡村地区，尤其在上埃及，仍保持着古代的交易方式，即以物易物。对乡村中的佃户们，有这样的规定：由于佃户是王室土地上的佃户，他们“购买啤酒、油、鱼、蜂蜜、布匹、苏打、砖、木料、纸张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几乎所有其他物品时，只能从国王那里购买，因

---

①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12 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101 页。

③ 参看同上。

为国王是唯一的生产者和卖主"①。那么,佃户们会不会从私商那里购买这些物品呢?他们是可以从私商那里购买的,问题在于:"为了取得执照,私商要缴纳的费用很多,以致他们产品的价格不可能比国王低。"②

埃及城市中的商业是发达的。除了有各类商店销售商品,以及各类手工作坊可以自产自销而外,出售商品的其他人(如家庭农场主等)还可以通过经纪人代办买卖业务。尼罗河及其支流上的货运,有私人的船只,但王家船队占优势。王家的货船在尼罗河上来往不绝,它们把王室土地和王家作坊的产品销往各地,再卖给私商和居民。"所以,埃及国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人和工场主。"③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埃及的对外经济交往的规模扩大了。埃及出口的有粮食和各种工业品;埃及进口的商品,有木材、矿产品、宝石、象牙、珍珠、香料等,有些来自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有些来自印度、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西部地区。据说,进口的还有来自中国生产的丝绸,它们可能是通过印度或塞琉古王朝领土转运到埃及的。为了便于海上航行,在亚历山大里亚海岸修建了巨型灯塔。

在谈到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兴旺时,不可忽视埃及政府和埃及城市的经济观念的转变,而希腊人的涌入以及他们的实践在经济观念转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传统的埃及经济是一个基本上物物交换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托勒

①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9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密王朝时期的经济观念的转变，首先由于市场的扩大和以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希腊人把雅典、科林斯、提洛和罗得斯等城市的市场观念引进了埃及。比如说，“货币，特别是外国货币，作为交换手段，这是亚历山大以前的埃及所不知道的”①。自古以来，埃及就有金有银，但金银只被看成财富的象征，作为宝藏，“这个国家的大量金银归神庙所有和归私人所有”②，不进入市场。埃及的法老们不知道把金银当作交换手段来使用，当时“埃及的商业基本上在以货易货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货币基础上进行”③。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希腊人纷纷涌入，经济观念逐渐变化，国王也懂得要利用金银作为交换手段，便强制地改变了以前的交易惯例，金银投入流通的数量不断增加。托勒密王朝还欢迎外国商人前来购货销货，因为这些外国商人既懂得货币经济，也懂得地中海世界的商业制度。④

希腊人涌入埃及后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关经济观念的变化，发生于私人投资和私人应拥有产权方面。这对于古老的埃及传统而言是另一项重大的突破。托勒密王朝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希腊人前来投资，前来经营，因为只有希腊人才有资本可供投入，也只有希腊人才有经营的才干。但怎样才能调动希腊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持久性呢？唯有承认希腊人对投资后经营的商店、作坊、工场、公司和农场有产权，希腊人才愿意投资和经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26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参看同上书，第263—264页。

营。以农业为例，希腊人可以在城市范围内拥有土地，经营园圃，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希腊人也可以在尼罗河三角洲开垦荒地，从事农贸经营。这些荒地是国有的，通过开发而变成了投资人的私产。但有一点却是不可违背的，即希腊人不准到村庄去购买土地或开垦那里的荒地，以免同当地的埃及人发生冲突或动摇了托勒密王朝在乡村统治的基础。希腊投资者被限制在城市范围内活动，或被限制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国有荒地上活动，这对他们来说，也就满意了，因为这些地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何必到土著居民的村庄去同他们争地并引起冲突呢？

结果，在城市周围，尤其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新迁入的希腊移民数以千计，他们"以灌园、种植葡萄和橄榄，或以科学方法饲养家禽为生，这些住户好像是在埃及国有化经济的沙漠中出现了一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绿洲，其中有些家业日趋兴旺"①。他们是靠出售自己种植或养殖的产品而发家致富，他们是市场发展的受益者，也是产权确定的受益者。

(三)货币

商业发展了，市场扩大了，同外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增多了，对货币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托勒密的国王除了把神庙储藏的金银调动出来，使之进入市场而外，还大力发展金银的开采业。但埃及境内的金属矿藏不多，所以"四种基本金属——铁、铜、银和金必须进口，至少部分进口"②。托勒密王朝开展对外贸易的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6页。

②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381页。

目的之一，就在于保证境内所需要的金属的输入：铁来自梅洛埃，铜来自塞浦路斯，银来自西亚一些地区和塞浦路斯，金来自梅洛埃、阿比西尼亚和努比亚等地。① 埃及自身生产黄金，除了东部沿红海的一些地方有金矿而外，埃及南部的努比亚沙漠也盛产黄金。②

但金矿开采后，运输是一个大问题。开采金矿的地区处于沙漠地带，而且当地和运输途中土匪横行，处于敌对状态的部落也时常来抢劫，安全堪虑。③ 加之，在这些地区采掘金矿异常艰苦，一般劳动力不愿到那里去工作，所以托勒密王朝使用了大量囚犯和战俘作为采矿苦力："为国王工作的矿工都是带着锁链的犯人，由士兵监视着他们。"④金矿区由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保护，以防土匪和部落攻击、抢劫。⑤

托勒密王朝在开采黄金、保障金矿石的运输以及积极从国外进口金银的努力收到了成效，铸造货币（尤其是铸造金币）的资源充足了，于是托勒密王朝着手调整自己的铸币制度。托勒密王朝建立之初，沿袭的不是希腊本土各城邦早期使用的一城一币制，而是采用亚历山大时期的统一币制，即按照雅典城邦的标准铸造通用的货币（金币和银币），这种情况与亚历山大去世后其他希腊化国家一样。⑥ 后来，可能为了突出托勒密王朝的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381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382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29 页。

⑤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382 页。

⑥ 参看同上书，第 398—399 页。

自主性，显示自己的实力，便另定不同于希腊本土城邦和当时其他希腊化国家的钱币标准，铸造托勒密王国钱币，这种钱币一直用到托勒密王朝终结。[①] 由于努比亚生产的黄金质量上乘，埃及在有了自己的铸币制度后，便按自己的标准铸造出成色好的金币，在市场上深受欢迎。这对于开展埃及的对外贸易十分有利。在埃及的对外贸易中，同地中海西部地区的贸易是重要组成部分，迦太基是埃及的主要贸易伙伴。[②] 埃及的金币在那里是通用的，信誉很好。

(四)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和征税

托勒密王朝对于手工业和商业的管制相当严格和细密。这既符合于古代埃及的传统，但托勒密王朝又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以至于罗斯托夫采夫把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描述为一种"计划经济"，把工匠们的人身自由受限制以及强加给他们的各种义务说成是这种"计划经济"的必要的组成部分。[③] 杜兰在所著《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中，竟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托勒密王朝的社会主义"(第六章第二节)。[④]

工匠的身份是世袭的。像铁匠、石匠、木匠等行业和手工工匠，自古就是子承父业："每一个从事一种行业的埃及人，都要从他父亲学来(手艺)而依次教给他的儿子，他们用这种方法来保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399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2卷，第1101页。

④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33页。

存职业上的传统。”[①]这些工匠中，有些是生来自由的，也有一些是被释放的奴隶，[②]但子承父业却是所有工匠家庭的惯例。

矿场属于国王，有的租赁出去，有的由政府直接经营。一些大型手工工场也是政府所有和政府经营的。比如说，生产食用油的榨油作坊或工场是王室专营的，然后以官方规定的价格销售给零售商，再卖给消费者，同时政府实行高关税率以限制外国生产的食用油输入。政府专营的食用油利润率高达70%到300%不等。[③] 至于在王室专营的榨油作坊或工场中工作的榨油工，“和过去一样，仍然是传统的、受官方严格管制却又具有自由身份的劳作者”[④]。又如，食盐、纸草甚至烟香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可以建立手工作坊，但限于小型的，要领取执照，手续繁多，并且要缴纳执照费用，这种费用起初还是较少的，后来越来越多。

手工作坊主按规定要加入同业公会组织。商人们也有自己的行业组织。这些组织全都受到政府的监督。某些行业的手工工匠被限定世世代代从事某一产品的制造，不准生产限定以外的产品。某些村庄居民也被容许生产某种手工业品，但同样是世代制造该种产品，不得越过规定。

甚至最低等行业的从业者，也必须先缴钱取得执照后才能从事该行业的工作，如搬运夫、泥瓦匠、修鞋匠等都如此。只是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8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29—130页。

③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34页。

④ 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年，第177页。

所缴费用多少，则因行业而异。[①] 征收这种费用的理由似乎是："假定每个手工业者和每个土地耕作者一样，都是从国王取得营业权利以谋生计的，于是便认为国王是工业生产和土地的最后主人。"[②]这种征收工商业者营业执照费的做法，在以前的希腊城邦中是没有的。[③]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埃及乡村中的手工工匠的处境。一个埃及本地土著的手工业者，既是他所在村庄中的一员，同时又是某一个古代同业组织的一员。[④] 作为所在村庄中的一员，他在这里登记入籍，不得随意离开村庄外出；作为古代同业组织的一员，他要服从这个同业组织，受到它的规定的制约。这些存在于埃及乡村中的古代同业组织，在托勒密王朝时期虽然也有自己的希腊名称，但同希腊人的协会和俱乐部之类的组织有严格的区别，[⑤]即它们的经营活动并不像希腊人的同业组织那样自由，而要受到很大限制。

托勒密王朝对于商业贩运活动也有不少限制性的规定。例如，商船通过尼罗河运送货物时，除了作为交易者的商人要缴纳销售税而外，另要缴纳过境税，尼罗河上有两个税卡，负责向过往商船征税。如果商人经营的是对外贸易，那么在商品出境或入境时，还要按货物缴纳关税。最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是国内贸易中的商品贩运，"在城镇甚至乡村的城门口，过境货物也要缴

---

①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32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50 页。

⑤ 参看同上。

纳进口税或出口税”①。

对工商业者经营活动的限制和名目繁多的税和费，已经使工商业者感到既受限制而又负担沉重。但托勒密王朝时期最使工商业者不满的，不是税率的高低，而是包税制。关于包税制，前面已有说明，这里再做一些补充。要知道，实行包税制时要公开拍卖收税权，申请者中标后才能成为包税人。“包税人是当地的居民，但这些税并不是在地方上拍卖，而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拍卖。”②这种征税方式使托勒密王朝获得了大笔收入。地方上的包税人在托勒密王朝官员的经常控制下进行收税工作，而官员则是有军队作为依靠的。③ 实际上，从收税权的拍卖到包税人的经营，存在着一个网络，包括密谋、贿赂、说情等等勾当。④

一般情况下，托勒密王朝总是把税款的征收承包给同政府之间有良好关系的人，而为了使他们能够征收到足额的税款，政府规定了财产抵扣制，这是指：如果纳税人未能按期如数交齐税款，包税人可以在政府帮助下扣押纳税人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货物），抵充税款。这种制度引起广大纳税人的不满，纠纷不断。纳税人的不满，有各种形式：有的逃往他地；有的纠集群众，殴打包税人；有的集体抗税拒交；有些情形甚至酿成同军队对抗的流血事件。

只要托勒密王朝仍处于兴盛阶段，经济繁荣，商路通畅，纳

---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54页。

②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29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130页。

④ 参看同上。

税人收入较多，能够按时足额缴足税款，包税制的弊端还不突出。但到了托勒密王朝后期，政府控制力下降，内乱纷起，商路受阻，生意不像过去那样好做了，纳税人不能按时缴足税款，于是包税制的弊病便暴露无遗。

（五）金融业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国内国外贸易的开展，金融业也兴起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金融业既承袭了希腊本土一些城邦金融业的经验和通常做法，又有自身的新的创造。

银行体系的建立是一大特点。关于银行一词，本书上册在谈到古典时期雅典等城邦经济时已经说明，即不能用近代意义上的银行来理解当时的银行，当时的银行不过是供融资的机构而已。按照罗斯托夫采夫的观点，托勒密王朝的银行制度的“主要创新之处就是银行业的集中”①。这是指：在托勒密王朝境内：“创建了一个设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中央国家银行，并在各州的首府设立分行，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乡镇设立支行。”②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庞大的国家银行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这家银行被称为皇家银行。③ 这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是见不到的。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境内，也有私人办的银行，不过规模都比较小，活动范围有限，而且没有遍设分支机构的情况，它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282页。

② 同上书，第1283页。

③ 参看同上。

们“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次要的作用”①。当然，即使是次要作用，私人银行在民间融资方面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为什么托勒密王朝要建立皇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体系呢？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与托勒密王朝把土地、矿山、大型手工工场的所有权都集中于王室有关，也与托勒密王朝牢牢控制私人经济活动的体制有关。正因为如此，“国王是钱财的拥有者。自很早以来，托勒密王朝就向埃及境内外的人贷款。纸草文献也表明办理借贷钱款事项是由亚历山大里亚的皇家银行实施的”②。为了保证皇家银行效忠于托勒密王室，账目务必清清楚楚，银行工作人员都要宣誓对国王效忠，以免王室财产受损。③

前面已经提到托勒密王朝实行了自己的铸币制度。托勒密金币和银币在境内的流通是垄断性的。不管什么标准的外国铸币，在埃及自己的铸币通行后，一律不准携带入境，更不准在埃及境内流动。④ 如果外国商人或本国商人把外国铸币带到了埃及，必须交出，以便重新铸造并转换为托勒密铸币，这样才能在埃及境内使用。⑤ 这样，外国商人和一般本国商人感到很不方便，他们也难以从埃及的正式金融业机构那得到贷款，而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高利贷的利率很高。据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资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283页。

②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1页。

③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2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年，第145—146页。

④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294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1295页。

料，有一个借债人抱怨道，他借了70德拉克玛的钱的债，月息6%，10个月以后，共欠债达115德拉克玛。[①] 而法定的最高利率当时大约是年利率24%。[②]

那么，托勒密王朝的正式金融机构皇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体系主要从事什么业务呢？吸收存款和经营一些贷款的业务，仍然是有的，但正如前面所说，一般人很难贷到。皇家银行实际上是托勒密王室的理财中心，保存王家收入，代理王室办理结算、转账等业务。同时，应当注意的是，皇家银行业务的开展同托勒密王朝税收的货币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托勒密王朝的赋税制度实际上是二元的，[③]即一方面采取货币税，另一方面对所辖民众依然采取实物征收和劳役的做法，而且这还同户籍制度结合在一起，居民要"受其原籍约束"，不得离开本乡本土，[④]从而居民的负担并不因货币税的推行而有丝毫减轻，[⑤]但由于货币税的采用，使王室的"行政管理理性化"了。[⑥]

如上所述，由于皇家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替托勒密王室理财，而民间借贷利率很高，所以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神庙仍同过去一样起着融资的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和小城镇，缺钱的人照常向神庙借债。神庙收入丰裕，放债收入正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

①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2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年，第212—213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213页注。

③ 参看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70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

## 三、奴隶的使用

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以前，埃及早已使用奴隶。奴隶主要来自战俘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有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巴勒斯坦人等等。奴隶的子孙世代为奴。波斯帝国占领埃及时期，情况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对埃及本地人来说，是一种解放，因为埃及本地人不再受波斯王公贵族的压迫了，但亚历山大并未改变埃及境内历来存在的使用外族奴隶的传统。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沿袭亚历山大的做法，把使用外国人作为奴隶的惯例延续下来了。外国人作为奴隶，有三个基本的来源，一是战俘，二是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三是海盗掳掠的人口在奴隶市场(主要在提洛岛、罗得斯岛)上出售而被买进的。埃及本地人被强制在矿山等地劳动的，是囚犯，而不是奴隶，尽管他们的劳动的艰苦和生活状况的恶劣和奴隶不相上下。奴隶来自外国，“纸草文书中有不少关于奴隶的资料，从宫廷诗人所描述的日常街头对话，也可以看出此时埃及有操外方语言的奴隶”①。来自外国的奴隶，大多数是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输入的。②

输入的奴隶除了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包括生活服务、园艺、驾车、饲养家畜、保镖，甚至歌舞和使用乐器等)而外，不少人用于工商业中，尽管没有准确的数字，但从托勒密王朝的文献记

① 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76—177 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35 页。

载中可以了解到，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工商业中普遍使用奴隶。①有的企业经营者还专门从西亚购入奴隶，并运往自己在孟菲斯的纺织工场做工。②

神庙也使用奴隶。这些奴隶都是埃及本地人。他们是怎样成为神庙奴隶的，说法不一：或者是欠债未还的，或者是犯了过失和罪行的，或者是为了赎罪而投入神庙为奴的，等等。在埃及的希腊人使用的奴隶，主要是进口的。希腊人的企业和家庭一般很少使用埃及本地人为奴隶。③

在托勒密王朝的矿场和采石场中，大量使用奴隶，这里的奴隶属于王室，也就是国有奴隶。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艰苦的劳动，死亡率很高。私人经营的手工作坊中，除雇用人身自由的工人外，也使用购买来的奴隶。奴隶在私人手工作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要比在矿山等地方劳动的国有奴隶好一些，主要原因在于：私人手工作坊中的奴隶是私人花钱买来的。如果奴隶病倒了而无法工作，就被主人看成是一种损失；如果奴隶累死了，或认为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太差而逃跑了，将被主人看成是更大的损失。因此，主人宁肯让奴隶吃饱睡好，以便替主人多干活，多挣钱。到奴隶老了，干不动活时，主人宁肯释放他们，让他们去自谋生路，以减少自己的负担。

家庭中使用的奴隶，无论劳动强度、工作条件还是生活待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321—322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35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321页。

遇,都比在私人手工作坊中工作的奴隶好一些。但普通的家庭一般是养不起奴隶,也用不起奴隶的。[①] 只有比较富裕的家庭才普遍使用奴隶。这里所说的比较富裕的家庭,是指官员、军人、希腊工商业者,以及希腊化了的埃及本地中产者。[②]

此外,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一些重大工程建设中,如修建大型水渠和灌溉工程,挖掘尼罗河通往红海的运河(尽管由于流沙阻塞而没有修成),修建国王陵墓(包括亚历山大陵墓和托勒密王朝的国王陵墓)等,除了有征调而来的民工(服劳役的农民)而外,也使用了奴隶,但某些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则是由工匠来完成的。

按照托勒密王朝的规定,凡是殴打奴隶,或在奴隶身上烙印,都是违法的。[③] 托勒密王朝还禁止私人到埃及以外的地方去贩运奴隶,把奴隶买进,这是为了强调埃及的奴隶贸易皆由国家垄断。[④]

为了抑制奴隶进口,托勒密王朝除了由国家垄断奴隶贸易外,还对使用奴隶者课以重税。埃及农业中或某些领域内,几乎禁止使用奴隶。这是因为,为了保持国内的安定,托勒密的国王们不希望看到外国来的奴隶同埃及本地的劳动力争夺劳动岗位,从而使本地的劳动力就业困难。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1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321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4页。

④ 参看同上。

## 四、城市生活

前面已经指出，托勒密王朝在政教合一、国王专制、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在城市中实行希腊式的城市自治制度。这一制度的要点，是市长和市议员由城市中的公民选举产生，城市法院的法官也由城市中的公民或公民代表选举产生。但城市必须听从托勒密国王们的旨意，不得有任何违背国王及其代表中央政府高官的行为。尽管如此，来自希腊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已经很满足了，他们知道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希腊本土的城邦制度，能够保留城市自治制度已经相当不错。何况，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即使在埃及境内建立一个个独立自主的城邦，又能维持多久?结果还不是先后遭到塞琉古王朝或安提柯王朝的吞并，或陷入广大埃及本地人的围攻而最终被消灭。所以希腊移民及其后裔宁肯有一个希腊人的中央集权的托勒密王朝，这样他们才能在埃及安居下来，发展经济，振兴文化，致富，并享受城市的舒适生活。希腊人全都是托勒密王朝的支持者，没有人留恋公元前4世纪中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率军南下以前的那种希腊本土的城邦生活。移居埃及的希腊人都是十足的讲究实际的人。

托勒密王朝时期，城市有自己的土地，它们由国王赐给。“赐予这些新城市的土地，被认为是从王家领地中分出来的。”[①]这体现了东方的特点，因为在希腊本土从来不曾有过城邦土地被最高统治者赐予的情形。托勒密王朝的城市在得到国王赐给的土地后，“再把土地分配给各个市民，而这些份地就变成受领

---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7页。

者的私有财产了”[1]。这又体现了希腊的特点。在托勒密王朝的城市中，东方特点和希腊特点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即使市民领取了土地，但“保有土地要尽几种义务，例如服兵役和纳租税。这些义务正好使我们想到在理论上的国家的权利，即国王的权利”[2]。

托勒密王朝时期，城市的法律是比较完善的，几乎是雅典法律体系中大部分规定的照搬。城市中有大量私人拥有并经营的作坊、商店、小商小贩，生意兴隆。城市中还设有私人开办并经营的货币兑换店和私人的金融机构，虽说利率较高，但资金的融通比较顺利。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状况良好，陆路有马车可以通行的大道，但货运主要靠航道。尼罗河上来往的货船和客船都很多。国家对海上运输控制严格，而对于内河航运控制较少，私人的船只载人载货，收费盈利，只需照章纳税(尽管税收名目繁多)就行了。当时也存在类似于航运公司的组织。

城市是经济中心。在托勒密王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希腊人的中产阶级不仅成长起来，而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拥有不动产：房屋、葡萄园、花园、土地。他们有储蓄，并且渴望把拥有的货币投资于盈利的工商业部门。[3] 官员，包括退休官员，还有军人，也都可以包括在希腊人中产阶级之内。托勒密王朝知道这些人对维持埃及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因此总是维护他们

①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07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330 页。

的利益。

在城市中，比上述这些人低一个层次的，是希腊人中的小商人、零售店主，他们人数较多，但他们不是城市小商人、零售店主中的多数，占多数的仍是埃及本地的小商人、零售店主。[①]

来到埃及的希腊人中还有一些小作坊主，他们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但应当注意到，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手工业一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埃及本地人经营的。[②]

城市还是文化中心。城市文化同样反映了托勒密王朝兼容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特色。在城市文化中，以希腊文化为主，但又保存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痕迹，还允许外族人（包括犹太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利比亚人）在城市内居住，听任他们遵循本民族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他们自己的节日活动、宗教活动和祭祀仪式，照常举行。他们可以设立本民族的教堂、祭坛、学校和互助团体。因此，在托勒密王朝前期，城市一般是稳定的、繁荣的。城市中没有发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奉者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情况基本上维持到托勒密王朝的中期。

关于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妇女地位，值得单独叙述一下。埃及的情况同希腊本土、波斯帝国和犹太人聚居的巴勒斯坦的情况不一样。在埃及，妇女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和自由的。[③] 这可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330 页。

② 同上书，第 331 页。

③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第 173 页。

能同古代埃及的传统有关。比如说，埃及的妇女，即使在结婚以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同别人订立合约，可以持有财产，一切合法的行动都不需要经过丈夫的同意。事实上，埃及的情况是：一对夫妇可以各自对外签约，他们也经常这样做。[①] 希腊人刚来到埃及时，感到埃及人这种做法是不可思议的、荒唐的。所以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以及希腊人移居埃及后，他们认为自己必须有同埃及人分开的、单独的法律和单独的地方行政长官，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妇女不是独立的人，而是由她们的父亲、兄弟、丈夫甚至儿子来代表的人。但时间久了，在埃及的希腊人逐渐接受了埃及人的传统和惯例。公元前3世纪的一项由托勒密国王颁布的法令，要求丈夫同意妻子的一切合法的行为，即从法律上承认了妻子与丈夫同等的法律地位。[②] 从此，埃及人历来尊重妇女地位的传统不仅在法律上被认可了，而且还影响了在埃及的希腊人及其后代。这也是希腊人的埃及本土化的一种表现。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城市中，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被完全移植过来了。希腊的建筑风格、希腊人的服装和打扮、希腊人的饮食习惯、希腊人的礼仪、希腊人的娱乐休闲方式，甚至希腊人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民主的珍惜，在埃及的城市中几乎同雅典一模一样。说得更确切些，埃及的城市风貌和希腊居民的生活更接近于雅典的盛期。[③] 尽管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自治城市在体制上

---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年初版，1976年重印，第173页。

② 同上书，第174页。

③ 与同时期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式城市相比，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式城市的希腊化程度更高一些。

迥然不同于雅典城邦，但希腊居民在行使自己被赋予的民主权利方面始终是专心致志的，其热情不亚于盛期的雅典。

城市中通用希腊语。从宫廷到民间，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中上层社会都讲希腊语，官方文书也用希腊文。埃及本地人为了同希腊人交往，特别是为了同希腊人做生意，也都学习希腊语，尤其是埃及本地上层社会人士，几乎全都通晓希腊语和希腊文，并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中以希腊语交流为荣。其实，不仅埃及的城市成了希腊语的天下，连希腊人居住的乡间，希腊人经营的葡萄园、果园、农场等地区，也同样如此。

希腊人在埃及这块土地上繁衍成长。希腊移民的后代同他们的祖辈一样，既然来到埃及，这里的城市又充满了希腊情调，所以他们就把这里当成了家乡，附着在这块土地上。[①] 当然，埃及同叙利亚、两河流域还有一个区别，即埃及距离希腊本土较远，要越过大海才到达希腊本土，从陆路去希腊本土要绕经西亚和小亚细亚，于是托勒密王朝境内的希腊移民和塞琉古王朝境内的希腊移民相比，他们返回故土的愿望要小得多，而把新移居地区真正当作家乡的愿望则要大得多。

## 五、首都亚历山大里亚

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在地中海沿岸和西亚地区，“仅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就有 70 多个”[②]。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 年，第 327—328 页。

② 史继忠:《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第 183 页。

大里亚是当时最大的一个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

亚历山大里亚是一座新建的希腊式的城市。什么时候开始建设？说法不一。但都同亚历山大有关，也同托勒密王朝的建立和兴起有关。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他"看见这个地方，灵机一动，觉得在这里修建一座城市非常理想，这城将必繁荣兴旺。于是他满腔热情地就要动工兴建，亲自把城市草图标划出来：什么地方修建市场，盖多少庙，供什么神——有些是希腊神，还有埃及的埃西斯（埃及神话中司繁殖的女神）等等，以及四周的城墙修在何处"①。亚历山大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还向神明献祭，得到的启示很好"②。亚历山大还允许在这里按照雅典的方式实行城市自治制度。③ 但由于他急于继续东征，继续开拓疆土，所以并没有抓具体的城市建设工作。

到了公元前 305 年，即托勒密正式建国（自任国王，称托勒密一世）的那一年，才开始大规模建设。建设这座城市究竟花费了多少时间，也有不同的说法。大体上可以这么说，经过 20 年，到了公元前 285 年，托勒密一世传位给次子托勒密二世（两年后托勒密一世去世），托勒密二世加冕时，亚历山大里亚已有相当规模，其宏伟与华丽都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成为"新雅典"。托勒密二世和以后的几位国王，相继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充、修建。

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总数大约有 40 万—50 万人。街道整

---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94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年，第 34 页。

齐、宽敞，路的两旁有树木遮阴，晚上灯火通明。城市内有王宫，还有国王的陵墓。亚历山大的棺椁安放在城市西区，托勒密王朝历代国王的陵墓也建在那里。城内建筑中有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图书馆。要知道，"希腊古典时代既没有国家图书馆，更没有受官方俸给的学者"①。而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则是国家图书馆，里面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都是领取政府薪酬的。"学术在古典希腊城邦是出自私门，东方的希腊化国家则是受庇于王室。这一区别的意义是历史性的。"②城市内还有其他文化设施，如博物馆、剧院、竞技场、角斗场、跑马场、体育馆等。所有这些与希腊城市生活配套的公共文化设施，都是希腊人的领域并按希腊方式管理。③

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以希腊人为主，此外还有埃及本地人、犹太人、外国人以及来自埃及南面的黑人，还有大量奴隶。在亚历山大里亚，主要的族群分区居住，"如希腊人住在港口的皇家区域，埃及人住在西部，犹太人住在东部"④。族群分开居住的好处，是为了"保持各自文化的整体性"⑤。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业，甚至整个托勒密王朝的商业，实际上由犹太人和希腊人把持，他们之间为了商业而竞争不已。⑥

---

① 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78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 年，第 68 页。

④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35 页。

⑤ 同上。

⑥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 年，第 68 页。

亚历山大里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城市，并且是当时地中海沿岸和周边地区最大的城市，超过了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罗马、迦太基首都迦太基城和塞琉古王朝的首都安条克。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中，希腊人约占一半或略少一些，[①]犹太人约占五分之一。[②] 到了公元前60年，也就是托勒密王朝末年，尽管埃及内忧外患严重，社会动荡不已，据说亚历山大里亚仍有30万以上的自由人，奴隶另有登记。[③]

托勒密王朝兴起后，随着希腊人的纷纷涌入，在亚历山大里亚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由希腊富人组成的富豪阶层："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和出口商，同国王本人、王家成员以及宫廷成员等一道，形成了埃及最富有的阶级。"[④]他们财富的来源，不外是经商、办企业、搞运输、收地租和包税。但更重要的是从事对外贸易业务："他们掌握船只和货栈，他们都是亚历山大里亚有势力的船主协会和货栈主协会的会员。"[⑤]在托勒密王朝境内，国王是否直接控制海上贸易的商船队，还没有足够资料证明这一点。现有的资料表明，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外国商人很多，他们用金银铸币采购埃及商品，他们不一定雇佣托勒密王朝的船队运货，而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139—1140页。

②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36页。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138页。

④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0页。

⑤ 同上书，第403页。

拥有自己的船队。① 但毫无疑问，亚历山大里亚存在着船主协会和货栈主协会，这表明托勒密王朝境内私人船舶是进行海上运输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协会不存在于托勒密王朝早期。②

在亚历山大里亚，不仅有船主协会和货栈主协会这样的富人们的组织，也有工人组成的同业团体，例如磨谷碾谷的工人和码头搬运工就建立了自己的组织。③ 由于亚历山大里亚不断扩建，后来把周围的乡村也包括进来了，原来住在这些村庄中的埃及本地农民也纳入了亚历山大里亚。他们是亚历山大里亚居民中地位最低和最贫穷的人群。④

亚历山大里亚是妇女们最自由的城市。妇女在街上无拘无束地行走，散步，闲逛，购物，参加娱乐活动。上层社会的妇女竞相打扮，在街上炫耀自己。有些妇女和男子在街上拥抱、亲热，她们并不是妓女，而是男人的情侣、女友。但妓女确实存在，而且人数不在少数。据说，“亚历山大里亚城市中最好的私人宅第属于妓女”⑤。亚历山大里亚的这种风气常使初次来到这里的外国人吃惊不已。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里亚也是托勒密王朝的科学技术中心，许多科学家、研究人员在这里居住、工作，许多发明创造都产生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397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397—398 页。

③ 参看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30 页。

④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 年，第 67 页。

⑤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36 页。

于这个城市中，其中包括计时水钟、多种以空气制动的机械、螺旋扬水器、水车等。[1] 托勒密二世临朝时，亚历山大里亚所制造的大型战船，无论从战船的长度、宽度、高度，还是装载人数方面，都超过了雅典所达到的水平。[2]

亚历山大里亚之所以能够这样兴旺、这样繁荣、这样开放，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托勒密王朝境内资源丰富，财力雄厚，有条件连续投入大量资金来建造像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大城市。加之，托勒密王朝又有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包括奴隶和征调来的埃及民工。

第二，托勒密王朝所采取的吸引希腊移民前来的政策，以及善待外国人、外族人的政策起了有力的作用。迁入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外国人、外族人不仅贡献出自己的商业才能、管理经验、手工技艺，而且还把资本带进来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业(包括对外贸易)就掌握在本地居民和外国商人二者手中。[3] 托勒密的国王们对商业发展一直采取鼓励的政策，尽管征收的进口税和出口税的税率都较高，间或对某些商品的运销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如对葡萄酒和橄榄油进行管制并课以重税，[4]但总的说来生意还是好做的。此外，在托勒密王朝的鼓励和支持下，这里的研究人员多，技术人员多，研究成果也多，甚至还“产生了新

---

① 参看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79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34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139 页。

的科学,例如比较植物学(生态学)和气候学”①。

第三,亚历山大里亚的地理位置适中,港口设施良好,有巨大的灯塔,便于夜间海上航行。过往船舶和客商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西可航行到迦太基、罗马和西西里岛上各城邦,北可以到达希腊本土、爱琴海各岛屿、叙利亚、小亚细亚,直到黑海沿岸。向东走,可以水路陆路并用,到红海边,由此前往波斯湾或印度洋。正由于亚历山大里亚是水路、陆路的商业枢纽,所以它能够长久繁荣不衰,它在当时的各国商人看来是“世界之都”②,用同时代的一位作家所说,其他城市同亚历山大里亚相比不过只是村庄而已。③ 据说,亚历山大里亚还同中国之间有贸易往来,很可能这是通过印度循海路开展的贸易,也可能是通过伊朗高原、塞琉古王朝境内而开展的陆路贸易。在《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犂轩”,可能就是指亚历山大里亚。④

第四,托勒密王朝在土地使用方面还赋予亚历山大里亚一项特权,即免除缴纳土地税。这不仅给亚历山大里亚减轻了税负,有利于工商业者前来投资,而且还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工商业的长期发展。“完全免除义务的特权似乎曾给与过某些城市;我们知道至少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就是一个例子,一直到公元后第四世纪,该城的居民对于土地还有完全的所有权而免纳土地税。”⑤

---

① 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年,第 12 页。

②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42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142—143 页。

④ 参看何芳川:《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 页。

⑤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07 页。

第五,亚历山大里亚还是托勒密王朝的金融中心。国王在这里设立皇家银行,从事外国货币的各种业务,同时它也是国王的中央金库。它与财政主管机构下属的金库并存但又有所区别。[①]皇家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城乡都有。这些银行分支机构也是与财政机构并存的。财政部门征收来的款项由银行运用。[②] 凡是雅典的银行经营的各种业务,埃及的皇家银行都经营,[③]因此可以说,"托勒密王朝是按照希腊的方式组织(银行)的"[④]。甚至连术语、结算方法、运作方式也都是希腊式的。[⑤] 正如前面已经谈过的,[⑥]托勒密王朝的皇家银行是国有银行,而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本土,银行主要是私人的。某些希腊城市也有城邦银行,但其规模与托勒密的皇家银行无法比拟。银行业高度集中于国家银行,是托勒密王朝的一大特征。[⑦] 亚历山大里亚商业的繁荣,在较大程度上得力于商人的融资条件较好。

## 六、埃及的犹太人

亚历山大当初率军进入埃及,赶走波斯军队时,曾对境内的犹太人许下承诺,即要让埃及的犹太人不再受到歧视,享受与希腊人同等的待遇,拥有与希腊移民一样的权利。于是西亚的犹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404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405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同上书,第 2 卷,第 1283 页。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本书,第 916—917 页。

⑦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287 页。

太人纷纷来到埃及。这些犹太人当初是作为亚历山大的客人被邀请到埃及来的。①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仍采取亚历山大当年制定的宽待犹太人的政策。当托勒密一世攻占耶路撒冷时，战争中曾俘虏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托勒密一世把他们带回埃及，后来都被托勒密二世释放了，其中不少人就定居在亚历山大里亚。

犹太人不管是原先就住在埃及的还是亚历山大统治埃及后陆续移居于埃及的，甚至包括托勒密王朝占领巴勒斯坦后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的确未遭到歧视。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官员。②犹太人在埃及城市中生活和经商的，被容许按本民族的法律处理日常事务，还被容许设立自己的法庭，选举自己的法官，并且依据本民族的法律判案。

在埃及军队中，除希腊人当兵以外，犹太人也可以当兵。“托勒密军队中的犹太雇佣军成为最先被希腊化的犹太人。”③这些犹太兵士都会说希腊语，但他们仍坚持信仰犹太教，他们在所驻防的地区设立自己的圣殿，并同巴勒斯坦老家保持密切联系。④ 相形之下，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前，托勒密军队中是不招收埃及本地人的。

前面已经提到，亚历山大里亚人口中犹太人约占五分之一，并且专门开辟一个犹太人居住区，让犹太人安家。犹太人在这

---

①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67页。

②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年，第84页。

③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④ 参看同上。

里经商，开作坊，做医生，当教师，或给别人打工。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并不限于居住在犹太人居住区内，他们在亚历山大里亚有迁移住处的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除了限定托勒密王朝官员居住的那个区以外(因为托勒密王朝规定那里不允许非政府官员迁入)，都可移住。据说，亚历山大里亚城区也有一支犹太雇佣军，他们甚至被称为犹太"马其顿人"。[1]

犹太人在埃及城市中依旧信奉自己的传统宗教，有神庙、祭坛，有犹太教祭司主持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有些神庙兼有学校性质，或者说，政府容许犹太人把自己的学校设在神庙内。到了托勒密五世时(公元前 203—前 181 年)，距托勒密一世建国已经一百年以上，埃及境内有些犹太人还会讲希伯来语，尽管人数已不多，但他们都已看不懂希伯来文。[2] 大多数犹太人会说希腊语，甚至在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居住区内也是这种情形。[3] 只有设在神庙内的学校才教授希伯来文，讲解犹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并以希伯来语阐释犹太教的经典，从而增加犹太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犹太人坚持这种神庙与学校合一的做法，但却增加了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对犹太人的不满，也引起托勒密王朝的猜疑。

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对犹太人的不满是逐渐加大的，除了文化上的隔阂而外，还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对立情绪。

① 参看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7 页。

②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涅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 年，第 77 页。

③ 参看同上。

从政治上说，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都承认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都把国王奉为神。然而，犹太人有自己信仰的犹太教和犹太教的神，他们并不相信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是神的化身，这样，在希腊人看来，犹太人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是不是另外有国，神外有神，从而形成了另一种神权和政权的合一？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对犹太人的猜忌加深了，托勒密王朝对犹太人也越来越不信任了。

从经济上说，犹太人在埃及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就，这也使希腊人嫉妒不已，认为犹太商人抢了他们的生意，占了他们原来的地盘，而埃及本地人则更是仇视犹太人，认为犹太企业只雇用犹太人，排斥本地人，断了本地人生路，夺了本地人的饭碗。

加之，犹太人历来奉行的是不与外族通婚的惯例。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是可以通婚的，但犹太人既不与希腊人结亲，更不与埃及本地人联姻。犹太人封闭性的婚姻制度被看成是不让外族染指于犹太人的技艺，维持技艺不外传的传统，更被看成是不让外族人有机会参与犹太人的经商活动，以免财富的外流、利益的分享。加之，犹太教有禁止独身的规定，所以托勒密王朝城市中犹太人繁殖很快，这越发引起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的担忧。[①]埃及的历史学家则传播几百年以前犹太人因患麻风病等恶疾而曾被逐出埃及的故事，更加扩大了埃及本地人对犹太人仇恨的对立情绪。[②]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37页。

② 参看同上。

另一个同政治经济都有关的新情况是:罗马共和国已日益强大,它在击败迦太基之后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的霸主,而且在击败安提柯王朝之后正准备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扩张。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托勒密王朝认定罗马下一个攻击目标将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境内的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都把罗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国。罗马的粮食生产是不敷国内需求的,歉收年份更有求于从国外进口粮食。埃及是著名的粮仓,希腊商人和埃及本地商人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都不愿从事对罗马的粮食出口生意。当罗马向托勒密王朝购买粮食时,正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商人接下了这一大笔生意,并由他们负责把粮食运到意大利半岛。犹太商人这种只图赚钱而不顾托勒密王朝命运的行为,遭到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的唾骂。

上述这些都为托勒密王朝晚期犹太人在埃及的地位的变化产生了较大影响。犹太人越来越成为埃及境内令人厌恶的族群了。

## 第三节　托勒密王朝的衰亡

### 一、罗马的威胁

前一章(第十二章)在谈到塞琉古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时,曾指出马格尼西亚战役是一个分界线。这是指:公元前197年,罗马军队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击败了安提柯王朝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军队,控制了希腊,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闻讯,派兵进入小亚细亚,准备渡过海峡,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对抗罗马军

队,以支持安提柯王朝。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帕加马王国,原来隶属于塞琉古王朝,后来摆脱了塞琉古王朝,宣布独立。它害怕塞琉古王朝的军队重来,在这紧要关头,倒向罗马一边。公元前189年,罗马军队在帕加马王国境内马格尼西亚的战役中重创塞琉古军队,塞琉古军队不得已撤出小亚细亚,退守叙利亚北部。从此,塞琉古王朝元气大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

托勒密王朝由盛转衰的时间比塞琉古王朝晚了好几十年。托勒密王朝当时的国王是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3—前181年)。他看到塞琉古军队被罗马军队击溃的事实,了解到厄运即将降临在自己头上,因此向罗马派出使者,以屈辱的方式向罗马表示,自己不会为罗马征服希腊本土而同罗马对立。而罗马则认为,这时还是以安抚托勒密王朝为好,因为罗马还有比同托勒密开战更重要的事情:一是,尽管罗马已经击败了迦太基,但还没有灭掉迦太基,而只有消灭迦太基,罗马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霸权才能确立;二是,尽管罗马已经击败了安提柯王朝,但从马其顿到希腊本土,到处都有反罗马的势力,罗马也必须消灭安提柯王朝,把希腊本土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然后才能以此为基地,向西亚、北非扩张;三是,罗马无论是为了安定意大利境内,还是为了应付此后的征服塞琉古王朝的战争,粮食的充足供应都是必须保证的。埃及是意大利的主要粮仓,所以罗马有必要维持托勒密王朝现状,这样对罗马更为有利。正是在这些考虑之下,罗马安抚托勒密王朝,告诉托勒密的国王们,罗马同托勒密王朝是友好的,托勒密王朝如果受到其他方面的威胁,罗马将伸出援助之手。

马格尼西亚战役结束之后又过了半个世纪,到了公元前

146 年，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部，罗马不仅灭掉了迦太基，而且把首都迦太基城彻底摧毁，把还活着的迦太基人全部变成奴隶；在东部，罗马在灭掉安提柯王朝后，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对希腊本土的反罗马的科林斯城邦也采取了毁灭性的镇压，全城被付之一炬，男子全遭杀害，妇女和小孩全体被变卖为奴。从这时起，托勒密王朝才真正感到大难即将临头。罗马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这时已经四分五裂，绝对不是罗马的对手。托勒密王朝同样抵挡不住罗马军队的进攻。如果抵抗罗马军队的进攻，迦太基和科林斯的悲惨遭遇将在埃及重演。于是托勒密王朝君臣们抵抗罗马入侵者的意志已经基本动摇。谁都不敢得罪罗马人，生怕挑起事端，使罗马找到攻入埃及的借口。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托勒密王朝内部发生了地方分离势力抬头的严重问题。地方分离主义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从托勒密王朝建立之初就有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全是由希腊人（包括马其顿人）担任的，埃及本地人只能充任低层办事人员，一切都得从命于希腊人上级，所以他们不服。埃及历来就有一些精英家族，势力很大，对托勒密王朝以前的历代统治者都有巨大影响。即使埃及曾被外国入侵者占领过，但他们仍有同过去一样顽强的政治欲望。① 这些精英家族在法老时期都是当地的世袭领主，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荣誉世代传承。他们还担任祭司职务，这一职务既有地位，又有经济利

① 参看劳埃德："早期托勒密时期的埃及精英：若干象形文字的证据"，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118 页。

益，还能在地方上产生很大影响。[1] 当托勒密王朝强盛时，以这些精英家庭为代表的地方分离主义暂时不动声色，处于隐蔽状态。而当托勒密王朝的军事力量削弱之后，地方分离主义便公开活动了，本地的精英家族也随之纷纷由后台转到前台。上埃及的情况正是如此，甚至连尼罗河三角洲也日益被地方分离主义所笼罩。特别到了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后，托勒密王朝由于兵源不足，开始招募埃及本地人在军队中服役，土著军队人数不断增加，这又进一步加速了埃及地方分离势力的滋长。[2] 它从内部销蚀了托勒密王朝的力量。

## 二、埃及本地人的逃亡和起义

前面已经指出，托勒密王朝建立后，由于不信任埃及本地人，所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全都是希腊人，而为了稳住埃及本地人，试图通过宗教政策把托勒密国家同埃及本地人连接起来，即传播这样一种思想：托勒密国王就是神的化身、神的代表，他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宗教领袖，埃及本地人服从国王旨意就是对神谕的服从。尽管托勒密历代国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埃及人心中，从未把他们和真正的法老视为同一，也从未承认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真正的首都”[3]。

在埃及本地人看来，托勒密王朝是希腊—马其顿人的王朝，

① 参看劳埃德：“早期托勒密时期的埃及精英：若干象形文字的证据”，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120—121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21页。

③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5页。

埃及本地人是被征服者,如同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一样。"他们一直把托勒密家族看成是外国人,并始终梦想将来有一位本族的国王,把孟菲斯作为他的首都。"①这几乎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托勒密王朝的创立者托勒密一世和他的继承者们都懂得这一点。好在当时托勒密王朝实力强大,不怕埃及本地人造反,所以让希腊人掌握地方实权,同时对埃及本地人采取安抚政策。比如说,建设重大工程时要征调本地农民来从事劳动。虽然本地农民是在服劳役的名义下被征调来的,但政府给以报酬,工作条件也较好,不允许虐待他们。对于广大农民,无论他们是在王室土地上耕种,还是在神庙土地上耕种,或者从事垦殖荒地工作,都是自由人身份,或者划给他们一块份地,或者采取分成制,可以养家糊口,只是不得随意离弃土地而已。在司法方面,大体上能够依照法律处理,并没有对埃及本地人实行歧视。尽管如此,埃及本地人心里仍然牢记着他们祖先生活过的法老时代,牢记着法老时代的传统,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并不是托勒密王朝推行的安抚政策就可以消除的。② 但不管怎样,由于托勒密王朝还相当强盛,所以从总体上说,埃及社会安定了将近一百年之久。

地方分离主义主要滋生于埃及乡村。城市中的情况要好一些。在城市中,埃及本地人或经商,或经营手工作坊,或做小商小贩,或任雇工,或从事自由职业,一切待遇都正常,没有受到歧视。埃及本地人在托勒密王朝前期的城市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好

---

①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5页。

② 参看同上。

处，生活有所改善。埃及本地人从自己的记忆中，是能够做出对比的：这比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要好得多。虽然他们对希腊人在城市中所得到的更大的好处，感到嫉妒，心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忍耐。所以城市中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之间大致上相安无事，只是埃及本地人心存芥蒂，久久未消而已。

从托勒密四世、五世起，托勒密王朝前期的盛世已告结束。而从这以后的国王们比托勒密四世、五世更加昏庸无能。他们只图享乐，家族内部争权夺利，任用佞臣、贪官，把持朝政，搜括民财，民怨载道。埃及本地人的负担加重了很多，而谋生之路因经济的停滞而越来越窄了。埃及本地人从来都是最相信本族祭司的，祭司们常说，在波斯人和希腊人统治埃及之前的长时期内，古代埃及法老治理埃及时期国运昌盛，经济繁荣，人民富庶，而现在希腊人的统治却同波斯帝国统治埃及时一样，埃及人受欺压，受盘剥，所以只有反抗才有出路。埃及的社会形势从此急转直下。①

农民逃亡是最常见的反抗形式。埃及农民的逃亡始于公元前3世纪末年，原因主要是农民负担的租税和劳役越来越重，一些农民欠债累累，于是逃离了乡村。不少王室土地荒废了。这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即农民逃亡，使得王家土地荒废，农产量下降，国家税收减少，政府就加重税负，增加劳役天数，于是农民的负担更重了，他们只好继续逃亡。加之，在这段时间内，保留下来的土地册和其他文件表明，水利失修，灌溉系统不起作

---

①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334页。

用，土地沙化严重，导致农业产量剧减，这进一步促使农民弃地外逃，以谋生计。[①] 进入公元前 2 世纪后，逃亡的农民更多，离村外逃竟成了普遍现象。[②] 有些村庄竟有一半土地荒废。

弃地外逃的农民逃往何处？有逃往城市的，有逃往边远地区的，有逃入神庙求庇护的，也有逃往尼罗河下流湿地，靠捕鱼和开垦土地谋生的。无论往哪里逃，都表明乡村的动荡不宁，结果都是国王的收入缩减了，埃及的粮食产量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托勒密王朝日趋衰落的过程中，连希腊地主也有弃地离去的情况。这是因为，在埃及的乡村，允许私人资本在一些荒地上或未开垦的土地上投资建立农场；[③]希腊移民是投资者、农场的主人，他们置地而不种地，种地的劳动力是本地人。[④] 但到了后来，由于政府官员贪污、勒索、腐败，税收又不断加重，希腊农场主就加紧压榨本地劳动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本地劳动力先离去，最后希腊投资人也不得不抛弃土地而走。“托勒密王朝早期君主所曾开辟的土地现在丧失了。那些土地大片大片地变成了庙产，或者变成荒地，荒废无主而渐趋干涸。”[⑤]

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后，埃及一向著名的手工业生产也衰落了。税收加重是原因之一。官员专横跋扈，勒索成风，随意没收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19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406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同上书，第 125 页。

手工业者的财物，是导致手工业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此外，由于托勒密王室内讧不绝，社会秩序混乱，商路阻塞，出口减少，也使得一些手工作坊停产倒闭。[①] 公元前 2 世纪，埃及境内的王室大型手工工场中的工人也屡有逃亡，主要是因为工资减少了，劳动强度加大了。工场中的监工为了防止工人怠工，采取了对工人体罚或其他惩戒手段，工人只好采取逃亡这种反抗形式。这种情况有时也发生在一些私营大型工场中。

手工工场中的埃及雇工在受到恶劣待遇和惩罚时，还实行集体罢工。“罢工是一种向神提诉以听候神的判决的解决办法，其具体行动就是离开他们平时的住所而躲避到一所神庙中去。”[②]这是一种古老的反抗形式，“罢工”在埃及被看成是“亡命”一词的同义语。[③] 罢工者躲在神庙里要靠神庙给以食宿，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在同情罢工的人看来，这恰恰反映了埃及人始终把埃及宗教中的神当成自己的神，而不相信托勒密国王是埃及人的神。“罢工者在神庙里一直消闲度日，要等纠正了偏差或受强力压迫才肯恢复工作。”[④]

甚至连充当职员和警察的埃及本地人，也有逃离职守的。他们并不是为了税收加重而出走，也主要不是为工资菲薄而离职。他们通常是为了受歧视、受冷落而这样做的。他们受上级领导（几乎都是希腊人）的压制和不公平处理，或受希腊同事的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20 页。

②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392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同上。

排挤,对希腊人深怀不满和仇恨,于是一走了之。他们也通常逃到神庙,神庙中的祭司同情他们,愿意收留他们。

由于神庙中的祭司不仅在当地有经济实力,有威望,而且因收留逃亡者、罢工者、落难者而获得埃及人的信任,于是名声更大了。在埃及后来所发生的本地人暴动中,“这些叛乱的首领往往是土著祭司。他们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把外国人,包括国王在内,一起赶走”①。

接着,埃及兵的兵变也发生了。正如前面已经多次提到的,在托勒密王朝建立后的长时期内,只有希腊人(还有犹太人)才有资格当兵,埃及本地人在战争期间,只能修建工事和充当挑夫、马车夫。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之间一再发生战争,托勒密王朝时而失败,时而获胜,即使获胜,兵力损失仍然很大,所以从托勒密四世起,为了补充兵力之不足,开始招募埃及本地人入伍,成立了埃及本地人的军队。后来发生兵变的,就是埃及军队。

埃及军队之所以哗变,原因很多。一是由于埃及军人不管在战场上如何英勇作战,待遇都低于希腊军人,他们心中不服;二是,高级军官都是希腊人,这些希腊将领歧视埃及士兵,战功主要归于希腊士兵,从而引起埃及军人的愤怒。再加上埃及社会上对希腊人的怨恨在增加,地方分离主义在抬头,终于激起了埃及军队的一次次哗变。尽管历次哗变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但埃及军人对希腊人的怨恨未消,总在等待机会再次哗变。此外,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页。

越来越多的埃及军人转而采取消极方式来反抗,如抗命罢战,不战自退,甚至开小差。

在这种情况下,托勒密王朝不得不采取缓和矛盾的政策,“答应向土著居民让步,但这样一来,反而鼓励了他们,使他们更相信政府的力量薄弱不足以强迫执行它的要求,因此情况弄得更糟”①。

在埃及人的起义中有几次规模很大而且影响深远的事件。一次是公元前165—前164年发生于首都亚历山大里亚的埃及人起义。这次起义是多年以来埃及本地人对希腊统治者的积怨累积而爆发的。要知道,亚历山大里亚虽然是首都,是自治城市,但公民权作为国王授予的一项特惠,只授给限定的人群。②埃及本地人虽然可以住在亚历山大里亚,但他们一直享受不到自治权这一特惠。③ 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南部原有的一些村庄中的埃及农民,他们世代住在这里,务农或经营手工业为生。亚历山大里亚扩建时,把这些村庄纳入了城市地区,但他们却不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④ 这无疑使他们仇视希腊人,仇视那些得到亚历山大里亚公民权的希腊居民。

公元前165—前164年亚历山大里亚的起义由埃及上层人士、贵族世家出身的佩托沙拉匹索领导。他受到埃及军人的支持,由军队哗变开始,很快扩展为一场有埃及各阶层人士参加

---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页。

②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年,第77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的、并有农民加入的大起义。不幸这场起义在当时实力依然强大的托勒密军队镇压下失败了。

此后几十年间，埃及人的起义始终不断。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在埃及南部以底比斯为中心又发生了大起义，其规模大于公元前165—前164年亚历山大里亚的起义，而且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更广泛。托勒密国王不得不耗费大量财力和派出众多军队才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但托勒密王朝的元气已经大伤，它在埃及南部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了。

需要指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在埃及境内所发生的大规模埃及本地人的兵变和起义，都同托勒密王室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国王是托勒密六世（公元前181—前145年），亚历山大里亚起义就是在他临朝期间发生的。也正是在托勒密六世临朝时，罗马已经占领了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灭掉了安提柯王朝。罗马人于公元前146年彻底摧毁科林斯，就是给所有希腊人一种警告：谁要是胆敢反抗罗马人，科林斯的毁灭就是例证。托勒密六世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形势下死去。他死后，埃及的局势更加混乱。埃及境内的势力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托勒密七世，一派支持托勒密八世，两派都有军队参加，包括希腊军人和埃及军人，也都有埃及地方势力的背景。关于这些，本章将在下文进行阐述。①

## 三、犹太人问题的产生

在托勒密王朝政府官员腐败加剧和经济状况恶化的形势

① 参看本书，第963—965页。

下,不仅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而且希腊人、埃及本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坏,最终形成无法共处的格局。

托勒密王朝从建立之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三个族群:希腊人、埃及本地人和犹太人。到了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后,三个族群的对立把托勒密社会撕裂成三大块。托勒密名为统一的王国,表面上仍由希腊人掌握大权,实际上,三个族群各有势力范围,互不相让。希腊人的势力主要在尼罗河下游,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中。犹太人的势力也主要在城市中,侧重于商业和金融业领域。埃及本地人的势力则城乡均有,尤其是在埃及南部地区势力更大,那里几乎全是埃及本地人的地盘。如果说,希腊人的后台是托勒密王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官员,犹太人的后台是犹太教神职人员和城市中的工商界富户,那么埃及本地人的后台则是各地的祭司和世代在埃及拥有势力的"埃及精英"。

进入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后,犹太人在埃及的处境越发困难。主要原因是,犹太人被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看成是只顾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全的商人,是亲罗马的败类。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犹太人自知敌不过有政府支持的希腊人和有强大地方势力支持的埃及本地人,于是有些犹太人选择了离开埃及的道路,他们把资金也带走了。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对犹太人的痛恨,于是殴打犹太人、抢劫犹太人财物的事件屡有发生。没有逃离埃及的犹太人不敢再住在城市内了,他们也不敢逃到乡下,因为那里埃及本地人多,他们逃到乡下无异于受到更大的迫害。犹太人只有逃往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他们寄希

望于罗马人，把罗马人当成是解救者，以为罗马人定会早日消灭托勒密王朝，把犹太人解救出来。

正在这时，埃及的犹太人从巴勒斯坦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即那里的犹太人在西门的领导下，并得到罗马的支持，于公元前142年赢得胜利，迫使塞琉古王国承认犹太的独立，西门成为世袭的犹太国哈斯蒙尼王朝的开国君主。[①] 这一消息使埃及的犹太人欢喜若狂，他们纷纷离开埃及，迁往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大批出走，使托勒密王朝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同时也加深了埃及境内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对犹太人的怨恨。他们的反映是：早就知道犹太人没有把埃及当作自己的家乡，果真如此。西门是在同罗马结盟之后击败塞琉古王朝的，这似乎又证实了犹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亲罗马分子。

## 四、罗马在地中海东部海域霸权的确立

罗马在公元前189年的马格尼西亚战役中击败塞琉古王朝军队，占领小亚细亚，直逼叙利亚边境之后，塞琉古王朝已由盛转衰。接着，罗马又灭掉安提柯王朝，统治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一些岛屿，罗马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霸权已经初步建立。剩下的只有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这两个由希腊人掌权的国家了。这时的塞琉古王朝的疆土已经很小，中亚细亚、印度河流域早已不在塞琉古王朝管辖范围内，伊朗全境、巴比伦城和两河流域一部分地区也被由塞琉古王朝分离出去的帕提亚王国夺走。巴勒斯坦已隶属于新建立的犹太国。塞琉古王朝主要管辖区域

---

① 参看本书，第839页。

只限于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地区。相比之下，托勒密王朝所统治地区大致上仍同过去差不多，因为埃及仍在托勒密国王掌控之下。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于埃及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抬头，埃及南部的许多地方已不听从托勒密国王的命令了。而罗马人的向东扩张仍在继续。

进入公元1世纪后，罗马共和国本身陷入长期的派别斗争之中。公元前73—前71年，意大利半岛爆发了斯巴达克领导下的奴隶起义。罗马统治集团中的贵族派和民主派两派，既忙于派别斗争，又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斯巴达克起义。尽管如此，罗马仍然不放弃对东方的征服。公元前67年，塞琉古王朝末代国王安条克十三世遇害，国内争夺王位的内乱加剧。公元前64年罗马消灭了塞琉古王朝。

到了公元前60年，罗马形成了“三头政治同盟”，三头是指克拉苏、庞培和恺撒三人，其支持者是罗马的平民和骑士，即民主派。民主派在罗马掌权后，在国内恢复了公民会议，恢复了保民官制度，并清除了元老院中的贵族派势力。罗马内部既已安定下来，于是就想乘着托勒密王朝衰弱无力的机会，一举消灭这个唯一留下来的希腊化王国。

但这时的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平静。这里变成了海盗横行的海域。海盗不仅公开抢劫过往的商船和客商，还公然登陆攻击地中海沿岸罗马统治下的城市，绑架人质，高价勒索，如果勒索未能如愿，就杀戮人质或将其变卖为奴隶，甚至连罗马派驻的官员都被绑架。此外，由北非运往罗马的运粮船只也一再遭劫，粮商不敢再从事海上贩运粮食的生意，罗马粮价因此大涨，甚至一度有断粮的危险。

罗马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海盗掠夺事件，而是具有政治意图的阴谋。海盗以希腊本土西部和南部的城邦境内多山多峡谷的港湾为基地，目的在于把罗马人赶回意大利半岛，让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再度成为希腊人的领海。因此，庞培向罗马元老院提出肃清海盗的方案。在恺撒支持下，罗马元老院授权庞培指挥一支拥有 12 万 5 千名士兵和 500 艘舰船的军队，进行消灭海盗的战争。①

庞培担任统帅后，从陆上战争着手，先陆续占领并摧毁了海盗在希腊本土和各个岛屿上的海盗基地，断绝海盗船只的归路，然后在战争中击沉和俘获海盗船只，予以全歼。海盗首领被俘后处死。从此，地中海商路恢复通畅，粮食源源运抵罗马，罗马粮价大跌。罗马这才真正确立了在地中海东部海域的霸权。

庞培手握重兵，为什么在肃清海盗之后不一鼓作气攻下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消灭托勒密王朝，占领埃及全境呢？据说，他接受了托勒密王朝一大笔贿赂，所以按兵不动。但这只是一种传闻而已。根据罗马元老院的规定，将帅统兵远征国外，必须有元老院的授权。那么，元老院为什么不乘此机会授权庞培，让他统兵进攻亚历山大里亚呢？这又同元老院对庞培产生疑心有一定联系。

具体地说，很可能与下述事件有关，即庞培在肃清海盗后，急于返回罗马城，是为了给自己手下的兵士争取一份福利：他建议给这些兵士分配一份国有土地，以维持他们退休后的生活。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109 页。

这是庞培向他手下的兵士做过承诺的。然而,当庞培返回罗马时,受到人民的欢迎,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但元老院却不信任他,不愿再重用他,因为元老院认为庞培个人野心太大,有独裁之意。至于他建议向手下的兵士分配国有土地的做法,也因元老院不同意而作罢。据说,在这个问题上,元老院中有人认为庞培有收买军心之嫌。

公元前 59 年,恺撒当选为执政,立即向元老院提出庞培曾向元老院提请讨论的把国有土地分配给士兵的议案,元老院依然刁难,但在恺撒坚持之下,元老院终于通过了。罗马军队士气大振。公元前 58 年,恺撒率军远征高卢,获得胜利,又进军莱茵河,横渡海峡攻入不列颠。至此,恺撒的名声达到了高峰。

此后 10 年,罗马内部的斗争又趋激化。一方面,恺撒同元老院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另一方面,恺撒和庞培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恺撒的地位几乎不保。庞培手下的军队人数比恺撒的多。庞培这时已经拥有两个根据地,一是西班牙,另一是阿非利加,即原来的迦太基。但庞培的野心更大,他率军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军希腊,想把希腊变为自己的第三个根据地。庞培把军队布置在这三个根据地,准备同恺撒展开决战。恺撒知道他同庞培之间的大战已不可避免,于是首先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半岛的地位,接着攻下了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公元前 49 年,恺撒和他率领的军队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伊庇鲁斯地区。公元前 48 年,恺撒以人数只及庞培一半的军队,同庞培决战,结果庞培军队大败。庞培率领残部南下,他劝部下向恺撒投降,他本人和妻子则乘船由希腊海边渡海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庞培所乘的船抵达亚历山大里亚

港湾时，托勒密国王托勒密十二世派大臣去迎接。不料庞培刚下船就被刺客刺死，他的妻子在船上目睹了这一惨状。据说，派刺客刺杀庞培，是托勒密王朝内部某些人的预谋，策划者或者想借此向恺撒邀功，或者想使埃及免遭恺撒军队的侵入。

恺撒闻庞培被害，赶到了亚历山大里亚，厚葬了庞培，处决了刺客，随即进驻王宫。至此，尽管托勒密王朝此时仍继续存在，但已经置于罗马直接控制之下了。

## 五、托勒密王朝晚期的埃及本土化

前面已经提到，托勒密王朝衰落后，境内希腊人和埃及本地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埃及本地人的起义(包括埃及军队的哗变)，以及埃及农民的逃亡，不断发生。埃及本地人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日益滋长，不少地方，尤其是埃及南部地区，实际上已不再听命于托勒密国王了。在这种形势下，托勒密王朝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采取了加速埃及本土化的措施，借此缓解埃及本地人的不满情绪。

(一)神权王权的合一趋向本土化

首先在神权王权合一方面，托勒密王朝出于笼络埃及本地人的考虑，把埃及本地人信奉的神祇同希腊人信奉的神祇置于同等重要、同等显著的地位，以表示希腊人信奉的神祇和埃及本地人信奉的神祇，都是托勒密王朝尊崇的神，托勒密王朝的神权王权合一并非只是王权同希腊人信奉的神及其代表的神权的合一，而是王权同希腊人信奉的神、埃及本地人信奉的神以及二者所代表的神权的合一。托勒密国王以为这是宽慰埃及本地人的必要措施，也是让埃及本地人认同托勒密王朝的必要措施。

这样一来，埃及祭司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国王不仅提高了付给祭司的报酬，以及增加了对他们的赏赐，而且也赋予祭司直接管理当地埃及人事务的权力，这在托勒密王朝盛期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过程从公元前 2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当时，托勒密五世刚登上王位，他就为了笼络埃及祭司而赐给他许多优惠，包括免除神庙的土地税，免除神庙历年拖欠的税款，大幅度降低神庙手工作坊所制亚麻布的税率等等。① 因此，"孟菲斯的祭司会议为了报答这些恩典，作出一项纪念托勒密五世的决定，其中列举了他的德政，并指明埃及各神庙必须对他表示崇敬"②。托勒密国王和王后还专门写信给当地的行政机构，要他们保证神庙收入，不得使他们受到侵害。③

此外，过去托勒密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中，通常以希腊人为正职，埃及本地人为副职，村一级的由埃及本地人自行选举管理者。到了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后，地方行政机构中，埃及人任正职的渐渐多起来了。在提高埃及祭司们的地位以后，实际上在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以外又多了一个系统，即埃及人的神职系统：由各级祭司自成一系，插手地方行政事务。埃及祭司们成为当地最有权威的地方管理者。

尽管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能认为埃及祭司掌握地方管理权之后希腊人是不是加速与埃及本地人融合在一起了，但可以做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49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第 273—274 页。

出初步判断的是：埃及祭司地位的提高并对此进行了公告，意味着托勒密王朝对待埃及本地人的政策做了重大的调整。[①] 从总体来说，希腊人主要住在城镇中，以希腊居民为主的城镇不仅同埃及本地人聚居的村庄是分别由不同的法律来治理的，而且以希腊居民为主的城镇和以埃及本地人为主的城镇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法律之下，希腊城镇居民和埃及城镇居民仍分别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生活。[②] 这种情况并未因托勒密王朝对埃及本地人的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祭司地位的提高并赋予他们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权力等措施收效如何？简要地说，收效甚微。首先是神庙财产增加了，这等于为埃及的地方分离势力提供了更多的可使用的财力。同时，"一些祭司团体有见于国王之懦弱无能，有见于自身在居民中具有影响，愈来愈表现其僭妄骄汰，不断地要求得到新的特权，诸如成立避难所、接受土地等等，而这些要求大多能如愿以偿"[③]。结果，托勒密王朝的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国王在埃及境内的影响也进一步削弱了。

（二）兵制的调整

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本土化也反映于兵制的继续调整。要知道，托勒密王国建立后，只有希腊人才有资格当兵，兵士是招募的，有薪酬，但希腊人把服兵役当作公民的义务。而从托勒密王

①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77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76页。

③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8页。

朝中期以后，由于同塞琉古王朝的战争频繁，兵力损失很大，兵源不足，于是招募埃及人当兵。但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埃及军队哗变的事件常有发生，托勒密王朝进而全部采取雇佣兵制度，即不管是希腊人、埃及本地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以雇佣兵的身份当兵。在新的雇佣军中，埃及本地人占多数。军人的报酬形式也相应地做了调整。以前，对于招募来的服兵役的士兵，是由政府发给薪酬的，退役以后划拨一份土地给他们，使他们生活上有保障。改为雇佣兵制度后，可能是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货币，就改以土地代替货币作为酬劳。①

这种给士兵付酬的方式，起初还是临时性的，后来变成了常态。② 不仅如此，这块土地作为薪酬分配给士兵后，就成为士兵们世代相承的家庭拥有的土地了。③ 相应地，现在的埃及军人也就转变为真正的屯垦兵。④ 这对于埃及本地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埃及本地人绝大多数住在乡下，他们虽有地种，但却不是名副其实的小土地所有者，而是王室农民，即依附于王室土地之上的佃户，土地属于国王，他们只是劳作者，他们要向国王缴纳租税，还要服劳役。而且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受到很大限制，不能随意离开村庄，离开土地。现在，士兵改以分配土地作为薪酬，埃及本地人，尤其是生活在乡下的穷人，可以拥有自己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90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的土地养家了，他们当兵的积极性大增。[①] 可是这样一来，埃及的劳动力供给又紧张起来，因为愿意当雇工的埃及本地人逐渐减少了。[②]

（三）风俗习惯的变化

还应当指出，在托勒密王朝后期，在风俗习惯上也出现了埃及本土化的趋势。托勒密王朝兴盛时，希腊人保持希腊本土社会的风俗习惯、礼仪和生活方式。他们瞧不起埃及本地人的风俗习惯，不愿意同埃及本地人往来。然而，一方面，由于埃及境内埃及本地人毕竟占多数，希腊人占少数，希腊人同埃及本地人的交往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埃及本地人的风俗习惯多多少少影响希腊人，而希腊人的风俗习惯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埃及本地人。另一方面，除了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数量可能多于当地的埃及人而外，在其他城市中，希腊人总是生活在占多数的埃及人中间，他们找妻子不容易，因为希腊人男多于女。尤其是希腊士兵，他们在这些地方是找不到希腊女子为妻的，他们所娶的几乎都是埃及的女子。[③] 这样，生下的第一代孩子还能说希腊语，还有机会接受希腊式的儿童教育，除此以外，他们在家里已不感到自己是特权阶级一员了。[④] 再往后，孩子们的性格受到埃及母亲的影响肯定大于受到父亲的影响。[⑤] 这种影响不可忽视，它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92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 7 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 年，第 149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加速了社会习俗的埃及本土化。

由于希腊男子同埃及女子通婚的日益增多，社会对女婴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希腊家庭一直不重视女婴，抛弃女婴的现象相当普通。[①] 而埃及本地人家庭的情况却不一样，据当时的记载，埃及家庭弃女婴的现象并不多见，只要是家中生下来的孩子，全都尽可能抚养成人，所以埃及人中的男女性别比例要比希腊人好得多。[②] 希腊人和埃及人通婚后，希腊人家庭弃女婴的现象减少了，因埃及母亲根据埃及人的习俗，无论男婴女婴都不能舍弃。

另一个风俗习惯的变化是：按照埃及人古老的习俗，同胞兄弟姐妹是可以结为夫妻的。韦伯在所著《世界经济通史》中做过分析："族内婚或兄弟姐妹结婚，是一种贵族制度，目的在于保持皇室血统的纯洁性。"[③]埃及法老时代，国王就有兄妹或姐弟通婚的。而在希腊人看来，这违背了家庭伦理，所以兄妹婚在"希腊世界并不熟悉"[④]。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埃及人的这一习俗很早就影响了王族。例如，托勒密二世即位后，就娶了他的姐姐，立她为王后，她死后还被托勒密二世尊奉为神。又如，托勒密八世先娶其妹为妻，立为王后(前妻)，后又娶侄女为妻，也立为王后(后妻)。[⑤] 再如，

---

① 参看 D. 汤普逊："早期托勒密埃及的家庭"，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151—152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52—153 页。

③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 32 页。

④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36 页。

⑤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41 页。

到了托勒密王朝晚期，托勒密十一世临终时，考虑到王朝崩溃在即，便立下遗嘱要儿子托勒密十二世和女儿克娄巴特拉二人结婚，兄妹共同主政。[1]

其实，在东方国家，也不是都有兄妹通婚的习俗的。据希罗多德在所著《历史》中记载，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期间，波斯王族本来没有国王娶自己姐妹为妻的风俗，但自从波斯王室成员冈比西斯把自己的妹妹带到埃及之后，就同她结为夫妻了。[2] 这也许是受了埃及人旧习俗的影响。

兄弟姐妹结婚也许是埃及人风俗习惯影响希腊人的一个特例，而且主要见于王室。埃及人在婚姻方面的风俗习惯对希腊人影响较大的，则是一夫多妻制。在古典希腊的城邦，正常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3] 而在古代东方，一夫多妻现象是常见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在王室或在民间，一个希腊男子可以不止结婚一次，一夫两妻或一夫三妻并非罕见。[4] 这些婚姻都是合法的。显然这不是希腊人的风俗习惯，而可能受到当地习俗的影响。也许这种做法自亚历山大东征后就开始了，例如亚历山大本人在东征期间就娶了不止一个波斯女子为妻，他还主持过马其顿—希腊军人同波斯女子的集体婚礼，这可称为开风气之先吧。[5] 反正一夫多妻现象在原来的希腊本土是不常有的。托勒

---

① 参看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138 页。

② 参看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07 页。

③ 参看波梅罗依："家庭的价值：对过去的利用"，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13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密王室很早就开始一夫多妻制，托勒密一世就是如此。托勒密八世也如此。[①]

再从托勒密国王的加冕仪式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托勒密王朝的本土化趋势。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加冕仪式仍是希腊式的。而从公元前2世纪以后，则几乎完全依照埃及人的传统礼节和形式进行。这似乎是给埃及本地人一种印象，现在的国王已经不是希腊人的国王，而是埃及本地人的国王了。

以上所有这些托勒密王朝加速埃及本土化的措施，如果从弥合希腊人同埃及本地人之间的隔阂，促进希腊人同埃及本地人的融合的目标来看，收效不大，埃及本地人并未因此而同希腊人和解，埃及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也并未因此减弱。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这些加速埃及本土化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效果呢？应该说，这些措施日久天长，却造成了两个出乎托勒密王朝国王们意料之外的结果：

一个结果是，埃及本地人比过去团结了，他们的凝聚力比过去增强了。埃及本土化的措施似乎在这方面起了唤醒埃及本地人的国民意识的作用。[②] 这使当时密切关注托勒密王朝动态以便征服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的罗马人感到震惊，因为罗马人发

---

① 参看波梅罗依："家庭的价值：对过去的利用"，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②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77—78页。

现埃及人中间已经存在一种强有力的国民反抗罗马人侵的情绪。[①] 埃及人认为，埃及这块土地，不再是希腊人的土地，而是埃及人的家乡，所以他们愿意保卫托勒密王朝同罗马人抗争，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托勒密王朝同建立时不一样，那时它是希腊人的王朝，如今已经是埃及人的王朝了。[②] 换言之，那种把托勒密王朝当作是希腊人的王朝，从而想把罗马人看成是解救者的情绪，已经减弱，至少已经不是埃及本地人的主流思想。

另一个结果是，随着托勒密王朝加速埃及本土化政策的推进，希腊人的自尊心也在逐渐销蚀。希腊城邦时代早已过去，亚历山大时代早已不再存在，托勒密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这些都成为托勒密王朝晚期希腊人记忆中的东西。在罗马人日益逼近，托勒密王朝不得不向罗马屈辱性地示好，以求苟延下去的日子里，希腊人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生活和工作在埃及的希腊人还能像托勒密王朝建立之初那样目空一切，恣意享乐奢侈吗？随着托勒密王朝盛世的消失，“文学衰落了，创造性的艺术死亡了；公元前 3 世纪之后的亚历山大里亚对这两方面未曾再有任何贡献。埃及人失去了对希腊人的敬意；奇怪的是希腊人也失去了自尊心”[③]。

在埃及这样的环境中，也许希腊人在这里生活得太久了，从他们跟随亚历山大来到这里，已将近三百年，不少希腊人的后

---

①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 年，第 77—78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78 页。

③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39 页。

代，后代的后代，连希腊本土是什么样子，早已没有印象，甚至也没有人再提起三百年前的往事。“他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语言，讲着一种希腊语与埃及语混杂的俗话。”①希腊人至此还有什么优越感可言，自尊心可言？

## 六、托勒密王朝的终结

在罗马军队于公元前189年的马格尼西亚战役中重创塞琉古王朝的军队，迫使塞琉古王朝放弃小亚细亚之后，罗马对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威胁日益严重。照理说，塞琉古和托勒密这两个希腊化的王国应当尽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罗马人的南进。但它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争夺西亚部分地区的统治权，继续激战不已。这两个王朝始终把削弱对方、扩大地盘作为自己的目标。它们把大量财力、军力用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等到各自的财力、军力消耗得差不多了，罗马人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一一消灭。关于塞琉古王朝的衰亡，本书上一章已予说明。这里谈一谈托勒密王朝是如何被灭掉的。

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公元前175—前163年）和托勒密国王托勒密六世（公元前181—前145年）争夺西亚的战争（即新的叙利亚战争）只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场战争可能是托勒密六世发动的。他企图乘塞琉古王朝被罗马击败之机，夺回托勒密王朝丧失的西亚某些地区，并向塞琉古王朝索取原来属于托勒密王朝、后来被塞琉古王朝夺走的另一些土地。塞

---

①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39页。

琉古王朝集中兵力，击败了托勒密军队，进入埃及境内，包围了托勒密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六世在出逃时被俘。[①] 亚历山大里亚的军民另立托勒密六世之弟为新国王，即托勒密七世，[②]但在有的史书中把亚历山大里亚平民拥立的新国王称为托勒密八世。[③] 安条克四世不同新国王托勒密七世谈判，而同被俘的托勒密六世缔结和约，并把他送往孟菲斯城。这是公元前 169 年或 168 年之事。[④] 稍后，塞琉古王朝只留下一部分军队驻扎在埃及境内，大队人马撤回叙利亚。这样，埃及境内就形成两个国王（托勒密六世及其弟托勒密七世）、两个首都（孟菲斯和亚历山大里亚）和两个朝廷并立的局面，它们彼此攻打，相互削弱，商路受阻，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埃及的财物则被塞琉古王朝劫掠一空。[⑤]

托勒密两个国王终于明白了塞琉古王朝旨在控制埃及、削弱埃及的隐恶用心，他们和解了，决定仍由托勒密六世任国王。公元前 168 年，安条克四世的军队再度围攻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无奈，只得向罗马求助。这时，罗马已在希腊本土击败了安提柯王朝的军队，便干预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战事，派

---

①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3—54 页。

②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50 页。

③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第 92 页。

④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3—54 页。

⑤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50、455 页。

出使臣逼迫安条克四世撤出埃及，并把所占领的塞浦路斯岛交出来。[1] 迫于罗马的压力，安条克只好照办，从此，埃及不得不依靠罗马的保护，才能生存下去。

但托勒密王室内部的斗争并未止息。塞琉古王朝在罗马压力下撤兵后，托勒密王室内乱又起。不久，托勒密六世之弟托勒密七世在一些贵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赶走了其兄长托勒密六世，重新登上王位。托勒密六世又向罗马求援。罗马考虑到托勒密六世及其弟托勒密七世各有军队和官员支持，不如由两个国王分治：托勒密六世管辖埃及本土和塞浦路斯岛，托勒密七世管辖昔兰尼。[2] 在罗马调停之下，托勒密王室内部冲突暂告一段落。

不久，托勒密六世去世，王室内斗又开始了，托勒密六世，在位时间自公元前 181—前 145 年。公元前 145 年托勒密六世去世之时，罗马已经控制了希腊全境，并已彻底毁灭了科林斯，向一切不服从罗马人的希腊境内境外的希腊人发出警告：这就是反抗罗马统治的下场。托勒密王朝时刻面临罗马人的侵袭。然而，正是在这危急时刻，托勒密王室又乱了。军民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托勒密七世担任新的国王，另一派反对托勒密七世继位，支持托勒密六世的遗孀（其实她在这时已经嫁给了新国王托勒密七世）。托勒密七世得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许多希腊人的支持，继位后称托勒密八世。[3] 托勒密六世的遗孀则得到大多数埃及

---

①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51 页。

② 参看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第 92—93 页。

③ 参看本书，第 963 页。可见有的史书上称之为托勒密八世是有道理的，托勒密七世和托勒密八世是同一个人。

本地人的支持，尤其是埃及祭司们的支持。两派混战不已，托勒密王室成员不少人被杀害。所以这场内战，既有宫廷斗争性质，又有以希腊人为主的一方同以埃及本地人为主的一方的斗争的性质。[①] 战争至公元前 127 年才告结束，结果是支持托勒密六世遗孀的一派失利，她被迫逃往叙利亚。又隔了 3 年，双方和解，达成共同统治的协议。但这场内战进一步削弱了托勒密王朝的力量。[②]

托勒密王朝的宫廷斗争仍在继续。王室成员继续在斗争中被杀害。公元前 118 年，托勒密八世颁布诏令，大赦在这之前参与宫廷斗争的所有人，不再追究其责任，以便安定人心，但为时已晚，托勒密王朝的元气已经丧尽。[③] 两年后，即公元前 116 年，托勒密八世去世，托勒密十世继位。王室内部再度内讧并日趋激烈。公元前 107 年，在反对托勒密十世的暴动四起的形势下，托勒密十世被废，他的弟弟托勒密十一世即位。托勒密十世被迫流亡国外，但得到塞浦路斯居民的支持。登上王位的托勒密十一世实际上没有权力，大权由其母后把持。直到公元前 101 年，其母后去世了，托勒密十一世才独立执政，据说母后是被其儿子谋杀的，但也只是一种传闻而已。托勒密十一世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107—前 89 年，实际执政是公元前 101—前 89 年。托勒密十一世是被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赶走的，死于逃亡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73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455 页。

途中。[1] 其兄托勒密十世复位。他两度任国王，第一次是公元前116—前107年，第二次是公元前88—前80年。[2] 托勒密十世于公元前80年去世，据说是在埃及人暴动中被杀害的。

在托勒密十一世在位期间，发生了昔兰尼归属罗马的事件。前面已经提到，在托勒密六世和托勒密七世弟兄二人分治埃及期间，托勒密七世分治的地区就在昔兰尼。托勒密六世去世后，托勒密七世继位，称托勒密八世。昔兰尼仍由托勒密王室成员治理。昔兰尼的托勒密王室成员同罗马的关系一直较好，正是因为昔兰尼之所以能分治，全靠罗马帮助的结果。[3] 到了公元前96年，分治昔兰尼的最后一个国王就把这块土地赠给罗马，也就是归属罗马共和国了。关于这一过程，本书第十二章已有说明。[4]

托勒密十世被杀害后，继任国王的是托勒密十二世。"这时候，托勒密王国已经四分五裂，以至于罗马元老院在公元前65年讨论了消灭这个独立国家，把它归并于罗马的问题。"[5]结果，托勒密国王拿出巨款贿赂，才得到罗马元老院的承认。[6]

公元前48年，当恺撒率领罗马军队进驻亚历山大里亚时，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873页。

② 参看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第400、402页。

③ 参看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4—135页。

④ 参看本书，第835—836页。

⑤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年，第455页。

⑥ 参看同上。

托勒密王朝最后的命运已经注定，并且再也无法挽回了。

埃及军队不满意恺撒率军进驻亚历山大里亚，直接干预托勒密王朝内政，更不满意恺撒把克娄巴特拉作为情人，便发动兵变，企图把罗马军队连同他们的统帅一起赶走。在战斗中，“有一次埃及军队把他（指恺撒）和部下赶到海里”①。这时，“托勒密十二世以为判军已获胜，于是他就离开皇宫，加入叛军的行为，从此也就生死不明”②。但恺撒仍坚守不退，并向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求援，等援军来到，恺撒把埃及叛军击溃。“在这危机中，克娄巴特拉一直站在恺撒一边，于是恺撒便把政权交给她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以示报答；从此克娄巴特拉就成为埃及的女王了。”③

恺撒把克娄巴特拉扶上王位，接着又平定了庞培支持者支持的外地叛乱。公元前 47 年，恺撒带着情妇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以及他们生下的男婴回到了罗马城，得到罗马元老院授予的终身执政一职。谣言随之遍传于罗马。其中一种谣言说，恺撒想当皇帝了，想立克娄巴特拉为皇后，还想把他们生下的男孩作为罗马皇位的继承人。另一种谣言说，恺撒已把东方当作自己的家乡，准备迁都于东方，等等。于是有些人准备杀死恺撒，说这是为罗马除害。公元前 44 年，恺撒在罗马城内遇刺身亡。

恺撒去世，安东尼接掌大权。而恺撒原来心目中的接班人是养子屋大维。罗马元老院担心安东尼的权力过大，便用屋大

---

①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140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维来牵制安东尼。屋大维的军队与安东尼的军队开战后,安东尼败走。屋大维让元老院提名他为执政官,元老院只得同意。屋大维立即取消了元老院宣布过的对参与杀害恺撒人的大赦,并把他们一一处死。至此,屋大维认为摆脱元老院的时机已到,便同安东尼和解,再联合当时另一位支持安东尼的将领雷必达,结成又一个"三头政治同盟",常称"后三头同盟"。

安东尼率军驻防于希腊,他被认为有亲希腊的倾向,常常去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时克娄巴特拉依然是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她又成为安东尼的情妇。克娄巴特拉认为安东尼会对她百依百顺,这样,托勒密王朝就有可能继续存在。果然,安东尼为了取得克娄巴特拉的欢心,把罗马已占领的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叙利亚中部一些地方赠给了克娄巴特拉。这一下引起罗马人的愤怒,认为这些都是罗马军队刚征服的土地,安东尼怎能擅自赠送给埃及女王呢?

但屋大维同安东尼之间的关系此时还不会恶化,更不可能就此破裂,因为屋大维还需要得到安东尼的支持,以巩固自己在罗马的地位。等到屋大维在安东尼舰队支持下彻底击败了庞培儿子的残余部队,元老院提名屋大维为终身保民官之后,便考虑对付安东尼了。这是公元前 36 年的事情。

安东尼这时仍在东方,一心想扩大地盘。就在公元前 36 年这一年,他率大军 10 万人进攻帕提亚王国,兵力损失一半,知难而退,但总算在回师途中,把亚美尼亚并入了罗马。他回到亚历山大里亚,大肆庆祝自己的胜利,并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即屋大维的妹妹,把她送回罗马城。公元前 32 年,安东尼同克娄巴特拉结婚。据说,安东尼曾立下遗嘱:死后传位于他和克娄巴特拉所生的孩子。

屋大维认为消灭安东尼和结束托勒密王朝的时候来到了，于公元前32年向克娄巴特拉宣战。屋大维"向克娄巴特拉宣战（不向安东尼宣战），声称这是为争取意大利独立的神圣战争"①。屋大维的兵力同安东尼—埃及联军的兵力大致相当，双方在亚得里亚海对峙了约一年之久。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希腊阿克兴岬焚毁了安东尼的大多数船舰，安东尼战败，逃到亚历山大里亚。屋大维乘胜攻占了安东尼在希腊本土的基地，肃清了支持安东尼的势力。公元前30年，安东尼在埃及向屋大维求和，被屋大维拒绝，安东尼自尽。屋大维军队占领了埃及，埃及军队投降。克娄巴特拉作为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国王，被软禁于王宫内。当她获悉屋大维要把她押解到罗马城时，自杀了。托勒密王朝亡。拜占庭编年史家把公元前30年定为罗马人从希腊人手中接管埃及的年份。②

就在屋大维向安东尼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一年，即公元前33年，位于北非最西端的毛里塔尼亚已完全由罗马控制。当地土著领袖波库斯把这一片地广人稀的领土馈赠给罗马元老院。③ 屋大维占领埃及后，不打算管理毛里塔尼亚，就把它给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所生的女儿塞兰妮和她的丈夫朱巴来治理。但他们一直治理不善，这里依然是无秩序的疆土。④ 后来，

---

①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② 参看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4页。

③ 参看威廉姆斯：《罗马的来临：公元1—5世纪罗马帝国边疆史》，康斯达伯尔出版公司，伦敦，1996年，第125页。

④ 参看同上。

他们的儿子托勒密继位，继续管辖毛里塔尼亚。公元 37 年，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即位，邀请托勒密去罗马，托勒密在罗马被谋杀，毛里塔尼亚重新并入罗马帝国。[①] 这时距托勒密王朝灭亡已经 67 年。

## 七、对托勒密王朝总的评价

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所建立的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中，托勒密王朝是最后一个被罗马人灭掉的希腊化王朝，也是最具有特色的希腊化王朝。

托勒密王朝的特色至少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希腊化的角度来看，托勒密王朝是希腊文化、希腊式城市建设和希腊本土以外保存希腊风俗、习惯、传统最好的王朝。在埃及境内，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而完全融合了，都以希腊人自称并被别人视为希腊移民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风格和希腊色彩，都超过了雅典，从而被当时的西方世界认定是希腊文化中心。希腊语在托勒密王朝城市中的通用程度或被非希腊人（包括埃及本地人、犹太人和外国人）的接受程度都超过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西亚城市和两河流域城市。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是希腊化的标志之一，它不仅远远超过了希腊本土各城邦曾经有过的图书馆，而且它还是国家图书馆，是研究中心，靠财政经费维持和发展。塞琉古王朝境内，除了帕加马图书馆可以同亚历山大里亚相提并论而外，希腊

---

① 参看威廉姆斯：《罗马的来临：公元 1—5 世纪罗马帝国边疆史》，康斯达伯尔出版公司，伦敦，1996 年，第 125 页。

化世界再没有可以一提的图书馆了。何况，帕加马图书馆在规模上仍逊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而且帕加马王国很早就脱离塞琉古王朝而独立了。

托勒密王朝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希腊移植过来的，至少是沿袭亚历山大帝国的。从这些体制的存在和延续，同样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是一个比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更接近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的王朝。

第二，从东方化的角度来看，正如前面已经谈过的，三个希腊化王朝中，安提柯王朝的东方化程度最低，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东方化程度都是很高的，但托勒密王朝的东方化具有特点，即在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埃及境内，神权王权的合一最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埃及早在波斯帝国征服埃及以前很久就是一个神权王权合一的国家，国王就是宗教领袖，是神的代表、神的化身、神的传人；另一方面，当亚历山大东征进入埃及境内时，就接受了埃及人的神权王权合一的传统，自称是神的儿子，是代表神的意志把埃及人从波斯帝国的压迫下解救出来的。托勒密王朝建立后，把这种神权王权合一的体制保持下来了。相形之下，在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看不到这种情况，即使在塞琉古王朝统治地区，由于那里民族成分多，各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每一个民族又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所以不像托勒密王朝那样，除了希腊人就只有埃及本地人（其他民族人数少，可以不计），这样，神权王权的合一就比较容易实现，也比较容易产生效果。

托勒密王朝的东方化还反映于国王专制、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体制的建立。就这一点而言，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是

一样的。但由于塞琉古王朝的疆土最初要比托勒密王朝大得多,民族成分也比托勒密王朝复杂,所以塞琉古王朝尽管力图做到中央集权和大权归于国王,但在塞琉古王朝的边远地区却往往力不从心,一些地区的地方割据势力不断壮大,国王对它们无可奈何。起初,国王还能维持名义上使它们服从中央,到后来它们干脆不再听从中央的命令而自主为王了,以至于塞琉古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直到最终只保留了叙利亚和一部分两河流域的土地。托勒密王朝则不然,在它兴盛阶段,埃及全境都由国王控制,大权独揽于国王;即使到了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后,地方分离主义抬头了,不像过去那样顺从国王了,但还没有一个地区敢于脱离中央而宣布独立。中央集权体制在这些地方只是削弱了,而不是消失了。这也是托勒密王朝的特点之一。

第三,从埃及本土化的角度来看,应当说,这也是托勒密王朝的特点之一。在安提柯王朝,是不存在所谓本土化问题的,这是因为,安提柯王朝由两个板块构成,一是马其顿王国的基地马其顿,二是被马其顿王国统治的希腊本土各个城邦。马其顿在希腊各城邦看来,原是蛮族或半蛮族之邦,是未开化或半开化之乡,但经过这么多年,马其顿早已希腊化了,所以不存在所谓本土化问题。至于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希腊本土,它们本来就是希腊文化的发源地,也没有本土化问题。至于塞琉古王朝,幅员广阔,过去属于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在被亚历山大征服后,就一转而成为塞琉古王朝的疆土。所谓本土化,对塞琉古王朝而言,是很难说清楚的。本土化,是指波斯化?还是指巴比伦化?还是泛指西亚化?很难做出回答,因为塞琉古王朝统治的地区,曾由不同的民族统治过,它们都曾在这里建立过国家,也都给这

里留下一定的影响。塞琉古王朝很难走本土化的道路,包括波斯化和巴比伦化。如果说塞琉古王朝要走西亚化的道路,那么这也接近于一句空话,因为什么叫作西亚化,谁也说不清楚。塞琉古王朝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要奉行的只是希腊化的王朝,而不是波斯化、巴比伦化或西亚化的国家。

托勒密王朝与此不同。在它统治的埃及境内,除了希腊人和少数既非希腊人又非埃及人(如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而外,大多数都是埃及本地人。这些埃及本地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法律和文化传统,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伦理观念,他们相信自己的祭司,尊奉自己的宗教信仰,崇拜自己的神祇,守护自己的神庙。城市中的埃及人,为了工作和生活,会说希腊语,但广大乡村,尤其是南部广大地区的埃及人却一直抵制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怀念波斯帝国征服埃及前的法老时代。这就是埃及的特色。埃及本地人的人数众多,而且他们往往凝聚在埃及祭司的周围,听从祭司所传达的神谕。这样,托勒密王朝从建立之时起,就不信任埃及本地人,例如,军队不招收埃及兵,地方政府的职务只能由希腊人任正职,埃及人任副手。

但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战争频繁,使托勒密王朝越来越感到兵源不足,从托勒密王朝中期起,军队开始招收埃及兵。为了安抚埃及本地人,地方政府开始任用埃及本地人任正职,埃及祭司的地位和薪酬都提高了。这还不够,连托勒密国王的加冕也采纳了埃及人的仪式。关于托勒密王国加速埃及本地化的这些措施,前面都已指出。可以了解到,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本土化是塞琉古王朝所不曾见到的,或至少没有类似措施。

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勒密王朝是希腊化三个王朝中相

对而言最为封闭的一个王朝,也是神秘性最多、神秘色彩最浓厚的一个王朝。这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法老时代的埃及本来就不被外人所了解,它被当时的人看成是一块不被外人所知的土地、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土地。外人对所到过的地方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但也限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南岸一带,很少外来的人到过尼罗河上游,到过南部地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托勒密王朝,都是这样。二是,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尽管鼓励希腊人前来经商、担任公职和移民垦殖,即也仅限于在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和少数城市中,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垦殖区。托勒密王朝实际上同外界的联系并不多。它和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希腊本土各城邦,隔着地中海,除了商人来往和学者交流以外,来的旅客不多,而且主要逗留于沿海城市,几乎没有专程到内陆地区和南部的。关于埃及南部的风土人情,外界无从得知。因此对托勒密王朝及其管辖地区的神秘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都是宫廷斗争不断的王朝,特别是进入公元前 2 世纪以后,宫廷斗争在两个王朝都愈演愈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的有关章节已有阐释。这里只需补充一点,即宫廷斗争的激化更增加了外界对这两个王朝的神秘感。比如说,在埃及古代国王家族就存在兄弟姐妹通婚的习俗,托勒密王朝的国王采纳了从埃及古代流传下来的这一习俗,而塞琉古王朝似乎没有这种不合伦理的做法,于是在讨论托勒密王朝的宫廷斗争时,往往就多了一份神秘感,使后人对王室的内讧多了一些猜测。

第五,同安提柯王朝与塞琉古王朝的灭亡不一样,托勒密王

朝的灭亡似乎更有戏剧性。也就是说，安提柯王朝是在同罗马军队几次激烈战争中失利而最终被罗马灭掉的。塞琉古王朝也同罗马军队发生过激烈战争，除马格西尼亚战役中塞琉古军队受到重创后一蹶不振而外，罗马军队步步进逼，最终把塞琉古王朝逼到叙利亚一小块地区，一举消灭了它。然而托勒密王朝的灭亡过程并非如此。

自从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击败迦太基之后，罗马军队就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希腊境内、马其顿境内和小亚细亚，同安提柯王朝交战，同塞琉古王朝交战，节节胜利。但罗马军队从未同托勒密王朝的军队在埃及以外的地区交战过。相反地，当罗马军队已控制了希腊本土、爱琴海上一些岛屿和小亚细亚时，托勒密王朝却同塞琉古王朝为了争夺西亚某些地区打得不可开交。塞琉古王朝的军队胜了，他们不仅夺走了西亚一些地区，还长驱直入埃及境内，包围了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在危急之时向罗马求援，罗马介入这场战争，逼迫塞琉古国王撤军。从此托勒密王朝便成为罗马的盟友。后来，在托勒密王室内讧，出现了两个国王、两个朝廷时，又是罗马出面调停，形成两个国王分治的局面。再往后，恺撒率军队进驻亚历山大里亚，安东尼率军队进入亚历山大里亚都没有同托勒密王朝的军队发生过战争。托勒密王朝依然存在，女王克娄巴特拉照样是埃及的国王，朝廷同过去一样运转。恺撒被刺身亡，不是埃及人行刺的。安东尼自尽，也不是埃及人逼迫的。刺杀恺撒的是罗马持不同政见的政客。逼迫安东尼自尽的，是率领罗马重兵的统帅屋大维。直到屋大维率军登陆埃及后，埃及军队才同罗马军队发生战斗，但很快就被屋大维击败而投降了。从这

个意义上说，托勒密王朝的灭亡大体上是平静的。难怪有的史学著作中用罗马人从托勒密王朝手中“接管”了埃及这样的说法。[①] 也正因为如此，埃及的经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亚历山大里亚被罗马人控制后繁荣如故，埃及境内广大地区的生活一切如常。

此外，还需要提一下，如何评价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克娄巴特拉女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她之所以同恺撒相好，恺撒被刺身亡后又同安东尼相好，更多地是逼于当时托勒密王朝已岌岌可危的形势。她一心想保存托勒密王朝，保存托勒密王室。然而，罗马国内的形势变化是她所始料不及的。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自杀了。托勒密王朝也就结束了。

最后，对于托勒密王朝的社会性质需要做一概述。前面已经提到，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这三个希腊化王朝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托勒密王朝与另外两个希腊化王朝相比，神权和王权的结合更为突出。但这并不否定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社会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封建社会。那种把使用了奴隶劳动作为托勒密社会是奴隶制社会依据的说法，同样是没有说服力的。

## 八、罗马占领后希腊人在埃及的处境

托勒密王朝自进入晚期以后，政府腐败无能，官员贪污成风，可以说，公元前 2 世纪末和公元前 1 世纪内，埃及并不是被国王和他的某些正直的、有良心的大臣们所统治，而是被一帮自

---

① 参看本书，第 969 页。

私的、贪婪的和目无法纪的官员所统治，后者形成了王国内一个新的富裕和有影响的贵族阶级。① 这帮人的劣迹数不胜数。在他们之下，还有一大批地方官、警官、财务部门代理人（税务官员、包税人等），这些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他们把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既欺骗政府，又欺骗王室的佃户；他们强制居民为自己服劳役，并无偿地征用居民的船只和驮畜；他们无偿地或低价迫使工人为自己干活；他们在收租或催讨欠债时，违法没收他人的住宅、牲畜、工具等；他们还随意逮捕和关押居民，目的在于讨债或泄私愤。② 换言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名声糟透了，国王也奈何不了他们，因为这不仅是某些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所致。③

此外，还应当加上社会治安状况很坏。埃及本地人的暴动时有发生，暴动失败后，有些人不回家乡，而是沦为土匪，流窜抢劫；即使是暴动失败被俘的人，在赦免之后或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仍然不愿回家，而是宁肯当土匪、盗贼。④

以上这些就是托勒密王朝晚期实际情况的写照。所以不少埃及境内的希腊人和一部分埃及人认为，罗马人即将统治埃及了，这可能会带来一场大变革，这场大变革对埃及社会是祸还是福，现在还难以预料。反正大变革已是躲避不了的。

由于克娄巴特拉女王并未下令组织大规模的抵抗，所以罗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896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893—894 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 895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892 页。

马征服埃及时埃及所受到的破坏要比罗马人在马其顿、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造成的破坏要轻。[①] 托勒密王朝灭亡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罗马实现了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奥古斯都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奥古斯都登基后，决心裁军，因为罗马内战已经结束，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都已相继灭亡，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军队了。原来，单单是获胜者奥古斯都一方就有 60 个军团的兵力，奥古斯都决定保留 28 个军团，其余的都被遣散并且定居于移民地区。[②] 奥古斯都建立了西方世界最早的专业常备军，包括 15 万名军团士兵，另有数目相近的辅助部队。[③] 奥古斯都之所以大量裁军，既为了节省开支，实际上还反映了他对军队的不信任，避免他们被野心家所利用。[④]

奥古斯都对埃及的管辖是特殊的。他熟悉埃及的历史，了解埃及社会的现状，所以对于如何治理埃及，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奥古斯都并不致力于把埃及来一个全面彻底的改组；他主要目的在于恢复这块土地的缴纳租赋的能力，如我们所知，这正是他这位罗马国家统治者的主要收入来源。"[⑤]奥古斯都知道托勒密王宫中积存了许多金银财宝，他和他手下的官兵都为此惊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912 页。

② 参看威廉姆斯：《罗马的来临：公元 1—5 世纪罗马帝国边疆史》，康斯达伯尔出版公司，伦敦，1996 年，第 3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⑤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409 页。

讶不已。但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国王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而不用，还拼命增加税赋，榨干人民，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奥古斯都决心从整顿埃及着手，使埃及成为自己的财源。

以前罗马所征服的地区，一般辟为行省。例如，在征服迦太基之后建立了行省，在征服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后建立了行省，在征服塞琉古王朝之后也建立了行省。但罗马征服埃及后，并没有把埃及变为行省，而是把它作为奥古斯都的私人领地，由奥古斯都亲自管理。"奥古斯都曾禁止任何（罗马）元老或高级骑士进入埃及，除非是得到了他的许可。"①他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的治理方式，等于"封锁了埃及"，主要目的是防止任何人企图通过控制埃及"以及海上和陆上的枢纽地点而陷意大利于饥饿之地"②。奥古斯都去世之后，历代罗马皇帝都这样做。因此，"埃及的行政管理一直保存了家族经济的特色，而这个国家被罗马人基本上作为一个巨大的皇帝的领地来看待"③。这是从托勒密王朝到罗马帝国埃及经济的特征，甚至早在法老统治时期就已经如此。④

在奥古斯都统治下，埃及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即三角洲、特拜德、赫普塔诺米亚。三个行政区的长官都由罗马皇帝派出。行政区以下分为若干个专区，交给地方行政官员治理。亚历山大里亚不包括在三个行政区之内，这个城市直属奥古斯都。

---

①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8页。

② 同上。

③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3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332—333页。

前面提到，奥古斯都征服埃及后就大批裁军。所保留的大约15万名专业常备军分驻各地。罗马帝国的版图如此广阔，北方、东方、西方的边境都有劲敌，如北方和西方要防备蛮族(包括日耳曼人等)的侵扰、袭击，东方要防备帕提亚王国的进攻，所以驻防于埃及的罗马军队不多。要防卫埃及和管理好埃及，罗马人不能没有希腊人的帮助。希腊人既善于经商，又了解埃及的情况，他们也愿意为新的统治者罗马人效劳，所以罗马占领以后希腊人的处境实际上比他们原来担心的最坏遭遇要好得多。从担任地方官员的方面来看，埃及境内三大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由罗马皇帝派自己的亲信出任，他们都是罗马人。行政区以下的各级地方官员，通常由行政长官任用当地的希腊人出任。

托勒密王朝原来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都维持不变，只是过去归属于托勒密国王的大片王室土地变为归罗马皇帝所有了。希腊人经营工商业的，拥有私人农场的，从事自由职业的，也一律照旧。奥古斯都认识到，罗马占领后埃及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如何恢复经济、发展经济。只有经济恢复和发展了，埃及社会才能稳定。

希腊人终于稳定下来了，他们很快就转入发展经济的轨道。这与奥古斯都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是奥古斯都的政策使希腊人安下心来，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

相形之下，埃及本地人的处境却大大不如在埃及生活和工作的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可能是若干代以前迁来埃及的希腊移民的后代。他们只是听到祖辈谈到过希腊本土的往事，但谁也没有回到希腊本土老家去看看，他们也不认识同乡、同城邦的人。现在，希腊本土的经济还不如埃及，文化也比不上埃及，原

籍已和他们无关。所以他们身在埃及，就一心一意关注埃及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埃及本地人则不同，埃及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家乡还有亲戚，有邻居，有熟人。后者的生活状况，同他们有关。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埃及的经济下一步将如何发展，而是罗马人到来以后他们的处境会不会有所改善。埃及本地人看到，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农民是王室土地的佃户，而现在，埃及农民却变成了罗马皇帝私人领地上的佃户，农民依附于所耕种土地之上而不得自由离去的规定未变，应当缴纳的租税数额未变，服劳役的天数也未变，他们失望了。在他们看来，埃及农民的地位在罗马人来到前与来到后只有细微的变化，埃及农村中原有的土地制被罗马人继承下来了。[①] 埃及本地人有什么为罗马的统治而高兴的呢？

再以海上贸易来说，希腊人的感受和埃及本地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希腊商人参与埃及的对外贸易较多，但过去是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西亚地区的贸易在埃及对外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现在地中海西部海域的海上商路畅通了，整个海域的海盗被罗马人肃清了，埃及同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西部的贸易变得更加重要。[②] 尽管埃及不可能独享地中海贸易的利益，因为它现在必须同叙利亚、腓尼基、帕加马、小亚细亚其他一些城市生产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307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918页。

的同类产品展开竞争，大家共享市场扩大带来的好处，[①]但同托勒密王朝晚期相比，在埃及的希腊商人感到生意比过去好做了。这是整个地中海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总的说来，这是罗马人给在埃及的希腊人带来的新机遇。[②] 商路不断开辟，市场不断扩大，这是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希腊商人始料未及的。除了地中海市场以外，一条新商路是埃及和印度之间的商路。过去，两地之间难以直接通航，必须绕道波斯湾，大约自公元48年以后，由于发现了印度洋上的季节风，于是就开辟了埃及和波斯之间的定期航线。[③] 另一条新商路就是南方商路。过去，商路只到赛伊尼(今埃及阿斯旺附近)。罗马占领埃及后，商路不断向南延伸，深入非洲中部，尽管那里的非洲土著“所进行的是纯粹物物交换的贸易”[④]，但南方市场毕竟打开了。

然而埃及农民又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好处是微乎其微的。罗马把埃及当成粮仓，粮食要源源不断地供应意大利半岛。粮食是谁生产的，主要是埃及的农民。但正如前面所说，罗马人来到埃及之后，种地的埃及农民依旧是佃户，他们照常纳租缴税和服劳役。为了增加粮食出口，对农民的催缴租税、催缴粮食的官方行为丝毫没有放松，农民又有什么理由为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兴旺而高兴呢？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918—919页。

② 参看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年，第83页。

③ 参看J. W.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5页。

④ 同上书，第25—26页。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在托勒密王朝中期以后，国王曾经推行过加速埃及本土化的措施。当时，希腊人同埃及本地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而埃及本地人在埃及居民中占大多数，希腊人看到托勒密国王有倾向埃及本地人的意图，他们为了自保，也有埃及本土化的打算。这就是当时希腊人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想法。然而，自从罗马占领埃及后，希腊人看到自己的处境还不错，于是他们便中止了埃及本土化的做法，与此相反，埃及境内的希腊人却又开始了罗马化的过程。

对埃及境内的希腊人来说，罗马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的起步。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最初，仍有不少希腊人处于观望状态，他们在等待罗马政策的明朗化。当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发现，在罗马占领后的埃及，只要不反对罗马，罗马就会给他们发财致富的机会、施展才能的机会、替罗马政府效力的机会。既然托勒密王朝已经灭亡，大势已无可挽回，但只要希腊人还能信奉自己的宗教，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活下去，并且是比以前更安全地活下去；埃及境内的希腊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们同罗马人打交道，就必须学习罗马的法律，必须懂得拉丁语，也必须了解罗马人的风俗习惯。这就是他们的罗马化。这样，在罗马占领下的埃及，希腊人的中产阶级保留下来了。埃及本地人的中产阶级也仿照希腊人的做法，不反对罗马，听从罗马政府的命令，经商，开作坊，为地方当局服务，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他们也渐渐罗马化了。有趣的是，埃及境内以希腊人为主、包括埃及本地人在内的中产阶级，在罗马占领后的埃及保留下来了：他们不是罗马建立的，也不是罗马设计出来让他们在罗马政府机构中发挥作

用的。他们是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的遗产。①

在埃及境内的希腊人逐渐罗马化的同时,来到埃及的罗马人也不知不觉地希腊化了。他们住在希腊式的城市中,尤其是住在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大城市中,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在雅典生活,但雅典哪会有这样宽畅的街道?雅典哪会有这样舒适的豪宅?罗马人生活在希腊化的环境中,吸收了希腊文化,懂得了希腊城市自治制度的意义和作用,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特征。来过埃及而后来又回到罗马城的罗马人,会炫耀自己是从亚历山大里亚回来的,自认为见过大世面,还认为自己比到过希腊本土的罗马人更有希腊文化修养。

还有一批退伍的罗马军团老兵。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有大片尚未开发的土地,罗马就把这些退伍老兵安置在这些尚未开发的土地上,给他们每人一份土地,让他们成为小型家庭农场的主人。这一安置方案有三个好处:一是让退伍老兵生活安定,在新土地安家落户,生活状况也会不断改善;二是多生产粮食,供应意大利半岛的需要;三是这批退伍军人是罗马帝国的后备军事力量,对维持地方治安有利,一旦发生战争,还可以为保卫罗马帝国边疆做出贡献。由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广人稀,罗马退伍军人同希腊人原先在这里经营的私人农场不争地,不争水源,而粮食市场又大,所以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久而久之,他们也就同附近的希腊人熟悉了,有交往了。要知道,这里只有共赢共富,没有争地争水的纠纷,所以一直相安无事。而在罗马人同希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306页。

腊人交往的过程中，罗马退伍军人的家庭和后代也受到希腊文化、希腊生活方式、希腊风俗习惯的影响。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希腊人的罗马化和罗马人的希腊化，表面上看这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互不干扰，实际上这却酝酿着一次文化大融合。关于文化大融合，本书第十四章将有较多的论述。

那么，罗马统治之下，埃及下层社会的成员的处境又如何呢？应当说，其中大多数人的处境仍同托勒密王朝时期一样，在乡村中的依旧被束缚在土地上，缴税纳租，服劳役，不能离村外出。罗马人来到后，也同当初希腊人来时一样，既要利用埃及人作为基本劳动力，又要防备他们，怕他们起来反抗。但由于罗马人占领埃及后，对埃及本地人采取“一切同过去一样”的政策，却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依旧，对于埃及人的神庙不加骚扰，对于埃及人所使用的自己的文字，不加干涉。[①] 埃及本地人安下心来，社会秩序就逐渐恢复正常，加上埃及经济状况比罗马人占领前不断好转，所以总的说来，在罗马帝国前期，埃及农民没有发生大的社会骚乱。至于罗马化过程，则同埃及下层社会成员无关，尤其与住在内陆地区乡村的广大埃及农民无关。他们过去不学希腊语，现在既不学希腊语，又不学拉丁语。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神庙和祭司，有自己的一套传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一切都同过去一样，谁都无法使他们改变。

---

① 参看 J. W.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 24 页。

这告诉我们，凡是已有本民族的悠久传统文化的东方土地上，要使这种历史文化遗产退出社会生活领域，总是异常困难。埃及就是如此。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三百年，罗马帝国统治埃及（包括东罗马帝国统治埃及）长达六百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埃及本地人仍保留自己的文化，他们既没有被希腊化，又没有被罗马化，至少希腊化和罗马化对埃及上层中层社会的影响仅限于城市，广大农村未受影响。

# 第十四章　从希腊化文化到拜占庭文化

## 第一节　希腊化世界和希腊化时期

### 一、关于希腊化世界的进一步阐释

在本书第十章“马其顿帝国的急剧扩张和迅速崩溃”的最后一部分，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那里，已经使用了“希腊化世界”这个名词，可以把作者的基本观点重复一下：

“亚历山大的去世，使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使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怎样理解‘一个时代的结束’？所结束的是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的时代。……怎样理解‘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开始的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希腊化世界和希腊化文化的时代。”①

在这里，首先对希腊化世界这个名词作些说明。

希腊化世界一词是指接受希腊文化，采纳希腊式政治体制，

---

① 参看本书，第 654—655 页。

并且由希腊人治理的区域。[1]

亚历山大东征后所开辟的辽阔土地，无疑是希腊化世界。亚历山大去世后这块辽阔土地分裂、分治而形成的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领土，也被统称为希腊化世界。这一称谓是符合上述条件的：第一，这三个王朝都是马其顿—希腊人建立的和治理的，因为马其顿人已经希腊化了，到后来，他们都被称为希腊人而不再细分谁来自希腊本土，谁来自马其顿；第二，这三个王朝的领土全都采纳希腊文化，传承希腊的宗教信仰，使用希腊语言和文字，通行希腊的风俗习惯；第三，虽然这三个王朝采用的是国王独揽大权、中央集权和王室家族世袭的体制，但这也可以看成是马其顿王国体制的延续，或亚历山大体制的延续，但希腊的城市自治体制也被采纳，在这三个王朝的领土上，都存在原有的或新建的希腊式城市。

吴于廑在所著《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中指出："'希腊化'这个名词是有问题的。"[2]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希腊化"这个名词"只标示影响这个时期的希腊因素，抹煞了埃及、西亚因素[3]"。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帝国囊括了马其顿、色雷斯、希腊全境、黑海沿岸、小亚细亚、西亚、北非的埃及以及地中海东部的岛屿。而"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属土，不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基本上承袭波斯和埃及的传统；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都不过是希腊外族王朝统治下的非希腊国家，绝非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序言，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5 页。

②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 年，第 78 页。

③ 同上书，第 78—79 页。

'希腊化'一词所可概括"①。应当承认，吴于廑的上述观点是有见地的。② 但考虑到"希腊化"一词多年来已被各国学术界所采用，所以本书依然沿用这一名词，只是在书内一再强调，绝不可忽略东方文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希腊化过程中所包含的东方因素。

希腊化世界的领土最初是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土地。接着，随着三个王朝控制地盘的变化而变化。最明显的是塞琉古王朝疆土的缩小。塞琉古王朝最盛时，疆土东到印度河流域，东北到里海、咸海周边地区。后来，塞琉古王朝的领土分崩离析，印度河流域和中亚细亚都失去了，再往后，小亚细亚、黑海沿岸、伊朗高原，甚至连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土地也丢失了。整个希腊化世界的面积也就缩小了很多。

希腊化世界不仅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以接受希腊文化与否为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概念，即这一地区是否受希腊人的国家所管辖。例如，巴勒斯坦境内住了许多犹太人，他们信仰犹太教，有自己的法律和惯例，使用自己的希伯来语言文字，但这一地区长时期或者归属于塞琉古王朝，或者归属于托勒密王朝，所以一直在希腊化世界之内。到了公元前 142 年，犹太领袖西门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哈斯蒙尼王朝，控制了巴勒斯坦，从这时起，巴勒斯坦就不属于希腊化世界了。

又如，位于中亚细亚咸海南岸的巴克特利亚，原先隶属于波

---

①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 年，第 79 页。

②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序言："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24 页。

斯帝国。公元前 329 年，亚历山大率军队由伊朗高原东进，越过兴都库什山，占领了巴克特利亚。这样，巴克特利亚就归属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塞琉古王朝继承了亚历山大在西亚和中亚的领土，巴克特利亚成了塞琉古王朝的一个行省。过了若干年，巴克特利亚乘塞琉古王朝西部有战争的机会，总督狄奥多特（希腊人）于公元前 250 年左右据地称王，但名义上仍附属于塞琉古王朝。公元前 230 年左右，狄奥多特二世继位后，就宣布独立。尽管巴克特利亚国王是希腊人，在政治体制上却更接近波斯帝国体制，而且人口以当地人为主，所以独立后的巴克特利亚就不再被列入希腊化世界之中。

陈恒在所著《希腊化研究》一书中指出，传统的希腊史研究以雅典为中心的论点是不足取的，把马其顿征服希腊本土各城邦说成是希腊文化衰落的观点，同样没有依据。① 实际上，马其顿对希腊本土的控制并不表明希腊文化一蹶不振了，而是意味着，希腊文化"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而在空间上大大拓宽了，其结果造成了分享希腊文明的社会集团大大扩展了"②。也就是说，希腊文化中心转移了，它转移到希腊本土以外。"如果说希腊文明衰落了，那也只是它在希腊世界中失去了文化上的领导地位。"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化时代不是希腊文明的终结，而是新的高峰"④。

---

① 参看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3—4 页。

## 二、关于希腊化时期的进一步阐释

希腊化时期是另一个概念。它是指希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范围传播和扩散其影响的时期。简单地说，希腊化世界是一个空间概念，希腊化时期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希腊化世界陆续被罗马征服之后，希腊化的三个王朝先后消失了，但在以往希腊化世界存在的希腊文化的影响却依旧长时期存在，它并不以罗马占领了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西亚、埃及而一并消失。同样的道理，希腊化时期随着托勒密王朝的灭亡(公元前 30 年)而结束之后，希腊文化的影响也长时期存在于这一大片土地上，它也并不以罗马的占领而退出历史舞台。希腊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并不局限于希腊化时期，也不局限于希腊化世界。

应当注意到希腊人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希腊人并不是全都固定在一个移居地。他们中有不少人总是不停地流动，把希腊文化带到他们足迹所到之处，因此有必要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考察希腊文化的影响范围。[①] 比如说，希腊商人在传播希腊文化，推广希腊生活方式和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方面，始终十分活跃。他们是职业的旅行者，人数又多，总是来往于各地，从事交易活动，他们也就成为希腊文化的传播者。[②]

又如，有一些希腊学者、政客和演说家，他们来往各地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从事政治活动。各个不同的城市，不分大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112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1113 页。

小，都经常有这样一些希腊人，四处奔走，发表演讲，或同希腊化各王国的国王、政界要人讨论重要的或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或者参加这些国王所组织的庆典，或者作为调停人和仲裁人而活动。①

再如，在职业的旅行者之中，除了商人、学者、政客和演说家而外，还有许多专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如医生、艺术家、作家等人。他们很少把自己看成是只限于在某一个地方活动的人，他们经常四处流动，而且他们并不单纯从物质方面考虑，有些人还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能够成为积极的和有用的人，准备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工作。②

总之，希腊人的流动性对于老希腊（希腊本土）和新希腊（希腊化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交流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是希腊化过程中的一个有利因素。③ 这种作用并不因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相继灭亡而消失。由于有了希腊人的流动，所以在罗马人占领西亚、北非后，希腊化的过程并未就此结束。尽管希腊化世界从政治上说不存在了，希腊化时期从政治方面来看也已终结了，但希腊化过程并未到此画上句号。希腊文化的影响依旧存在，而且还从这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接受了某种文化，那么要使这种文化的影响逐渐减退，就要依靠另一种文化的力量。假定另一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113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

种文化的力量强于该地区人民所接受的原有的文化，那就会出现文化的替代，尽管这种替代过程是缓慢的、长期的、渐进的。假定另一种文化的力量与原来的文化的力量相差不大，或各有所长，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形成两种文化并存和平行发展的现象，甚至会相互吸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至少原有的文化不会很快地退出历史舞台。假定另一种文化的力量不如原来的文化的力量，那么另一种文化至多只是对原来的文化造成干扰，但既不会形成平行发展的格局，更不会取代原有的文化。

那么，希腊化时期或希腊化世界的文化倾向究竟是什么？可以概括地说，这种文化倾向就是竭力想把希腊文化传播到这一世界，即所谓"新希腊"。对于希腊化的三个王朝来说，在把希腊文化提升为主流文化这一点而言，文化倾向大致上是一样的，它们全都自命为希腊文化中心或基地。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希腊化王朝都试图统一希腊化世界，成为"新希腊"的霸主。"这种统一，尽管由于政局的变动而动摇过和陷入过困境，但作为希腊化生活的有利因素却从未停止发挥作用。"①实际上，自从亚历山大去世后，直到罗马灭掉托勒密王朝之时为止，希腊化世界从未统一过。统一只是愿望，是设想，希腊化世界统一的理念只不过作为一种遗产转交给罗马人了。② 从此，地中海世界的两大部分，即东部的希腊化世界和西部的罗马世界，在罗马人手中才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了。

罗马人完成了地中海东部与地中海西部的统一。"与政治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301页。

② 参看同上。

统一一起，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彼此渗透也就加快了。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化世界的‘罗马化’是轻微的，而稳步扩张的拉丁世界的‘希腊化’却明显得多。”①这就是历史的实际过程。其结果，“西方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同东方的有了惊人的相似之处”②。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希腊化世界、希腊化时期、希腊化过程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希腊化世界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因亚历山大征服了广大领土而形成，因亚历山大去世后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先后建立而确定下来，因托勒密王朝的灭亡而结束。

希腊化时期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始于亚历山大对广大领土的控制和管辖，终于托勒密王朝的消失。

而希腊化过程却不以希腊化世界和希腊化时期的结束而停止。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继续存在，罗马占领希腊化世界后这一过程一直在悄悄地进行，以至于到了后来，罗马世界的希腊化要比希腊化世界的罗马化更为突出，更为显著。③

---

①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301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本书，第1061—1063页。

# 第二节　希腊文化的变迁

## 一、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命运

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最后阶段，据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当时希腊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学说之一。然而，随着亚历山大的去世和马其顿帝国的分裂、分治，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希腊本土和希腊本土以外地区的影响却日益下降。

要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的核心是有关混合体制的设想。他希望，一方面，公民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私有土地，而只有公民才有服兵役的权利和投票权，另一方面，应由国家来管理公共财产、工业、婚姻、家庭、教育、道德、文化等等。他还认为，公民在职业上应当有所规定：公民不得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农田耕作，因为这些职业被认为是卑贱的，并且从事这些职业会有损于美德。亚里士多德还建议公民应到公共食堂中去用膳。

看来，亚里士多德是想把希腊城邦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雅典模式和斯巴达模式糅合起来，既要遵奉希腊社会中民主和宪制的传统，又要吸纳斯巴达模式中强调公民纪律和公民平等重要性的做法，同时还要采取雅典模式中尊重公民私有财产的原则。尽管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混合体制作为未来城邦的改革方向，并且一度受到雅典人的重视，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晚期，无论在雅典还是在希腊其他城邦，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影响越来越

小了。等到亚历山大去世后，马其顿帝国很快就分裂了，亚里士多德简直成了雅典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

雅典人不欢迎亚里士多德是有理由的。一方面，雅典社会中反马其顿的倾向一直很明显，他们推崇的是雅典的民主和宪制，而马其顿代表的是专制和集权，而亚里士多德则被看成是亲马其顿的，是不爱希腊的。亚历山大在位时，人们不敢公开指责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接着分裂了，人们的顾忌不复存在，所以亚里士多德遭雅典人唾弃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在斯巴达已经一蹶不振而雅典难以再度复兴的形势下，在安提柯王朝牢牢控制希腊全境的环境中，亚里士多德学说既没有吸引人之处，又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已沦为一种纯粹的空谈。人们讥笑他，嘲弄他，甚至还控告他，说他的作品中有不信神的言词，说这是违背希腊人的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万般无奈，只好离开雅典，回到他母亲的老家，不久去世，享年 63 岁。

亚里士多德在精神痛苦中死去，意味着崇信希腊城邦理念的时代的结束。再也没有人相信希腊城邦理念了。历史不可能倒退。希腊化王朝中还保留的希腊城市自治制度，已失去了希腊城邦制度的精髓，仅仅具有一种希腊式城市的形式而已。而马其顿的专制和集权体制却在各希腊化王国中继续发挥其作用。

## 二、平民极端派过激行动的哲学基础

在希腊城邦内部贵族派和平民派的斗争中，平民中逐渐出现了极端派。产生平民极端派的背景是希腊城邦内部贫富差距

扩大，以及穷人就业机会有限。[①] 穷人如何谋生？乡村中土地已经私有，穷人不可能再有一块份地供养家糊口。手工业普遍采取家庭作坊形式，可以吸纳的雇工很少。[②] 加之，奴隶仍被使用，被释奴隶为数不少，商人和家庭作坊主如果需要劳动力的话，他们宁肯使用奴隶或雇用被释奴隶，而不愿意雇用人身自由的穷人。[③] 这样，平民极端派作为一部分穷人的代言人，便以仇视社会、仇视现存秩序、仇视富人的面目出现。他们不仅主张取消债务和重新分配土地，还主张没收富人财产，用来接济穷人或充实国库。有的地方甚至采取杀害富人或没收富人财产后再把他们驱逐出境或杀害的措施。

安提柯王朝统治希腊本土期间，平民极端派的过激行动比过去多得多，规模也比过去大。而且在某些城市，平民极端派的过激行动还同奴隶暴动结合在一起。平民极端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往往释放本城的奴隶，奴隶骚乱时也有平民极端派煽动下的穷人一起参加。这些情况都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公元前3世纪末年斯巴达人纳比斯领导的有平民极端派参加的起义，起义者一度夺取了政权，宣布所有的人为自由民，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债务。起义扩大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地方，最后遭到安提柯王朝支持下的阿卡亚同盟的镇压。[④]

---

①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年，第55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55—56页。

④ 参看本书，第693—694页。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全境和马其顿被罗马所占领。以科林斯为首的一些希腊城市中的平民极端派以反对罗马统治为口号，夺取了城市政权，采取了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以及释放奴隶等措施，结果遭到罗马的残酷杀戮，并采取了焚毁科林斯、把科林斯妇女和儿童全部变卖为奴的报复措施。①

这些都是社会矛盾加剧的结果："财产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较富裕家庭手中，而穷人失去了改善自己命运的一切希望，完全依赖于他们的雇主的恩惠。"②穷人被逼得无路可走了，终于采取了极端的做法。而科林斯的暴动又在罗马占领之后，所以平民极端派把仇恨转到了罗马统治者头上，这就酿成科林斯悲剧的发生。

在安提柯王朝统治下，希腊本土的富人是保守者，他们担心平民极端派会得势，于是从维护既得利益的立场出发，他们是亲马其顿派。罗马灭掉安提柯王朝而成为希腊本土的主人后，大多数城市中的富人转身变成了亲罗马派。这样就必然导致希腊本土的平民极端派把反对罗马的斗争同反对本地富人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在罗马的干预下，希腊本土的富人们总算摆脱了"社会革命的幽灵"，并且因罗马人对无产者实施的严厉惩罚而受到鼓励，于是他们更不准备同无产者妥协了。这些亲罗马的希腊本土富人们似乎感到自己已经是局势的主人，于是就按此

---

① 参看本书，第737—738页。

②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755页。

行动。①

平民极端派的过激行动在希腊本土终于在罗马的镇压下暂时消沉了，但平民极端派的思想远没有消失。很难说平民极端派的思想究竟受到哪一个学派的影响。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在古典希腊城邦就存在过，压迫加深了，社会裂痕扩大了，平民极端派懂得了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他们不一定需要某些哲学家的教导，他们自发地就会展开反对富人的斗争。但这并不等于说思想家们的开导不起作用。

一种说法是：芝诺和他的信徒伊安布鲁斯的思想对平民极端派的影响不可忽视。芝诺大约在公元前 300 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共和国》，描述了理想社会的情况，说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压迫，人人过着幸福生活。他的信徒伊安布鲁斯于公元前 250 年描述了印度洋上有个岛国，堪称人间乐土，大家一起工作，平分产品，轮流管理岛上公共事务，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不能认为这种思想不曾对当时的希腊平民发生一定的影响。

比思想家的说教更有影响的，可能是公元前 3 世纪内希腊人宗教观念的变化。要知道，自从城邦制度建立以来，希腊人的宗教观念可以概括如下，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信奉的都是多神教，即万物皆有神灵，人和神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感应，神并非高高在上。人为什么要祭拜神灵？既是为了同神有一种交流的机会，使人可以得到神的理解和帮助，也是为了今生今世都能与神处在交流、沟通的境地。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755—756 页。

自从亚历山大东征和建立庞大帝国之后，大批希腊商人、希腊移民进入西亚、北非，东方文化对希腊本土居民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包括了东方人的宗教观念对希腊本土居民宗教观念的影响。前面提到过的对神和人之间关系的转变就是一例。

在以前的希腊，神与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受到东方影响后，神是人的命运的主宰，国王是神的化身，神高高在上。东方的宗教也有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希腊本土的，它们成为希腊的外来宗教，并拥有一些信徒。正是在外来宗教的影响下，希腊人的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尽管变化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

比如说，希腊宗教观念和东方传来的宗教观念的最大区别是：根据希腊人原来的宗教观念，只有希腊公民家庭才有资格参加宗教活动，包括祭祀、朝圣、膜拜等，外国人没有这种资格，奴隶没有这种资格。而东方人的宗教观念是，信徒无国际和等级之分，不管什么人，自由民也好，奴隶也好，希腊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只要是信徒，大家一律平等，都可以参加宗教活动和宗教庆典。由此引申出一个道理：神高高在上，神高于人，而信徒则大家一样，是平等的，大家全都听命于神，听从神的旨意，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要有富人与穷人的差别、贵族与平民的差别呢？

"神在上，神之下人人平等"这种东方传入希腊本土的宗教观念，在希腊本土受到了底层社会群众的欢迎，它逐渐成为平民极端派成员的信仰，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动是符合宗教原则的。

尽管希腊本土的底层社会接受了来自东方的外来宗教的影响，但这种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既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也没有

成为社会的大规模行为。[①] 这种新的思想主要是影响了一部分人的行为,并且很可能在某些城市议事时被朦胧地察觉出来。[②] 比如说,这种新思想从未导致有深远影响的妇女解放,但仍可能使某些妇女在若干领域内与同一层次的男性合作共事。[③] 又如,这种新思想并未使奴隶的处境有任何根本性的、实质性的改变,一般说来,关于奴隶制的法律依然如故,未作改动,但也使得一些拥有奴隶的个人和一些城市在对待奴隶方面采取了某种新措施,[④]包括有的城市给予奴隶以法定的节假日,有的城市可能让奴隶有受教育的机会,有些私人捐赠者在一些场合组织食品分配时不对奴隶进行歧视,此外,还给奴隶以较多的经济自由,使奴隶能够积聚资金,最终能用于赎身等等。[⑤] 当然,在大多数场合,对奴隶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并非仅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其背后可能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动机,而且社会经济动机还是决定性的。[⑥]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希腊化时期,奴隶和主人之间变动着的关系中,是受到上述新思想的影响的。[⑦]

## 三、道德评价标准的改变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公元前3世纪以后,希腊本土居民的道德评价标准逐渐发生变化。在这里,需要着重谈一谈伊壁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110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1111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书,第1111—1112页。

⑦ 参看同上书,第1112页。

鸠鲁和这一学派的思想的影响。

本书第八章第三节中曾对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学说要点做过评介，[1]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学说对希腊化时期希腊居民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涉及的人们道德评价标准的改变。

公元前306年，伊壁鸠鲁在西亚讲学归来，在雅典定居。他总结了自己在西亚的所见所闻，看到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后，使希腊人接触到东方文化和东方的神秘主义，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了，因为神成了人的主宰。伊壁鸠鲁认为，这不是希腊传统。按照希腊传统，人和神应当是平等的，相互交流的。所以伊壁鸠鲁主张要摒除宗教信仰，尤其是东方宗教中的神秘主义，因为这只会使人产生恐惧感，感到人的渺小，感到人是受神支配的，受命运支配的。在伊壁鸠鲁看来，神既不能帮助人，又不能伤害人；能帮助人的主要是自己，能伤害人的仍然主要是自己。人虽然也需要依靠周围的人，但无论如何不是依靠神。

根据伊壁鸠鲁的观点，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那就不应当相信命运。不相信命运的人才是自由的，也才是快乐的。那么，什么是快乐？伊壁鸠鲁认为，快乐需要诚实、公正、自律。不诚实，不公正，不自律，就没有快乐可言。快乐是幸福的同义语。人生来追求快乐，也就是生来追求幸福。把追求快乐理解为追求享乐、放纵、无节制，是对伊壁鸠鲁学说的歪曲。

伊壁鸠鲁不仅贬低人们对神的崇敬，而且还告诫人们不要卷入政治。“谁都知道他的名言：‘要平庸地生活’。为了了解这

---

① 参看本书，第520—522页。

种思想，应当提一下当时希腊的政治生活的情况——城邦衰落，古代民主制度退化了，内战，马其顿粗暴地干涉希腊内政。”①因此，在伊壁鸠鲁看来，政治生活是不平静的，这会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苦恼；一个人只要投身于政治，就会贪图名利，失去友谊和真诚，并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恐惧，甚至会参与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这些都是违背做人原则的。“所以伊壁鸠鲁的不问政治并没有表现为对社会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根本不关心态度。”②

伊壁鸠鲁在雅典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教书 36 年，门徒众多。他生活简朴，言行一致，不介入政治纷争，待人真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反对伊壁鸠鲁学说的，曲解他的学说的，大有人在，但伊壁鸠鲁学说仍在希腊化世界广为流传。他的学说对希腊化世界的最大影响，在于促进了希腊人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

希腊人信奉宗教，为的是同神灵交流，以宽慰自己的心情，求得神的理解和帮助；在东方传入的外来宗教影响下，希腊化时期底层社会之所以接受了新的宗教观念，是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困惑，认为人与人之间在神的主宰下应当是平等的、不分等级的，从而鼓舞他们去重造人间的平等和正义。伊壁鸠鲁则不同，他要人们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认为人只有摆脱了这种束缚，才能获得幸福，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包括诚实、公正和自律，才能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这就不可避

---

①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76 页。

② 同上。

免地促进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例如对宗教活动的评价、对人际关系的评价、对生活享受的评价、对幸福含义的评价，直到对是非善恶的评价。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应当争取什么，应当摒弃什么，这是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在道德评价标准方面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古典希腊的城邦制度下，争取民主和维护宪制，历来被希腊人看成是“善”；不关心城邦的政治，不关心城邦制度的命运，历来被希腊人看成是“恶”。这一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在希腊本土已经好几百年了。到了希腊化时期，希腊人普遍陷入迷茫之中。而在伊壁鸠鲁的学说的启迪下，希腊人逐渐转变了看法：城邦制度一定是争取实现的目标吗？该怎么解释城邦制度之下希腊社会出现了那么不公正的、违背做人原则的现象？为什么持不同政见的人会被民主政府打成异端，被监禁，被流放，甚至被处死？可见，一个政府，不管是君主制的还是民主制的，只要尊重人，不迫害人，让人们幸福，那就是“好政府”。人们不要介入政治，因为政治离不开派别斗争，离不开尔虞我诈，也离不开争名夺利。对个人来说，一介入政治，幸福就无从谈起了，诚实、公正、自律，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会接受伊壁鸠鲁及其信徒们传播的学说的基本原因。

正如本书第八章第三节中已经指出的，伊壁鸠鲁学说曾一再被歪曲，有人把伊壁鸠鲁思想曲解为享乐是人的本性，个人享乐至上成了人生目标，甚至认为伊壁鸠鲁主张以个人享乐作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这些说法都是违背伊壁鸠鲁学说的原意

的。[1]

## 四、隐世思想的抬头

如上所说，伊壁鸠鲁并不主张人们避世独居，而是劝戒人们不要听从宗教的摆布，不要介入政治斗争。与此同时，在希腊化时期，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前期的隐世思想却日益抬头，也影响了不少希腊人。隐世思想的抬头同古典希腊晚期和希腊化时期早期出现的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的学说传播有较密切的关系。

关于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学说中的要点，以及这两派学派在当时希腊本土的影响，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已经论述。[2]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进入希腊化时期以后，尤其是在公元前3世纪内，它们是如何影响希腊人的，它们又是如何导致隐世思想被希腊人接受的。

犬儒学派的主要观点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嫉世，厌世，隐世。嫉世，意味着他们蔑视一切社会制度，认为现存的各种政府体制都给人间带来罪恶、苦难和相互仇视。厌世，意味着他们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因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苦难只会加重，烦恼只会越来越多。隐世，意味着他们宁肯过清贫的生活，回归自然，独立自处。

到了三个希腊化王朝建立并长期相互攻战的时期，社会的苦难比过去加深了。所以犬儒学派的追随者们比他们的创始人

---

① 参看本书，第521页。
② 参看本书，第522—527页。

走得更远。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只是否定任何形式的政府，而犬儒学派的追随者“根本否定国家”。[①] 城邦制度已经瓦解了，或者说，在希腊化世界，古典希腊城邦已经不再存在了。在这种形势下，犬儒学派的信徒们“认为城市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偏见，将对城市的爱排除于道德情感之外”[②]。这些人“甚至都不想做一个公民”[③]。

古典希腊的城邦社会中固然有种种弊端，但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建立以后，又给社会增添了一些苦难。犬儒学派的信徒遍布于这三个王朝管辖区域内。“他们对国家秩序、社会秩序的尖锐批评，对高傲的富人和昏庸的统治者的无情揭发，他们抱怨宙斯对生活福利的分配不公，宣传平民化，回到自然，以贫穷为光荣，——这一切在贫困和怀着不满的群众当中都得到热烈的响应。”[④]

希腊化时期犬儒学派信徒的行为同这一时期希腊本土某些城市的平民派极端分子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他们不相信当时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完全不是号召人们去推翻这个制度”[⑤]。而希腊本土某些城市中的平民派极端分子却是打击富人的积极行动者。后者杀害富人，没收富人财产，重新分配土地等行动，犬儒学派的信徒一般是不参与的。

---

①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72 页。参看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98 页。

② 同上书，第 372 页。参看李玄伯译本，第 298 页。

③ 同上。

④ 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 2 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0 年，第 379 页。

⑤ 同上。

从逃避现实这一点来看，斯多噶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区别不明显。或者说，两派的思想有相似之处。然而，两派在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方面仍有许多区别。斯多噶学派强调的是个人良心上的自由，个人应当自律、节制和安于清贫生活，它“并不禁止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希望他们参与国家事务，但却警告他们，其主要的工作应是个人的改善，无论面对何种政府，人的良心都应该是自由的”①。

毫无疑问，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希腊本土境内那些隐世独居的人，不一定都是犬儒学派或斯多噶学派的信徒。有些人也许从来就不知道或从未听说过有一个犬儒学派或斯多噶学派。促使他们选择隐世之路的，是对希腊本土的前景的悲观失望，以及对先有马其顿统治的压力，后有罗马人侵占的威胁的担忧。关于斯多噶学派的影响，虽然不容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多噶学派对政策的影响却是不足道的。斯多噶学派刚产生时，不曾挽救希腊城邦的衰亡的命运。在希腊化各个王朝的统治时期，也未能阻挠罗马对希腊化各个王朝的攻占。即使斯多噶学派的影响在罗马统治时期继续存在，也只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人们不能眼睛老是盯着过去，不能老是怀旧。②“正如每一个古典学者知道的，斯多噶派的循环论曾迫使罗马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企图重振往昔的道德和恢复旧时代的政策

---

①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3页。参看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

② 参看S.E.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何新译，黄巨兴校，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8页。

来解决罗马文明中比过去复杂得多的问题，而结果终归失败’。”①

隐世思想的影响不仅反映于有人离开了喧哗的城市，到山区、海岛或偏远的乡村去生活，而且也反映于他们虽然仍住在城市中，但与别人不来往，闭门独居。此外，不结婚，不生儿育女，也是隐世思想的一种反映。这是因为，要成家和抚养子女，生活费开支浩大，而且妻儿都会在不确定的生活中度日，不如不要妻子儿女，可以减少许多烦恼。

不应当忽略来自东方的外来宗教传入希腊本土后对希腊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关于神与人的主从关系、神之下人人平等而无等级之分，就是东方宗教影响希腊本土社会的表现。除此以外，东方宗教也有逃避现实、不问世事等思想，这些思想被认为适用于乱世，小则可以避祸，苟全性命，大则可以减少尘世的纷争，化解个人之间、家族之间的积怨，以求得社会的宁静。接受东方宗教观念的不限于希腊人中的底层成员，还包括希腊上层社会的一些人：他们既已失去昔日的辉煌，目前又陷入困惑不解之中，于是便接受了避世、隐世的说教。

---

① S. E. 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何新译，黄巨兴校，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8页。

# 第三节　希腊文化、东方文化和罗马文化的较量

## 一、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较量

从亚历山大东征之时起，在亚历山大征服的西亚、北非地区，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就发生碰撞，开始交融，这种交融的结果，形成了“一种融合希腊与东方文化的独特、新型的阶段性文明”①。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较量就在悄悄地进行，并经历了很长时间。

亚历山大和他的将领们虽然来自马其顿，但自从马其顿把希腊本土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后，他们都希腊化了。他们率领大军东征时，带去的是希腊文化，而他们所征服的西亚、北非地区则存在着悠久的东方文化，有些文化的历史比希腊文化还悠久。

亚历山大统治的时间不久，随后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相继建立，在它们各自的领土上，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较量一直在进行着。尽管安提柯王朝以马其顿和希腊本土为基本统治地区，但安提柯起家于小亚细亚，并且曾经统治过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北部一段时间，加之，东方文化也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了希腊本土，所以在安提柯王朝境内也出现了希腊文化

① 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西欧文明》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和东方文化的较量。

在塞琉古王朝境内，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亚述文化、赫梯文化、巴比伦文化和波斯文化。至于一度被塞琉古王朝统治过的中亚细亚、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在那里也有过希腊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碰撞，但由于塞琉古王朝很快就放弃了这些土地，或者这些地方被地方割据势力盘踞了，所以可以略去不计。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地区，东方文化主要是指古埃及文化、波斯文化。此外，还有犹太文化、腓尼基文化和努比亚文化，不过它们的影响是局部性的，只限于某一个地区，对全局的影响有限。

希腊文化不等于希腊宗教或希腊人的宗教观念。固然希腊宗教或希腊人的宗教观念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只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而已。从希腊的历史来看，早期城邦时期，希腊宗教的作用很大，但城邦制度发展起来以后，民主和宪制思想的作用越来越大，希腊宗教的作用相形之下减少了。而到了希腊城邦制度陷入危机后，希腊宗教的作用又开始增大。

那么，希腊的宗教究竟是什么？据狄金森在所著《希腊的生活观》一书的阐释："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即希腊的宗教是众神的崇拜。"[①]尽管希腊人对众神的崇拜只是起源于一些神话故事，但希腊人总是把这些神话故事看成是真的，相信这是事实。[②] 实际生活也是这样，在希腊人中，"每一个种族，总是推源到一个'英雄'，这些英雄又都是神的子女，将他们自己神性化

---

① 狄金森：《希腊的生活观》，彭基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② 参看同上。

了"[1]。这被认为是希腊宗教和东方宗教的重大区别。这是因为，在东方，只有国王才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而在希腊本土，神和人之间没有什么隔阂，部落的祖先是英雄，英雄是神的子女，于是每一个部落成员也就成为神的子女了。在东方，人们把国王奉为神，是为了便于国王的集权独裁统治。在希腊，人人都自视为英雄的子女，即神的子女，是为了把家族和民族凝聚在一起，于是希腊宗教成了希腊城邦制度的社会基础。[2]

把希腊宗教、希腊人的宗教观念包括在内的希腊文化，最基本的是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个人自由，公民平等，程序与规则至上。

个人自由：在希腊城邦制度下，个人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做出选择。从理论上说，既然希腊城邦的公民人人都是神的子女，那么为什么要个人牺牲自由去服从神的唯一儿子——国王呢？

公民平等：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服从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不得违背它；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因为这些或者是公民大会通过的，或者是祖辈流传下来的。

程序与规则至上：程序与规则一经制定就成为共同遵守的准则，程序与规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更改的。违背程序与规则而登上领导者地位，是僭主，是异类，是不齿于希腊社会的。

在希腊城邦盛期，"当时所谓西方文明，即指当时的希

---

① 狄金森：《希腊的生活观》，彭基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8页。

腊”[①]。在地中海西部，罗马还处在刚准备统一意大利半岛的阶段，而另一个强国是迦太基，但是，“在本质上，他们的精神不属于西方，而属于东方”[②]。

在希腊本土，谁是希腊文化、希腊精神的传承者？照理说应当是希腊城邦的一代又一代公民。在社会贫富分化还不明显的时候，说希腊城邦一代又一代公民是希腊文化、希腊精神的传承者，是符合实际的。而当城邦内部的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之后，很难再用“公民”这一笼统的说法来表述了。贵族寡头们，不管已当政的，还是急于想夺取政权的，难道会成为希腊文化、希腊精神的代表吗？平民极端派出现后，难道他们能代表希腊文化、希腊精神吗？都不可能。按照罗斯托夫采夫的观点，作为希腊文化、希腊精神的代表的，以及可以传承希腊文化、希腊精神的，是中产者。[③] 他写道：“雅典在公元前 4 世纪晚期是一个中产者城市。”[④]这主要是指一批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富裕农民而言。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家庭富裕，从事工商业，或拥有土地，经营农场，同时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起着积极作用的人，使希腊文化、希腊精神传承下来了。不仅雅典一个城市如此，其他希腊城市也这样。到了希腊化时期，中产者已经不是什么新的社会现象，他们已经活跃于希腊化各国，继续在希腊文化、希腊精神的传播中

---

①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3 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115 页。

④ 同上。

发挥自己的作用。①

在希腊化时期，希腊本土各城邦的中产者，由于经济停滞，工商业发展状况大不如前，所以他们纷纷把希望寄托在东方新建的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境内。当地的国王们欢迎他们前来，他们自己也愿意向新地区移民。他们中有不少人认为，在新地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发财，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他们融入了新的社会环境。赚钱归赚钱，但一旦遇到战争，他们为了保卫这一大片新开辟的希腊人的土地，会投身军队，加入战斗，也会捐躯。这是他们的理念。他们已经把新地区当作自己的家乡了，他们是为希腊人的利益而战。这样，希腊文化、希腊精神就在新地区扎根并传承下来了。

然而，希腊移民所扎根的新地区毕竟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征服的东方，东方有东方的传统文化。希腊人在西亚、北非居住下来，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碰撞便开始了。"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可能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希腊化而会实现融合。但它们在这方面是错误的。这样的融合并没有发生。"②

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为什么会有上述判断的失误？原因之一在于："希腊居民证实是不可能使东方的精神希腊化的。某种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希腊化实现了；但在精神方面，新移民们却逐渐被古代东方文明所同化：他们的普遍心理在新条件下可以被看成是具有一种新的性质，即既不是纯东方的，也不是

---

①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年，第1115页。

②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5页。

纯希腊的。”[1]这不等于两种文化，即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完全融合了。这只是它们的部分的融合。两种文化的界限和各自影响的范围依然是明显的。

这仍是两种文化的较量。而且应当注意到，在希腊人的力量还强大，希腊人仍管辖着这块土地的时候，希腊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因为他们既有政府机构，又有军队作为依靠。他们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在城市中占据优势，在经济中也占据优势。希腊文化在这种形势下是有活力的。但东方文化依旧像过去一样顽强，在广大乡村，在腹地，尤其在下层社会中，到处都是本地人。东方文化在那里根深蒂固，希腊文化既不可能同东方文化完全融合，更不可能在西亚、北非取东方文化而代之，进而成为主流文化。同样的道理，已经进入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管辖地区的希腊人，既不能被东方文化所同化，也不可能被东方文化所驱逐。

在西亚、北非地区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中，希腊人终于扎下根来了。这些城市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希腊移民，成了支撑希腊化王朝的“希腊—马其顿基础”[2]。在国王们看来，只要城市支持王朝，忠于国王，给他们的城市一些自治权又何妨？对希腊移民来说，只要国王欢迎希腊人前来，有生意可做，有公职可以担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又同希腊本土一样，即使要顺从国王旨意，

---

①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115页。

② 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第268页。

那又何妨?[①] 这就是希腊文化在新地区存在的依据。

因此,在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境内,自始至终都基本上没有改变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并存和相互较量的格局。而两种文化的部分融合,则是两者并存和较量的结果。

## 二、希腊化文化的形成

从亚历山大东征到罗马人灭掉托勒密王朝,经历了将近三百年。在这三百年内,在希腊人所在地区,在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并存、相互影响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希腊化世界特有的文化,即希腊化文化。

希腊化文化既不完全是希腊文化,又不完全是东方文化。说得确切些,希腊化文化是在希腊化世界这块土地上掺和了部分希腊文化和部分东方文化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不能把它说成是希腊文化的东方化,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东方文化的希腊化。这两种说法之所以都不正确,就在于这三百年的时间内,希腊文化处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希腊化文化就是变化中的希腊文化同东方文化在希腊化世界部分融合的产物。以宗教信仰为例,希腊化各王国尽管在宗教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仍是希腊宗教的信仰者。[②] 区别在于:对众神的

---

① 这与古典时期晚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雅典,由于民主政治已日益败坏并演变为暴政,所以进入希腊化时期以来,“批判民主政治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希腊移民很少留恋过去雅典那种民主政治,反倒更愿意接受希腊化王朝建立的社会秩序。(参看晏绍祥:“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载《世界历史》2004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② 参看戴维斯:“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相互渗透关系”,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第 6 页。

崇拜渐渐淡化了,主神的概念渐渐确立了:安提柯王朝主要崇拜的是宙斯神,塞琉古王朝主要崇拜的是阿波罗神,托勒密王朝主要崇拜的是塞拉皮斯神。①

前面已经指出,自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城邦制度陷入深度危机之后,希腊文化随着人们对城邦制度的信心的丧失而发生了变化,这时被希腊移民带到塞琉古王朝境内和托勒密王朝境内的希腊文化已经不是希腊城邦制度鼎盛时期的希腊文化了。今日的雅典已非昔日的雅典,今日的斯巴达也非昔日的斯巴达。希腊移民懂得,往年被希腊人引以自豪的民主和宪制在希腊本土已无法实行,即使在新占领的西亚、北非土地上,至多只容许实行城市自治而无法把希腊城邦制度移植过来,所以希腊人移居到西亚、北非后,很少再有人留恋曾经存在于希腊本土的城邦制度。由此可见,希腊化世界所传承下来的希腊文化,并不是以雅典盛期和斯巴达盛期为代表的希腊文化,而是希腊城邦陷入深度危机之后逐渐变化的希腊文化。比如说,希腊人一直惯于独立思考,反对盲从;而在希腊化世界,国王却要人们顺从,认为独立思考是有害于国家,也有害于独立思考者本人的。希腊移民们怎么办?绝大多数人在西亚、北非的土地上,不再按照祖辈教导的那样去独立思考,而顺从了国王的意愿。这就是希腊文化与希腊化文化的区别之一。

希腊本土有些城邦也实行国王制。斯巴达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斯巴达的国王是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力的权力并

① 参看戴维斯:"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相互渗透关系",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第6页。

非神授,而是公民大会赋予的,并且国王要受到各种制约。公民大会既可以授予国王权力,例如战争期间的军事指挥权,也可以收回这种权力。斯巴达的国王不是僭主,他们必须行为合法。东方则不是这样,靠军队拥戴就能登上王位,王位父子相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希腊化各个王国,不是希腊文化、希腊精神的体现,而是把东方文化、东方精神中的一些内容吸纳进来以后的产物。

在希腊城邦制度下,公民有义务服兵役,尽保卫国家之职。"爱国主义"在希腊—波斯战争的第一阶段最充分地表现出来。但进入希腊式城邦制度晚期,公民服兵役的现象虽然并未消失,但军队的主力已经转变为雇佣兵了,雇佣兵为金钱而作战,根本不会因"爱国主义"而战。[①] 雇佣兵中有一些人是从"蛮族"中招募来的,他们有什么"爱国主义"?[②] 在希腊化世界,情况与此相似。移居当地的希腊人虽然也有服军役以尽公民义务的想法,但军人的丰厚薪酬(包括安家的份地和退役后的屯垦土地)开始占了上风。希腊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已不如过去,但由于新地区毕竟是希腊移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他们仍有战斗精神,不过到了下一代或以后各代,这种战斗精神也就淡薄了。后来,希腊化王国的战争不再依靠希腊军人的勇气,而靠花钱收买对方的军事指挥官。每次战役之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贿赂对方,给对方的雇佣军首领更高的报酬,这是最有效的战略。[③]

---

① 参看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年初版,1976年重印,第402—403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403页。

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希腊化各个王朝,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建立之初,并一直到中期以前,依然多多少少保存了一些古典希腊的精神,即公民作为军人,要为城邦而战,为保卫自己的家园、权利、城邦主权而战。这种信念是珍贵的,也是重要的。当年希波战争期间,希腊人之所以奋不顾身地在战争中拼杀,视死如归,不正依靠这种信念、这种理想、这种精神么?这种精神在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的前期,在希腊移民身上多少还能反映出来,他们也有为整个希腊人的利益而作战的信念。甚至在罗马人击败了安提柯王朝的军队,战争中消灭了马其顿王国,占领了希腊本土的公元前1世纪中叶,小小的科林斯城居民仍然拒绝罗马人的招降而坚决抵抗,直到被罗马军队毁灭,男子全部被杀,妇女儿童全部被贩卖为奴的时候,古典希腊的精神仍在科林斯城反映出来,这就是一个例证。这岂是雇佣军所具有的信念?然而,雇佣军成为希腊化王朝军队主力的大势已定,谁也无法使历史倒转。

既然在希腊化世界,希腊人祖祖辈辈为城邦的独立和主权而作战的精神已经消失,那么,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信念,什么动力呢?是不是追随亚历山大的遗愿,把希腊化各王国统一起来的大胆设计呢?这同样是不可能的。① 时代不同了,人物不同了,谁还有能力把分治的各个希腊化国家统一起来呢?谁也实现不了这一点。于是各个希腊化王朝唯有培育本国的希腊人对本王朝的忠诚,使他们成为本王朝得以巩固统治的精神上的支

①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第268页。

撑。[1] 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尤其如此，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维持下来。

东方文化中什么是最值得希腊化王国的国王们吸纳的内容呢？那就是：国王是神的化身、神的儿子的说教。由于神权和王权是统一的，国王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便顺理成章了。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一直依靠把变化了的希腊文化同东方文化中适合自己掌握权力的内容掺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希腊化文化，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到了公元前2世纪以后，希腊化文化中的东方因素或东方成分还越来越多。在罗马人依次消灭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后，希腊化世界结束了，希腊化文化却继续存在于这三个希腊化王朝曾经统治过的土地上。

## 三、希腊化文化和罗马文化的较量

希腊化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阶段性的文化，是希腊古典文化和罗马文化的中间环节，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2]

罗马军队消灭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时期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托勒密王朝灭亡后不久，罗马转入帝国时期。这时也正是罗马文化（前期罗马文化）发展的高峰阶段。在三个希腊化王朝原来管辖的范围内，罗马文化和希腊化文化经常发生碰撞、摩擦、较量。

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它们尽管

---

①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第268页。

② 参看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西欧文明》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是不同的文化，但自古就有相通之处。罗马建国之初就从希腊人那里汲取了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体现于希腊人对自由和平等的崇尚，以及对民主和宪制的遵奉。此外，希腊和罗马早期，对王政的看法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在希腊，“王族的权力被剥夺了，但仍为人民所尊敬，他们甚至还保有王室的头衔和标识”①。罗马亦然：“人们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国王的称号并没有被看作一种耻辱，而仍然是一种尊贵的头衔。……罗马人祈祷时仍用(国王)这个词来称呼诸神。”②又如，希腊人和罗马人自古都没有废法之举：“人们的确可以立新法，但旧法仍旧保留，不过，新旧法律之间可能会有些相冲突的地方。”③在希腊，“德拉古法典并没有因梭伦所废除；”④在罗马，罗马“王法也没有为《十二铜表法》所取代。”⑤

希腊文化早于罗马文化，希腊文化传播的地区和罗马文化传播的地区相距不远，加之，希腊人很早就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移民，所以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影响要大于当初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或者说，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吸收要多于希腊人对罗马文化的吸收。朱龙华在所著《罗马文化》一书中对此有专门的分析。他写道：“整个希腊文化都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而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充分吸收，也以接受这种精神为前

---

①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07 页。参看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7 页。

② 同上书，第 207 页。参看李玄伯译本，第 147 页。

③ 同上书，第 155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提。"[1]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在追求人本主义理想方面一般要比较务实，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罗马文化的质朴务实的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它与希腊不仅有息息相通之处，而且通过对其吸收借鉴而使罗马文化日臻成熟与完善"[2]。

罗马和希腊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希腊自古就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概念。希腊本土存在着许多城邦，一个城邦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各自为政，各有各的疆土。"即使在鼎盛时期，希腊人也绝不可能去建立一个希腊帝国。他们确实不喜欢在一起工作；他们喜欢凭个人情趣自由行事。"[3]后来，在希腊本土上虽然出现了一些城邦同盟，它们被某个强大的城邦所控制，但城邦依然是城邦，城邦并未统一为一个国家。即使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希腊的城邦也没有统一过。

罗马与此不同。罗马从王政时代起就建立统一管理的体制，既便于指挥作战，抵御外敌，又便于对外扩张，因为罗马需要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劳动力。所以"在罗马人看来，群体就是力量"[4]。罗马人认识到，没有群体，他们无法生存和发展。[5]

从向希腊文化学习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即使在罗马前期，也不能认为罗马文化"完全归结为对希腊文化的模仿"[6]。罗马人确实向希腊人学了不少东西，但需要注意到，"不仅罗马

---

① 朱龙华：《罗马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 34 页。
② 同上。
③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78 页。
④ 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7 页。

共和国时期的拉丁文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视为希腊文化的延伸或扩展，而且早期罗马城邦的发展也不能视作对希腊古典城邦文化的简单模仿"[1]。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实际上是共存的、平行发展的，并且各有创造。[2]

到了罗马的版图扩大到意大利半岛南部、西西里、迦太基、高卢、西班牙和部分巴尔干半岛地区之后，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区别越来越突出。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在于公民权的授予。甚至可以说，希腊和希腊化世界的公民权概念同罗马的公民权概念是尖锐对立的。[3] 要知道，一个罗马公民不一定生来就是公民，因为罗马的公民权是可以授予外国人的，从而这些外国人就可以拥有罗马公民的权利，包括投票权。[4] 罗马有时把公民权授予某一个行省的居民，例如恺撒就这么做过。而在罗马皇帝卡腊卡拉临朝时期，罗马把公民权授给了帝国中的每一个人。[5]

然而在雅典，在亚历山大里亚，或在希腊本土和希腊化世界，却从来不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希腊化世界的每一个城市都捍卫着自己的公民权，生怕外人得到它。[6] 因此在希腊本土和希腊化世界的一个希腊城邦或希腊式城市中，民主范围是很狭窄的，它只是极少数人的民主。[7] 不仅大量住在这个城市里的

---

①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7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 年，第 56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参看同上。

⑦ 参看同上。

外国人得不到公民权，甚至连希腊化世界中居住在城市里的本地人，也不能成为希腊式城市的民主权利的分享者。[①] 这种情况其实早在雅典城邦制下就已如此。公民和非公民的差别是很大的。一个得不到雅典公民权的人，每年要缴一笔人头税，除非得到特许，否则在雅典不能置产，也不可能同一个雅典公民有合法的婚姻关系，等等。[②]

除了公民权问题而外，从总体上说，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区别还可以归纳为：

第一，尽管罗马和希腊一样，也推崇民主和宪制，但希腊人的民主和宪制思想的出发点是公民个人至上的理念，而罗马人的民主和宪制思想的出发点则是：唯有国家统一和强盛，才能实现公民的权利；唯有对外战争胜利，公民的生活才能改善。

第二，希腊和罗马都使用奴隶，并且都废除了把欠债的本国人沦为奴隶的做法。但希腊和罗马对待被释奴隶（他们都是外国人或异族人）的态度则不一样。在希腊，被释奴隶可以被认为是侨民，但侨民并不等于希腊公民。在罗马，被释奴隶则成为罗马公民，几代之后大家都忘记了他们的祖辈曾是奴隶。[③] 为什么希腊人的做法不同于罗马人？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奴隶必定是“蛮族”，只有“蛮族人”才会变成奴隶。所以奴隶的“蛮族”出身的痕迹是抹煞不掉的。[④] 那么，谁的祖先是希腊人，谁的祖先

---

① 参看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 年，第 56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163 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 164 页。

是“蛮族”呢？这主要是一种文化概念，而不一定是血统概念。这种观念在希腊人那里是根深蒂固的。①

第三，在罗马，国家利益总是被置于公民个人利益之上。例如，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公民们两次容忍了“三头政治同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于是宁肯牺牲个人权利而容任领导人独断独行。而在希腊，公民在这方面是绝对不让步的，只要违背了公民大会制定的法律、规章制度和程序，谁上台执政都是“僭主”，是异类，是受唾弃的。希腊各城邦不允许任何人“以国家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但“罗马人的第一天性是服从权威和接受纪律的约束”②。这表明：“希腊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的公民；罗马不容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他们需要逆来顺受的臣民。”③这也许是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最大区别。

自从罗马占领希腊、马其顿、小亚细亚并进而灭掉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后，罗马人成了希腊化世界的统治者。在希腊化国家原来的疆土上，罗马文化同希腊化文化之间的长期较量就一直进行着，因为这时的希腊文化，从马其顿控制希腊本土之时起，已经逐渐演变为不同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的希腊化文化了。那么，罗马文化自身是不是也在变化呢？毫无疑问，随着由罗马共和国晚期向罗马帝国的转变，罗马文化（前期罗马文化）也开始转变为罗马帝国文化（中期罗马文化），大约经过三个

---

① 参看韦尔斯：《亚历山大和希腊化世界》，哈克特出版公司，多伦多，1970 年，第 164 页。

②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79 页。

③ 同上。

世纪，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罗马帝国文化又转变为罗马—基督教文化（后期罗马文化）。说到罗马文化和希腊化文化的较量，那么也大体上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期罗马文化同希腊化文化较量的阶段，时间大致上从罗马人开始进入巴尔干半岛起，到罗马灭掉托勒密王朝，把希腊化王国的领土全部变为罗马领土为止。

第二阶段，从时间上说，大致上从托勒密王朝灭亡，到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接受基督教之时为止，这是中期罗马文化同希腊化文化较量的阶段。

第三阶段则是后期罗马文化同希腊化文化较量的阶段，从时间上说，大致上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和成为主流文化之时起，到罗马（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登位之时为止。

三个阶段一脉相承，罗马文化和希腊化文化的较量从未停止过。也就是说，从政治上说，希腊化世界在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灭亡之时已告结束，但在这一片土地上，希腊化文化却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它始终在同罗马帝国文化（中期罗马文化）、罗马—基督教文化（后期罗马文化）较量，直至公元6世纪形成拜占庭文化之时为止。拜占庭文化把希腊化文化、东方文化、罗马—基督教文化的主要内容全结合到一起了。

需要指出，奥古斯都所开创的罗马帝国对待所征服的西亚、北非地区的文化政策，应当说是比较宽容的。“当罗马作为征服者来到这个希腊化东方时，它忠实于它传统的自由放任做法；它进入了一个说希腊语的希腊式城市的土地，它满足于既保留希

腊语，又保留希腊式城市：它不要求近东的拉丁化和罗马化。”①这就大大缓和了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多年以来形成的敌对情绪，便于罗马人在希腊化世界实行统治。这样，“虽然各个希腊化王国覆灭了，而希腊的思想却不受拘束地自然发展”②。很难说，这是罗马人在希腊化东方的退让还是“退中有进”，或者说“退就是进”。

这也许是由于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战争观念存在着某种区别。正如有人曾做过如下的比喻：“罗马人好比鲨鱼，而希腊人好比海豚：二者都是贪吃的食肉动物，但一个是孤僻的和专心致志的，另一个是调皮的和爱管闲事的。”③这是就两个民族的性格来说的。在对待战争方面，“在希腊世界，战争已经成为一门手艺，从而也是一种选择：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也可以运用其他的技巧。在罗马，战争是男性自尊的场地：一个罗马人的选择，或者是交战，或者是耻辱。”④这样也就决定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雇佣兵的不同看法：“未在军中服役的希腊人可能雇一些熟练的作战工——雇佣兵——去为他们从事战斗。而罗马人不这样做。无论是在意大利战争中，还是同外国人交战时，无论是战败还是获得胜利，‘男子气概’总是使罗马军国充满生气。”⑤罗马帝国成立之后也都是这样。直到后来，罗马帝国因兵员不足，才

---

① 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第25页。

② 同上。

③ 伦东：“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社会”，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6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使用雇佣兵作战。

因此，当罗马军队灭掉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占领西亚、北非地区时，只要敌方顺从，不反抗，就采取安抚政策，鼓励被征服地区工商业开业经营，农民照常耕种，希腊人一切如前。只有像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坚持反抗罗马占领的地方，才采取严厉镇压措施。这被认为就是罗马人的一贯作风：善待归顺者，打击反抗者。希腊化文化之所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同希腊人在希腊化的土地上不反抗罗马人的行为有直接关系。

罗马帝国对所占领的希腊化世界也有一种统治方式，这反映了罗马帝国充分考虑到西亚地区的特点。“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以城市为基地的。也就是说，帝国的地方精英都生活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内。”①这是有利于罗马帝国统治的。正是在这些大城市的市区，罗马文化与希腊化文化不仅有碰撞，而且更重要的是并存和结合。这是因为，罗马帝国把地方精英（主要是希腊上中层社会人士）组织到市议会之中去了。于是，“皇帝就可以通过自己指派的总督而周旋于市议会议员之间，总督还把行省的情况反馈给皇帝和罗马元老院”②。罗马文化和希腊化文化在大城市中的并存和结合，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一大创造，“这种比较可靠的制度便于对如此广泛的区域进行统治”③。这样一来，在罗马新占领的西亚、北非的希腊化世界，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也就易于被希腊化王朝过去的希腊臣民所

---

① 萨里斯：“从君士坦丁到赫勒克留的东帝国（306—641 年）”，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2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接受,从而减少了罗马帝国统治的阻力。

尽管从公元1世纪起罗马共和国已转变为罗马帝国了,但这时的罗马帝国并不等同于公元4世纪起的罗马帝国,这时的罗马帝国也不同于东方的帝国或希腊化的王朝。在罗马,皇帝的产生要经过元老院选举这一不可漏失的程序,并且由元老院加冕予以承认。皇帝多多少少要受元老院的制约,皇帝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首席公民"或"第一公民"。加之,城市自治制度依然保存下来。这一切既被罗马公民所认可,也能被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希腊人所接受。至于原来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境内的本地农民,或者说,住在乡村中的土著居民,那么依然同过去一样生活,不接受罗马的制度和文化,也很少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①] 正如他们在希腊化王朝统治的三百年间很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一样。这种情况要到罗马—基督教文化形成和传播后才发生变化。

在过去的希腊化世界范围内,东方文化仍然是顽强的、有影响的。那么,罗马文化和希腊化文化相较量的过程中,哪一种文化更有优势?很难说。罗马文化无疑具有政治的优势,希腊化文化则具有社会的优势,因为西亚、北非的土地毕竟被希腊人统治三百年了,希腊人在西亚、北非已扎下根来,他们在这里的城市中掌握了经济的控制权。这就使希腊化文化在同罗马文化的较量中显得有一定的优势。但政治优势同社会优势相比,政治优势更重要一些,所以罗马文化的优势往往在罗马皇帝的旨意

---

① 参看奥斯顿费尔德编:《希腊的罗马人和罗马的希腊人:文化相互作用研究》,导言,阿鲁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中流露出来。

希腊人在西亚、北非地区是讲究实际的，他们不是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到了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后期，税负越来越重，希腊商人的生意不好做了，希腊人的生活大不如前了，为什么这些希腊人仍然忠于各自的希腊化王朝呢？主要是从现实利益出发，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有了希腊化王朝的国王们的庇护，他们本人和他们家族的利益可以维持下来，至少可以保存现状。[①] 到了罗马大军的日益临近，直到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相继灭亡，希腊人又转而倾向罗马，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②]

于是在希腊化世界出现了如下的现象，希腊人在罗马统治之下，他们都希望能成为罗马的公民。虽然没有一个希腊式城市正式提出要求，但希腊人作为个体，"人人都努力想得到它（公民权）"[③]。当时，希腊人为了得到罗马公民权，甚至不择手段，"一个最容易且最快获得公民权的办法是先将自己卖给某个罗马公民为奴，然后以合法手段获得解放，便能得到公民权了"[④]。好在罗马对给予希腊人公民权这一点，并不吝惜，它"很愿意授予他们公民权"[⑤]。有了罗马公民权，希腊人还有什么必要留恋希腊式城市的自治地位呢？"终有一天，（希腊式）城市仅剩下一

---

① 参看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第 269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97 页。参看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19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个空壳而无实际内容了。”①这就是在罗马文化同希腊化文化的较量中,罗马文化的政治优势的表现。

但希腊化文化的社会优势并未消失,它在这场较量中仍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希腊化世界的金融制度被罗马继承下来了;②货币制度同样如此,即罗马一直奉行自亚历山大以来通行于希腊化世界的良好的铸币制度,保持铸币有可靠的信用和十足的币值,这样才能使罗马钱币在东方市场逐渐替代希腊化各国铸币。③ 过去罗马的工商业者在西亚、北非市场上是没有地位的,他们来到罗马新征服的这块新地区之后,遵循希腊商人和希腊金融经营者的做法,逐渐壮大了自己,终于成为希腊化世界货币市场和借贷业中的支配力量了。④ 这同样是罗马政治优势帮了罗马商人的大忙。⑤ 即使罗马商人在希腊化世界的土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但罗马帝国当局离不开希腊人,尤其是离不开希腊人中的上中层社会的成员。例如,如何把这里的城市管理好?如何使它们继续繁荣?这些都关系到罗马帝国的利益。“城市是罗马帝国的基石。它们是人口、贸易、制造业、各种形式的文化的中心,以及行政管理的基本架构。”⑥那

---

①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98 页。参看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19 页。

② 参看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第 1290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

⑥ 福斯:“城市和乡村的生活”,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1 页。

么，建设和管理好城市的人才来自何处？主要来自新地区的希腊式城市。还有，要建设和管理好城市，庞大的支出从何而来？这是很花钱的，例如维修街道和市场，建立和维持各种公共设施，尤其是花钱很多的公共浴室，这些费用如何筹集？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①] 看来，这些费用都加在居住在这些城市中的希腊人身上。[②] 保留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希腊式自治城市本来是住在这些城市中的希腊人的愿望，而现在向城市建设和管理机构的捐献又成了他们的义务和烦恼。[③] 但希腊人还是忍受了，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 四、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兴起和传播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不是罗马人自己的宗教。罗马人的宗教和希腊人的宗教，都是多神教，二者之间互有沟通，罗马征服希腊化世界后，“随着两种文化的交往日深，希腊与罗马两种宗教系统渐渐揉为一体”[④]。这同基督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神教。所以无论在希腊宗教的信奉者，还是罗马宗教的信奉者看来，基督教都是一种异教，希腊宗教、罗马宗教同基督教是不能相容的。再说，无论是希腊宗教还是罗马宗教都是产于西方世界的宗教，基督教源出犹太教，它和犹太教都属于东方世界的宗教，这种对立从基督教一产生就开始了。

---

① 参看福斯：“城市和乡村的生活”，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1 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 72 页。

③ 参看同上。

④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98 页。

基督教一产生就受到多方面的迫害。犹太教容不了它，希腊宗教、罗马宗教容不了它，罗马帝国也容不了它。早期的基督教，“按罗马的标准，简直没有资格被称为宗教”[①]。这不仅由于它同罗马帝国境内原有的罗马宗教、希腊宗教不同，更由于“它不是全民性的，而表现为一种地下的、世界性的秘密组织”[②]。这种无国界的、像秘密组织一样的早期基督教，“确实也有自己的宗教仪式，但它们是在关闭了的大门背后举行的”[③]。这哪里像希腊罗马的宗教呢？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教义的活动，据说这同犬儒学派把原来的城邦转变为世界城邦的设想有传承的关系。[④] 关于这一点，虽然有人进行过研究，但不一定有充足的证据。当然，早期的基督教信徒和传教者，有些人也过着简陋清贫的生活，甚至以行乞为生。他们既可能受到在希腊化时期传播很广的犬儒学派学说的影响，也可能与犬儒学派学说无关。[⑤] 其实，犬儒学派尽管宣传隐世思想，但对宗教活动是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的，犬儒学派根本不相信所谓“神谕”，认为“所谓神谕，实际是祭司之谕”[⑥]。

基督教在越过巴勒斯坦向外传播时，已经同希伯来预言家最初的说教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希伯来预言家们对社会存在不

① 曼戈：“新宗教，旧文化”，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参看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

⑤ 参看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⑥ 同上。

公正提出自己的抗议，但他们"对带有集团义务的部族社会的记忆犹新。他们能够回忆过去，借助于这种社会的风俗与法律来攻击分成不同社会阶级的新社会的入侵势力"①。然而基督教在对外传播时，"在某种意义上，福音比预言家的著作更具有革命性。他们的基础更广泛，因为他们发出的呼吁不仅仅是为了被压迫阶级，而是为了全人类。他们的目标不是消灭个别的弊端，而是要完全变革人在社会中的行为"②。这正是早期基督教能吸引教徒的力量的源泉。

早期基督教终于秘密传播开来了。它先传播于西亚。教徒们为了传教，逐渐建立了教会。然后基督教进入希腊本土。"早期的基督教会面临两种选择：希腊的道路与罗马的道路。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差距，彼此没有契合点。"③这里所说的"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最高政治领导人，在当时，这最高政治领导人就是罗马皇帝。但早期基督教会选择的则是希腊道路，即不拜皇帝，不信任帝国，不附和官员，而崇尚自由和平等。教会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新约全书》使用了希腊文。一些小教会——当时尚未建立统一的教会——由希腊人或者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人来做主教"④。这是公元1世纪前期的事情。

公元1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意大利半岛。当时的信徒以穷人为主。无论在西亚、希腊还是意大利，刚传播时基督教的教义大体上是这样的：现实世界是罪恶的，人生下之后就不断陷入

---

① 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38—39页。
③ 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④ 同上。

罪恶之中，只有相信救世主耶稣，人才能得救。当时，基督教对信徒的教导是要他们洁身自好，向善，互助共济；不主张反抗，而以自我牺牲为荣。基督教很快就被各地的下层群众所接受。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基督教传教者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就是异教徒的干扰。异教徒对异教的信仰和对偶像的崇拜，使基督教的传播是困难的。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①] 异教徒和基督教之间的斗争，谈不上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而是文化之争，皈依新宗教——基督教——的信徒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正如异教中同样有富人和穷人一样。[②]

基督教开始传播时，由于处于地下秘密状态，所以罗马帝国实际上并未专门处理传教者。但久而久之，基督教传播的范围扩大了，罗马帝国警觉起来，便对基督教及传教者、信教者采取了镇压措施：对他们拘捕、监禁、判刑、流放、直至以酷刑处死。基督教在传教中遇到的这一困难或阻力要比受到异教徒的干扰大得多。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的主要理由是：基督教徒不拜皇帝，只拜基督，不听从官员的命令，只听从教士说教和叮嘱；不怕刑罚，只相信信教者死后能升入天堂……高压禁止不了人们信仰基督教，也阻挡不了基督教的继续传播。这种广泛传播可能同流动的手工业者四处谋生有关，“没有他们，基督教的传播是不可能的；基督教自始就是流动手艺人的宗教”[③]。

---

① 参看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年，第 27 页。
② 参看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39—40 页。
③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 118 页。

这种状况大约延续了二三百年之久。连富人也信仰基督教了，连罗马皇帝周边的大臣和宫廷侍卫中也有人信仰基督教了，甚至皇族中也出现了基督教徒。有远见的罗马皇帝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既然基督教已无法禁止，即使明令禁止传播基督教、禁止信仰基督教仍阻止不了基督教的暗中传播和地下礼拜活动，既然迫害基督教传教者和信奉者的做法反而会把受迫害者抬到圣徒的位置，使更多的人效法他们，使基督教的影响更大，不如使基督教由非法转为合法，使传教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使之接受罗马皇帝的指导，使基督教徒们由敌视罗马帝国的立场转为支持罗马帝国的立场。

罗马帝国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的变化发生于公元 4 世纪初。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先于公元 313 年颁布米兰宣言，宣告对基督教的宽容，又于公元 337 年临终前加入了基督教。从此，基督教在罗马全境成为公开的、通行的宗教，尤其在罗马帝国东部，即过去的希腊化世界土地上，成为主流文化的标志。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基督教的倾向性已经不同于早期基督教了。公元 4 世纪中期以后的基督教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早期基督教的信徒只拜基督，不拜皇帝，而从公元 4 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罗马皇帝已经皈依了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徒逐渐既拜基督，又拜皇帝。这样一来，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之间的隔阂也就逐渐化解了。在罗马皇帝们看来，全国绝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是新时期社会凝聚力增强的反映，因为罗马帝国在希腊化世界“是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出现的，但是相应于这个庞大的结构体系却没有出现任何精神上一致的民族；说明确点，罗马帝

国只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①。希腊人、波斯人、埃及人、叙利亚人都没有成为罗马人。罗马人依旧是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人。怎么把这些不同民族转化为罗马帝国的人呢？靠皇权是做不到的。现在有了基督教这个共同的信仰，就好办了：“如果说基督教的主要作用适应于有关政治激发活动的历史，那么这个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群本质。”②大家都是基督徒了，只是分散于各个不同的族群中，但都是罗马帝国的一分子，这就行了。

第二，早期基督教的传教者们一直向信徒们灌输下述思想：现实世界是罪恶的源泉，唯有笃信基督教，才能死后得救，等等。这种思想实际上告诉信徒们，现实世界的罪恶无法消除，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而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的甚至唯一合法的宗教之后，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基督教传教者们着重宣传，只要教会和全体信徒笃信基督，共同努力，现实世界是可以改变的，结果，现实世界会逐渐好起来，会给人们带来新生活，带来幸福。

第三，起初的基督教组织是地下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基督教组织的活动经费和积累下来的财产是传教者垫支的或教徒们自动捐献的，而且这些都不能被罗马帝国发现，一旦被发现或被告发，经费和财产全部被没收。然而从这时起，罗马帝国政府不仅承认基督教合法，承认基督教的教会合法，而且还给予教会一些特权和赏赐，如免纳税款，可以出租土地或经营土地，可以举

① 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② 同上。

办作坊(以接济穷人和帮助失业者的名义)等,政府有时还赏赐土地给教会,用以修建教堂。信徒多了,信徒向教会的捐献多了,教会富起来了。传教士成为一种有薪酬可得的职业,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所以他们愿意依靠政府,为政府效力。

从公元3世纪后期起,在罗马帝国尤其是在罗马帝国东部,一些异教信仰者愿意转而信仰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尽管有的地方曾采取强制手段,如拆毁异教神庙、祭坛,没收这些异教神庙的财产,或对拒不改信基督教的异教徒实行惩罚等,但在大多数地方,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不一定需要政府施用强制手段。他们或者受到亲戚朋友的影响,或者受到邻居、同乡、同事的影响,或者真的有所感悟,认为这是自己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也可能同罗马帝国东部即原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统治地区的希腊化文明背景有关:“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对相同的作者们著作的研究基础之上的。”[①]不仅如此,在原来的希腊化世界的土地上,异教徒和基督徒所使用的都是希腊语和希腊文字,也就是说,“异教徒和基督徒共享同一种文化”[②]。这使得异教徒易于看懂基督教的宣传品,听懂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教,并能同基督徒们交流,他们从异教信仰者转为基督教的信徒不是一件难事。在这块希腊化的土地上,“异教徒接受基督教,并不是被迫放弃古代的精神财富;改变宗教信仰,并不是要陷入野蛮状态”[③]。于是在罗马帝国东部,基督教被大多数希腊人接受是一个非强制的文化转型过程。

---

① 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第3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与此同时,基督教会也完成了它的转型。它放弃了历来所坚持的希腊道路,而自动选择了罗马道路。① 这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过程:"要是追随了希腊,基督教会怎能荣享罗马皇帝的册封呢?罗马人把教会引向了通往至高权力的道路,这个权力将要统治天堂、地狱和人间。"②基督教传教、布教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早期基督教会受尽压制,基督教传教者受尽迫害,传教者们也都历尽艰辛。从君士坦丁一世信奉基督教之后,假定基督教会继续坚持希腊道路,拒不接受罗马道路,历史也许就不这么写了,"历史也许不会留下这般可怕的记录:制造冤狱的宗教法庭、残害死囚的种种酷刑、殃及异教徒的虐杀"③。历史自有自己的安排,这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督教会终于自愿从希腊道路转上了罗马道路。希腊化文化在同罗马文化较量的过程中,从基督教会转型这个方面来看,最终是罗马文化占据了上风。相形之下,在异教徒转变为基督徒的方面,希腊化文化又起着积极的作用。总的说来,两种文化的较量依然是难分胜负的。也许需要几百年甚至一千多年,才能看出两种文化较量的结果。

但希腊化文化同罗马文化的较量并未到此为止,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

## 五、希腊化文化向罗马—基督教文化的靠拢

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文化变成了罗马—

① 参看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79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182 页。

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的礼仪也就随之官方化、模式化。基督教有了一套正式的礼仪，包括唱诗、读圣经、讲道和祈祷等公开仪式，还包括念信经、主祷文和圣餐礼等非公开仪式。[①] 基督教不再具有早期那种民间的、朴素的性质，而变得神秘化，而且越来越神秘化。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些东方文化的内容。

希腊化文化本来就是在希腊化世界的土地上，以变化了的希腊文化和原来就已存在于东方多年的东方文化部分融合而成的。在罗马—基督教文化形成以后，它逐渐成为罗马帝国文化的主流。希腊化文化有逐渐向罗马—基督教文化靠拢的趋势。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和渐进的过程。

在皇权和神权相结合的基础上，“基督教教民的身份与帝国臣民的身份重合为一”[②]。作为基督徒，他们“是上帝的特造子民，是天国的公民，这构成他们人格尊严的基础”[③]。于是基督徒内心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自己献身给上帝了。然而，他们作为帝国的臣民，“作为具体国家的成员，难说有什么尊严，在等级体系的网络上，人性遭受扭曲”[④]。这一切对于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意义是明显的：经过三百年的被征服，到现在，在罗马—基督教文化已经在文化中成为主流文化的时刻，希腊人不仅再也不是过去城邦社会中的希腊人了，甚至也不再是希腊化王朝时期的希腊人了。希腊人成了基督徒，成了罗马帝国皇帝的臣民。

---

① 参看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38 页。

② 从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三联书店，2003 年，第 56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他们受到双重约束：一方面，在皇帝和教会的约束下，他们受到基督教教义和教规的约束；另一方面，在皇帝和官员的约束下，他们受到帝国法律、法规、政策的约束。希腊化文化对他们还有多大的价值呢？罗马—基督教文化中，似乎已经把罗马文化和东方文化糅合到一起，希腊化文化尽管依然存在，它本身已经越来越向罗马—基督教文化靠拢。

在罗马—基督教文化上升为主流的形势下，希腊人，或希腊多神教的昔日信徒们，如今在放弃了希腊宗教信仰之后，随着而来的就是放弃了任何回归到希腊古典时期甚至希腊化时期的美梦。基督教的传播和基督教影响的扩大，"打破了异教与皇帝们想要恢复的联盟"①，而这种所谓的"联盟"曾经是不少希腊人在罗马帝国刚占领西亚、北非时的设想，不料现在演变成"基督教与皇帝的联盟"。罗马—基督教文化一旦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威力便充分发挥出来，"基督教彻底推翻了地方祭祀，它熄灭了坛火，彻底摧毁了城市的守护神，它更进一步拒绝接受从前支配社会的那些祭祀方式"②。东方诸神、希腊诸神甚至以前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祀奉的罗马诸神，统统被赶下了祭坛，因为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由体制外的宗教转变为体制内的宗教，而且是唯一合法的宗教。希腊人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其中有些人可能会说：希腊诸神被赶下了祭坛，但罗马诸神不也同样被赶下祭坛了吗？不错，事实真的如

---

①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参看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② 同上。

此。值得注意的是:罗马诸神被赶下了祭坛,但罗马皇帝已经成了基督教的最高主宰,基督教的大主教、主教都听从罗马皇帝的旨意,而希腊诸神被赶下祭坛之后,希腊人的“王权”在哪里呢?三百年前就已失去了。希腊人能没有失落感吗?

希腊人还剩下什么?只有希腊古典时期的文化结晶:哲学家的著作、戏剧家的作品、雕塑家的杰作、诗人的诗篇还留在世上,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距离希腊古典时期少说也有七八百年了。难道希腊人的后代们仅靠这些来振奋精神吗?事情可能没有这样简单。希腊化文化仍在变化:它在尽量靠拢罗马—基督教文化这一罗马帝国主流文化的同时,仍在原来希腊化世界这块土地上发挥作用,影响着罗马皇帝,影响着政府官员,影响着成千上万的希腊人的后代,也包括对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影响。从西方文化形成过程中,希腊文化和罗马—基督教文化的碰撞、较量与接近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后来的西方文化形成中的三个主要要素都已经具备,这三个主要要素就是:基督教精神、希腊思想、罗马机构(组织)。① 这三个主要要素的结合大约是在公元开始的最初几个世纪内,而且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基督教精神。②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一种新的文化——拜占庭文化,在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也就是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土地上,悄悄地形成了。不仅罗马帝国未来的皇帝和王公贵族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连基督教本身也摆脱不了这种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文化的

① 参看埃杜阿尔·勒·鲁瓦:《西方文明》序言,葛雷、齐彦芬译,载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第164页。

② 参看同上。

无形的力量。让我们接着讨论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分化：为什么会分化？分化的结果又如何？

## 第四节　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分化

### 一、罗马帝国分裂的文化背景

虽然罗马—基督教文化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文化，但它本身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既有来自罗马帝国方面的原因，又有来自基督教本身的原因。

从罗马帝国方面来说，君士坦丁一世登上皇位之前罗马帝国的政局就很不稳定。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分裂的格局加速形成。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帝国西部驻军将领君士坦修斯·契洛鲁斯的儿子，而君士坦修斯·契洛鲁斯又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接班人加莱里乌斯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加莱里乌斯对君士坦修斯·契洛鲁斯存有戒心，便以欣赏他的儿子君士坦丁的才华为借口，要君士坦修斯·契洛鲁斯把儿子君士坦丁送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实际上以君士坦丁为人质。后来，君士坦丁逃离罗马东部，奔往西欧，与其父相聚，并供职军中。君士坦修斯·契洛鲁斯在军营中去世，驻防于西欧的罗马军队立即拥戴君士坦丁（当皇帝后称君士坦丁一世）为领袖，而加莱里乌斯则指定李锡尼为西欧驻军统帅。李锡尼无法掌握西欧驻军，只好仍留在罗马东部。他为了交好于君士坦丁，同意君士坦丁的米兰宣言，宽容基督徒。

君士坦丁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他的宽容基督徒的政策也越

来越得人心。李锡尼心有不甘,便违背米兰宣言,着手迫害辖区内的基督徒,君士坦丁便以此为借口出兵攻打李锡尼。公元323年,李锡尼战败投降,第二年被处死。君士坦丁即罗马皇帝位。从这时起,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分裂格局结束,君士坦丁一世使罗马帝国东西部全部归自己控制。

然而,罗马帝国东西部统一的时间不长。君士坦丁一世生前已经预见到帝国可能因自己离开人世而再度分裂,并且有可能发生继承战争。于是,他决定采取世袭制,父子相传,以防止内乱。但君士坦丁一世究竟把皇位传给哪一个儿子呢?他难下决心。他本来想传位给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但又听说这个儿子不忠于自己,就把他杀害了,后来又发现自己是被流言所误,痛悔不已。他转而采取把疆土分治的做法,让几个子侄各治一方,免得将来火并。他第二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君士坦丁二世统治高卢、西班牙、不列颠;次子君士坦修斯统治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三子君士坦斯统治意大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巴尔干半岛和首都君士坦丁堡;希腊、马其顿、亚美尼亚则交给两个侄子统治。尽管如此,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皇位继承之战仍然爆发了。

被分封疆土的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修斯、君士坦斯弟兄三人都拥有军队,都自称皇帝,于是罗马帝国一下子就有了三个皇帝。内战打了16年,从公元337年一直打到353年。君士坦修斯统一了帝国,同他争夺皇位的兄弟和堂兄弟都死去。君士坦修斯当了6年罗马皇帝,于公元361年因病去世。其另一堂弟和妹夫朱里安继位。朱里安从小生长在小亚细亚,在东方宗教的气氛下长大。他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皇权,便寻求东方宗教

的信徒的支持,同时迫害基督徒,禁止基督徒担任官员。但他只当了两年皇帝,在征讨伊朗萨珊王朝的战争中受伤,因伤重不治而亡(公元 363 年)。他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不信基督教的皇帝。他死后,罗马军队把禁卫军将领裘维安推上皇位。裘维安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去世了。

从这以后,罗马帝国又出现了并立的两个皇帝,分别由罗马东部驻军和西部驻军推举出来。于是罗马帝国有了两个首都,两个元老院。西部驻军推举的皇帝驻在米兰,元老院设在罗马城;东部驻军推举的皇帝驻在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设在君士坦丁堡。首都所在地以元老院设置地点为准,皇帝驻所只是军事指挥部所在地。但无论是东部的元老院还是西部的元老院都是必要的形式,大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因为皇帝才是权力执掌者,军队听命于皇帝本人。

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东帝国和西帝国,尽管二者都以罗马帝国自居,东帝国和西帝国只是地域不同而被使用的名词。罗马帝国东部分离出来而自行治理时,希腊化文化和希腊政治传统,再加上基督教教会的影响,使罗马帝国东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同罗马帝国西部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① 人们以后把东帝国称作拜占庭帝国,尽管那个时候从未使用过这个名称。②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帝国和西帝国具有深刻的经济原因。西部地区战争不断,日耳曼人的入侵、骚扰,使土地荒芜,商路被

---

① 参看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 年,第 3 页。

② 参看同上。

阻，而罗马军队的供养全赖地方，西部城市工商业者不堪重负，四处逃亡，包括有一些工商业者逃到了东部。而相形之下东部地区的战事要少一些，无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比较繁荣的状态。东部的城市仍同过去一样繁华，民间也较为富庶。西部驻军都以能离开西部地区、调防于东部为幸事。而东部驻军则不愿离开东部防区，不愿被调到西部去打仗或驻防。西方驻军之所以愿意来东部驻防，因为东部富裕、社会安定，军官和士兵的待遇较好，生活条件也较好，而且战争主要在西部战场上进行，日耳曼人南下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高卢和意大利，西部的军人比东部的军人要艰苦很多。

文化背景同样是东部和西部差异的重要原因。西部使用拉丁语，是罗马文化的发源地，东部使用希腊语，是希腊古典文化和以后的希腊化文化的发源地。在君士坦丁一世转而成为基督徒并使罗马文化逐渐转型为罗马—基督教文化以后，罗马—基督教文化在东部推广得较快，西部则相形之下推广得较慢。罗马人原来信奉的罗马宗教在东部的基础不深，很快被基督教取代了，而在西部，特别是在意大利半岛上仍有较多的信徒，他们仍保留罗马诸神的祭坛和神庙，尤其是在乡村。基督教主要在西部城市中站稳了脚；在西部乡村中，信奉基督教的人数远不如东部乡村。

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的文化差异不限于此。东部地区很早就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亚历山大东征后征服了波斯帝国统治地区，在这里推行了希腊化政策，同时又吸收了不少东方文化的内容。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奉行着与亚历山大一样的措施，希腊化照常推进，但东方文化也照常存在，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希腊化文化,其中就包括了对东方文化的吸收,所以东方文化在这些地区继续发挥作用。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在公元前 2 世纪以后还实行了加速本土化的政策,使东方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也使得罗马帝国东部与西部相比,希腊化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影响,在东部要比在西部大得多。

东方文化的影响,从政治方面看,还可以举两个例子。

首先以元老院为例。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各有一个元老院。尽管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实权都掌握在驻军统帅手中,皇帝是他们推举出来的,有时驻军统帅就被推上皇位,但罗马帝国自建立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传统:皇帝必须由元老院通过任命,并由元老院加冕,皇帝也应尊重元老院的各项决定。但在西部,元老院成员都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他们有显赫的家世,在意大利各地有势力,有影响,他们历来受罗马文化的熏陶,动不动就谈罗马辉煌的过去,包括罗马的公民权利和对领导人的制衡,所以对皇帝多少有所牵制,以至于西部的皇帝宁肯带兵驻在米兰,平时不来罗马城:元老院平时见不到皇帝,皇帝也不理睬元老院。罗马帝国东部的情况不一样。东部的皇帝和元老院都在君士坦丁堡这座新建的首都。皇帝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统领一切。元老院成员中以新贵为主,有些人出身比较卑微,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他们有的是靠战功上升的,皇帝曾经是他们的统帅。他们有的是靠才干出众而被皇帝提拔上来的。有的还是皇帝的宠信,听话,赢得了皇帝的欢心。总的说来,东部元老院的成员不仅对皇帝顺从,而且还能帮皇帝的忙,使皇帝省心。于是,东方式的皇帝专制集权体制就在罗马帝国东部形成了,皇位世袭制也首先在东部确立下来。罗马帝国越来越同塞琉古王

朝、托勒密王朝一样，皇帝同希腊化王国的国王一样；既是皇帝（或国王），又是军事统帅，还是宗教领袖，皇权（王权）与神权合一，大权独揽，不受制约，所不同的只是罗马帝国多了一个元老院而已。简要地说，在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文化差距的影响下，“两大事件——基督教的胜利和帝国政治中心实际上转移到希腊化的东部——标志着拜占庭时代的开始”①。

下面再以军队为例。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起就实行公民兵役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军人授田制和军屯制。与罗马共和国基本上同一时期的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也实行军屯制度。到了罗马帝国盛期过去以后，公民兵役制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因为罗马人愿意从军的越来越少，日耳曼人参加军队的则越来越多，罗马军队，主要是罗马帝国西部的驻军，在成分上发生变化：军队走向蛮族化。蛮族化的罗马军队采取雇佣兵制度，军官招募兵士，发给军饷，武器或由雇佣兵自备，或由军队提供。招募雇佣兵的军官，不管军官是罗马人还是日耳曼人，就是雇佣兵队长或雇佣兵总领队。谁招募雇佣兵，谁就按时发军饷，雇佣兵也就跟着谁。雇佣兵领队还允许雇佣兵在打了胜仗之后抢劫财物，鼓励他们卖命地作战。虽然西部军纪松弛，军人行为恶劣，有时却建立战功。但西部军队临阵倒戈的也不少。这就是帝国西部驻军的特色。

而在罗马帝国东部，军队的情况与西部有很大差别。东部仍在执行军人授田制和军屯制，当兵的主要是罗马人和希腊人，

---

①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修订版，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27—28页。

西亚、北非地区的土著居民也有从军的。但他们都不是北方的蛮族，不是雇佣兵，他们服役是有期限的，服役期满便解甲归田，有地可耕。东部的军队受到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比西部军队大得多，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同样大得多。

## 二、基督教会分裂的文化背景

基督教被正式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在公元 392 年。当时的罗马皇帝是西奥多西一世（公元 379—395 年）。他受军队拥戴，在东部称皇帝。由于西部形势危急，他率军西征，乘机重新统治西部，但仅隔一年，他就去世了。罗马帝国又分裂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国家，并且这一次分裂是正式的分裂。西奥多西一世的儿子阿卡蒂乌斯做了东帝国的皇帝（公元 395—408 年），西奥多西一世的小儿子霍诺留成为西帝国的皇帝（公元 395—423 年）。罗马皇帝的帝徽本来是一只老鹰，从这时起，这只老鹰画上了两个头，一个代表东帝国，一个代表西帝国。

正由于基督教是在公元 392 年定为罗马帝国国教的，三年后，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帝国和西帝国了，于是就出现一个新问题：君士坦丁堡教区的主教和罗马教区的主教中，究竟哪一个代表基督教教会组织呢？这实际上涉及东部教会组织和西部教会组织的利益之争。

这时，罗马帝国境内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其中有穷人，也有富人。穷人富人都向教会捐钱，有些富人死前立下遗嘱，死后将财产捐给教会。捐献只是教会财产增加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是：其他宗教已被列为异教，异教神庙的财产（包括土地和金银财宝）被政府没收，有些被政府转划为基督教会的财

产。由于东部的异教神庙比西部的多,东部的异教神庙的财产也比西部的多,这样,东部的基督教会就更富裕了。东部的教会之所以不愿意同西部的教会多联系,多交往,除了教义解释存在着分歧而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西部教会来分享东部教会的财产。

由于基督徒越来越多,神职人员显然不足。担任神职人员现在不仅不再冒风险,而且收入颇丰,是一项美差。加之,神职人员地位高,既为政府和教会效力,又在教徒心中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人们竞相担任神职人员。任用神职人员的权力在于主教,主教权力大,地位更高,收入更丰。君士坦丁堡教区的主教自视地位仅次于罗马皇帝,理应成为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首席主教或总主教。而罗马教区的主教不甘心屈居其下,他以当初被杀害的耶稣第一门徒圣彼得的传人自居,声称其在教会组织中的地位应当高于君士坦丁堡教区的主教,更不必说高于东方其他教区的主教(如耶路撒冷教区的主教和亚历山大里亚教区的主教)了。罗马教区的主教以便于就近受西帝国的管辖为理由,拒绝自己归东帝国统治,从而东部的基督教宗教会议也无法对罗马教区发号施令了。

东部基督教组织和西部基督教组织之争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终于在公元 451 年,也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 25 年,在一次举行于小亚细亚的宗教会议上,确立了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在东部的地位。罗马教区主教提出抗议,但已无济于事。罗马教区主教依然自行其是,不受东部教会组织的制约。基督教分裂成了定局,无法再弥合。

由此可见,罗马帝国基督教的分裂,至少在开始分裂时不是

什么教义解释之争,而是利益之争。君士坦丁堡教区和罗马教区两位主教之争,主要是地位和权力之争。教义之争和教义解释的分歧是存在的,但在教会组织正式分裂之时并不占主要地位。等到教会组织正式分裂之后,教义之争和教义解释的分歧才日益突出。这是因为,东西教会双方都想向教徒证明自己才是正宗,便在教义上大做文章。教义中的不同解释,没有权威的判断,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种争论就一直没完没了,双方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以后再也合不到一起了。

罗马—基督教文化形成之后所发生的两件大事——罗马帝国的分裂和基督教会的分裂,清楚地表明罗马—基督教文化是不稳定的,并且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东部,希腊化文化和东方文化则是比较稳定的。希腊化文化向罗马—基督教文化靠拢,东方文化继续发挥自己在本土的作用,这将会促进罗马—基督教文化向拜占庭文化的演变。而在西部,不稳定的罗马—基督教文化则在同蛮族文化的碰撞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演变,最终形成独特的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关于这两种变化,本书将在以下两段分别予以说明。

## 三、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的形成

在罗马帝国西部,很多地方在公元 4—5 世纪被日耳曼人占领了,日耳曼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些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家不是城邦,因为罗马帝国西部的城市本来就不算多,它们都因商业衰落而衰落了。西部只有日耳曼诸侯的城堡,它们作为军事政治要点而存在着。公元 476 年,率军进入意大利半岛的蛮族领袖奥多亚克灭掉了西罗马帝国。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意

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在当时人看来，“这一年（476 年）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划时代的年份”①。这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表明西帝国不存在了；东帝国依然存在，罗马帝国并未消失。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西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是根据奥多亚克的命令正式向元老院声明退位的，“元老院派出一个使团赴东罗马朝廷，把帝徽送给当政皇帝芝诺陛下。他们宣称，西罗马不再需要一个自己的君主，世上唯一帝足矣”②。奥多亚克担任了执政官，以东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着意大利半岛一部分地区，“所以在法律上西罗马帝国一点也没有灭亡，只不过是东西罗马重新合并而已”③。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在罗马帝国西部，日耳曼人对这里的统治已经确立下来，他们不必要再利用西帝国的名义，也不必要树立一个以西帝国皇帝为名义的傀儡了。

然而，即使在日耳曼人的领地上，罗马—基督教文化仍然存在，并发挥影响。罗马—基督教文化中，“罗马”这个词可以省略不计了，而“基督教”这个词还保留下来，因为日耳曼人逐渐信仰了基督教，听从当地的基督教教会的说教和嘱咐。

南下进入原来西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这就是“蛮族文化”。“蛮族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南下之前的日耳曼人，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

---

①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译，赵世瑜校，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24 页。

② 同上书，第 23 页。

③ 同上书，第 24 页。

当时可能处于氏族社会阶段，部落联盟大体上是他们在南下途中为了作战的需要而建立的。他们不是普通的移民，从寒冷的北方移居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南。他们主要是入侵者，以部落联盟的组织形成，组成强大的军队，以骑兵为前导，大队步兵跟在后面，男子、妇女、老人和小孩全都跟着步兵，越过边境线，蜂拥而至，攻城略地，抢劫财物。部落联盟后来就成为一个个诸侯国家，最高首领就是国王。国王最初是被部落成员推举出来的，多数是勇敢善战的人。以后，国王之位变成了世袭的。

在日耳曼人那里，由于长时期内保持了氏族社会的传统，平等的色彩是突出的。内部，成员一律平等，靠自己的习惯和习俗处理内部纠纷，对外则团结一致，以求生存和发展。虽然日耳曼人在建立国家以后有了等级的划分，但他们的等级按血缘关系和功劳大小划分，而且是逐渐形成的。等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日耳曼人在王国建立之初就有了像后来那种森严的等级阶梯，日耳曼人建国初期仍然是一个内部注重平等的社会。这就是当初的“蛮族文化”，与西罗马帝国国内的罗马—基督教文化是很不一样的。

其二，在日耳曼人眼里，农业和畜牧业最重要，土地最珍贵，因为当他们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时，经常发生饥荒，只有依靠逃荒和四处劫掠为生。日耳曼人不从事商业经营，也不懂商业的意义和作用。他们对商业的唯一了解，就是把牛羊、兽皮、木材、矿石卖给罗马商人，换取粮食、布匹、日用手工业品和葡萄酒之类的商品。有时，他们之中有些人带些土特产来到罗马帝国的边境城市，摆摊出售。这些人亲眼目睹了罗马城市的繁华和奢侈，他们既嫉妒，又自卑，转而对罗马人产生了厌恶和

仇恨。他们势力壮大和兵力强盛后，之所以对罗马城市恣意抢劫和焚烧，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厌恶和仇恨情绪的发泄。他们建立了王国，他们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国家是一个农业社会，把自己大大小小的领地变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庄园。他们释放了奴隶和俘虏，这也许与道德观念无关，而可能是认为庄园内不需要奴隶，而只需要安安心心替自己干活的佃户。久而久之，这些被征服的土地上的劳动力转化成依附于领主、同时又受到领主保护的农奴，而且世代相传。这是“蛮族文化”的另一个特征。

但日耳曼人来到帝国西部境内以后，尤其是在他们建立了王国以后，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同基督教当初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初期的情况相似。首先，信基督教的主要是穷人，因为基督教宣传要平等待人，要帮助弱者。后来，信仰基督教的富人渐渐多了，因为富人认为信仰基督教后是可以死后进天堂的。最后，王公贵族也信了基督教，国王同样信了基督教，因为在国王和贵族看来，基督教可以被用来安定民众，巩固政权，增加大家的凝聚力；终于从上到下都是基督徒了。罗马—基督教文化中的罗马帝国色彩、罗马皇帝色彩，在西部的日耳曼各个王国都被抹掉了，基督教文化则保留下来。至于保留还是不保留罗马教区的主教，则要看主教是不是同日耳曼各个王国的国王合作：合作的，就保留；不合作的，就废黜他，至少把他丢在一旁，不理不睬。

日耳曼人，从国王到普通人，当然不会信奉罗马—基督教文化中所谓罗马皇帝与上帝合而为一的说教，最后一位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是被迫退位了吗？皇帝对日耳曼人还有什么权威可言？皇帝同日耳曼人基督徒之间已经毫无关系了。日耳曼人加

入基督教徒的队伍后，他们也做礼拜，也听讲道，也参加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但他们对东西部教会的教义之争，从来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种争论不影响自己对基督教的虔诚，而且这场争议同自己毫无关系。日耳曼人也有充当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有穷人，也有贵族子弟。穷人之所以愿意充当基督教神职人员，是因为这是一项待遇不错的职业，而且在教职阶梯中有逐步上升的可能。贵族子弟之所以愿意充当基督教神职人员，是因为领主家庭实行的是一子继承制，以防止领主的庄园财产和土地不断被细分，实力不断被弱化，最终被其他领主吞并。除继承了财产和土地的一子外，其他子弟需要另谋生路，或从军，或赋闲，或成为神职人员。于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逐渐日耳曼化了。随着神职人员的日耳曼化，西部的基督教会也走向日耳曼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部，罗马—基督教文化逐渐演变为“蛮族—基督教文化”，也就是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很难说这种“蛮族文化”中采纳了多少罗马经典作家的学说，也很难说在罗马帝国时期流行的斯多噶学派、犬儒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哲学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蛮族王国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影响。①

西部，是罗马的发祥地，罗马文化在这里形成，罗马文化有过自己辉煌的年月，但这里只是受到亚得里亚海对岸的希腊古典文化的影响，而并未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冲击。西部从来不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西部的罗马—基督教文化在向“蛮族—基督教文化”即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的过程中，同东部

① 参看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8—79页。

的罗马—基督教文化的演变，完全是两条道路、两种轨迹、两个模式。

当然，在谈到罗马文化向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的过渡时，并没有贬低罗马文化对此后西欧文化的影响的意思。希腊文化的影响，已如上述，但是，"我们迄今为止讲的希腊思想的历史，其实毋宁说是希腊罗马的思想也许更恰当些"①。虽然，"无论在科学或在哲学上，拉丁作家都不是首创者。但想到我们对于希腊思想的知识，从卢克莱修、西塞罗、塞内卡以及其他诸人所得的裨益，我们若不承认罗马的贡献，实在不公平。"②承认罗马的贡献，并不等于抹煞中世纪西欧各国的研究者更多地崇尚希腊古典作家的人文精神这一事实。

## 四、走向拜占庭文化

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掉后，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存在了一千年左右，并且一度十分强盛。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奥多西二世临朝期间（公元 408—450 年），尽管西罗马帝国这时仍在勉强维持着，但西奥多西为了表示东罗马帝国不同于西罗马帝国，就强调希腊语的重要性，认为拉丁语是"野蛮的"语言，就规定官方语言一律采用希腊语。公元 425 年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时，希腊语教师多于拉丁语教师。

东罗马帝国自己从不使用"东罗马"一语，它一直以罗马帝国自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它更是如此。但从公元 6 世纪初

---

①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节选），陈修斋译，载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 年，第 233 页。

② 同上。

开始，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大多数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他们是军队出身，是受军人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们受希腊式教育长大，希腊文化或希腊化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远远大于罗马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他们都是基督徒，但他们也都尊奉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根本不理会罗马教区。

当时已经有了“拜占庭人”这种说法。但“拜占庭人”仅指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人而已。① 而对于君士坦丁堡以外的东罗马居民，或者称他们为“希腊人”，或者笼统地称他们为“东部人”。西部的罗马人仍习惯地把君士坦丁堡称作“新罗马”，把西帝国称作“罗马”或“罗马尼亚”。②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那里的罗马人多少有些怀旧的心理，把东罗马帝国称作罗马，把“拜占庭人”也称作罗马人。

公元 527 年，查士丁尼一世当上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出生于巴尔干半岛，接替他的舅父查士丁一世（公元 518—527 年）登上皇位。在他临朝期间，东罗马国力强盛，查士丁尼一世以恢复昔日的罗马帝国为目标，带兵西征，最盛时，他收复了意大利半岛、北非的突尼斯、西班牙南部、西地中海的三个大岛（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为此他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他再也没有力量去收复高卢、西班牙北部和不列颠了。但他的功绩足以受到当时人的赞扬而无愧。

更重要的是，拜占庭文化在查士丁尼时期终于形成。希腊化文化、东方文化、罗马—基督教文化中各有一些内容被纳入拜

---

① 参看卡尔德利斯：《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② 参看同上。

占庭文化之中，其中主要的是希腊化文化。拜占庭文化的形成是长时间内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反复较量的最终结果。从希腊化文化到拜占庭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在罗马征服安提柯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后，希腊人先是成了罗马人（他们取得了罗马公民身份），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他们又成了“东部人”或东罗马人，再随着东罗马帝国越来越希腊化，希腊人又被称为希腊人，他们自己也以希腊人自称了。然而，这时的希腊人已经不再是几百年前的希腊人，因为他们不是希腊宗教的信徒，而成为基督徒了。①

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的主流是希腊化文化，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吸纳了更多的东方文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更加突出皇帝本人，更加神化皇帝，也更加严厉地打击异教。查士丁尼一世为了表明自己是神的化身，也就是神，所以到后来，常住在皇宫中，深居简出，平时连大臣都不容易见到他。他每说一句话，都由内侍传达到朝廷，就像神的旨意一样。他到处兴建教堂，耗费了不少钱财，为的是炫耀自己，证明自己的伟大使命在于弘扬基督教。他打击异教毫不留情。在他以前，尽管基督教早已定为罗马国教，但历代罗马皇帝还为异教和异教徒保留一小块活动余地，这就是希腊本土的雅典。不同意基督教教义的学者和他们的追随者，可以到雅典去，在那里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雅典实际上就是异教的庇护所，也成为非基督教文化的中心。查士丁尼一世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决

① 参看卡尔德利斯：《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心根除境内异教的残余，于公元529年关闭了雅典的学院，教授们被赶走，有些人无法在国内安身，只好逃往伊朗。学院的财产也被没收了。拜占庭文化中的东方色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文化专制、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查士丁尼时期的东罗马帝国达到了极点。

这一切都表明，在拜占庭文化的背景下，希腊化文化同基督教教会结合得更紧了。[①] 基督教树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东罗马专制政治树立了牢固的权威，皇帝就是二者的后台、支持者和决策者。

查士丁尼一世渐渐老了，他的性格发生变化，变得多疑，总是疑心别人在暗算他。即使是自己周围的最亲信的大臣、高级将领，他也怀疑这些人在阴谋结党谋反。尽管他收复罗马城时曾得到罗马教区主教的帮助，但他在基督教教会领导问题上决不让步。在他看来，既然西罗马帝国已经消失好几十年了，只有东罗马帝国才是唯一的罗马帝国，罗马教区有什么理由不归君士坦丁堡管辖呢？在涉及皇帝本人就是基督教最高领导者的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

查士丁尼一世甚至对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也不放心。他担心元老院成员中有人反对皇帝独揽大权，甚至暗中支持反对派，所以一再对元老院成员进行排队、清洗，一些元老院成员被杀害或被投入监狱，家产被没收。从此，元老院成员对查士丁尼一世唯命是从，再没有人敢于不听从皇帝的旨意了。结果，在东罗马帝国的疆土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使得一种新的经济和

---

① 参看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第32页。

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①。于是拜占庭文化体现于拜占庭体制的建立：一种利用基督教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独裁的体制在以前的希腊化世界建立了。

至此，罗马文化还剩下什么？罗马人自己的宗教变成异教了；罗马公民权已经普遍授予希腊化世界的希腊人了；罗马的权力制衡设计早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期间就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对雅典学院的容忍已走到了尽头，学院被封，教授被逐；最后，连元老院这一罗马文化的最终痕迹，也消失了。从此，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看到的是蛮族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取代，看到的是走向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的趋势；而在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内，看到的是拜占庭文化成为主流，拜占庭文化中包含了希腊化文化和东方文化，却找不到罗马文化。

基督教文化依然存在。日耳曼人成了基督徒，东罗马臣民也都是基督徒，但无论在原来罗马帝国的东部还是西部，同基督教相结合的都不是罗马文化，罗马—基督教文化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在西部，同基督教文化相结合的是蛮族文化；在东部，基督教文化已经融合在拜占庭文化之中了。何况，融合到拜占庭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也已经不是君士坦丁一世时的基督教文化了，因为查士丁尼一世所突出的拜占庭文化中，皇权和神权已经高度合一，而且皇权被置于神权之上，从而使皇权和神权都增添了大量神秘的色彩。又过了大约 500 年，到公元 1054 年，东部教会在经历长期争吵、斗争之后，终于同西部教会最后决裂，

---

①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修订版，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69 年，第 28—29 页。

东正教由此产生。①

那么，古典的希腊文化这时还剩下什么？同罗马文化一样，希腊古典文化也只留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留在一些还记得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历史的人的记忆中。但古典的希腊文化毕竟与罗马文化还有差别，差别在于：希腊古典文化中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宪制、公民权利等思想并没有随着城邦制度的解体而消失，它一直存在于希腊文化曾经传播的地区。凡是同希腊上述思想有相同或相似内容的罗马文化，被认为是罗马人接受了希腊文化的产物，它们也没有随着罗马共和制转向帝制而消失，只不过人们更多地认为这是希腊人文主义的留存，而不记得在罗马文化的遗产中也有人文主义的成分；至于罗马文化中为罗马共和时期所特有的内容，如权力制衡设计、对法律的尊重、公民权的普惠和公民平等、对集权的指责等等，则都随着罗马帝制的产生和发展而被淡化了，消失了。到后来，罗马文化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只剩下与基督教文化相结合的罗马—基督教文化了。但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罗马—基督教文化是不稳定的：在帝国东部，拜占庭文化代替了罗马文化，同时又把基督教文化融入其中。而在帝国西部，当日耳曼人灭掉西罗马帝国并建立了一些日耳曼王国之后，罗马—基督教文化演变为蛮族文化，基督教仍保留下来，但这已经成为蛮族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结合，最后，形成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

罗马文化被人们遗忘了。虽然希腊古典文化也在人们心中淡化，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首先发现的是希腊文化遗产。比如

---

① 参看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15 页。

说，“以1500年为准，意大利人曾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希腊文”①。佛罗伦萨就是人们学习希腊文的中心。此外，在罗马等城市“几乎一直聘请希腊文教师”②。对古典文化首先是对希腊文化的尊崇，主要是汲取其中的人文主义因素。尽管希腊人文主义中有不少是非基督教的内容，但并不减少人们学习希腊文的热情。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力图证明人文主义和基督教是可以调和的。③ 相形之下，对罗马文化的关注却逊于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关注。也许，对罗马历史遗迹、古城建筑的兴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较为突出。④ 对罗马法的研究热情可能要到17—18世纪以后才在法国、英国、德国兴起。⑤

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长期较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应该说仍是希腊文化占了上风。这不是偶然的。罗马共和国确实征服了希腊本土，征服了希腊化世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人？从这时起，“罗马人承担了把希腊文化推广于西方的使命”⑥，这种说法并不夸张。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罗马文明史在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当时，罗马第一次被带进了同希腊的接触之中。我们处处将会看到此后希腊文化是如何渗透到罗马的各方面的。希腊向罗马提供了艺术和文学，教导罗马以哲学，覆盖和几乎摧毁了罗马本地的宗教，甚

---

①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2页。

② 同上。

③ 参看同上书，第203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174—175页。

⑤ 参看周枬、吴文翰、谢邦宇：《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50—51页。

⑥ 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4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年，第237页。

至书写了它的历史。失去了希腊，欧洲陷入黑暗时代；重新发现希腊，欧洲各国又开始思考”①。

由此看来，希腊本土即便于公元前 2 世纪中期被罗马征服了，但希腊和希腊文化一直存在着。“为了起警示作用，科林斯被毁灭了，马其顿成为行省；但像雅典和斯巴达这样的城市则让它们自己管理自己，虽然外交政策仍受制于罗马当局。”②为什么对雅典和斯巴达采取这样的政策？可能在希腊历史上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典型的城邦，各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治理方式，也都有过自己的影响，所以罗马人要保留它们，以显示罗马对希腊人的宽容。对于雅典，罗马可能有更多的考虑，即雅典历来是希腊的文化中心，罗马看中了雅典的文化价值，认为这是地中海周边城市中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替代的。于是在罗马统治希腊化世界的时间内，“雅典继续讨论、写作和讲授。它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大学城，高贵的罗马人为了学习而被送到这里来。甚至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当阿卡亚被补充列入罗马行省名单之时，这并不意味着雅典不再是自由的城市。在罗马帝国时期，比较有教养的罗马皇帝，如尼禄和哈德良，喜欢把他们的时间在希腊度过，试图分享它的知识的魅力”③。

后来呢？到公元 4 世纪，君士坦丁一世信仰了基督教，并确立了皇位世袭制，雅典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它继续宣传在基督教看来是异教的思想。再往后，在公元 361 年罗马帝国最后一位

① 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 4 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 年，第 23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8 页。

③ 同上。

敌视基督教和信奉异教的皇帝朱里安临朝后，他想振兴希腊哲学并借用其学说作为对付基督教的依据。[①] 雅典似乎又受到重视，但朱里安只当了两年皇帝。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加速传播，雅典依然是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心。这就是雅典。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公元 529 年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关闭雅典学院为止。[②] 雅典学院的关闭意味着拜占庭文化的全面胜利，尽管拜占庭文化中也有希腊化文化的成分，但罗马文化的成分却很难找到，东方文化陆续代替了罗马文化的位置。

以上所说的就是从希腊化文化、罗马—基督教文化走向拜占庭文化的全过程。

不仅文化上希腊化文化与拜占庭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思辨方式也如此。可以认为，"拜占庭是希腊化时期思辨方式的继承人"[③]。例如，从观察世界的方法上看，希腊化时期的习惯是向后看，追溯往事会使人感到欣慰，感到美好。拜占庭时期人们的眼光也一样，他们总是把眼光固定在古典时期遥远过去的光荣之上，较近一些事迹常被他们忽略不计。[④] 自亚历山大死后的几百年内，希腊化文化的这一特征在西亚、北非一带一直保存下来。罗马征服这一带的希腊化王朝之后，希腊化文化的这一特征始终未变：从罗马帝国前期的一些有作为的皇帝，直到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基督教皇帝，全都如此。[⑤] 这就不得不令

① 参看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 4 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 年，第 238 页。

② 参看同上。

③ 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年，第 8 页。

④ 参看同上。

⑤ 参看同上书，第 9 页。

后人感到惊讶:为什么在希腊化世界的土地上,希腊化文化有如此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是它的源头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东方文化的作用?还是吸收了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二者部分内容的希腊化文化的力量?这是一个可供继续探讨的课题。

拜占庭文化形成了,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形成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如果说它们之间多多少少存在一些联系的话,基督教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联系。但基督教已经分裂,东部教会组织和西部教会组织已经成为不可相容的两大对立组织,到后来,连教义、教规、仪式、节日、教职等都不一样了,[1]还有什么相互沟通可言呢?甚至在语言文字方面,拜占庭文化影响下的东部和中世纪西欧封建文化影响下的西部,也是不同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罗马官员为了便于统治,早就使用希腊语和希腊文了,直到后来官方正式采用希腊语言文字,而把拉丁语和拉丁文字排除在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 而在罗马帝国西部地区,在日耳曼人占领并建立了一些日耳曼王国之后,拉丁语和拉丁文却是通用的,那里从不使用希腊语言和文字,但使用拉丁语文并不意味着日耳曼人的“蛮族文化”已经改变了。

拜占庭文化对西欧封建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十字军东征以后。查丁士尼一世去世后,东罗马帝国又陆续丧失了被查丁士尼一世收回的西欧土地,而在西欧,不久就出现了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分裂了,西欧又增添了一些日耳曼王国,“拜占庭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未完全中断,只是在十字军东征以前,这

---

① 参看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52—53页。

② 参看卡尔德利斯:《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种文化交流依然是较弱的”[1]。公元10世纪起，在意大利境内出现了一些城市共和国，它们同拜占庭之间有过不少商业往来，但也仅仅限于商业往来而已。如果说拜占庭文化对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影响，那是很有限的。意大利这些城市共和国的居民，对拜占庭人总是感到很可笑，感到怪怪的：他们留着长胡子，穿着几百年前式样的衣服，不会说拉丁语而只说希腊语，甚至连他们的谈吐、礼仪都是旧式的，他们祈祷和做礼拜的规矩也不同于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居民，这有什么可供借鉴和学习的呢？即使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到达了意大利，也只是到此为止，很少越过阿尔卑斯山往北。[2] 直到十字军东征以后，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贵族们一手扶植的拉丁帝国建立以后，西欧人不仅较多地了解拜占庭及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历史、民俗、人情，而且更被那里的繁华所吸引了。从此，拜占庭对西欧来说不再是一种传闻，而是由黄金和珠宝堆砌起来的富裕之乡，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宝库。虽然拉丁帝国是短命的，只存在几十年，但拜占庭留给西欧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留下深刻印象与接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基本上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拜占庭文化的影响除了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即原来的希腊化世界而外，还包括东欧、俄罗斯等地。拜占庭被土耳其人灭掉以后，它仍然存在于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内，不过范围越来越狭小了。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本章一开始曾经指出，希腊化时期

---

① 杰弗雷斯和曼戈："走向法兰克—希腊文化"，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② 参看同上。

是一个时间概念，它随着托勒密王朝的灭亡（公元前30年）而结束。① 这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分析的结果，因为托勒密王朝的灭亡表明希腊化王朝统治时期的结束。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那么能不能说土耳其人于公元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最后一个王朝佩利奥洛格斯王朝灭亡了，这才是希腊化时期最后结束的年份呢？因为在这以前，希腊化文化仍然支配着拜占庭社会，是拜占庭的主流文化。这种从文化史角度的分析，是不是可以成立，也是可供进一步探讨的。至于拜占庭文化传入俄罗斯，俄罗斯也曾自命为“第三罗马”，即它把自己看成是拜占庭的直接继承者，那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拜占庭文化或希腊化文化进入俄罗斯之后，就被包容在俄罗斯文化之中了。②

---

① 参看本书，第991页。

② 参看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76页。

# 引用书刊索引

（按作者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 A


阿克罗伊德：《古代希腊》，冷杉、冷枞译，三联书店，2007 年。（23、27、92、93、117、151、323、349、391、440、551、556、577、609、610、636）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583、584、585、594、595、599、601、602、603、607、608、614、616、617、620、927）

阿希莱：《马其顿帝国：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年代，公元前 359—前 323 年》，麦克法兰出版公司，伦敦，1998 年。（Ashley, J. R., *The Macedonian Empire: The Era of Warfare Unden Philip Ⅱ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359-323 B. C.*, Mc Farland & Company, lnc., Publishers, London, 1998.）（375、389、440、583、584、594、596、615、616）

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Ogden, D., ed.,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ctives*,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 Co. Ltd., London, 2002.）（604、627、639、640、685、686、702、703、705、748、749、828、833、834、877、939、940、958、1015、1016）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253、254、256、260、261、265、266、268、269、270、276、289、411、421、422、431、433、434、435、577、578、596、597、757、759、760、815、820、821、859、863、

871、872)

奥斯顿费尔德编:《希腊的罗马人和罗马的希腊人:文化相互作用研究》,阿鲁斯大学出版社,2002 年。(Ostenfeld, E. N. , ed. , *Greek Romans and Roman Greeks: 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2.)(740、858、1028)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修订版,鲁吉斯大学出版社,1969 年。(Ostrogorsky, G. ,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Revised Edi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9.)(1047、1059)

奥斯汀和维达尔-纳奎:《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导论》,英译本,奥斯汀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 年。(Austin, M. M. , and Vidal-Naquet, P. ,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An Introduction*,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Translated by Austin, M. 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48、49、53、56、57、101、136、137、138、160、162、177、179、187、326、327、338、343、344、415、420、421、422、453、495、561、623、624)

## B

巴格纳尔、提罗编:《希腊化时期:史料译丛》,第 2 版,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牛津,2004 年。(Bagnall, R. S. , and Derow, P. , ed. , *The Hellenistic Period: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2004.)(626、712、720、828、832、833、843、917、918、954、963、964)

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 年。(Bilde, P. , Engberg-Pedersen, T. , Hannestard, L. , and Zahle, J. , ed. , *Conversity Value of the Hellenistic Greek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7.)(603、613、614、687、690、959、960)

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陶笑虹、庄万友、周柏青等译,涂厚善校,商务印书馆,1999 年。(606、815、820)

白钢:"光从东方来",载白钢主编:《希腊与东方(思想史研究第 6 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年。（43）

白钢主编：《希腊与东方（思想史研究第 6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43）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505、507、508）

贝恩斯：《希腊化文明和东罗马》，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年。（Baynes, N. H., *The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East Ro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447、650、655、932、1026、1034、1037、1058、1063）

比罗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国际关系"，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Billows, 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abin, P., Wees, H. V., and Whitby, M.,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Greece,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ise of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639、717、727）

波德曼：《前古典时期：从克里特到古风时期的希腊》，企鹅图书公司，哈蒙兹渥斯，1967 年。（Boardman, J., *Pre-Classical: From Crete to Archaic Greece*, 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1967.）（17、18、26、32、37）

波拉等：《古典希腊》，时代—生活丛书出版公司，亚历山大里亚，美国弗吉尼亚州 ，1977 年。（Bowra, C. M.,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Classical Greece*, Time-Life Books lnc., Alexandria, Virginia, USA, 1977.）（21、22、31）

波梅罗依："家庭的价值：对过去的利用"，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Pomeroy, S. B., "Family Values: The Uses of the Past," in Bilde, P., Engberg-Pedersen, T., Hannestad, L., and Zahle, J., ed., *Conventional Values of the Hellenistic Greek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77.）（687、690、959、960）

波斯渥斯：《征服和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王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

(Bosworth, A. B., *Conquest and Empir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610、616、619、656、661、750、751、827、872)

伯里和梅吉斯:《希腊史(到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第 4 版(修订版),圣马丁出版社,纽约,1975 年。(Bury, J. B., and Meiggs R.,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with revision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25.)(41、80、81、92、110、111、115、116、124、127、128、129、135、136、147、438、440、441、442、446、447、448、449、450、451、452、624、625)

伯尔斯坦:《希腊文化的前哨:黑海岸边赫拉克利亚的兴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 年。(Burstein, S. M., *Outpost of Hellenism: The Emergence of Heraclea on the Black S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124、125、597、598、599、633)

伯尔斯坦编译:《希腊化时代:从伊普索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七世去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Burstein, S. M., edited and translated,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u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Ⅶ*,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751、752、830、832、834、835、839、958、963、966)

博登:"装甲步兵和荷马:战争、英雄崇拜和城邦意识",载里奇和谢普莱编:《希腊世界的战争和社会》,鲁特莱奇出版公司,伦敦,1993 年。(Bowden, H., "Hoplites and Homer: Warfare, Hero Cult,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Polis," in Rich, J., and Shipley, G., ed.,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Routledge, London, 1993.)(44、52)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97 年。(1061)

戴尔·布朗主编:《失落的文明: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李旭影译,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22、23、24、25、26、28、29、32、33、34、596)

布朗德:"大草原和海:公元前一世纪以前黑海地区的希腊化北方",载奥格登

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载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Braund, D., "Steppe and Sea: the Hellenistic North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before the First Century B. C.," in Ogden, D., ed.,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ctives*,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 Co., Ltd., London, 2002.)(702、703)

布朗森:色诺芬著《长征记》一书英译本序言,载色塔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431、432、595)

皮埃尔·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578、580、597、628、753、816)

皮埃尔·布里昂:"大流士三世帝国的透视",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Briant, Pierre, "The Empire of Darius Ⅲ in Perspective," in Heckel, W., and Tritle, L. A., ed., *Alexander the Great, A New History*,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West Sussex, U. K., 2009)(603、604)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译,赵世瑜校,商务印书馆,2000 年。(1051)

C

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20、21、25、27、34、37)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97、98、544、545、578、609、629、630、652、654、668、673、697、698、747、766、768、795、802、846、907、917、921、928、958、989、990)

陈恒选编:《西方历史思想经典选读》(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57)

陈启云:"文化传统与现代认知:历史主义诠释",载《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508)

陈思贤:《西洋政治思想史·古典世界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47、481、515、534)

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21、89、435、458、551、565、718)

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三联书店,2003年。(102、462、1039)

## D

戴维斯:《民主和古典希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8年。(Daries, J.,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50、438、439、457、458、469、499、504)

戴维斯:"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相互渗透关系",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Davies, J.,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Hellenistic Sovereignties" in Ogden, D., ed.,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ctives*, The Classical Press of the Wales and Duckworth worth & Co. Ltd., London, 2002.)(639、640、705、1015、1016)

狄金森:《希腊的生活观》,彭基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0、76、151、166、247、532、1010、1011)

董乐山:《苏格拉底的审判》译序,载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501)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35、99、139、179、181、204、334、335、336、617、618、678、700、704、705、710、738、771、772、774、777、778、779、780、830、831、892、893、899、906、911、913、914、915、922、923、930、932)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卷《东方的遗产》,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260、262、267、282)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24、33、84、85、87、88、114、115、117、119、120、122、126、141、

144、155、188、200、206、207、208、216、217、222、224、230、239、242、268、269、270、273、275、278、280、298、299、300、305、312、323、324、325、342、343、350、351、361、365、371、389、399、406、408、409、410、411、436、458、523、539、554、556、567、573、574、579、580、590、591、605、606、613、618、665、666、679、691、692、714、715、760、809、810、811、832、837、838、860、878、912、913、929、930、936、961、962)

杜兰:《世界文明史》第 3 卷《恺撒与基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年。(722、723、737、738、852、853、951、959、967、969)

E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 年。(174、175、210、211、244、571)

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潘光旦译注,载《潘光旦文集》第 1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45、74、297)

F

阿哈默特·费克里:《埃及古代史》,高望之等译,科学出版社,1956 年。(110、264、276、289、601、602)

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65、66、73、87、135、149、151、152、156、303、323、328、339、368、376、434、497、506、583、584、592、608、609、610、611、612、667、668、707、709、712、713、720、724、725、747、748、753、762、763、770、773、786、790、793、794、808、811、836、837、860、864、867、868、869、870、871、872、879、886、887、891、892、893、894、896、902、908)

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年。(70、75、76、142)

福克斯哈尔:"古代希腊的农耕和作战",载里奇和谢普莱编:《希腊世界的战争和社会》,鲁特莱奇出版公司,伦敦,1993 年。(Foxhall, L., "Farming and Fighting in Ancient Greece", in Rich, J., and Shipley, G., ed., *War and So-*

*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Routledge, London, 1993.)(457)

福莱斯特:《斯巴达史》,第3版,布里斯托古典丛书出版社,伦敦,1995年。(Forrest, W. G., *A History of Sparta*, third ed.,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London, 1995.)(142、146、379、380、398、696)

福斯:"城市和乡村的生活",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Foss, C., "Life in City and Country," in Mango, C.,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030、1031)

G

高尔德纳:《希腊世界:社会学分析》,哈泼和劳出版公司,纽约,1965年。(Gouldner, A. W., *The Hellenic World: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65.)(69、71、73、77、207、209、210、215、258、396、397、403、416、424、455、463、464、530、531、534、535、536、537)

格兰格尔:《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马其顿帝国的瓦解》,汉勃尔顿丛书出版中心,伦敦,2007年。(Grainger, J. D., *Alexander the Great Failure: The Collapse of the Macedonian Empire*, Hambledon Continuum, London, 2007.)(635、636、637、658、659、664、665)

格林:"蛮族的变质:变动世界中的雅典泛希腊主义",载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历史论文集(公元前360—前146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诺曼,1996年。(Green, P.,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Barbarian: Athenian Panhellenism in a Changing World," in Wallace, R. W., and Harris E. M., ed., *Transitions to Empire, Essays in Greco-Roman History, 360-146 B. C., in Honor of E. Badi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1996.)(537、538)

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257、258)

格罗特:《〈希腊史〉选》,郭圣铭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43、318、319、320、

321、322、479、485、486)

葛剑雄:“纸的起源与传播”,载上海《文汇报》,2011 年 8 月 15 日。(906)

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 年。(648、692、1041、1055)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闫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1999 年。(95、317)

古朗士(中译本译为“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61、63、64、132、133、134、149、164、165、201、314、315、320、365、366、488、490、491、693、1006、1007、1020、1029、1030、1040)

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61、63、64、132、133、134、149、164、165、201、314、315、320、365、366、488、490、491、494、693、1006、1007、1020、1029、1030、1040)

郭小凌:“梭伦改革辨析”,载《世界历史》1989 年第 6 期。(206、220、221)

郭小凌:“希腊军制的变革与城邦危机”,载《世界历史》1994 年第 6 期。(307、308、404、480、531)

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载《世界历史》1999 年第 6 期。(189)

**H**

哈丁编译:《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伊普索战役》,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Harding,P. ,ed. and translated,*From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Battle of Ips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622、626、636)

哈里斯:“马其顿早期帝国史导论,公元前 360 年—前 300 年”,载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历史论文集(公元前 360—前 146 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诺曼,1996 年。(Harris,E. M. ,“The Early Imperial History of Macedon,360-300 B. C. ,”in Wallace R. W. , and Har-

ris, E. M. , ed. , *Transition to Empire, Essays in Greco-Roman History, 360-146 B. C. , in Honor of E. Badi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1996. )(559、561)

哈尔:"希腊时代的国际关系",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Hall J. 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Sabin, P. Wees, H. V. , and Whitby, M. , ed.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Greece,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ise of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3、159、162、572、577)

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211、214、215、288、290、291、345、346、423、504、510、511、513、536、538、539、558、574、575、607、612、613、643、651、682、683、734、1012、1021、1024、1033、1038)

何芳川:《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845、932)

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6、51)

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46、51、53)

赫克尔:"不信任的政治:亚历山大和他的后继者们",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Heckel, W. ,"The Politics of Distrust: Alexander and His Successors,"in Ogden, D. , ed. ,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ctives*,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 Co. Ltd. , London, 2002. )(604、627、639)

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Heckel, W. , and Tritle, L. A. , ed. , *Alexander the Great: A New History*,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West Sussex, U. K. , 2009. )(551、573、574、578、579、580、581、582、599、602、603、604、620、621、622、623、629、630、644、647)

赫克尔:“亚历山大对亚洲的征服,”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Heckel,W.,“Alexander's Conquest of Asia,”in Heckel,W.,and Tritle,L. A.,ed.,*Alexander the Great*:*A New History*,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West Sussex,U. K.,2009.)(599、602)

赫克尔:“国王和他的军队,”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Heckel,W.,“A King and His Army,”in Heckel,W.,and Tritle,L. A.,ed.,*Alexander the Great*:*A New History*,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West Sussex,U. K.,2009.)(620)

赫丽生:《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谢世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24、550)

华莱士和哈里斯编:《转向帝国:纪念巴廷的希腊罗马历史论文集(公元前 360—前 146 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诺曼,1996 年。(Wallace,R. W.,and Harris E. M.,ed.,*Transition to Empire*,*Essays in Greco-Roman History*,*360-146 B. C.*,*in Honor of E. Badi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1996.)(537、538、559、561、568、569、576)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彭树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 年。(603、752、753、823)

黄天海:《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766、767、803、805、806、836、839、840、934、935)

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载《世界历史》1994 年第 1 期。(183)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39、55、56、66、67、85、99、109、118、134、135、140、154、182、205、239、549、550、586、587)

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36、72)

黄洋:“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载《历

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213、214、242、243)

惠特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Wheatley, P. ,“The Diadochi, or Successors to Alexander,”in Heckel, W. , and Tritle, L. A. , ed. , *Alexander the Great: A New History*,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West Sussex, U. K. , 2009. )(621、622、623、629、630)

霍金森:“战争、财富和斯巴达社会的危机”,载里奇和谢普莱编:《希腊世界的战争和社会》,鲁特莱奇出版公司,伦敦,1993 年。(Hodkinson, S. ,“Warfare, Wealth, and the Crisis of Spartiate Society,”in Rich, J. , and Shipley, G. , ed. ,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Routledge, London, 1993. )(427、429、430)

J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22、55、67、80、82、143、150、178、229、285、393、550)

加布里埃尔森:“希腊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Gabrielsen, V. ,“Warfare and the State,”in Sabin, P. , Wees, H. V. , and Whitby M. , ed.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Greece,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ise of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5、286、400、419、420、553、585)

杰弗雷斯和曼戈:“走向法兰克—希腊文化”,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Jeffreys, Elizabeth, and Mango, C. ,“Towards a Franco-Greek Culture,”in Mango, C. ,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65)

杰克逊:“奥德赛世界中的战争和战利品掠夺”,载里奇和谢普莱编:《希腊世界的战争和社会》,鲁特莱奇出版公司,伦敦,1993 年。(Jackson, A. ,“War

K

科克、阿德柯克、查尔斯渥斯编:《剑桥古代史》第7卷《希腊化的君主国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Cook,S. A. ,Adcock,F. E. ,Charlesworth,M. P.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 7,*The Hellenistic Monarchies and the Rise of Rom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636、657、664、670、673、674、684、688、701、706、708、710、713、716、759、761、769、772、773、775、809、861、866、873、876、877、878、879、887、888、898、899、914、915、919、920、931、932、940、941、957、1013、1014)

科洛能:"罗马叙拉古希腊语与拉丁语地位不相等的三个案例",载奥斯顿费尔德编:《希腊的罗马人和罗马的希腊人:文化相互作用研究》,阿鲁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Korhonen,K. ,"Three Cases of Greek/Latin Imbalance in Roman Syracuse," in Ostenfeld, E. N. , ed. , *Greek Romans and Roman Greeks*:*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2.)(740)

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5、38、42、55、59、61、62、65、72、98、100、101、103、109、111、152、159、162、163、236、237、284、306、311、314、322、326、366、487、496、497、533)

L

劳埃德:"早期托勒密时期的埃及精英:若干象形文字的证据",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Lloyd,A. B. ,"The Egyptian Elite in the Early Ptolemaic Period: Some Hieroglyphic Evidence," in Ogden, D. , ed. ,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tives*,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 Co. Ltd. , London,2002.)(877、939、940)

伦东:"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社会,"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1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Lendon J. E. ,"War and Society," in Sabin, P. ,

Wees, H. V. ,and Whitby,M. ,ed. ,*The Co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Vol*. 1,*Greece*,*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ise of Rom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428、1026)

里奇和谢普莱编:《希腊世界的战争和社会》,鲁特莱奇出版公司,伦敦,1993 年。(Rich,J. ,and Shipley,G. ,ed.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Routledge,London,1993. )(44、52、56、107、108、403、404、427、429、430、457)

里尔:"希腊早期的战争、奴隶制和殖民地,"载里奇和谢普莱编:《希腊世界的战争和社会》,鲁特莱奇出版公司,伦敦,1993 年。(Rihll,T. ,"War Slavery,and Settlement in Early Greece,"in Rich,J. ,and Shipley,G. ,ed.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Routledge,London,1993. )(107、108)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编,商务印书馆,2006 年。(184、217)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编,商务印书馆,2006 年。(125、593、1066)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年。(329、330、480)

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 年。(328)

廖学盛:"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阶级斗争,"载《世界历史》1989 年第 6 期。(205、226、227)

廖学盛:"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载《世界历史》1997 年第 2 期。(141、169、213)

刘军:"近代西方公民权利发展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武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 2 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68)

卢伯克:"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Roebuck,C.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Peloponnesian War,"in Strian,J. ,ed. ,*The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Greece*,Holt,Rinehard and Win-

ston,lnc.,New York,1971.)(384、388)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 年。(122、344、517、869、1054)

埃杜阿尔·勒·鲁瓦:《西方文明》序言,葛雷、齐彦芬译,载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 年。(1041)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节选),陈修斋译,载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 年。(648、1055)

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宋桂煌译,载葛雷、齐彦芬编:《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 年。(692)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212、449、489、509、510、1033、1034)

罗斯:"希腊宗教的起源",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Rose,H.J.,"The Origins of Greek Religion,"in Strain,J.,ed.,*The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Greece*,Holt,Rinehard and Winston,Lnc.,New York,1971.)(127)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1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Rostovtzeff,M.,*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Vol. 1,Th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41.)(421、663、669、670、674、675、676、681、682、685、687、690、708、764、768、772、782、783、787、788、790、791、792、800、801、815、816、817、818、890、894、904、905、909、910、911、912、920、921、923、924、930、933、988)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 2 卷,克莱伦顿出版公司,牛津,1941 年。(Rostovtzeff,M.,*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vol. 2,Th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41.)(337、648、649、653、654、661、677、697、698、699、700、702、703、704、733、734、735、746、763、787、790、791、795、796、826、828、829、830、832、833、844、845、855、897、898、907、912、916、917、929、956、957、965、966、977、978、981、982、984、991、992、

993、994、998、999、1001、1012、1013、1030）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495、529、778、812、834、835、848、849、856、895、910、929、943、945、946）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836、857、863、864、873、880、882、883、899、900、901、902、903、944、955、978）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31、100、122、126、495、593、610、744）

**M**

D. B. 马丁："希腊人的迷信"，载巴尔德、恩贝格-彼得森、汉纳斯塔德、查勒编：《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传统价值》，阿鲁斯大学出版社，1997 年。（Martin D. B.，"Hellenistic Superstition，"in Bilde，P.，Engberg-Pedersen，T.，Hannestad，L.，and Zahle，J.，ed.，*Conventional Values of the Hellenistic Greeks*，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7.）（603、613、614）

T. R. 马丁：《古代希腊：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 年。（Martin，T. R.，*Ancient Greece：From Prehistoric to Hellenistic Tim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17、30、31、41、42、68、133、134、142、168、259、302、303、322、349、350、351、380、381、392、393、397、406、456、537、545、547、549、556、559、570、618、760、800）

马哈菲：《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文化的发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5 年。（Mahaffy，J. P.，*The Progress of Hellenism in Alexander's Empi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5.）（548、621、671、745、802、807、808、928、930、934、955、960、961、982）

马哈菲：《希腊的生活和思想：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的征服》，阿尔诺出版公司，纽约，1887 年初版，1976 年重印。（Mahaffy，J. P.，*Greek Life and*

*Thought*: *From the Age of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rno Press lnc., New York, 1st editon, 1887, reprint edition, 1976.)(588、630、634、636、645、646、649、650、661、704、721、725、726、809、828、831、865、875、924、925、1017)

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1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8、79)

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Mango, C.,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027、1030、1031、1032、1065)

曼戈:"新宗教,旧文化",载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Mango, C., "New Religion, Old Culture," in Mango, C.,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032)

蒙森:《罗马史》第1卷,李稼年译,李澍泖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99、111、112、113、115、116、117、120、121、498)

蒙森:《罗马史》第2卷,李稼年译,李澍泖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568、616、715)

米莱特:"战争、经济和古典雅典的民主",载里奇和谢普莱编:《希腊世界的战争和社会》,鲁特莱奇出版公司,伦敦,1993年。(Millett, P., "Warfare, Economy,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 in Rich, J., and Shipley, G., ed.,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Routledge, London, 1993.)(403、404)

米列塔:"国王和他的土地:关于希腊化小亚细亚王室土地的若干看法",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年。(Mileta, C., "The King and His Land: Some Remarks on the Royal Area of Hellenistic Asia Minor," in Ogden, D., ed.,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ctives*,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 Co. Ltd., London, 2002.)(748、749、828、833、834)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48、

**N**



**O**



**P**

潘光旦: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译注,载《潘光旦文集》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5、74、297)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黄民兴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603、752、753、823)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王新刚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26、27、744、779、796、797)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41、146、151、450、451、452)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2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600、611、714)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448、688、689、691、692)

## Q

琼斯:"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年。(Jones, T. B., "Minoans and Myceneaeans", in Strain, J., ed., *The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Greec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1.)(17、20、32、36)

## R

阮炜:"舶来的'怪力乱神'",载《读书》2010年第4期。(43)

茹贵:《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化世界》,英译本,道比译,阿里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85年。(Jouguet, P.,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English lanquage edition, translated by Dobie, M. R., Ares Publishers, Inc., Chicago, 1985.)(429、652、653、684、685、690、691、692、716、720、807、843、874、877、882、885、897、902、926、942、966)

## S

(172、176、244、245、332、333、334、335、364、431)

色诺芬:《经济论》,载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244、245、431)

色诺芬:《雅典的收入》,载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172、176、332、333、334、335、364)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363、367、418)

舍拉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战争和国家",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Serrati, J., "Warfare and the State," in Sabin P., Wees, H. V., and Whitby, M.,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Greece,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ise of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634、664、775、776、865、891、892、900、901、903)

石敏敏:《希腊人文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501、502、506、507)

舒扎:"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军事力量:海军",载萨宾、威斯、维特比编:《剑桥希腊罗马战争史》第 1 卷《希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Souza, P. de, "Military Forces: Naval Forces," in Sabin, P., Wees, H. V., and Whitby, M.,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Greece,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ise of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558、595、617、638、721、723)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东山译,三联书店,1998 年。(500、501、502)

斯塔斯:《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庆泽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508、520、521、522、523、525、590)

斯塔尔:《希腊早期经济和社会的成长(公元前 800—前 500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年。(Starr, C. 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800-500 *B.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61、62、71、75、105、106、107、126、

129、138、181、185)

斯塔尔:"希腊化文化",载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Starr, C. G., "Hellenistic Culture," in Strain, J., ed., *The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Greec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1.)(638、645、651、679、713、756、776、777、817、864、1014、1018、1019、1029)

斯特兰编:《古代希腊的贡献》,浩特、莱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纽约,1971 年。(Strain, J., ed., *The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Greec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1.)(17、20、32、36、127、384、388、638、645、651、679、713、756、776、777、817、864、1014、1018、1019、1029)

斯特劳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雅典》,克罗姆·赫尔姆出版公司,伦敦,1986 年。(Strauss, B. S., *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Croom Helm Ltd., London, 1986.)(417、421、477、478、482、484)

斯托巴特:《希腊曾经辉煌》,第 4 版,普莱格出版公司,纽约,1964 年。(Stobart, J. C.,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4th edition,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64.)(553、673、678、686、690、704、746、1061、1062、1063)

史继忠:《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117、128、141、272、460、464、526、926)

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147、238、293、424、437、553、554、560、562、574、629、694)

**T**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614、660、661、789、979)

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39、123、124)

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国家和社会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 年。(Tread-

gold, W. ,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835、969、1044)

特里特尔:"亚历山大和希腊人:艺术家和士兵,朋友和敌人",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 年。(Tritle, L. A. ,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Artists and Soldiers, Friend and Enemies," in Heckel, W. , and Tritle, L. A. ed. , *Alexander the Great: A New History*,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West Sussex, U. K. , 2009. )(644、647)

D. 汤普逊:"早期托勒密埃及的家庭",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Thompson, D. , "Families in Early Ptolemeic Egypt," in Ogden, D. ed. ,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ctives*,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 Co. Ltd. , London, 2002. )(958)

J. W.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652、653、738、822、856、982、985)

W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147、155、445、513、516、517、589、590)

王晴佳:"伟大的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载郭圣铭、王晴佳主编:《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413)

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辞海》,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 年。(178、364、424、897)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576、1021、1022、1031、1039)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彭树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 年。(26、27、744、779、796、797)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262、263、606、815、817、

(125、263、264、423、429、445、626、677、687、698、707、708、710、711、715、815、816、821、822、825、829、875、905、943、944、954、963、964、965、966、1003、1006)

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年。(50、76、77、153、340、341)

吴恩裕:亚里士多德著《雅典政制》中译本序言,载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511、515)

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40、42、60、69、70、146、240、413、414、476、503、527、549)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三联书店,2008年。(21、30、45、51、52、54、57、58、71、137、150、151、152、171、185、199、224、227、283、347、348、425、426、441、472、552、557、558、560、573、647、675、831、891、913、919、928、931、988、989)

吴于廑:"希腊城邦的形成及其历史特点",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年。(58、71、185)

吴于廑:"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载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附录,三联书店,2008年。(647、675、831、891、913、919、928、931)

武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1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45)

武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2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68)

**X**

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47、170、418)

西塞罗:《国家篇》,载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47、418)

西塞罗:《法律篇》,载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170)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 年。(78、333、367、465、640)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83、102、109、110、121、122、145、155、206、253、261、262、263、265、269、889、959)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82、83、133、143、144、148、178、239、271、272、275、277、278、279、281)

夏遇南:《罗马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 年。(114)

筱敏:“圣火”,载《随笔》2008 年第 2 期。(461、463)

谢普莱:“隐藏的风景:希腊田野调查资料和希腊化历史”,载奥格登编:《希腊化世界:新观察》,威尔斯古典出版社和杜克渥斯出版公司,伦敦,2002 年。(Shipley, G., “Hidden Landscapes: Greek Field Survey Data and Hellenistic History,” in Ogdan, D., ed., *The Hellenistic World: New Perspectives*,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and Duckworth & Co. Ltd., London, 2002.)(685、686)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 1 卷,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358、503、504、509、5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35、81、149、169、171、384、387、388、389、390、391、392、412、41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116、395、405、406、407、408)

**Y**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194、196、197、199、202、208、212、219、221、222、225、226、232、233、235、238、239、301、302、306、315、338、339、453、454、511、51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28、90、135、141、148、154、155、156、157、233、234、235、352、353、383、454、512、514、550)

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 年。(525、526、1032)

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西欧文明》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806、1009、1019)

叶孟理:《欧洲文明的源头》,华夏出版社,2000 年。(46)

伊文斯:《希腊化时期的日常生活:从亚历山大到克娄巴特拉》,格林渥德出版社,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2008 年。(Evans, J. A., *Daily Life 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U. S. A., 2008.)(524、557、596、672、676、680、704、750、829、935、946、997、1022、1023)

伊凡诺夫:《伊朗史纲》,李希泌、孙伟、汪德全译,三联书店,1973 年。(259、266)

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24、25、47)

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载武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第 1 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145)

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237、238)

晏绍祥:“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载《世界历史》2004 年第 1 期。(524、1015)

晏绍祥:弗格森著《希腊帝国主义》译后记,载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592)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18、19、30、37、41、44、50、51、54、62、63)

晏绍祥:“古代希腊作家笔下的荷马”,载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附录 1,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44)

晏绍祥:“早期希腊史研究的新趋势”,载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附录 2,上

海三联书店，2006年。（18、19）

晏绍祥："演说家和希腊城邦政治"，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148、218、219）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60、1064）

Z

扎尔恩特："马其顿背景"，载赫克尔和特里特尔编：《亚历山大大帝：新历史》，维莱一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英国西苏塞克斯，2009年。（Zahrnt, M., "The Macedonian Background," in Heckel, W., and Tritle, L. A., ed., *Alexander the Great: A New History*, Wil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West Sussex, U. K., 2009.）(551、573、574、579、580、581)

周枬、吴文翰、谢邦宇：《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1061）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820、823）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752）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816）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80年。（134、167、360）

朱龙华：《罗马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21）

# 后　　记

30年前，当我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开设“经济史比较研究”一课时，希腊古代经济史安排在第二讲。安排为第一讲的是“原始社会的经济”，其中重要论点后来在我所著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做了表述，并由经济出版社出版了（1999年出版，2010年修订版）。后来的几讲，也在前几年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年出版）、《罗马—拜占庭经济史》（2006年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2010年出版）中加以阐释。读者也许会问我：希腊古代经济史为什么拖到最后才交稿呢？从历史顺序上应当早就出版的，却排到了最后才交稿，原因何在？我只能如实地奉告：这部希腊古代经济史与我以前的有关读书笔记和讲稿中的出入是最大的，修改是最多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对希腊古典时期的民主制度的总体评价有了重大的变化，有些章节必须重写。整理读书笔记和整理原稿的过程，实际上是重新构思和重新调整思路的过程。

问题不在于对希腊古典时期奴隶制经济的看法。在这方面，我在本书中表述的观点同30年前基本上仍是一致的，即在我看来，“奴隶制社会”一词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奴隶制经济只不过是希腊城邦以及后来的希腊化王朝辖区内多种经济成分中

的一种，而且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通常依附于其他某一种经济成分。例如，国有矿山、国家公共设施和国有企业中使用了奴隶，这可以看成是依附于国家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私人兴办的工商业企业、小作坊、小商店、私人农场中也使用了奴隶，这也可以看成是依附于私人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家庭中所使用的奴隶，同样是依附于家庭的，不能把这种形式下对奴隶的使用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经济成分。在希腊城邦中，社会中对立的双方从来就是贵族和平民，他们都是自由人，而且都是城邦的公民。在我已经出版的《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一书中，已经阐明这一论点了。在这部《希腊古代经济史》中，我仍坚持这一看法。

那么，我的观点的重大改变究竟在哪里？在于对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的看法。在以往的读书笔记中，我认为雅典或斯巴达所实行的公民大会制度是体现了公民的民主精神和决策的民主性的。如果说斯巴达还保留了较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的话，那么雅典则是经过了梭伦以来的历次改革，直到伯里克利改革。长期的改革，即制度调整，使雅典的民主制度臻于完善。因此，30 年前的我，在读书笔记中对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充分肯定的、称赞的，我认为这是古代西方世界对以后的政治制度的积极贡献之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过的书籍、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使我原有的看法逐渐改变。后来去希腊考察，在雅典城内外的古希腊遗址上，在科林斯地峡的两侧海岸，我想到的很多。我想：难道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制度真的像某些历史研究者笔下所赞美的那样完美吗？否则怎么解释公元前 4 世纪前期雅典城邦的危机和雅典社会危机的交织而引起的民怨情绪呢？怎么说明从那以后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斯多噶学派的学说会风

行一时呢？又怎么全面解释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的动乱和斯巴达从此一蹶不振，以及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人对科林斯的彻底摧毁呢？

那种公民通过抽签方式轮流担任公务人员的做法，既制止不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土地的不断集中，又不能把民意真实地表达出来。公民大会所惯用以鼓噪方式通过的决议，难道就是真正的民意吗？即使是陪审团用投票方式做出的判决，难道一定是真正民意的表露吗？在民主的口号下实行的违反法律的暴力行为难道还少见吗？从众不一定代表真理，媚众很可能导向对真理的歪曲。民主啊民主，假借这一名义所干的破坏民主的事件，在希腊境内难道还少吗？为什么不少演说家这样活跃，不正因为他们的演说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从而引起不同政治派别的追随者为下一步的暴力活动做好准备么？

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不断加剧，双方的情绪不断升温，各方都通过正常的程序把政治领导权夺来夺去，有的得势了，有的失势了，得势的一方乘机打击失势的一方，失势的一方不甘心失败而蓄势再来，准备夺回失去的权力。公民大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未变，但谁也不想真正着手改善民间最为关心的改善民生和缩小贫富差距问题。

谁最失落？谁最绝望？是穷人。社会上最担心的是出现一批绝望者，他们对历来被公民们引以自豪的雅典民主体制感到失望、绝望之后，一切可以束缚自己行为的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都被置之脑后。这样，在雅典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极端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平民极端派。他们走向极端，诅咒现实社会，而采取的手段却是破坏现存秩序。他们走向街头，以富有煽动性的言辞

或口号，号召人们起来打破旧秩序。他们还以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于是一场极具破坏力的平民极端派专政的局面出现了。到处抓捕富人，没收富人财产，杀害他们，放逐他们，甚至波及不少小康之家。整个社会处于恐怖、惊慌之中。诬陷成风，告密成风，谁也不想被陷害而遭到厄运，谁都不愿生活在这样的无秩序状态中。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不管是富人还是小业主们，甚至包括穷人，都紧张地、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无政府的社会中。大家都宁肯出现一个能使人人过上平安生活的“僭主”统治，而不愿听任“民主到极点”的极端分子继续执政，继续横行，继续实施暴政。有些人宁愿看到外来的征服者把自己“解救”出苦海，而不管这个征服者是波斯人还是马其顿人。

雅典式的城邦民主走到了尽头。到了菲利普二世率领马其顿军队南下击败希腊城邦联军时，雅典人对现实生活中民主的滥用已不存任何希望了，而古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早已一去不复返，可望而不可即了。他们抛弃了幻想，宁肯现实一些，再现实一些。只要菲利普二世和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承认希腊城邦有城市自治权，承认雅典还能作为希腊文化中心的典型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也就心满意足，别无奢求。

这段历史的重新探讨，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社会秩序对雅典人，也包括全体希腊人在内，比什么都重要。直接民主或民主的滥用只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丧失，导致“集体暴政”、“集体僭主”，而社会秩序的丧失才是雅典人、希腊城邦公民最大的灾难。进一步说，社会秩序为什么会丧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变形，实际上也就是民主的扭曲和变质。民主和暴政并不是不能转化的：在民主的旗帜下，民主并非不可能演变为暴政。何

况，任何民主制度在当初设计时不是没有考虑制衡机制的，但制衡机制最终为什么在雅典失灵了呢？甚至最终不再起作用了呢？民主中应当包含制衡机制，并让这种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而不致失灵，这才是研究古典时期希腊史时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在希腊诸城邦中，雅典还算是最幸运的。雅典受到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的宽待。安提柯王朝时期雅典仍是受宽待的。一直到罗马人来到，雅典依然受到重视，雅典人生活如常，其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的地位未变。雅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一直认为：社会秩序与民主权利相比，民主权利固然重要，社会秩序更加重要；僭主政治固然不可取，民主的滥用比这更糟。历史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教训。

斯巴达远没有雅典这样幸运。在雅典自梭伦改革之后经历了多次改革（制度调整），直到伯里克利执政的同时，斯巴达仍然坚持着古老的氏族社会传统，没有制度调整的打算。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失地农民也不断增多。执政当局还是没有制度调整的迫切感。马其顿人南下了，亚历山大东征了，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分治了，安提柯王朝在马其顿和希腊本土站稳脚跟了……这么多的事件没有触动死守祖先惯例的斯巴达领导层；这么长的时间内经历了多少届政府，谁也没有准备进行改革。斯巴达依旧是讲民主、讲纪律、讲程序的城邦，尽管这时的城邦已经不再是古典时期的城邦，而已成为安提柯王朝统治下只给予有限自治权的城邦，但“双国王制”仍保留着，公民大会仍保留着。

斯巴达的改革一拖再拖，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照常存在，而平民派中的极端分子却再也无法等待，终于借着国王们准备

改革并着手初步改革的混乱之际，成为斯巴达政局的主导力量，极端的措施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无序和动摇。结果遭到了安提柯王朝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其他城邦的一致抵制、打压。斯巴达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从此它在希腊境内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斯巴达的教训告诉后人，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越是拖延所付出的代价越沉重。甚至可以说，改革原来还是有可行性的，拖到最后，改革已不可行了。混乱滋生暴力，暴力破坏秩序，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改革？

科林斯的遭遇比斯巴达更坏，结果更惨。这时已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人已经消灭了安提柯王朝，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全境。科林斯由于城邦内部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依旧激烈，社会动荡不已，平民中的极端分子夺得了政权，鼓动科林斯人对富人进行清算，包括重新分配土地，驱逐和处死富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连一般市民也遭到迫害。不少人，包括一般的公民，逃出了科林斯，连财物都不要了，性命比财物重要得多。罗马在希腊的驻军首领派兵对科林斯进行镇压。以平民极端派为代表的科林斯号召并组织群众同罗马军队在科林斯激战，结果失败。罗马人杀害了幸存的男性，把妇女和儿童全体变卖为奴，科林斯全城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毁。科林斯遭此浩劫，无疑是侵略者罗马军队的残暴所致，但同样无疑的是，此举含有向被征服的希腊各城邦警告之意，即告诉希腊人，反抗罗马占领的后果就是如此。然而仔细分析，罗马之所以如此残酷地镇压科林斯，在一定程度上同平民极端派在执政期间采取的极端措施有关。罗马原先认为，只要击败马其顿军队，灭掉安提柯王朝，把俘获的马其顿—希腊的官员中的反罗马分子押解到意大利半岛就可以维持

自己对希腊城邦的控制了。但科林斯平民极端派的反抗行动，表明这些平民极端分子的煽动力不可轻视，一旦他们把希腊人煽动起来了，社会秩序就会大乱，罗马统治下的希腊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最终必然导致罗马的撤退。这就是罗马决心彻底摧毁科林斯城的主要原因。

这样，在对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评价方面，我修改了以往在读书笔记中的看法。当然，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和民族社会背景，并且是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雅典制度调整的成绩需要肯定，制度调整的首创者可能有崇高的动机，但他们之中，有谁能想到用意高尚的改革会演变成后来的民主滥用和社会无序？有谁会想到以后的野心家使民主制度变了质？可见，民主的滥用所带来的灾难未必小于民主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灾难，公元前 4 世纪前期雅典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　　*　　*

在本书行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老友马克垚教授。他不仅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而且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使我受益良多。

我的学生和同事程志强、郑少武、滕飞、李金波、赵锦勇、蒋承、张文彬、傅帅雄、黄国华、刘玉铭、尹俊、吴玉芹和贾羽，给了我许多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书稿不可能准时交给商务印书馆。

我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郑殿华、范海燕、黄一方、宋伟等同志。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种精神代表了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

2011 年 11 月 28 日